

馬來西亞抗日軍

新馬僑友會編

香港見証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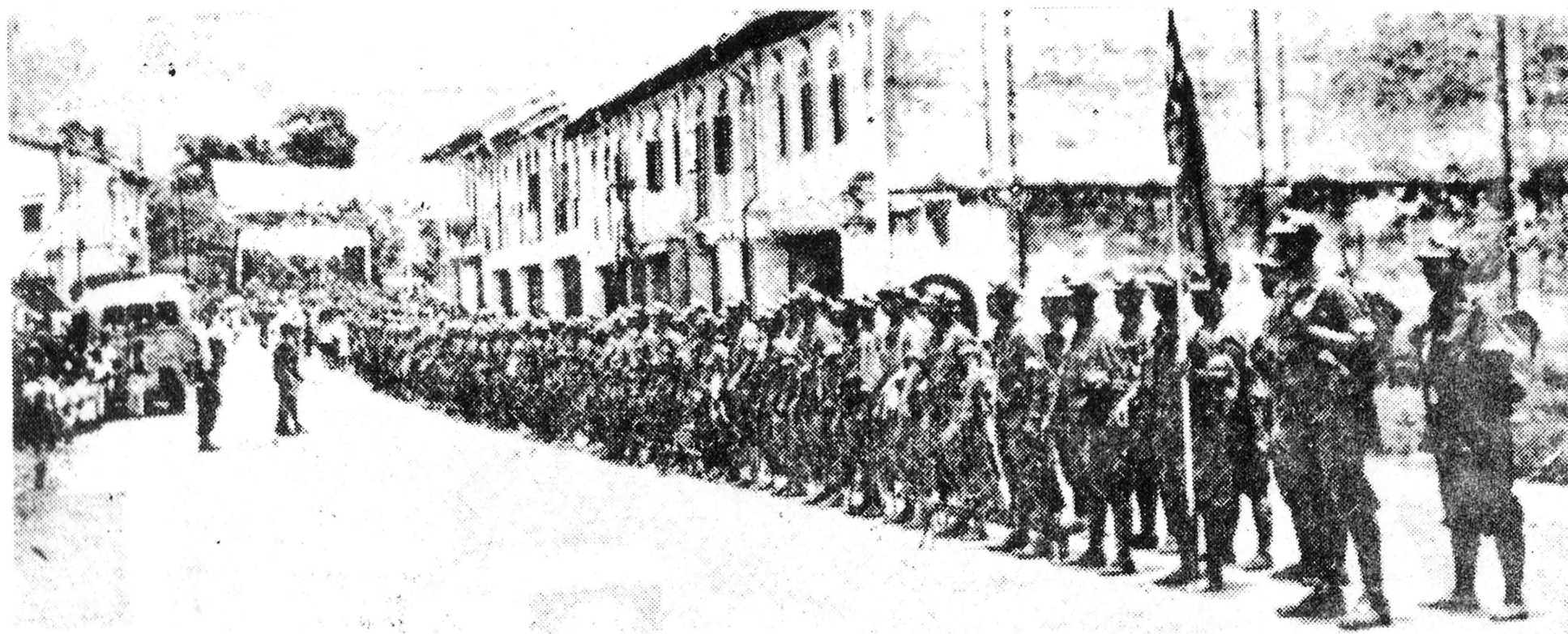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军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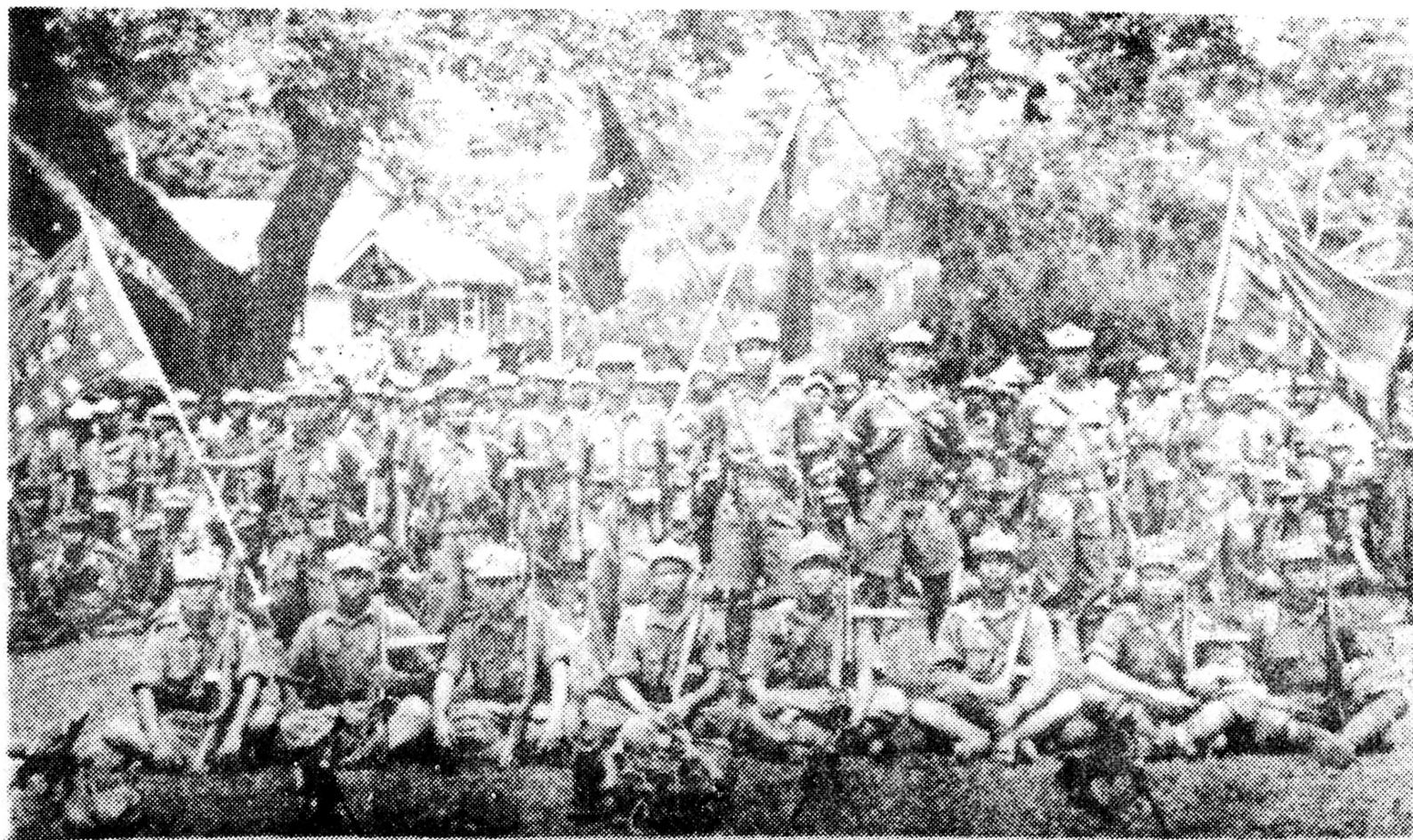
霹靂州積莪營人民歡迎人民抗日軍入城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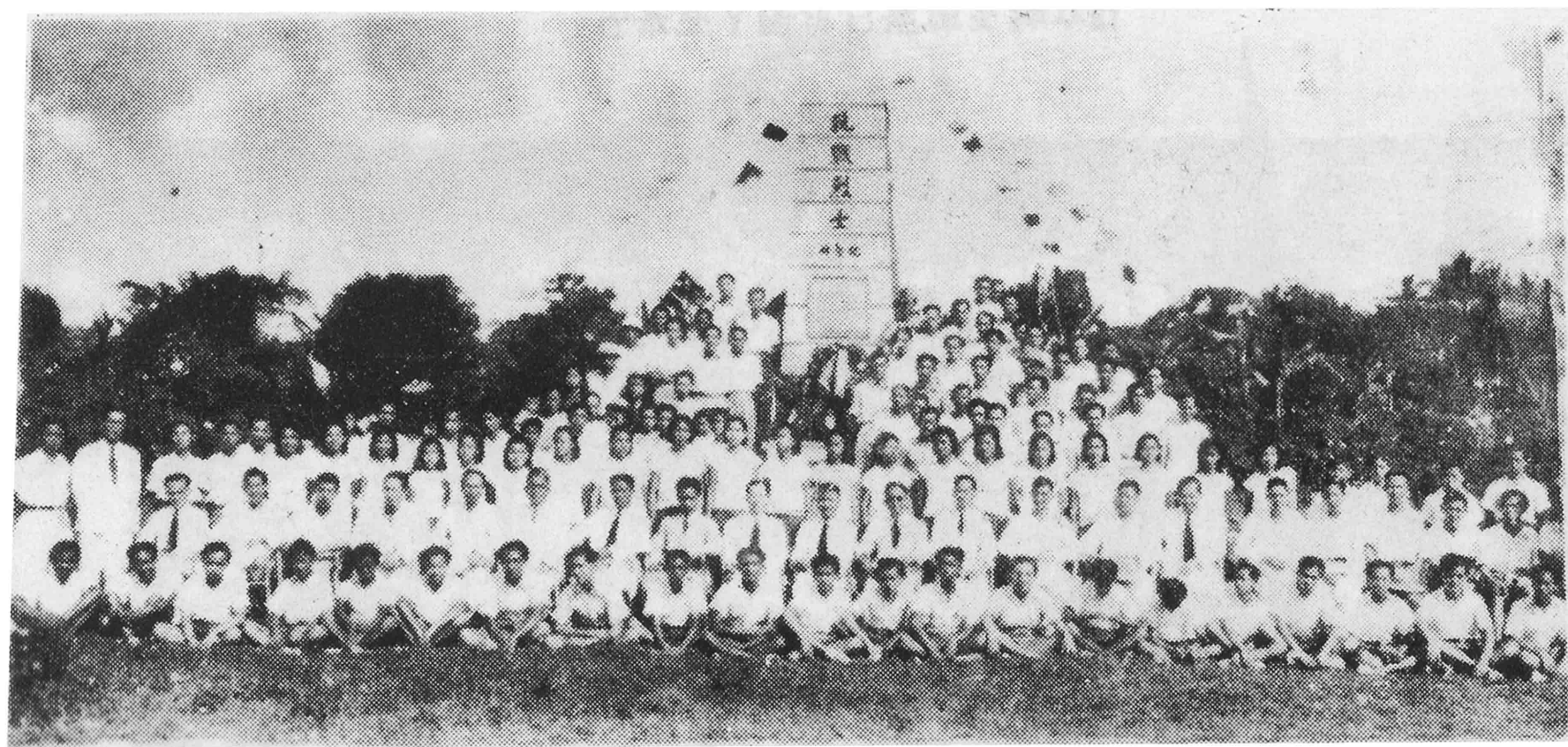
马来亚各族人民集会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本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驻各地城镇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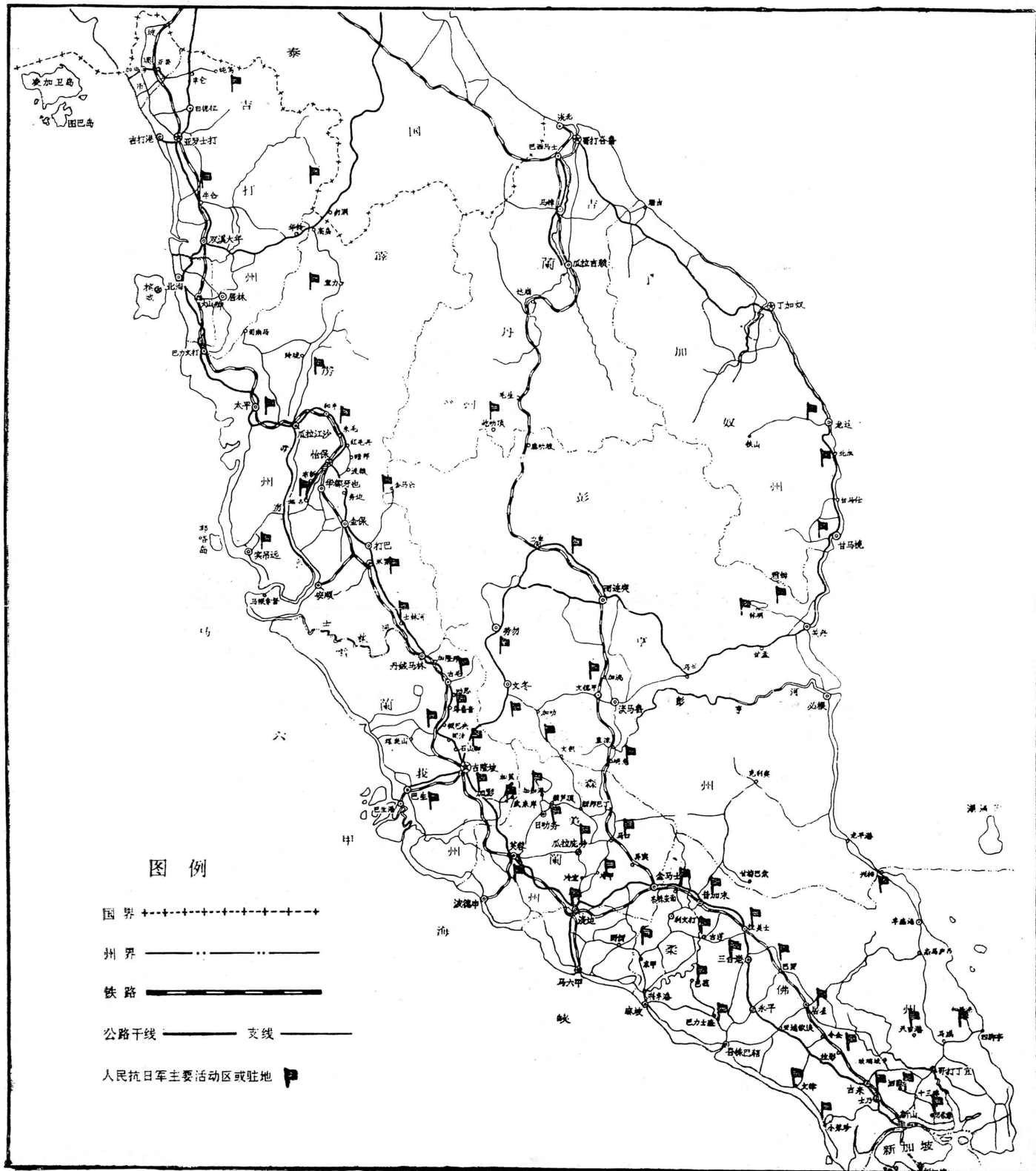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
第一中队部分指战员合影



1947 年吉蓝丹州抗日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

战前(1942—1945)马来亚示意图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主 编	司马乔	
责任编辑	曾冠彪	罗须磨
	文 训	梁 明
撰 稿 (第一至第七章)		
	曾冠彪	罗须磨
	林文光	文 训
	梁 明	亚 竹
	陈忠秋	
督 印	陈云彪	

新马侨友会编

序 言

这一本《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较为翔实地记载了 1941—1945 年 8 月期间，当地人民浴血奋战，坚持三年八个月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由马来亚共产党所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武装队伍。

这支人民军队，其成员来自马来亚各民族、各阶层，而以马来亚华人为主体的，深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在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逐步成长壮大。至日本投降前夕，除原有的独立队（称老队）外，为了与联军合作抗日，又扩建了八个独立队（称新队，其中有三个是原来的老队），合计共有六十七个中队，九千九百余人，加上全马各州的后备队、抗日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成员共达四万五千余人。

在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的三年八个月期间，人民抗日军与日军进行了约三百四十多次的大小战斗，共毙伤敌人五千五百余人。

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人民抗日的支柱，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不仅动摇了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使其妄图控制西南太平洋战略要冲及掠夺马来亚居东南亚首位的胶、锡等战略资源的阴谋不能完全得逞，还打击、牵制、分散了其兵力，支援了中国、苏联以及英美联军的对敌作战，对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人民抗日军写下了马来亚在被侵略时期由人民自己创立军队，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篇章。正是由于

人民抗日军的英雄业绩和马来亚人民在日治时期的痛苦经历，激发了马来亚各族人民战后要求国家独立解放的热情，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继而在马来亚各族人民和各党派의共同奋斗下，赢得了今天马、新两地的国家独立，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宣告结束。

可以肯定，人民抗日军的这段英雄业绩，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仍将继续激励马、新两地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建设繁荣昌盛的共和国而努力奋斗！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殖民主义体系残余思想的影响和各种偏见，至今仍然有人在蓄意歪曲马来亚抗日战争的历史，抹煞人民抗日军在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所建下的功绩。更为遗憾的是，为抗日的胜利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三千多位烈士及其家属不但得不到抚恤和嘉奖，相反，成千上万的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在1948年6月21日英殖民政府颁发的“紧急治安条例”下，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昔日抗日盟友，转眼变成阶下囚”。这种遭遇实在太不公平了！

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情况，过去在各地曾有过一些报道，但大都是片面和失实的。有些则是蓄意歪曲历史，把人民抗日军与联军合作抗日的情况和过程，篡改得面目全非，把英军在战时建立起来的情报联络组（即所谓的一三六部队）吹捧得功大如天，说什么人民抗日军是由他们组织、训练、供给粮食、武装才得于发展壮大；有些文章甚至把打家劫舍、冒充“华侨抗日军”的土匪组织与人民抗日军相提并论，混淆视听。凡此种种，均是无稽之谈。其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企图否认和贬低人民抗日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有一些报纸和某些书籍，对人民抗日军的情况，虽然作了一些善

意的报道，但因撰稿人不是当年战争的直接参加者，所收集的材料难免有其局限性，以致多有疏漏，甚至误传。

为了把被扭曲了的历史纠正过来，还其本来面目，同时确保这段宝贵的历史资料不致因时间的推移而被湮没，1987年初，在新、马侨友会的倡议和主持下，由曾冠彪、罗须磨、陆明、林文光、张昌、叶志辉、尹天雄、王汕平、吴亚浪、老卢、曾月华(亚珍)、文训、阿竹、陈六、若冰、汪友发等十六人，组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编辑委员会，拟订出写作计划，散发各地，广泛收集史料和征求意见，邀请各地熟悉情况的原抗日军退伍军人分别召开座谈会，选出专人对所收集的史料进行核实，分工整理，首先写出各独立队队史初稿，然后选出责任编辑四人，在各独立队队史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补充和修改，如此反复多次，经历四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此书的编辑工作。

在这里应该着重指出，马来亚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如果没有马来亚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拼死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抗日军来自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部队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壮大，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在日军的重重围剿下，部队所以能够机动灵活，安全转移或者迂回出击，并取得大小战役的胜利，也全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这种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在本书的有关章节里，都有较详细的叙述。

各族人民为马来亚抗日的胜利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实在太大了，功不可没。我们谨以此书，奉献给马来亚各族人民。因为这是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史，是马来亚各族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历史！人民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万

世流传！

同时，借此机会，对所有为反侵略正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抗日烈士及各族死难同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哀悼！

我们还要向社会各界大声疾呼：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在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大业中立下的不朽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其历史地位必须得到承认和公正的评价！

这就是我们编辑本书的基本宗旨。

为本书提供史料和参加编写工作的，都是曾经直接参加过马来亚抗日战争的原人民抗日军指战员，其中有独立队司令部党代表、队长，中队党代表、队长、政工人员以及民运工作者共百余人，所提供的史料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因年代久远，有些情况记忆不全，还有许多情节、人物、事件，尚未能一一罗列，许多数字无法准确统计，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希读者见谅。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海内外人士（大部分已是六、七十岁高龄），他们一如既往，不但无偿地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慷慨解囊，赞助经费，甚至不辞劳苦自费到各地采访、收集资料，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顺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注：

本书各章叙述中关于马来亚(或新、马)的地理概念，指的是英属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槟城、马六甲和海峡殖民地新加坡，亦即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和新加坡共和国。过去，新、马两地华侨，具有双重国籍的身份，两国独立后，大多数华侨已取得当地国籍，成为当地公民，双重国籍身份已不复存在。因此，本书在叙述时统称为马来亚华人，或新、马华人。

编 者

一九九一年元旦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战前马来亚的内外形势	1
一. 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的出现与日本准备南侵	1
二. 马来亚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初步形成	3
三. 英国殖民政府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推行消极防御致策	10
四. 马共积极准备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14
第二章 日军侵占马来亚,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	18
一. 大检证、大屠杀	18
二. 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疯狂的经济掠夺	20
三. 军事统治与血腥镇压	22
四. 愚民政策与奴化教育	25
五.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26
第三章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28
一.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建立与发展	28
二. 武装斗争的三个阶段	38
三. 人民抗日军的战术与作战方法	50
四. 除奸与收编群众自发武装	57
五. 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来源	64
六. 人民抗日军的政治教育	67
七.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功绩和历史地位	71
第四章 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73

一. 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战争	74
二. 大力支援人民抗日军	77
三. 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工作蓬勃开展	82
四. 各阶层联合共同抗日	85
第五章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东南亚联军的合作关系 ...	88
一. 合作的初始阶段	88
二. 马共暨人民抗日军与联军签订合作抗日协议的经过	91
三. 一三六部队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95
四. 人民抗日军积极准备配合联军反攻	99
第六章 日本投降与人民抗日军复员	105
一. 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05
二. 马共提出“八大主张”,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 ...	110
三. 马来亚重新沦为英帝国殖民地	117
四. 和平民主运动遭到残酷镇压	122
五. 人民抗日军复员	126
第七章 历史的回顾	131
附 录 各独立队成长战斗史	145
(一) 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的雪兰莪州第一 独立队	145
(二) 活跃在森美兰州的一支抗日先锋——第二独 立队	185
(三) 转战在柔北和马六甲的第三独立队	212
(四) 马来半岛南端的一面红旗——柔南第四独立 队	232
(五) 中北马的一支抗日劲旅——霹雳州第五独立 队	275

(六) 上彭人民的抗日支柱——第六独立队·····	307
(七) 战斗在东彭、丁加奴州的人民子弟兵——第 七独立队·····	338
(八) 吉打州第八独立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350
编后话·····	377
抗日战争烈士(部分)英名录·····	379
本书出版经费赞助人芳名录·····	383

第一章 战前马来亚内外形势

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 的形成与日本准备南侵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冲突频繁，国际局势激烈动荡，战争的阴云笼罩全球。

继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英、法两国政府被迫对德宣战，从而爆发了欧洲战争。德国纳粹军队以闪电攻势，迅速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直迫英伦三岛和北非。

1940年9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署了军事轴心同盟条约，妄图重新瓜分世界。

1941年6月22日，德军又以闪电战的方式，突然进攻苏联，迫使苏联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了，战争的性质也从原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战，转变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

1941年——1945年的南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必然发展。日本南侵是早有预谋的。从1931年开始，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东亚的美梦，就一直在亚洲大陆张牙舞爪，首先是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继而在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芦沟桥事件，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日本的这一野蛮侵略行为，遭到中国军民强有力的反击，并受到世界公正舆论的严厉谴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结成了广泛的爱国抗日统一战

线，全民奋起抗敌。到了1939年武汉战役之后，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的泥足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为了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一方面，它必须设法截断中国从南方获得外援的途径，以恢复其在中国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并以此威迫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另一方面，它也极需攫取东南亚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用来维持其对华的长期战争。

1941年7月28日，在日本陆军的支持下，近卫文磨再次上台，成立了亲纳粹的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4日，日军二万余人侵入印度支那南部，占据了向东南亚扩张的桥头堡。

1941年10月，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人内阁取代了近卫文磨政府。东条英机军人内阁上台后，便作出了立即向美英荷开战的决定，使日本的南侵计划进一步具体化。日本的南侵计划，其长远的战略目标是独霸亚洲，建立一个东起阿留申群岛，西到缅甸、印度，南到澳大利亚，形成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为新加坡不仅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而且又是太平洋与印度洋间的交通要冲，只有夺取了新加坡，才能有效地从海上控制东南亚以至南太平洋；而马来半岛的橡胶和锡的产量，则是居于东南亚各国的首位，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到了1941年11月初，日军大本营终于确定了向美英荷开战的日期。由陆军大将寺内寿一任日本南方派遣军的总司令，由山下奉文中将任侵马日军司令官，统率第二十五军辖下的近卫师团、第五、第十八师团发动进攻。日军侵马号称兵力十万，实际参加作战只有四万余人。1941年12

月8日，南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入侵马来亚，马来亚人民从此陷入沉重的灾难中。

二、马来亚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初步形成

（一）新、马华人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

据1941年的人口统计，新、马五百多万人口中，华人占二百三十七万余人，马来人占二百二十七万余人，印度人占七十四万多人。广大的新、马华人，不但和平时期为新、马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战争期间，更是风起云涌地投身到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中，为支持其宗祖国的抗战出钱出力，为抵抗日本对新、马的侵略和血腥统治而英勇战斗、壮烈牺牲；为争取战后马来亚的独立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直至日本侵马战争爆发初期，华人的抗日运动还是非法的、有罪的。许多人因抗日的罪名而被捕入狱，被递解出境。然而，马华抗日反帝民主运动是扼杀不了的。长期以来，新、马广大华人为争取抗日合法权利，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和民主，前仆后继地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马华人具有悠久的反帝反殖的民主运动历史传统，一方面是热爱其宗祖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宰割，尤其是后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要求民主，要求改善生活，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两个方面互为影响，互相促进，推动了马来亚民主运动的广泛开展。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马来亚人民（其中华人占大多数）便开始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34年，先

后爆发了铁路工人、煤炭工人大规模罢工和新加坡水兵的抗英起义；1935年，马来亚总工会（当时为非法的地下组织）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全马工人示威大游行，要求民主，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待遇；1936年，新加坡的清洁、运输、锯木、建筑等行业工人都先后举行了多次罢工斗争，在马来半岛也先后爆发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大罢工，以后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第一次新、马总罢工。这些斗争，不但锻炼了人民，同时也给了英殖民统治当局以沉重的打击。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来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更是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是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在马来亚，内部的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反对日本侵略已成为各民族共同的首要任务。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各族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以及华侨爱国抗日运动，必然地和反对日本侵略、保卫马来亚的抗日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条件已逐步具备。在这期间，马共召开了第六次中央扩大会议，针对当时的形势，对党的路线、方针作了调整，提出要求英殖民当局释放政治犯，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给以人民抗日的自由，武装民众，积极备战，坚决粉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阴谋。

在马共的领导下，新、马各地纷纷成立了各阶层、各行业（包括工、农、青、学、妇、文教界等）半公开的“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青年纷纷走上街头，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爱国的主张，推动各阶层、各行业进行义捐、义卖、义演、义唱活动，抵制

日货，打击汉奸走狗。工人抗日爱国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当年巴株巴辖 Batu Pahat（柔佛州）及甘马挽 Kg. K. Kemaman（丁加奴州）两地的日资铁矿，近万名工人先后举行大罢工，抗议日本侵华的罪行，迫使该两地矿场停产。从 1938 年至 1939 年期间，先后有新加坡电车工人、清洁工人、人力车工人、建筑工人、海港局工人；柔佛州新山的黄梨园工人；森美兰州马口橡胶工人；雪兰莪州煤炭山的煤矿工人、新街场锡矿工人、加影橡胶工人；霹靂州近打锡矿工人；檳城码头工人；彭亨州劳勿锡矿工人；丁加奴州龙运铁矿工人……等等，都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大示威。特别是 1940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加坡五万工人和人民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抗日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二）华侨中上层的爱国运动

在新、马抗日斗争史上，除了上述由工、农、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主流之外，华侨中、上层人士对抗日救亡工作，亦是不遗余力，这是应该肯定的。自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西安事变”的激励下，新、马华侨社会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摒弃以往的帮派成见和行会之争，走上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道路。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华侨中上层代表举行大会，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选出委员三十二名，由爱国侨领陈嘉庚担任主席。继新加坡之后，马来亚各地也相继成立了统一的筹赈机构，在各州首府设立总会，各地区设立分会。1938年10月10日，在一些华侨开明人士的倡议下，又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仍由陈嘉庚担任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任副主席，总办事

是设在新加坡怡和轩。至此，南洋华侨的抗日救国工作，开始有了一个合法的、统一的机构，推动了中、上层爱国抗日运动的开展。

华侨筹赈会成立后，为抗日救国曾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除向各侨团、侨商劝募特别捐和常月捐外，还发动各社团、学校举办义卖、义演、献金、献药，征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等等，成绩显著。例如，卖花筹赈是当时各阶层华侨响应最热烈、最普遍的一项爱国行动。据有关资料统计，1938年——1940年的三年间，新、马华侨通过各种方式捐款平均每月达四百多万元（旧国币，十五元折当时叻币一元）。征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半年之内报名人数三千二百余人，分成九批取道越南、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省，主要在长达三千多公里、地处崇山峻岭的滇缅公路上服务。

华侨筹赈会只是由各社团（主要是各地中华总商会）选派代表组成的一个协商性委员会，并无固定的团体或个人会员，其所以能在筹赈工作中取得成绩，关键是得到广大华族工农大众的有力支持。举凡筹赈会发起的爱国行动，如卖花、义演、抵制日货、发动日资铁矿工人罢工、征募华侨机工回国……等等，各界“抗敌后援会”无不全力以赴，带领群众走在最前列。如果离开了工农大众的全力支持，筹赈会单靠少数上层人士是难于完成大业的。1939年7月7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刊登一篇题为“抗战二周年与华侨”的文章，就曾坦率地指出：“救亡组织在马来亚，除了筹赈会而外，还有两大主流，第一是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第二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部。它们都在宣传、筹赈、除奸、抵货等目标之下工作，虽然受特殊环境的限制，仍不断地努力，那功绩是很大很大的。”

(三) 抗日阵线内的斗争

这种在抗日救国旗帜下的团结合作，标志着马来亚反法西斯抗日联合战线的初步形成，马来亚抗日民主运动面临空前的大好形势。

但是，英殖民当局对于人民的抗日觉醒却害怕得很，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它一方面对抗援会的各种抗日活动宣布为非法，实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又对华侨筹赈总会施加种种压力，禁止华侨筹赈会与抗援会接触。（逮捕侯西反并将他驱逐出境就是其中一例。）与此同时，当地华侨社会中的右派势力也跳了出来，与英当局一唱一和，把工农大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污蔑为“马共对抗日团体的渗透”，妄图在华侨社会中制造分裂。针对右派势力的这种分裂行为，抗援会以耶鲁、吴天、洪涛、英浪、厌之等五人联名的方式，于1938年7月30日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题为“我们的态度”的文章，向英当局表明态度：“希望当地政府充分认识我们的目的只是抗日救国，并且允许我们在合法公开的方式下，展开马华救亡运动。”文章还同时向上层侨领及各帮派、各社团发出呼吁：“我们认为在当前民族大危机之下，不论上下阶层侨胞，都有做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下，我们十分愿意和上层侨领以及各帮派各社团各地方各种信仰不同的侨胞，根据共同救国纲领来密切合作，来热烈地开展马华救亡工作。”

“我们的态度”一文发表后，在华侨各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上层开明人士以及广大工、农、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但少数的右派人物仍坚持其顽固立场，利用其控制的报刊、社团、继续向抗援会发起攻击，一时间，在抗日阵线内部引发了一场左派和右派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对中

国抗战和对马来亚抗日的态度问题。

关于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时值新四军“皖南事件”发生，国民党制造磨擦、制造分裂、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引起广大侨胞极大的愤慨，群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制造分裂，立即释放被捕的新四军指战员。在抗敌后援会内还组织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号召。群众的这一正义要求和爱国行动，却遭到了当时的右派势力的猛烈攻击。这一争论，曾经引起了华侨上层人士的关注。为了考察中国抗战的实情，慰劳前方壮士，1940年3月7日，南侨总会发起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全团五十余人，由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前往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及八路军延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实地考察，目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消极抗战的种种事实，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终于认清了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特别是陈嘉庚于考察完毕，归途中路经福建时，以其在国民党统治区考察的结果，直言不讳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势力在海外制造的种种谎言，澄清了是非。此后，海外少数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始略有收敛。

关于对马来亚抗日的态度问题，当时的右派言论，极力主张“华侨只谈爱国，支援祖国的抗战，绝不介入马来亚的抗日实际斗争。”这种“抗日分家”、自相矛盾的荒谬主张，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国际形势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当战火已经燃烧至马来亚门外的时候，大多数华侨上层人士终于觉悟到华侨具有“双重救亡任务”，承认“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侨胞，他们

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们的意志是坚定的，他们的热血行动和牺牲精神真足于撼天地，泣鬼神，他们认清日军的侵略是无止境的，决不会以攻占中国大陆为满足，他们会继续进攻东南亚，……”“英国政府对远东的局势，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们在马来亚布置了十万大军，但并无抗战的决心与士气，而手无寸铁的华侨，却热血沸腾，意志激昂。华侨认为远隔重洋的祖国抗战，固然要尽力后援，就是本身托足的居留地，也处于同样危急的地步，须予抢救。”（摘自《新马华人抗日史料》载“战前新马华人救亡运动”）这是华侨上层人士的爱国正义呼声，他们这种认识上和行动上的转变，为促进马来亚抗日大联合，创造了有利的气氛。

（四）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

马华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在组织上结成一体，实始于“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诞生。当时，马来亚战事已爆发二十天，马来亚半壁河山已陷入日军手中，日军兵临仕林河畔。在此危急关头，英国殖民当局才被迫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急不及待地请求陈嘉庚出面召开新加坡华侨总动员大会。会议于1941年12月30日举行，即席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由陈嘉庚担任主席；总务部主任叶玉堆、副主任刘玉水；劳工服务部主任林谋盛（中国国民党党员），副主任刘牡丹；保卫团主任郑古悦，副主任黄奕欢、陈锡清（马共代表）；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马共代表）；宣传部主任胡愈之，副主任唐伯涛、邵宗汉。对于当时的抗日大联合，战后出版的《大战与南侨》一书有如此追述：“此总会为当时华侨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之大联合阵线，其敌忾同仇之精神，团结一致之气象，有足垂为模范者。”其代表性之广，影响之深，由此可见。

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的同时，因受日本迫害而从中国华南各地前来新、马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士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沈兹九等人，于十二月下旬在直落亚逸爱同学校召开全星洲文化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交换对动员后方文化界参加新、马抗战工作的意见，即席决定组织“星华文化界战时文工团”（简称“文工团”），随即召开了成立大会，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文工团成立后，除了组织歌咏队深入各街道宣传抗战外，主要工作是配合抗敌动员总会民众武装部举办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前后招收了两批学员，经短期训练后，参加民众武装部的工作，然后分配到星华义勇军担任政训员。

抗敌动员总会以及星华文工团，从成立至解散，虽然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但对动员群众参加抗日，维护社会治安，组织星华义勇军参加保卫新加坡战斗等方面，曾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全马人民团结抗日作出了榜样。

三、英国殖民政府加紧镇压抗日

民主运动，推行消极防御政策

战后许多报刊、专著，在论述马来亚英军战败的原因时，往往都是归咎于双方兵力悬殊，说什么英军缺乏飞机、装备；有的则是指责英军士气低落，缺乏攻击精神；有的则埋怨马来亚气候炎热，湿度太高，使英军不能适应在如此的气候条件下作战……等等，却没有片文只字敢于披露马来亚迅速沦陷的最主要内因，是英国殖民当局顽固坚持其殖民统治政策所种下的恶果。

在三十年代末，面对着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威胁，空前觉醒的新、马各族人民要求联合抗日、保卫马来亚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与新、马人民高昂的抗日热情恰恰相反，英国殖民政府不但拒不接受马共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不给人民

以武装抗日的权利，而且变本加厉地残酷镇压新、马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禁止各行业工人组织合法的工会，禁止抗日的示威游行，取缔街头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就是对于像华侨筹赈会这样的合法社团，英国殖民政府也要加以限制，作了四条规定。即：（一）不得表明筹款助买军火，（二）不得提议抵制日货，（三）款项须统筹统汇，不得别设机关，（四）款项汇交国内何处，由总督指定。根据这四条规定，筹赈会只能成为慈善机构，不能称为抗日团体。

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下，当时许多进步民主人士遭到逮捕，并被递解出境。较早期因抗日而被拘捕并递解出境的有新加坡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王炎之、粘文华、苏棠影和辜俊英等四人，这就是当时曾经轰动新、马的“四君子”事件。随后陆续被逮捕监禁的抗日群众数以千计，先后被递解出境的也有多批。连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如侯西反）也不例外。到了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还有马共的主要成员林江石、戴英浪、陈荣火（陈青山）、江田、杨果、陈锡清等人遭到逮捕。林江石被捕后，在法庭上不顾法官的阻挠，发表长篇演说，公开阐明马共抗日主张，谴责英殖民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呼吁当局改弦易辙，依靠人民群众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他的演说博得了阵阵的掌声，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案件。杨果、陈锡清等三十余人于1941年底被递解出境，后因他们所乘的轮船在开往香港的途中，适逢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因而不得不折回新加坡。

英国殖民政府之所以如此加紧镇压新、马抗日民主运动，是与它顽固坚持殖民统治政策分不开的，它害怕人民的觉醒，将会直接威胁其根本利益，动摇其殖民统治的根基。当时的珊顿总督就曾经露骨地承认，他担心这种群众性的抗日民主

运动，最终“很可能改变成排日与抗英的运动。”一语道破了英当局的隐忧。

英国殖民政府的这一顽固立场，就是在马来亚战争爆发的初期，也没有改变过来。只是在前线节节失利，吉打、檳城已告失守的时候，才不得已接受马共的抗日主张，被迫同意无条件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近二百名政治犯，并同意马共选派骨干到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去接受游击战训练。到了马来半岛即将沦陷，英当局眼看大势已去，才不得不由新加坡总督汤姆士出面，匆忙召集陈嘉庚等社会知名人士举行紧急会议，要求人民“抛弃前嫌，同心合力，共济时艰。”即使如此，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时，它还对该总会的宗旨和任务作了诸多限制，只允许执行以下三项任务：（一）组织全市义勇警察，维持治安，及担任防空工作（每人只发给一根木棒）；（二）组织宣传队；（三）设立劳工服务团，代政府征雇民工。由于，马共派出的以林江石（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为首的十人代表团坚决提议武装民众，协同英军作战，这一动议获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在抗敌动员总会的组织机构里增设一个“民众武装部”，由林江石任该部主任，并立即着手组织“星华义勇军”。几天内就招募了三千多人，再三请求当局发给武器，参加作战。直到日军准备进攻新加坡的前夕，星华义勇军才从英国人手中领到勉强发给的一千支旧式步枪和猎枪，平均每支步枪配备十五发子弹。星华义勇军的指战员，就是凭藉这一非常简陋的武器走上前线，投入了保卫新加坡的壮烈战斗。

英国殖民当局在对新、马人民的抗日运动实施镇压的同时，对新、马的防务也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这是和它对日本

的侵略战争一贯采取的绥靖政策分不开的。这个政策的核心是鼓励日本北进，进攻苏联，妄图利用苏联西伯利亚的辽阔土地拖住日军的大部主力，而无力向南扩张，以免它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不过是英、美政府的如意算盘而已，而日本的南侵是其既定政策，并不曾因为英、美的引诱而有所改变。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曾多次向日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甚至以“石油禁运”相威胁，谋求与日妥协。到了1941年10月，当日军大举南移，四万余日军开进越南的金兰湾时，英国参谋本部的战情分析，仍然认为“日军可能要在中国大陆的西南方另辟战场，由云贵进入四川。”1941年9月29日，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召开了一次高级军政官员会议，检讨远东的局势，主持会议的是奉命前来调查远东局势的英远东战时会议主席（内阁情报部长）达夫古柏，出席会议的有澳大利亚驻英国特使佩居、英军远东总司令波樊、英驻中国空军总司令莱敦、新加坡总督汤姆士、英驻中国大使卡尔、驻曼谷公使克劳斯比等人。会议认为“日本之主要立足地为越南，可能成为攻击马来亚的跳板，但在近数个月内不致对南方有所动作，因此时日方正集中力量应付苏联，无力南进，加上从十二月至二月间，马来亚东海岸正值东北季候风时节，海上波涛汹涌，日军不可能渡海作战。而日本特使来栖三郎此时正在访问华盛顿，美、日双方正在就石油禁运问题进行谈判，新、马当不致立即受到日军的军事威胁。”

虽然，英国对于当时日军的南移，也作了一些部署和反应，那就是派遣“威尔斯太子号”（The Prince of Wales）主力舰和“击退号”（Repulse）战斗巡洋舰前来马来亚水域协防。

但这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举动，希望以此来遏止日本的南侵。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当时就曾这样说过：“我认为日本对付不了美英俄三国现在联合起来反对它。……只要我提到的舰队一到（注：指上述两舰），日本更会迟疑，这可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卷，551页）很明显，在派遣上述两舰时，并不是从实战去考虑，而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因而，在派出上述两艘战舰时，并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同行，也缺乏陆基空军的掩护，所以当两舰到达马来亚水域仅一个星期，（即1941年12月10日，也就是日军在北马登陆的第三天）就被日本空军炸沉。这是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遭到的首次严重打击。

日军登陆后，英当局对马来亚的防御仍是寄希望于英、澳、印军队，而不愿意动员马来亚本身的人力、物力来协同作战。到了马来半岛大部陷落敌手，英军节节败退，新加坡危在旦夕的紧急关头，才被迫于1941年12月18日与马共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从此以后，马共始得于公开地、合法地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马来亚抗日战争，并在英军撤退、新马沦陷后，肩负起领导新、马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神圣历史使命，掀开了马来亚历史新的一页。

四、马共积极准备和

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马共从其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就高举为马来亚的民族独立，为马来亚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大旗。但由于长期以来遭受到英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处于非法的地位，加上内部在较长时间里受到叛徒、内奸莱特的控制、出卖，其领导成员一批一批地遭到逮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在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下，从三十年代中、

末期开始，该党便走上了迂回曲折、荆棘满途的发展道路。尽管如此，马共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在其历史进程中，也确实为马来亚各族人民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尤其是组织和领导马来亚抗日武装斗争，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马来亚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10日，马共七届二次中央执委会又进一步向英当局提出武装人民，实行全面抗日战争的积极主张，会议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向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提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口号，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在敌后组建抗日游击队，带领群众拿起武器，抗击日军，为保卫新、马而浴血奋战。同日，马共领导下的新加坡火锯联合会、货仓工友会、米业运输工友互助社、驳业工友联合会、石业工人联合会、华人司机互助会、码头工友互助会、人力车工友互助会等八大工人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致函新加坡总督，并发表宣言，呼吁全民团结奋起抗战，要求新加坡政府给以新加坡近六十万华人武装抗日的自由和权利，为消灭日本侵略者而奋斗。12月18日，马共七届二次中央执委会又进一步向英当局提出武装人民，实行全面抗日战争的积极主张，会议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向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在敌后组建抗日游击队，带领群众拿起武器，抗击日军，为保卫新、马而浴血奋战。

马来亚各州马共地方党组织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决议，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作为战时最主要的任务。在军事上，一方面从各州选派了一百六十五名党员骨干，先后分成四批赶赴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短期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就地发动群众收藏粮食及各种军用物资，捡拾英军溃败时丢弃的武器弹药，建设背

地，组建抗日武装部队。新加坡沦陷前，在霹雳、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彭亨东部和西部、吉打等几个州，已先后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抗日游击部队（或小组）投入战斗，开展敌后游击战，破坏铁路、桥梁，狙击日军，收留和护送散失的英军撤退，在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的防卫战中，曾经起到了牵制日军的作用。总之，从北马到南马，随着英军的溃退和日军的进占，战事打到那里，那里就有英军遗弃的枪支弹药，那里的人民就捡起这些被丢弃的武器，反击日军的侵略。新、马人民的这种英勇抗敌精神，和英军丢盔弃甲、落荒南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当时由马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由于得不到英当局的支持和英军的配合，力量是单薄的，加上初期缺乏作战经验，在英军大踏步向南溃退的形势下，单凭这几批小股抗日武装，是无法阻止日军南下的。不过，游击战的枪声毕竟是打响了，人民抗日武装队伍终于冲破英当局的重重阻挠而建立起来了，反动的殖民政策阻挡不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一历史发展，是英当局始料所不及的。如果在战前，英当局能实行稍为开明的政策，给以人民武装抗日的权利，与人民联合起来抵御日军的进犯，马来亚的战局必会改观，那是无可置疑的。

综观战争前夕的历史，马来亚所面临的形势是：拥有十万正规军和数百架战机的英国当局，由于执行对日妥协的方针和顽固坚持殖民统治的政策，完全脱离了马来亚人民，结果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下，竟是不堪一击，难逃投降的厄运；而手无寸铁的马来亚人民，虽有抗日的热情和决心，但却没有抗日的自由和权利。

在人民内部，抗日联合阵线的发展也不平衡，中上层对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缺乏信心；由于殖民地政府长期实行“分

而治之”的民族分化政策所种下的恶果和日军的欺骗宣传，造成相当一部分马、印族人民对日军侵略的危害性初期普遍认识不足，对马来亚的抗日斗争，则多是抱着旁观的态度。

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决定了这场战争必然会面临不少的困难，只能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前进。

第二章 日军侵占马来亚， 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南太平洋战争，至1942年2月15日，继马来半岛陷落以后，号称有金汤之固的新加坡也告沦陷，驻马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率众投降，马来亚的版图从此改变了颜色。

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以后，为了加强其军政控制，掠夺被占领地区的物质资源和劳力资源，实行以战养战，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对马来亚各族人民实施野蛮暴戾与穷凶极恶的统治，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从而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在腥风血雨中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殊死的战斗。

侵马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这里仅根据战时群众目睹以及战后见诸报章的不完全统计资料，简述如下：

一、大检证、大屠杀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3天，由1942年2月18日至3月2日，首先从新加坡开始，进行大检证大屠杀。而后遍及全马各地。大检证的命令由山下奉文第二十五军大本营下达，由第二野战宪兵部执行，第五、第十八及近卫师团各派两个中队支援，先后分区强令居民集中检证，毫无甄别、毫无凭证、毫无审讯、不准声辩，随意检出无辜群众5万人，押赴海滨、市外集体刺杀、枪杀。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目的在于恫吓全马人民，使其俯首顺从日军残暴统治。在马来亚各州，也先后进行大检证、大逮捕、大屠杀。当时在新、马各地被杀的群众，加上因受残酷毒刑，凌辱虐待而死的受害者在15万人以上，英国维德上校在东京法庭指控日军在马

来亚的暴行，所提被害人数也是15万人。加上因日军施以暴虐，造成饥病而死的各族人民超过50万人。

在马来半岛受害最惨的地区是柔佛州的巴株巴辖和文律一带，1942年2月20日开始，日军数次围捕屠杀无辜平民1300多人，男女老幼一律刺杀、烧杀或枪杀，婴孩被刺刀挑起抛进河港或火屋中。巴力士隆、张厝港由日军挑唆唆使受蒙骗的暴徒，杀害无辜华人数千人。2月13日，日军屠杀士乃、德茂村男女老幼900余人。麻坡屠杀300余人；振林山数次屠杀千余人。哥打丁宜2月23—25日屠杀3100多人；十四碑先后4次屠杀500余人。3月20至30日在居鑾前后屠杀2000多人。丰盛港屠杀400余人，新山东山屠杀百余人。每次屠杀，伴随强奸、烧屋、抢掠（也有其他民族败类乘机盗掠）。

其他各州，无一幸免。马六甲州3月21日大检证，群众被杀300余人，逮捕2000余人，其中被刑杀、冤杀和病死狱中数百人。亚沙汉被围屠198人；火锯厂工人被关进木屋中烧死156人。马捷区屠杀200余农民及其老幼家属；吉山被屠杀157人。热水湖被刺死50余人；野新区被围起枪杀27人。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在3月18日被数百日军包围，不分青红皂白，残杀1680人，全村侥幸逃脱及轻伤治愈者仅数十余人。马口、冷宜一带农村、胶园的群众被残杀一千多人。见农底打士屠村死者数百人。霹靂州美罗地区被集体屠杀数百人。宋溪埠被杀150余人。金保新路屠杀200余人。冷甲围屠后，关在屋内烧死儿童16人。弹丸小镇高乌、仁丹被枪杀37人。吉打州3月21日在双溪大年地区屠杀300余人。亚罗斯打等地也杀200余人。彭亨州文德甲、淡马鲁、直凉各地被检证屠杀数百人。

较大城市檳城4月5日以后3次大检证，逮捕5000余人，超过半数当场被屠杀，在狱中被刑杀或病死千余人。吉隆坡及雪兰莪州各地被捕杀近千人。未找到文字记载的大屠杀事件很多，全马没有一块未染血腥的洁静土壤。

1942年2月13日，日军对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英国伤兵和医生员工400人，全部射杀或刺死，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凶残暴戾和惨无人道。

日本宪兵部和警备队随意滥捕无辜人民，三年八个月间长期持续不断。被捕人民，普遍遭受灌水、火烫、电刑、火棍、悬空吊打、鞭打、拔指甲、拔头发、拶指、棒打、狗咬、剥光妇女衣服烫阴部等等酷刑，致死致残人数何止三万人。檳城两个绰号杀人王的宪兵比赛砍头杀人，一个先砍满一百得‘优胜’，另一个也达90余人。

二、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疯狂的经济掠夺

日本马来军政监部实施各种经济政策，从公开勒索讹诈到抢劫，敲髓吸血，不择手段。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半个月，军政部就于3月2日召开昭南岛华侨代表大会，强令全马华侨要交献5000万元“奉纳金”，作为抵罪赎命钱。这5000万元的“奉纳金”，由受日军控制的华侨协会负责征募，限于1942年6月20日缴交。当时全马华侨拥有财产300万元以上的，无不纷纷廉价变卖产业、财物，极力筹措，6月20日期满还是无法筹足，最后由各州和特别市华侨协会，以华侨产业为抵押联保，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款2200万元（一年为期，年利六厘），方才如数凑足。接着又要华侨集款奉献飞机，续后，再命各州经营进出口贸易华商缴纳所谓巩固国防基金，勒索花招层出不穷。人民在经济上屡遭严重打

击，元气大损，生活深陷困境。

紧随侵略军队的脚跟，日本南方开发金库和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在新加坡、檳城、吉隆坡、马六甲分别设立分行，支店网遍布各州，以控制各州金融流通。同时发出毫无储备基金的军用票（香蕉票），和原有通货新加坡元等值，不久，叻币就在市面绝迹。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究竟发行了多少军用票，连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据1941年马来亚英政府货币委员会所公布的资料，当时马来亚通货共达21,900万元叻币。这二亿多元叻币（实为马来亚人民的血汗钱）全被日本军政府掠走，而取代叻币在市面流通的却是毫无预备基金的军用票（香蕉票）。战后有人统计，日本军政府在马来亚滥发军用票至少达70亿~80亿元，部分地区华人战后登记，沦陷期间其资财损失4.4亿叻币，全马人民在沦陷期间蒙受的经济和物资的损失就更加惨重了。

日本财阀以株式会社等的形式，对马来亚的工商业，实行垄断。这些株式会社或组合，均是日本财阀所操纵，他们的任务是在占领区实行经济掠夺和榨取的政策，可以任意“收买”民间的产业和商品，而民间的一切物资，均操纵在日本财阀手中，任由他们占用。马来亚丰富的锡矿和橡胶两大产业，也全由财阀集团属下的株式会社从事开采。各地华人锡矿、树胶园、油棕园、各种工厂、板厂、碾米厂、胶品制造厂、印刷厂等等产业，均遭强制低价收购。霹雳州华资锡矿在其威胁操纵下被掠夺达470家。随军南来的日本浪民投机商，互相仿效进行强抢豪夺。民族资本的工矿企业，绝大部分破产。全马344万英亩胶园，沦陷期间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状态。部分挖锡船的发动机，被拆去安装在机动帆船上，以维持近海航运。碾米厂的存谷，也被以市价五分之一

的低价强制收购，单是吉打一地就有几十万担。无偿征用汽车千余辆。1945年棉纺织品等重要生活物资，被军警搜刮没收。仅新加坡一地225家布商损失就超过2000万元叻币。

日本浪民、投机商人，勾结各地日本军政实权人物，设立各种组合，垄断商业贸易，举凡米谷、粮油、烟、茶、蔬菜、水果、木材、水产、禽畜豆类、五金、百货，等等，都成立组合，低价收购、然后高价出售，以此吮吸人民血汗，大发战争财。

1944年起日军在东南亚已丧失了制空和制海权，海上运输受到联军的严密封锁，马来亚物资供应非常短缺，加上日军各株式会社竞相抛出军用票抢购各类物资，结果造成物价暴涨，1942年6月间，各种工业原料价格平均较战前贵了十倍，到1942年底，增加至二十倍，及至1944年，市场物价平均已暴涨到一百倍以上。日本军政府更藉口“从事福利建设与吸收游资”，再三提高各项税率，至1945年，各种税率已分别增加至战前的一倍至四十倍。

三、军事统治与血腥镇压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为了维持其法西斯政权以及“确保重要国防资源的急速取得”，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统治，设置军政监部作为其最高行政机关，由军方自任行政，一切行政实施的责任在于军队。日本统治者毫不讳言地宣称：其统治的首要任务是把握“物”“心”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用军事力量、军事行动来掠夺占领区的物资，要用军威来慑服民心。

马来军政监部最初设于昭南岛（即新加坡），后来迁往霹雳州的太平市。其行政机构一改再改，目的无非是适应战局

的需要，便于渔肉人民。各州政府机关，不仅部局一级官吏全属日本军人掌权，科（课）一级也非他们莫属，当地民族只能担任科课的副职，只有执行权，没有决定权。如1943年昭南市5个部属下23个科长全部是日本人。日本南云舰队受到歼灭性打击以后，马来军政监部感到日益孤立，必须进一步利用当地人力物力，以稳住阵脚，苟延残喘。于是在昭南市及马来7州（吉打及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州的行政管理已移交泰国），分别设立“谘询委员会”，撑起“民意机关”的幌子，以蒙骗各族人民。被圈定的112名议员，只讨论社会生活小问题，不敢过问政府施政。

日本军政府对人民实行严密的户口联保制度，每一户人家必须领有安居证，方被认为是合法良民，并强令人民参加自警团队，利用人民内部互相牵制、互相监视，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军政监部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家长，以及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不论居住在任何市镇或乡村，都是自警团成员；自警团十家联合组成一个联保班（班长即甲长），每十班为一分区（分区长即为保长），十分区为一区（设置区长若干人）；每一市镇、乡村都必须设立自警团岗哨，自警团员按区、分区及班的组织，昼夜轮流站岗。法令还规定自警团的职责是：维持“治安”，防范共党游击队，监视来往行人，登记前来投宿的陌生人等。自警团员若不尽职，就得追究责任。在自警团的严密监视下，城乡人民毫无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稍有不慎，往往招来杀身之祸。

日本宪兵队是执行军事统治的最残暴机构，就像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一样。宪兵队可以随时逮捕、审讯任何平民百姓，掌握着生杀的大权，他们所采用的酷刑逼供方法，更是举世无匹。根据缴获的的日本陆军训练手册，完全证实酷

刑逼供是被日本政府正式批准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手段。这本手册的名称是：“询问战争俘虏的方法”，手册指示日军通常使用的方法如下：

酷刑：包括拳打、脚踢，以及任何足以使身体受到痛苦的方法。

恫吓：用酷刑、杀害、饥饿、单独监禁、不准睡眠等足以使人遭受痛苦的方法来恫吓。

灌水：这是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刑罚，将受刑者朝天绑在长凳上，将水从鼻孔和咀部灌进他的肺部，直到他失去知觉为止，跟着在他肚子上施加压力，将水挤出，如此周而复始。

火烫：一般是用点燃的烟头、蜡烛、烧红的铁条烧炙受刑者身体上敏感的部位，如鼻孔、耳朵、肚脐、生殖器、乳头等。

电刑：在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接通电流，使身体触电而震动。

夹棍：将受刑者双手反绑，令其跪在地上，将一根大棍放在腿弯处，在大腿上加重压力，往往使膝盖被压脱节，痛不堪言。

悬空吊人：将受刑者两手手腕、手臂、或头部用绳子绑住，悬空吊起，并加以鞭打。

跪刑：令受刑者在尖利的石子或三角木头上，跪上数小时之久，不准移动。

拔指甲：用钳子将受刑者的手指甲、脚指甲拔掉。

夹手指：将木棍夹在手指的中央，用绳子绑住手指，越拉越紧，手指剧痛难忍，指骨往往被夹断。

除此以外，宪兵队还常常别出心裁，创造种种酷刑。日治时期，凡是被日本军政府逮捕的平民百姓，无不经历过这

种酷刑的逼供审问，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打断骨头，不少人当场就被活活打死。

日本宪兵部残酷迫害抗日志士和抗日群众的暴行，不胜枚举，这里仅举出一、二事例，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的凶残罪迹。

吉打双溪牙兰抗日同盟会负责人郑翼秋（原名郑慈来），不幸于1942年，初被双溪大年日本宪兵部逮捕，日本宪兵为了从他的口中掏取抗日组织的机密，用尽了种种酷刑。他们牵来一条凶恶的军犬（狼狗），扒在翼秋的背上，用跺脚作信号，指挥军犬行动。军犬在日军的指令下，张开血口，在翼秋的背上咬下一大块肌肉，顿时血流如注，惨不忍睹。然而翼秋仍是一声不吭，怒视着敌人。气极败坏的日本宪兵见这一招不行，就进一步迫翼秋伸出舌头，用拳猛打他的下颚，使上下颚互相撞击，牙齿竟咬穿了舌头。十指痛连心，而舌头尖的痛楚比这还厉害！坚强的翼秋并没有被酷刑所屈服，但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伤口化脓溃烂，得不到医治，一个星期以后，在一个凄风苦雨的下午，便被拉出去枪杀了。

檳城码头工会主席李来晚，被捕时，日军见他年老，一束银须垂至胸膛，就从他的头顶淋下汽油，然后引火自须部燃烧起，被活活烧死在狱中。

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一桩桩，一件件，真是数也数不清！

四、愚民政策与奴化教育

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华侨必须起而与大日本军协力，向大东亚共荣圈迈进。”日本统治马来亚的文化政策，就是以此梦呓为出发点。一是愚民政策：最初关闭所有的公立私立学校，1942年4月首先重开马来文和印文学校，指定以日语为主课，每晨师生都须向东遥拜，升太阳旗，唱

“君之代”（日本国歌）。10月份才准许开放部分华文学校，课程与教师须经市、州长批准，华文只作辅助语文，战前全马华校1522间，学生137,328人。1943年1月，只开185间，学生24,078人。复课的马来学校占原有数的90.7%，印校76.9%，而华校只有12%。禁止各族人民收藏可以收听本土以外电台的短波收音机；禁止华侨与中国家乡亲友通讯；禁止悬挂除太阳旗以外的任何旗帜；禁止谈论任何政治问题……。

二是奴化政策：全面推行日本化，强迫学生和诱导成人学习日语，广播日本音乐，放映日本电影。纪年用“昭和”，时钟用东京时间。报刊全部归由军政监部新闻班所主办或者监办，马来文日报《马来新闻》，刊物《亚洲黎明》，印文《印度斯坦日报》，英文《昭南时报》，日文《昭南新闻》，华文《昭南日报》、《兴亚日报》、《彼南日报》全部如此，统一口径，掩饰日军和轴心国败绩，宣扬“皇军德政”，粉饰繁荣，满纸谎言。日本文化政策完全失败的基本原因，一是侵略者的语言与强盗语言同出一辙，受害者只有反感；二是经济的残酷掠夺与军事的血腥屠杀，抵消其一切自欺欺人的甜言蜜语。

五、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战前马来亚本已不太繁荣的经济，在日本法西斯的强抢豪夺下，已经彻底崩溃，物资奇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为了维持战争的需要，日军占领马来亚以后，便即推行所谓“增产运动”，采取强迫手段，强迫人民种植米粮、以及蔬菜、蕃薯、木薯、芋头、花生、玉米等短期作物，聊以充饥，而将配给的米粮一减再减。1944年6月，日军为了强迫人民种粮，利用廉价劳力为其流血流汗，发起组织所谓

“勤劳奉仕队”(其实是变相的拉夫),对象是年轻力壮的男子,到日军指定的地点无偿劳动。

1944年底,日军政监部颁行《男子就业限制法令》,强迫侍从、店员、电话员工、洗衣工、娱乐场职工、小贩、厨师、裁缝等,年龄18—50岁,必须转业务农,否则将强制参加兵补、义勇军、特别警察或军队劳工。在柔佛兴楼开辟新昭南农村,全马各地也分散辟地种植杂粮蔬菜。虽然砍伐大量树胶园林,种植各种稻谷17万多英亩,但产量仅够种植者及其家属消费。全马粮食产量只有需求量的34%,每月尚须由泰国进口大米5万多吨。全马城市居民粮食配给,最初成人每月每人20斤大米(妇孺酌减),后来减为8斤,乡村居民全不配给,只得靠喝稀粥、吃木薯度日。不少人因饥饿而死,大多数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上各种疾病,尤其因缺乏维生素而患脚气病和疥疮者特多。

日军的残暴,还表现在虐杀“死亡铁路”的劳工上面。1942年11月开工建筑连结仰光曼谷的250英里铁路,到1943年12月完成时,被强迫劳动的64,000名英澳战俘,因受虐待、毒打、残害、患病不治和枪决致死的达16,000人,幸存的战俘平均每人体重减轻70磅。被强征和诱骗筑路的马来亚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缅甸人有15万人,惨死的60,000余人。战后有人作了如下的统计:“这条‘死亡铁路’每一哩长的路轨,是用64名盟军战俘和240名民夫的生命换来的!”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由此可见一般。

第三章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一，马来选人民抗日军的建立与发展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在战争的紧急关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在毫无战争经验的情况下，由马共创建的人民武装。全军八个独立队，有四个是以参加过“101特别训练学校”军训的学员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余四个独立队，则是由各州的马共地方组织就地选派干部创建的。

现将各独立队的建立与发展过程，简述如下：

第一独立队——活动地点：雪兰莪州。

“一独”在1942年1月1日宣布成立，成立的仪式则于1942年1月4日在吉隆坡北郊双文丹（Serendah）的义山亭举行。部队刚成立时，由第一批“101军校”受训学员，结合由马共雪兰莪州地委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组成三个分队，合计有兵员160余人。独立队党代表许庆彪，队长陈天庆，副队长廖奕林，政治部陈祥，管理部刘尧。成立大会还未开完，就遭到日机的空袭，有队员一人当场中弹（后不幸牺牲），部队被迫撤往山区。初期开展除奸活动，组织群众和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部队和群众的损失都很大，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供应困难。特别是1942年9月1日发生的“石山脚事件”（亦称“九一”事件），由于叛徒、内奸莱特的出卖，马共中央受到很大的损失，共有18人在这一事件中壮烈牺牲。因为日军的连续扫荡，“一独”被迫把三个分队（包括在“九一事件”前建立的模范中队）集中到顿巴央（S. Tempeian）地区，改编为联合中队。联合中队在粉碎了日军几次大规模的进攻后，形

势有所好转，队伍不断扩大。1943年春，在南区武来岸（Broga）建立了第八中队，中区恢复了模范中队建制，北区吉磷（Kerling）建立了第二十九中队。同年底，又在新古毛（K. Kubu）成立第三十五中队。1944年底，在第八中队的基础上，扩建了第十二中队。1945年4—5月间，第八中队调往西海岸的万津（Banting）地区，在武来岸又成立了一个新中队——第八十一中队。到这时候，“一独”已有6个中队，约850余人。1945年春，第十二中队奉命开赴森美兰州，支援第二独立队恢复建制。为了配合联军反攻，“一独”和英军136部队达成协议，从各中队抽调军事骨干，在地方抗日组织的配合下，建立了四个新的中队（称公开队），按顺序分别命名为第一、二、三、四中队，约650人。至此，“一独”新老中队合计有9个中队，1300余人。三年八个月期间，“一独”共进行大小战斗120多次，毙伤敌8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280余支。

第二独立队——活动地点：森美兰州。

1941年12月31日，在新加坡由马共中央命名成立。“101军校”受训骨干30人从新加坡出发，于1942年4月在知知港（Titi）和马共森州地委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汇合组成二个中队，约230余人，正式建成第二独立队，党代表赖莱福（杜龙山），队长黄国平，副队长刘冠文（后由邓昌继任），政治部马丁（曾冠彪），管理部廖德（曾权）。“二独”的建队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道路。先是因为行军不慎和攻打瓜拉庇拉（Kuala Pilah）警察局没有经验，使武器和人员受到了损失（副队长刘冠文在此役牺牲）。其次是到达知知港后就遇到日军对群众的大屠杀，被害群众达1600余人。最后是日军的反复扫荡，造成人员散失，伤病员增多（最多

时占30%以上),供应十分困难。但由于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上下一心,不怕困难,也由于当地马共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到1942年10月,就发展到四个中队,即:模范中队(在知知港一带活动),第十五中队(在葫芦顶 Simpang Pertang 一带活动),第四十三中队(在知知港的双沟罗丹、半芭梨望一带活动),马口中队(在马口 Batau、冷甲 Dankap 一带活动),和一个独立分队——第五十一独立分队(在芙蓉 Seremban 郊外活动)合计有兵员约520余人。

为了反击日军对群众的屠杀,“二独”在1942年4月,发起进攻知知港警察局,毙敌数人。接着又在抗击日军的扫荡中,毙敌佐级军官一人。日军因此调来几千兵力,对“二独”实行长达五个多月的围攻。这期间,“二独”和敌人发生的战斗不下二十余次,毙伤敌100多人。为了保存力量,特别是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6月间,“二独”奉命开赴西彭亨,会合西彭人民抗日游击队,建立第六独立队。直到1943年底,马共中央才决定在森州恢复第二独立队的建制,由“一独”、“六独”、“三独”各抽调一个中队,任命邓福隆为正队长,斯科为副队长,商钦为保管部负责人,重新开展森州的游击战争。到日本投降时,“二独”共拥有四个中队,加上原来由“三独”划给“二独”指挥的马六甲流动队,共有四个公开中队,兵员600余人。“二独”没有新老队之分,日本投降后全部进驻城镇,并参加复员。

第三独立队——活动地点:柔佛州北部。

1942年1月20日正式成立。成立仪式在新加坡芽笼32巷一间平房里举行。当时由马共中央代表行授旗礼,宣布独立队领导人名单:党代表陈书,队长小杨(吴科雄),副队长袁治英,政治部肖尔新,管理部李明(李镜明)。同时宣

布成立二个中队：第一中队党代表陈田（后调往四独并未到任），中队长林文光；第二中队党代表胡萍（此人在1948年6月以后成为大叛徒，改名何浪），中队长李开发。会后全队乘车北上，到永平三合港时为战火所阻。后来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结合，司令部决定第一中队北上余民打（Jementah），第二中队东去巴罗（Paloh），还派人南下麻坡（Muar）成立第三中队。同年4月，在东甲（Tangkak）地区成立了第四中队。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各中队伤亡很多，粮食供应困难，疾病流行，战士无一完全健康。柔北当时有十多股群众自发武装，其中有的盗用抗日游击队的名义，打家劫舍，残害百姓。“三独”除说服收编其大部外，对少数顽固不化、继续作恶的，则只有以武力解决。1943年，日军进攻更为频繁，“三独”各个中队不断流动作战，以迂回伏击战术，打击困扰敌人。在战斗中，又建立了第五中队（在西隆坡、昔加末 Segamat 以北），第七中队（在永平），第九中队（在甲蓬 Bt. Kepong），第十二中队（在打色 Tersek，金马士以北、柔森彭三州交界处），第十五中队（在拉美士 Labis），第十八中队（在弄边 B. Rompin 彭亨罗滨河出口处）。1945年5月13日，“三独”发起“红五月运动”，同时进攻柔北地区17个（另一说则是23个）警察局，获得了全部胜利。接着粉碎了日暮途穷的日军提出的“和平分管地区，联合抗英”和跟随而来的排华阴谋。到日本投降前夕，“三独”共拥有九个秘密中队，三个公开中队，兵员约1500人。

第四独立队——活动地点：柔佛州南部。

1942年1月30日在新加坡武吉知马汉光学校宣布成立。独立队党代表陈路（胡天保），队长阿福（余洪），副队长陈培农，政治部阿川（郑戴明），管理部李文辉。（注：另

有资料说，当时在新加坡宣布司令部成员名单，政治部和管理部均设有副职，政治部副职为吴亚浪，管理部副职是南学、即张天和）。会后立即开赴士乃（Senai）泗隆港，会合已在那里集中的、由马共柔南地委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组成第一、第二、第三（后改称第九中队）、第四等共四个中队，分赴士乃、玻璃城（Kg. pol Lee Seng）、本珍（Pontian）、居銮（Kluang）等地活动。柔南人民在沦陷后遭受日军掳掠烧杀十分严重，死亡一万余人。日军进攻抗日部队也较频繁激烈，部队初期只能流动与敌周旋，经常靠野菜、波萝充饥，战死、病死的战士都不少。1942年8月以后，“四独”伺机出击日军警察局，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一年中胜利击退日军八次规模大小不等的进攻，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1943年司令部迁至天吉港（在哥打丁宜 Kota Tinggi 西北大森林中）建立根据地，先后组建了第七中队（在哥打丁宜），第十三中队（后改称第二十中队，在文律 Benut），第十八中队（在丰盛港 Mersing）和模范中队（在天吉港）。四次进攻古来日军，并进攻东山、东兴、勃兰东、白板等地警察局，两次击退日军对天吉港的大规模的围攻。在海上一次夺取日军七艘大型机动船及船上所载的十吨大米，俘虏押运的日军20余人。还成功地平息了日军在文律地区煽动的排华风潮。三年多时间里，“四独”与日军共作战150多次，（其中80多次是主动进攻），毙伤敌军警及走狗一千多人，自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到日本投降时，“四独”共拥有八个秘密中队，五个公开中队，兵力合计1300余人。

以上四个独立队，均是由“101军校”受训的学员作骨干，结合当地游击队组建而成。四批受训骨干共165人。第一批15人，第二批30人，第三、四批各60人。原计

划第一批派到北马，第二批到霹雳，第三批到雪兰莪，第四批到柔佛。但因英军撤退太快，不但第五批以后的计划被迫取消，也使得第一批只能到达吉隆坡北郊，第二批到达淡边，第三批到达三合港，第四批到达士乃泗隆港。他们虽然在陌生的环境下工作，但很快就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为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蒙受了重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的统计，到日军投降时，除个别人中途叛变，或做了逃兵外，这批骨干生还者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如第一批只剩下四人，第三批只剩下18人，牺牲之大由此可见。

第五独立队——活动地点：霹雳州。

日军1941年12月26日占领怡保之前，马共霹雳州地委就在朱毛（Chemor）和仕林河（Silim R.）两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朱毛地区有队员近百人，仕林河地区也有60—70人。霹雳全州沦陷后，马共霹雳州地委立即组织人力从战场上捡拾英军遗弃的枪械四百余支，弹药一批，初步武装了自己。在与马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霹雳地委于1942年1月下旬决定成立霹雳州军委，统一领导全州的抗日武装，把部队命名为“霹雳人民抗日军”。5月间，才由马共中央正式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司令部党代表张奇生（后由廖伟中继任），队长赖莱福（从森州调任），副队长黄立，政治部箫力，管理部蔡福。初期辖有四个中队：第一中队（后改为模范中队）在朱毛，第二中队在和丰（Sungai Siput），第三中队（后改为第十三中队）在波赖（Simpang Pulia），第四中队在美罗（Bidor）。部队刚成立，还来不及对外公布，日军便发起了进攻，迫使“五独”的正式成立被延至1942年12月1日。“五独”成立以后，为了扩大抗日

根据地，司令部及模范中队从关丹营地（Kanthan H.）转移到地骨（Tekat），再转移到务边（Gopeng）；第二中队从沙叻营地（Sadlak）出发，转移到玲珑（Lenggong）；第三中队从波赖转移到甲板（Papan）。

日军除了在军事上发动对“五独”的进攻外，同时也开展政治攻势，叫嚣“三月灭共”。“五独”则以加强军事进攻和除奸活动来回答，先后进攻朱毛、端洛（Tronoh）、红毛丹（Tg. Rambutan）等六处警察局，并在狮尾（怡保市郊区）伏击敌特高科的巡逻队，取得全胜。以后又与第六独立队合作，消灭了盘踞在吉兰丹州牙叻顶（G Garak）的二股土匪，在该地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在对日战争中，“五独”相继成立了第十二中队（在牙叻顶），第十四中队（在太平 Taiping），第十六中队（在实兆远 Sitiawan），第十九中队（在朱毛），第三十五中队（在玲珑）。为配合联军的反攻，1945年又组建了五个公开队。到日本投降时，“五独”共拥有八个老中队，四个新中队，共1500余人。

第六独立队——活动地点：彭亨州西部。

早在1942年2月间，在西彭马共地委的领导下，当地便成立了抗日游击队，由黄春任党代表，辖有四个分队，约200余人。因人多枪少，同时缺少军事经验，在日军的进攻下，受到了不少的损失。1943年5月，第二独立队奉命东调西彭亨，大大加强了该州的抗日力量。调去的“二独”人马和西彭抗日游击队结合，于1943年8月13日正式成立了第六独立队。党代表峰云（小张），队长曾冠彪（马丁），副队长陈豪，政治部吴亮明（后由赖文明继任），管理部汪清。辖有模范中队（在文冬 Bentong），第162中队（在明光 Mengkuang），第157中队（在文积 Mentri），第153中队

(在劳勿 Raub)，第 1 5 9 中队(在文德甲 Mentakab)。以后又陆续成立了牙叻顶中队(在吉兰丹州，以后移交给“五独”，改编成第十二中队)和 1 6 4 中队(在瓜拉立卑 Kuala Lipis)，总兵力一千余人。

“六独”成立以后，除了加强消灭敌奸、走狗，巩固农村阵地，粉碎了敌人进攻外，曾经先后进攻文积 (Manchis)、而连突 (Jerantut)、直凉 (Triang)、加叻 (Karak) 2 7 碑等地警察局。另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收编和围剿境内四股群众武装和土匪，并在布劳 (Peroh) 击退日军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消灭日兵 4 0 余人。“六独”的民族工作也做得较好，曾在瓜拉立卑建立了一支马来人抗日小队。到日本投降时，“六独”共拥有五个老队，四个新队和一个独立分队，加上各地的后备队兵力近二千人。

第七独立队——活动地点：彭亨州东部和丁加奴州。

1 9 4 4 年 1 1 月 7 日成立。早在 1 9 4 2 年 2 月初，马共东彭地委已着手组织一批胶工和城镇青年，收集英军遗弃的步枪十余支，在惹姆 (Kg. Jeram 丁加奴州境内) 胶园成立游击队，趁日军占领关丹后立足未稳，于三月间进攻雅姆警察局，获得胜利，缴枪 2 0 余支。马共在丁加奴州的甘马挽 (Kemaman)、甘马仕 (Kemasik)、基里社 (Kg. Kijal) 和北加 (B. Peka) 一带的基层组织，也组成一支 6 0 余人的队伍，于 1 9 4 2 年 5 月 2 0 日下午，用三支猎枪和 3 0 多把大刀，一举攻下基里社警察局，缴获来福枪 5 支。接着连夜进攻甘马仕警察局，又缴枪 1 0 5 支 (大部分猎枪，是日军从丁加奴州各地收集来暂放甘马仕警局的)。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东彭关丹抗日游击队”。到 1 9 4 4 年 1 1 月 7 日，才正式整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党代表庄清，队长张

祺，副队长杨清，政治部阿山，管理部吴克。辖有四个中队一个独立分队，兵员约700余人。“七独”从未取得联军一枪一弹的支援，三年间大小战斗近百次，进攻过11个警察局，击退千余日军的七路围攻，共缴枪500余支，并粉碎了日军的“招降”阴谋。“七独”也未曾建立新队，日本投降后以老队参加复员。

第八独立队——活动地点：吉打和玻璃市州。

第八独立队的正式命名，虽然迟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但它的活动和全马各地一样，在沦陷初期就开始了。因为吉打州毗邻泰国，最先遭到日军的进攻，当地马共组织和各族人民都缺乏思想准备，加以受破坏严重，各抗日组织失去相互联系，初期只由个别马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分别组织抗日武装小组，进行除奸和游击活动。这类抗日小组，前后共组织有七、八个之多，但在日军的连续镇压下，大多数被摧毁或被瓦解，幸存的只好隐蔽起来，或转移到安全地区。其中有二个小组，因为有比较坚强的领导，不但能继续坚持斗争，而且不断有所发展。其中活跃在吉中和吉南的游击小组，在马共地委成员张云的领导下，组成吉打（东）抗日游击队，他们从除奸活动开始，发展到进攻警察局。1943年底转移到华玲（Baling）山区，和第五独立队建立了联系，并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力量进一步壮大，队伍发展到60多人。在吉北活动的游击小组，最初只有三支半枪（其中一支是锯短的步枪），称“三支半枪游击队”。他们除了除奸以外，还消灭了曾残酷镇压工人的日人矿山经理。1944年初，发起进攻亚森（Asun）警察局，缴枪十余支。他们最成功的一次战斗，是新路反击战，重创和毙伤敌军40余人。此外他们还协助训练和支援泰南抗日义勇队，并和他

密切合作，进攻泰南昔罗县日军据点和古务（Kubu）警察局，缴枪12支。为了统一指挥，1945年3月，吉北抗日游击队和吉东抗日游击队统一编制，改称“吉打人民抗日军”，并和英军136部队建立了联系。日本投降后，“吉打人民抗日军”曾一度改称“吉打人民解放军”，引起英方抗议，结果由马共中央军委将其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队长何小力，副队长张江海、白丝木，辖有四个公开中队，除部分老战士提前转到地方工作外，有兵员500余人。

八个独立队共有秘密中队（又称老队）46个，独立分队2个，约5400余人；公开中队（又称新队）21个，约4500余人。合计共有新老中队67个，总兵力约一万人。（注：日本投降后进驻城镇的部队，除上述21个新中队外，还有“二独”、“七独”、“八独”的老队12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

八个独立队的编制基本统一。独立队设司令部，司令部辖中队指挥部，中队辖三个分队，分队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有队员10—12人。因为是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每个独立队所辖中队的数目，视情况而定，不受限制。同样，中队所辖分队，分队所辖小队的数目，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每个中队人数在100人至200人之间。各独立队的指挥作战，组织管理和民运工作，都是分别筹划，各自为战。中队的活动也相对独立进行。战争的规模基本上是以中队为单位的游击战，在靠近城镇地带，则多数以分队或小队为单位进行作战。三年多的战争期间，极少以独立队的规模组织作战（如第三独立队组织的“5.13”战设那样）。各独立队之间协同作战，更是绝无仅有（如“五独”、“六独”协同清剿

牙叻顶山区的土匪)。由于叛徒内奸莱特的出卖，从1943年4月以后，马共中央委员除东彭仅存一人外，基本上已损失殆尽，全马统一的领导机构，事实上就不再存在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日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即使如此，各独立队之间的相互支援，还是有的，如“五独”于1942年支援“一独”武器；1944年底，“一独”、“六独”、“三独”支援“二独”恢复建制等等。

二、武装斗争的三个阶段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斗争，是在没有外援，没有后方补给，尤其是在没有丝毫作战经验的情况下展开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其所以能够如此，除了有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日益好转的形势配合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马共的领导，有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华族群众的全力支持，以及抗日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实战中不断提高战斗素质的结果。

人民抗日军刚成立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缺少武器、弹药。英国殖民当局到最后关头虽然接受了马共提出的“合作抗日”的主张，并答应给予人民以武装，但骨子里仍然没有改变其仇视人民和害怕人民的立场。如选派到“101军校”受训的大批学员，英方最初曾口头许诺结业后每人配给长短枪各一支，手提机关枪每三人一支，轻机枪每五人一挺，手榴弹每人五箱（60粒），但到结业时，却大打折扣，如第一批15人，结业时只领得短枪15支（一说30支），手提机关枪5支，手榴弹30箱。只有第二批配备较好，30人共领得英式风机关枪一挺，轻机枪二挺，手提机关枪10支，左轮短枪15支，手榴弹60箱，弹药一批。第三、四批基

本上是人手一件，外加少量短枪和手提机关枪。这些武器中，不少还是杂牌枪，而且全是陈旧的。如第三批所分得的步枪，全是德国马枪、荷兰步枪之类，竟没有一支来福枪。因而造成第三、第四批学员结业时，曾发生全体学员拒绝出席英方举行的欢送会，以示抗议的事。总计四批学员所领得的枪支，总数仅在200件左右。这当然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需要。第三独立队建队初时，就曾因枪支不足而不得不把部份自愿来参军的队员送回农村。同样的事在别的独立队了也有发生。这样，武器弹药的缺乏，就成了影响抗日军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困难。

其次是毫无作战经验和缺乏军事常识。抗日军的成员都是来自工、农、学生和部分其他阶层人士，没有一个是当过兵的，而且一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不要说打仗，许多人过去连枪都没有摸过，（英殖民当局从来不招募华人充当军警）。英军“101军校”虽然对四批学员给以军训，但内容只是如何瞄准、开枪，如何装卸、维护、保管枪械，以及如何使用雷管炸药等军事常识。至于如何行军操练，如何指挥作战，战略战术之类，则丝毫没有涉及。由于缺乏经验，抗日军曾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第三独立队在1942年2月初，就曾发生过在行军时丢失枪支，后来攻打瓜拉比拉警察局又遭到失败（副队长刘冠文在此役中牺牲），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第三是各种物资的匮乏和供应的困难，包括粮食、药品、被服和鞋帽等，特别是在日军反复扫荡的情况下，尤为艰苦。吃不上饭，睡不上觉，衣服破了无法补，病了没有药医是常有的事。如第一独立队有一个时期只能靠榴莲核过活，第三独立队仅靠野竹荀和米糠充饥，第四独立队一连几个月以黄

梨和薯叶为生，没有米，没有油，没有盐，都十分平常，更不要说肉类了。因为缺乏营养，战士们又不适应大森林的水土，加上缺医少药，常常枵腹行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多，总计几年来染疾死亡的战士，约占牺牲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才有较大的改善。

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三年八个月战争中，人民抗日军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组织发动群众阶段，从全马沦陷至1943年1月止；第二阶段为积极防御阶段，从1943年2月至1944年10月；第三阶段为准备反攻阶段，从1944年底起至日军投降。

各阶段情况分述如下：

（一）第一阶段——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

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如何站稳脚跟、维护生存、抵御日军不断进攻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日军占领全马后，除了立即以“检证”和大屠杀来强迫人民服从它的野蛮统治以外，一方面，大肆宣扬它的所谓“赫赫战果”，以欺骗利诱的方法收买一部分亲日分子为其效劳，破坏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另一方面，一发现有抗日军活动，立即发动军事进攻，屠杀外围群众，纵火焚烧房屋，造成群众害怕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军的处境非常困难，干部战士除病死的以外，被捕和牺牲都比较多。而更为严重的是叛徒、内奸莱特的出卖和破坏，造成中上层干部损失惨重。战后才查明，新加坡刚沦陷不久，叛徒莱特就秘密投入日军的怀抱，他用召开干部会议的方法，把许多负责干部一批批的秘密出卖给日军，其中破坏最严重的是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机关几次被破坏，和雪兰莪“九一”石山脚事件，造成在整个日占时期新加坡抗

日活动的瘫痪，和许多抗日军高级领导人的牺牲。例如，四个独立队的第一任领导人，在这段时间内约有80%的人被捕或牺牲，致使日常的领导工作，仅得一至二人维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抗日军处境的险恶和困难。

除此之外，莱特还以“不给敌人一片树胶、一斤锡沙”为借口，于1942年5月30日在柔北三合港召开的中南马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上，提出以“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为重点”，以“罢工、怠工等斗争来破坏敌人的生产”为理由，把抗日武装斗争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还指责当时各独立队袭击日军交通线、破坏日占区铁路、桥梁的战斗为“冒险”。提出要把武器收藏起来，部队分散到农村去“活动”的荒谬主张。只是由于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抵制，他的这一包藏祸心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在需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形势下，会议通过的“保存力量、充实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的决定，却为以后的右倾保守和机会主义定下了调子，在后来的斗争中一直没有受到清算，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给抗日武装斗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为了改变处境，克服困难，抗日军在这时期不得不集中力量去宣传和发动群众，派出不少人员配合地方开展民运工作。针对当时敌奸活动猖狂的特点，又组织了许多除奸小组或流动队深入农村、矿山和胶园，根据群众的举报，在经过调查并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开展除奸灭叛工作。此举不但打击了敌奸、走狗的气焰，并且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以致后来除奸小组的活动，能够从乡村逐渐转移到城镇，在日军的眼皮下打狗除奸，给日军以很大的震动。关于这点，各独立队都有不少生动的事例。

针对沦陷初期各地有不少群众自发武装活动的情况（其

成员绝大多数是华族),抗日军组织力量,争取他们共同抗日。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利用从战场上捡拾或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在当时许多人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自发地拉起队伍,有些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些还打着“抗日”的旗号,进行招摇撞骗,个别最坏的,甚至奸淫妇女、强抢民女为妻,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给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他们针对其他民族(如对马来族)的土匪行径,影响尤其恶劣,为害更加深远。这类群众自发武装队伍,最盛时期全马约有三、四十股之多。每股从几人、十几人到一、二百人不等,总数约有近千人枪,尤以柔佛、彭亨、霹雳三州为多。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为了让群众识别真正的抗日队伍,抗日军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对这些群众自发武装,各独立队大都采取教育和收编为主的方针,只有对极少数行为极端恶劣,而又怙恶不悛的,才采取军事行动加以瓦解或消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1943年中起。除少数例外,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大多数已参加了抗日军。这不但加强了抗日军的力量,而且对于进一步发动群众,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日军的频繁进攻,因为处在敌强我弱和众寡悬殊的条件下,人民抗日军只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利用热带大森林复盖的有利条件,跟日军兜圈子,打冷枪骚扰,挫伤其锐气,再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进行伏击,大量杀伤或部份歼灭敌人,使其士气衰竭,知难而退。1942年10月,约二千多名日军分数路围攻雪兰莪双文丹(Serendah)顿巴央(S. Tampeian)抗日军营地,“一独”联合中队在三处据险伏击,然后分成小队迅速撤离,灵活穿插敌后,见敌就打,打了就跑,两天之内,毙伤日军一百余人,而抗日军仅死伤各一人。

1943年初，“五独”第三中队在怡保市郊波赖山上，抗击日军的三路合围，分兵伏击，而后迅速退出战斗，分散四面八方，大打麻雀战，使日军迷失进攻目标，只好灰溜溜收尸而返。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为了避免单纯的消极防御，抗日军在防御中也穿插着局部的进攻，用小部队攻打日军据点和警察局，迫使日军不得不分散其兵力，作面的布防，削弱其大部队的进攻优势。如“六独”的数次袭击敌营，破坏日军交通线；“二独”袭击知港警察局，伏击敌军车；“三独”没收日军“奉纳金”，炸毁铁路；“四独”的八次战斗，和攻打冷金（Rengom）警察局，等等，虽然规模不大，但都起到了牵制与削弱敌人进攻的作用。总计从1942年2月全马沦陷到1943年1月这段期间，抗日军在20多次的大小战斗中，共毙伤日军警约600人，缴枪200余支。

（二）第二阶段——积极防御，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经过一年多艰苦的战斗和持续不断的努力，群众已逐步发动起来。1943年2、3月间，马共在雪兰莪州某地召开了扩大的七届三中执委会会议，有部份地方党军高级干部参加。会议通过了“抗日九大纲领”（注1），还制定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统一的军旗、军礼、军纪、军歌等。七届三中执委会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马来亚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抗日九大纲领”的鼓舞下，不但大大地激励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更坚定了各族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如抗日同盟会、抗日联合会、抗日后备队、抗日自卫团……等纷纷建立，遍布矿山、胶园和农村，在城镇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形成一条广泛的抗日战线，抗日军的处境也大为改观，不但站稳了脚跟，

而且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反观日军，情况则愈来愈不妙。从1943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逐步败退，完全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为了挽救其日益明显的败局，它在占领区进行垂死挣扎。一方面，更加疯狂地掠夺马来亚的人力、物力资源，另一方面，除继续进行欺骗宣传外，又使出玩弄政治骗局的一手，在各地导演一出所谓“土生人民参政”的丑剧，企图诱使各族人民与之进行合作。

由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存在和发展，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统治威信，动摇了其统治基础，日军只好集中更强大的兵力，向人民抗日军发动猛烈的进攻。在柔南、柔北、森美兰、雪兰莪、霹雳这几个主要的州里，无一例外地都对抗日军进行所谓“军事围剿”。这些围剿，除了攻势更加猛烈、范围更加广阔、时间更加持久之外，还伴之以肃清乡村、强迫百姓撤离游击区，企图割断抗日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如从1943年6月到10月这段时间，日军就向第四独立队发动了三次大围攻，在围攻前，先将德茂芭、茨廊、180依吉、海南港、乌水港、笨珍路27碑……等地的外围群众赶走，放火把房屋烧光。同年5月，日军动员数千兵力，进攻“三独”司令部所在地彼咯(Bekok)，除了使用大炮轰击外，还动用飞机进行轰炸；与此同时，又向活跃在昔加末(Segamat)以北西隆坡地区的“三独”第五中队发动进攻，在那里制造了一个长达数十英里的无人区。同年3—5月，日军在森美兰州向“二独”进行了反复扫荡，除了在外围烧杀、驱赶群众外，还企图驻营不走，最后迫使“二独”东调西彭亨。

在雪兰莪州，从1943年3月起，直到同年12月，日军同样向“一独”第八中队连续发动了五次进攻，每次动用

兵力都在千人左右。日军所到之处，群众被屠杀，房屋被烧毁。又如在霹雳州，1943年初日军便抽调几千兵力，从和丰到朱毛一带，实行严密的封锁，把靠近森林的上万农民全部赶走，焚毁山边房屋，同时向活动在和丰灵丹（Kg. Lingtang）的“五独”部队发起进攻，迫使抗日军撤走，以后又跟踪追击到务边，沿途烧杀抢掠，使群众蒙受很大的损失。

针对日军猖狂的进攻，抗日军的战术仍和第一阶段相同，只是更多地采用伏击战来杀伤敌人。因为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日军的行动往往被抗日军预先侦知，为打伏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以上提到的日军对第四独立队的三次大围攻，第一次围攻刚开始，日军就在上泗隆、一百八十吉、德茂芭三处中伏；第二次大围攻也先后在茨廊、瑞林园、老杞等地遭到伏击。其次，是避开日军主力，主动转移到外线去作战，或在公路上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截击日军的供应，或攻击日军的据点和警察局，牵制敌人。如日军对“三独”、“五独”的进攻，和对“四独”的第三次大“围剿”，就是这样被打退的。日军不但没有达到消灭抗日军的目的，相反，却往往以损兵折将告终。

与政治上玩弄骗局相配合，日军在向抗日军进攻的同时，也使出了“招安”的一手，这是不同于前一阶段的一个特点。其中最阴险的一着，是指使以高克平、黄国平（注2）为首的一批叛徒，宣扬成立马共伪中央，公开发表声明，攻击马共犯了“不抗英”而“抗日”的错误。他们还根据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把霹雳州列为“招安”的重点，组成“昭南队”，协同日本特高科制定所谓“三月灭共”的计划，对被捕的群众实行收买利诱，然后释放出来，混入革命队伍伺机进行策反和破坏。为粉碎敌人这一阴谋，打击和惩办为首的叛徒和

敌奸，抗日军联同各地抗日组织，除了广为宣传揭露敌人这一阴谋、号召群众提高警惕外，同时派出许多行动小组或流动队，对其中罪大恶极、活动猖狂者加以惩处。其中最具典型的两件事：一是1943年5月，“五独”流动队在怡保郊区消灭日本特高科的一次战斗；另一件就要数到同年“七独”在惹姆胶园粉碎敌人“招安”的行动了。

抗日军和抗日组织还根据“胁从不究”的方针，对那些还没有完全泯灭民族良知，没有罪行或罪行轻微，有悔过表现的“失足者”加以争取，鼓励他们脱离敌人，回到人民中来。这样做的结果，果然有不少人脱离了敌人的队伍，投向人民。其中有些人不但带回日军发给的枪械，而且还提供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个别人甚至事先跟抗日组织联系好，然后诱骗那些死心为敌人效劳的叛徒或敌奸到约定地点，让抗日组织加以俘获或处置。由于抗日军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日军的“招安”阴谋，很快就偃旗息鼓，寿终正寝了。

日军为掩饰失败，挽回面子，竟然在有些地方指使其走狗化装成抗日军，演出接受“招安”的闹剧，这也可算是三年八个月生死斗争中一桩有趣的插曲了。

进入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显露出胜利的曙光，而日军的处境则如江河日下，日军为了实现其进军印度的野心和应付联军在缅甸的反攻，将其驻马来亚的精锐部队全部调走，这时，兵力不足和士气低落成为日军致命的弱点。为了防止抗日军的进攻，日军开始强迫居民在市镇四周建筑栅栏，并且收缩兵力，只驻防在一些大中城市。这时期日军对抗日军的战术也起了变化，变全面围剿为重点进攻，1944年日军只对“四独”的天吉港发起二次大围剿，其余地方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有时则派出小股部队，对抗日

军进行“游击”。这样一来，反而给抗日军提供了歼敌的机会。例如，1944年5月间，日军在柔北昔加末西隆坡不远处的“八十格”伏击抗日军，反被抗日军所伏击，全队14人，除一人逃得性命外，其余均被抗日军击毙。在雪州的吉毛叻思(Rarsa)，柔南的老杞、和平港等地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例子。

鉴于日军龟缩在大中城市，抗日军也及时把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中小市镇。攻打中小城镇日军的据点和警察局，就是这时期抗日军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抗日军积极防御战术的重要组成部份。1944年初“四独”四次进攻古来(Kulai)和勃兰东(Plenton)之战，特别是年底攻打水上警察局及西的里(Sedili)海上夺粮；“三独”进攻亚沙汗(Asahan)、巴罗(Paloh)、巴莪(Pagoh)和永平铁山警察局；“五独”进攻端洛警察局；“二独”进攻瓜拉比拉警察局和马来义勇军兵营；以及“一独”拔除大港敌人据点和武来岸警察局等，都是其中较为成功的战例。

在抗日形势日益好转的基础上，1944年10月，马共在雪兰莪召开了全马地委和独立队司令部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相互交流了抗日武装斗争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加强军政干部培训，扩充抗日武装部队，把人民抗日军编为秘密队和公开队，秘密队不与联军接触，保持其独立性，建立参谋本部领导，公开队与联军合作，接受空投武器和进驻英军联络官，以及准备在各州建立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军等各项决定，准备迎接联军反攻。会议以后，马来亚各地随即掀起了拥军、扩军热潮，迎来了准备反攻阶段。

(三) 第三阶段——主动出击，准备反攻

1945年是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载入史册的。

从年头开始，各族人民便以关切的心情，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抗日的活动中。广大人民更加积极地支援抗日军，出现了无数青年热烈要求加入人民抗日军的动人情景。抗日军更加壮大了，也更加活跃了。新年刚过，便传来了喜讯：“一独”在靠近吉隆坡的新街场咕腰地方，伏击日军中尉警长带领的有一百多人的巡逻队，取得毙伤敌34人，缴枪二十余支的胜利。各地抗日军也都纷纷出动，一时形成了杀敌夺武高潮。特别是柔北第三独立队所进行的“5.13战役”，即1945年5月13日向柔北地区的17个警察局，（一说23个）同时发起进攻，除在昔加末、巴罗、和麻坡遭到抵抗外，其余均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胜利，共夺得武器二百余支，俘敌近三百人。在这一胜利形势的影响下，抗日群众组织也更加活跃，他们的活动，不仅已深入到中小城市，甚至更伸展到大城市中去了。许多中上层人士，包括军警中的许多头目，都暗中向抗日组织靠拢，日军的处境更加孤立。到了德国法西斯战败以后，大家心里都明白：日本法西斯的寿命不长了，它的末日已是屈指可数了。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也没有缓和下来。日军由于在太平洋各岛上的作战连续失败，迫使它在马来半岛积极备战，把许多残败部队集中到半岛上来。一方面，它沿着贯通南北的铁路干线一带继续肃清乡村，进攻人民抗日军，特别是进攻靠近新加坡的柔南抗日军。另一方面，继续玩弄政治阴谋：第一步是派其爪牙四出活动，企图和抗日军建立联系。在柔北它找到了当地抗日组织，并通过抗日组织向抗日军提出了如下的合作条件：“双方划地为界，各不相扰，只要抗日军放弃抗日，合作抗英，日军将向抗日军提供物资和武器”。这个

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抗日军的严正拒绝。日军见此计不成，其阴谋的第二步就是煽动排华。排华的恶浪，首先在巴株巴辖（Batu Pahat）地方发生，后来蔓延到森美兰的马口和霹雳的一些地区。由于抗日军采取了正确的对策，后来日本也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排华浪潮才逐步平息下来，无辜的人民始得免于遭受更严重的性命和财产损失。

战后有一些人把这一次的排华事件归咎于人民抗日军，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第一，挑动民族分裂和相互仇视，特别是挑拨马、华两族的团结，是日本法西斯一贯的政策，这是从它占领马来亚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的。第二，这次排华，从挑动到组织、指挥都是由日军一手包办，这是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的。第三，排华的首发地点恰恰是在巴株巴辖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因为那里正是日军阴谋与抗日军划地而治的试验点。

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形势急转直下，抗日军原定配合联军反攻的各种部署，均无法实施，而是以和平进驻各地城镇，结束了这场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

注（1）：马共中央第三次执委会通过的抗日九大纲领内容：

- （一）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 （二）建立由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 （三）开放人民言论、组织、信仰的绝对自由，取消旧制度奴役人民的法令，释放政治犯及抗日俘

虏。

(四) 改善民生，救济失业难民，普遍加饷加薪，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

(五) 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六) 以各民族语言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七) 没收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发还被日军没收的人民及各友邦人民的财产。

(八) 实行关税自主，建立和各友邦友好条约与商务关系，承认友邦贸易自由。

(九)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独立，赞助日本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注(2)：高克平是原马共马六甲州委书记，沦陷后不久即被捕，叛变投敌，接受日军指示，组织马共伪中央，号召群众抗英。黄国平原是第二独立队的队长，在出席“九一”会议的途中被捕，叛变投敌。

三，人民抗日军的战术与作战方法

抗日战争期间，人民抗日军在军事上长期处于劣势的地位。因为日军不但在数量上比抗日军众多（每一次进攻，常常动用十倍、二十倍、有时甚至是百倍于抗日军的兵力），而且武器比抗日军好（抗日军只有步枪、机关枪等轻武器，而且大都是陈旧的），比抗日军训练有素，作战经验更为丰富。除此之外，它还占有许多军事据点，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

讯设备，有较为充足的后方供应，而抗日军则是缺少这些条件。但为什么在三年八个月的战争中，抗日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愈战愈强，力量越来越壮大呢？

关于这点，过去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归因有马共的领导；有的说是因为抗日军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有的认为是因为有英军提供的训练和援助；也有的认为是因为马来亚到处有大森林的掩护，便于游击队活动而不利于日军重武器火力的发挥；……如此等等。不能否认，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有马共的领导是很主要的。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日军是侵略者，对各族人民实行最野蛮的法西斯统治，而抗日军则高举反法西斯的大旗，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得到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当然，这还不是一切。抗日军除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外，还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在和日军作战过程中，抗日军逐步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坚决、主动、灵活、积极”。这就是说：行动要坚决，作战要主动，战术要灵活，态度要积极。所谓行动坚决，就是不论进攻或退却，都要当机立断不能犹疑不决，所谓作战主动，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力争主动，不能被动挨打；所谓战术灵活，就是用什么方法跟敌人作战，一切要依情况而定，没有固定的模式；所谓态度积极，就是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打击敌人，而不消极等待。这“八字”原则是互相联系，不能机械分开的。它实质上是游击战术的具体应用，也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敌进我退，敌驻我

扰”，“围城打援”，“声东击西”等等作战方法实施的指导原则。

总结几年来和日军作战的经验，抗日军最常用的作战方法，有以下几种：

阻击战。这是在日军进剿时最常使用的战术。如1942年10月，日军动员了千余兵力，向活跃在顿巴央的“一独”联合中队发动进攻，先是封锁了由间津十三条石起经双门丹、顿巴央至叻思、古毛间的达50公里的交通线，接着分兵三路，从南、北、中三个方向分进合击。战斗在当天下午打响，抗日军分据三个山头，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日军三次冲锋，始终未能攻占正面山头。到了傍晚，日军改变战术，分左右二路从山脚包抄上来，左路先到山腰，受到抗日军火力截击，右路日军闻声也向左边山头开火，却不料射向左路的日军，昏暗中互相打了起来。抗日军又派出小队，穿插敌后，见敌就打，打得日军蒙头转向，腹背受敌，最后遗尸几十具，狼狈撤离战场。但日军并没有从山脚撤离，而是守在山边，封锁了路口。第二天一早，他又重整旗鼓，重新发起了进攻。联合中队事前已经作了准备，等到敌人接近营地时，从各个山头突然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然后按计划安全转移。当日军进入抗日军营地时，又触响了抗日军预先埋下的炸药，数声巨响，炸得日军血肉横飞。这一仗，击毙日军尉官二名，重伤日军少佐一名，击毙日兵数十人，伤80余人。抗日军也牺牲一名机枪手，另一名战士受伤。

1943年1月初，日军向波赖山“五独”第三中队发起进攻，波赖山位于怡保市东面，该地山高林密，悬岩陡壁。日军起初动员了一千多兵力，还出动空军配合轰炸。抗日军坚守有利地形，给以迎头痛击。第二天，日军增兵二千多，并

动用大炮，分三路猛攻，抗日军则分途伏击，然后迅速撤离。日军迷失目标，只好撤走。此役毙伤日军数十人。

有时阻击战中也结合进行反击战，给日军以更大的杀伤。如：1944年9月，日军动员了五千多兵力，分四路进攻“四独”根据地天吉港。该处是森林中的一块盆地，只有哥打河贯通其间。日军进攻时还运来“亚答”、木料，准备长驻。除了用海军封锁河面外，还出动空军投弹百多枚。面对日军优势兵力，抗日军实行坚壁清野，除留下小部分兵力阻击敌人外，主力立即转移到外线，以小队为单位，破坏敌人铁路桥梁，截击敌人运输车辆，牵制敌人的进攻。日军虽然进到天吉港，却找不到抗日军的踪迹，外线又不断受到抗日军的袭击，为保护其后方的交通线，因而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回防，正当日军分兵时，抗日军则迅速化零为整，占据有利地形，在日军必经的路上埋设地雷，痛歼敌人。9月30日上午，日军在泗色路上中伏，死伤100人左右。另一队敌兵在取道玻璃城返回古来时，又在“才成园”芭洋（沼泽地）里中伏，死伤100多人，最后迫使日军全线撤走。此役日军共死伤200余人。

1944年4月，日军动用千余兵力，分七路向“七独”惹姆山营地进攻，还出动飞机配合。抗日军避开正面作战，在敌人进攻的各条路上埋设地雷。起初日军大摇大摆，毫无戒备，结果，被炸得血肉横飞。抗日军同时采用阻击、偷袭等战术骚扰敌人，并在惹姆至甘马挽之间的森林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消灭日军数十人，夺枪20余支，俘虏敌军五人。战斗中，有一民兵亦空手俘获敌兵一人。当战斗结束时，抗日军吹号集合，日军误以为抗日军又要发起进攻，结果，从惹姆和从甘马挽二个不同方向赶来的敌军，都错把

对方当成抗日军而互相开火，致使伤亡惨重。日军计划为期一个月的围剿，不到半个月便草草收场。此役日军死伤一百余人，包括击毙敌指挥官田岛大佐在内。

1945年2月发生在吉打新路的反击战，1945年8月发生在文律的反排华战斗，都是在敌人的进攻中，抗日军采取反击战术而取得较好战果的例子。

伏击战。1943年2月，日军数百余人向“六独”牙叻顶根据地进攻。抗日军坚壁清野，严阵以待。次日，日军三百人行经本路港石山下抗日军第一道防线，不见动静，便继续前进，九时刚过，日军大队人马走到布劳（牙叻顶根据地中的一个小市场，有店铺二十来间）镇东妈娘庙后约百米处时，突然遭到抗日军的伏击，日军马上散开进行两翼包抄。由于敌强我弱，抗日军杀伤敌人后即分二路退却，另择有利地形埋伏。十时以后，日军搜索进山，在水利沟附近又陷入抗日军的伏击圈。一阵猛烈的火力过后，日军纷纷倒地，活着的想夺路逃走，不料又被埋伏在另一边的抗日军开枪射击。日军只得仓惶地拖着十几具尸体逃出山口，回到布劳镇住下。当晚，日军不断遭到抗日军的冷枪骚扰，闹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个日军在河边取水，又被抗日军射倒。迫使日军不敢再住，马上全线撤走。此役日军死伤40余人，包括一个名叫“上井”的军官。抗日军伤一人，缴枪十余支。

1945年2月，日军一巡逻队百余人，在离吉隆坡市区仅几英里的新街场地方进行搜索。抗日军侦知这一情况，采取“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战术，在敌军必经之路的一个叫咕腰的地方设伏。下午五时，敌先头部队30多人迈着疲惫和零乱的步伐，进入了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种枪支一齐开火，敌兵纷纷中弹倒地，没有中弹的则企图夺路逃

走，但在敌军官的强迫命令下，又转过身来向前冲，立即又遭到抗日军的机枪扫射，几颗手榴弹也在敌群中开花。敌军因伤亡众多，只得向后退却。这时几个敌兵利用地形掩护，向抗日军机枪阵地爬来，企图夺取机枪，抗日军发起反击，经过肉搏，才把这几个敌兵消灭。抗日军同时绕过公路，截击来援之敌。敌人看见情况不妙，立刻率残部退走。此役毙伤敌34人，夺得枪械20余支。

一般说，伏击战是利用“打其无备”的情况，袭击运动中之敌，所以常常能收到较好的战果。譬如“五独”1943年在怡保郊区伏击日军特高科特务，1944年在玲珑遮薄甘榜伏击一队敌军；“三独”1943年在昔加末“八十格”地方伏击敌巡逻队；“一独”1944年在“那督勘”地方伏击日军巡逻队；“二独”1943年在简塘尾伏击敌军，以及“七独”1944年在邦振（Pauching）伏击敌运输火车等都是明显的例子。这种伏击战，各独立队都有不少成功战例，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

进攻战。1944年底，“二独”发起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及马来义勇军兵营的战斗，事先经过细致的侦察，集中优势兵力，先以一小队破坏交通电讯和封锁路口，然后兵分二路，以偷袭战术，同时进攻上述二个地点，使其不能互相呼应。战斗的目的，是为营救被关在警局的20多名政治犯，并夺取警局和义勇军的武器。由于计划周密，指挥统一，行动迅速，出敌不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夺枪80余支。

1945年5月13日，“三独”发起了“5.13战役”，对在柔北地区的17个警察局（一说是23个）同时发动进攻。除了在昔加末、巴罗和麻坡遇到抵抗外，其余基本上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里只介绍攻打昔加末的战斗。该地除有上百名警察外，还驻有一支日军警备队，人数有几十人。警备队驻在昔加末市政局后面一个叫水池山的小山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三独”的目的不在攻坚，而在占领警察局和夺取警察局里的军火库。警察局位于昔加末市内南北交通干线上，靠近火车站，离日军警备队约有半英里。

战斗任务由“三独”的二个中队联合执行。战斗一打响，战士们便勇猛地冲进警察局。那些警察不堪一击，只打了几枪，便纷纷缴械投降。恰好当时有一个日军警备队副队长也在警局内。抗日军令他投降，他却拔出指挥刀进行抵抗，当场被打死。另一个滞留在市内的日军伍长，亦被活捉。整个战斗只进行了十几分钟，抗日军便完全占领了警察局、火车站和邮电局。

激烈的战斗是在水池山下进行。日军警备队一听到警察局方面的枪声，便整队驰援。刚到山下，就遭到抗日军猛烈火力的阻击。日军一时摸不清情况，便退回山上固守。几分钟后，又冲下山来，但还是无法突破抗日军的火力网。日军于是改变策略，从左面发起冲击，不料又遭到猛烈火力的杀伤，不得已退了回去。最后改从两翼包抄，抗日军也转移阵地，同样以两翼反包抄敌人。就这样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日军始终无法冲下山来。直到警察局方面的抗日军完成了夺取军火库的任务后，才撤出了战斗。这次进攻仅昔加末一地，便打死打伤日军十人，包括一警备队副队长、一日军伍长（后来他企图夺枪被击毙），一个厚生科长和一个宣传队队长，缴获各种枪械200余支，弹药一大批。抗日军仅有一名战士腿部受伤。

关于抗日军的作战方法，仅列以上几种，以见一般。不

论什么作战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情报要准和及时。凡是情况把握准和及时的，一般都能成功，否则就有失败的危险，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方面，抗日军是有血的教训的，这里就不举例了。

四，除奸与收编群众自发武装

日军为了巩固其统治，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努力培植亲日势力，收买利诱一些没有民族气节和无知的人，为其利益服务。同时，残酷镇压所有抗日活动。这是日军统治手段的两个方面。

起初，日军为了收买笼络人心，针对各民族的不同情况，分别玩弄不同的政治花招。例如：召开各州苏丹的代表会议，让他们成立常设机构，同时，指使一个名叫依不拉欣·耶谷（Jbrahim Yeacob）的民族主义者发起建立马来义勇军和由马来人组成的“兵补”，唆使印度人建立“印度独立同盟”和印度国民军，在各州建立“华侨协会”（或称维持会）和“欧亚混种人协会”等等。表面上日军好象很尊重各族人民的“意愿”，实际上，它是利用这些机构来协助执行其奴役人民的各项政策，为其统治利益服务。针对以上情况，抗日军和抗日组织的政策是揭露其欺骗宣传和政治伎俩，号召群众为各民族人民的真正利益和民族独立，与日本统治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当时由于对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更多的了解，对于如何进一步促进民族主义者的觉醒，争取他们站到共同的抗日战线上来；对于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的人，如何更好地揭露其真面目，清除他们的影响，使他们在群众中陷于孤立，却没有进行更多有效的工作。这不能不是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损失，也错过了一次推进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良机。

对于“华侨协会”，情况稍有不同。除了揭露它是日军的统治工具之外，考虑到多数人是被迫加入的，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更多的是进行教育和争取的工作。在这一方针指导之下，“华侨协会”中有不少人逐渐站到抗日运动这方面来，他们除了捐款、捐粮、捐助药品，支援抗日军外，有些还为掩护抗日军伤病员，提供日军活动情报做出了贡献。个别地方的“华侨协会”甚至成了“白皮红心”机构。这包括后来成立的“自警团”的情况也是如此。关于这点，各州都有不少生动的事例。对于那些忠实为日军服务，屡教不改，而且对抗日运动造成危害的人，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才会对他们采取措施，或加以警告，或加以罚款，即使如此，只要他们改变态度，或停止做坏事，也就既往不究。只有极个别死心塌地，坚持与人民为敌到底，并给人民造成严重危害的人，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才会对他加以惩处。

日军除了扶植亲日势力，还收买一些坏人，包括抗日组织中的叛徒做他的走狗，以破坏抗日斗争，这些走狗或者带领日军进攻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杀害抗日群众，或者刺探抗日组织秘密，出卖抗日干部，或者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民心，或者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其中有些人是罪恶累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的。例如叛徒阿郑（黄雄奋）就是这样一个坏人。他原是第三独立队的一个干部，后来叛变投敌，马上带领日军搜捕抗日群众。在他的指认下，有十几个抗日群众被捕。这些群众，后来大部分被日军杀害了。他还带领敌人进攻抗日军，造成三十多个抗日军伤病员死亡。也有一些人虽然不是叛徒，但却是日军的忠实爪牙，他们杀害群众，鱼肉人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这种人各州都有一些。这是群众最为切齿痛恨的。

还有一种人，他也干了一些坏事，但不是一贯的干坏事，虽也有一些罪恶，但罪恶不是太严重。这种人，有的是为了贪图小利，有的是为了仗势欺人或其他不良动机。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在当时，都成了罪恶势力的一部分，成了日军统治人民的工具。

由于日军大肆收买坏人和不良分子做他的走狗，所以，沦陷初期，敌奸横行，特务气焰嚣张。为了跟日军作斗争，为了发动群众，保卫群众的利益，抗日军和抗日组织就非常有必要发起一个除奸运动。

对于除奸运动，抗日军和抗日组织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是在调查和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敌奸加以严厉惩处，对那些不是一贯做坏事，尤其是罪恶不是那么严重的敌奸，则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壮大抗日力量，而且对于分化瓦解敌奸队伍，使日军陷于孤立是很有好处的。由于当时对敌斗争残酷和极端复杂的情况，由于群众所受的极大灾难和痛苦，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在个别地方、个别时候虽曾出现过对个别敌奸的处理不当的情况，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这绝不是事情的本质和主流，一经发现即及时纠正过来。

关于收编群众自发武装情况：

上文已谈过沦陷初期一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的情况。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了满足个人贪欲，而干起打家劫舍，危害人民的勾当，这类队伍，其成员大多数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第二类，有抗日的思想和要求，也有自发的抗日行动，其中有些人是因仇恨日军的暴行或躲避敌奸的迫害而迫上“梁山”的。这类队伍以工人居多，亦有个别学生；第三类，不抗日，却打着“抗日”的

旗号，实际干的是抢劫勾当，这类队伍有较严密的组织，其成员大都是原来的社会流氓，他们常以“华侨抗日军”的名义，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他们和第一类队伍最大的不同点。

沦陷初期，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活动最为活跃。有些凭借武力，向群众征粮、征款、勒索群众财物，公开抢劫，个别头头更是强奸妇女，强抢民女为妻，如有抗拒，往往遭到杀害。其中最猖狂的，几乎每晚都出动抢劫，给群众造成很大的灾难。例如，活动在柔北居銮、巴罗一带的以李桂庭，李有才为首的一股，曾在一个晚上洗劫了三合港街场上的所有店铺；活动在金马士以北一带的以李铭、封国柱为首的一股，除了把一个有上千人口的马来农村彻底洗劫之外，还将一个马来村长的女儿强奸后加以杀害，这股匪徒特别恶劣，他们常以马来同胞为迫害对象，给民族和睦和民族团结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又如活动在余文打一带的以李单为首的一股，除了洗劫之外，还强抢民女为妻，几个匪首，几乎每人都抢有少女做为泄欲的工具，在这类队伍活动的地方，群众很自然地迫切要求抗日军为民除害，保障他们性命和财产的安全。考虑到并没有发现这类队伍跟日军有勾结的行为，抗日军从大局出发，对他们一般采取教育和收编的方针，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只有对少数顽固不化，继续为非作歹的才采用武力加以解决。

抗日军处理这类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彻底改编将其原来的队伍加以解散，成员都编到抗日军里，对第一类队伍大都采用这种形式；一种是照旧保持其队伍，抗日军只派少数干部进驻该队，加强政治工作，对第二类队伍包括一部份第一类队伍多采用这种形式；最后一种是订立合作抗日协议，规定双方都负有一定的义务。譬如：承

诺互不伤害对方和在日军进攻时互相支援等，这是对第三类队伍包括少部份第一类队伍所采取的政策。实践结果，凡是真心想抗日的，这种收编都取得了成功，相反，即使收编到抗日军里，也难保其不在某种适宜条件下有叛变的危险。在这方面，抗日军是有教训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以李铭、封国柱为首的一股，经抗日军做了工作以后，同意被第三独立队收编为第六中队。李铭被委任为副中队长，“三独”派了鲁东担任党代表，李海山为中队长，另派了几位干部去加强领导。但是不久，李铭故态复萌，又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还无故杀人，并且把派去的鲁东等人统统拘禁起来。“三独”忍无可忍，终于在争取到从其内部分化出来的、以李卓、李桂叔侄为首的真正愿意抗日的人的协助下，派出队伍去把李铭和他的几个死党解决了，六中也予以解散，成员编到其他中队里走。

又如，在彭亨劳勿积罗山有一支以李洪森为首的队伍，在经过派人做了工作以后，1942年秋天，同意接受上彭人民抗日军的领导，共同抗日，初时被命名为第十八中队。“六独”成立以后，被改为第158中队。由“六独”派黄爱平任党代表，李洪森仍任中队长。但李洪森劣性不改，到处以抗日军名义，勒索群众财物，影响很坏，经过一再教育，仍不思改过。“六独”最后被迫派队伍进入该队营地，要求李洪森接受改编调动。李洪森的死党带头反抗，双方随即发生战斗，结果，有十多名匪徒当场被击毙，第158中队副中队长陈秀清等四名战士不幸牺牲，另二名战士负伤。事发时，李洪森恰好带部分匪徒在外活动，得免一死。其残部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敢在西彭地区活动了。

有的队伍，即使人员收编在抗日军里，但在抗日军遭受

严重困难的时候，部分品性恶劣的也有分化出去的情况。如在文律地区活动的“四独”第13中队，原收编有以林金水为首的七个成员，1942年底，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中队党代表陈振耀被捕叛变，初建的队伍受到了破坏。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林金水趁着中队大部分人马外出的时机，串通几个死党，把留守的中队副队长陈亚福杀死，把其他几个队员捆绑在大树林里，便拉队携枪逃走了。

一般来说，大多数自发武装队伍的成员，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抗日军的教育下，许多人都成了坚定的抗日战士。例如，上面提到的从李铭那里分化出来的李卓、李桂叔侄俩，就是其中的代表。李桂后来还成为抗日军的战斗英雄，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

在彭亨、霹雳、吉兰丹三州交界，位于吉兰丹境内的牙叻顶（G. Gerah）山区，沦陷后不久便有三支群众自发武装队伍在活动，他们都打着“华侨抗日军”的旗号，人数从四、五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其中一批以冯成、刘旺为首的，其成员大都是工人和当地青年，他们是真心要抗日的。另一批以一个走江湖名叫高百乡为首的，表面也讲“抗日”，实际是以“抗日”名义向群众要钱要物；最后一批以蒋石波和一个外号叫“独眼龙”、真名叫扬广的人为首，成员大多数是亡命之徒，这类组织以土匪行经闻名。例如，沦陷初期在瓜毛生（Kua Musang 在吉兰丹州）就有十多家胶园主被他们洗劫一空。有个叫古亚横的一家八口都惨遭杀害，只有最小的儿子逃得性命。1942年农历初二，蒋石波带领匪徒到石山下抢劫，当抢至黄金仙家时，遭黄氏兄弟拼死抵抗，蒋石波被打伤右手，被迫撤走。1943年3月，扬广带人到大谷畲村勒索，被组织起来自卫的武装乡民包围，击毙六、七人。他们惯用的

手法是“箍头壳”，即用铁环紧箍人的头颅，再以木（竹）片敲逼，使人不堪痛苦而交出财物。他们常假借“华侨抗日军”的名义，其实以“抗日”之名，行土匪之实。群众对他们切齿痛恨。

1943年初，日军为巩固其统治，向牙拉顶山区发动进攻。冯成抗拒日军，和西彭抗日军建立了联系。1943年1月，抗日军派出以张剑青为首的七人小组前往该地，结果冯成接受改编，成立了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又经过争取，蒋石波、扬广、高百乡也同意接受抗日军番号，叫做抗日军吉兰丹部队第二、第三分队。三方达成协议，愿意彼此合作，打退日军的进攻。但在1943年2月，日军进攻时，蒋石波、扬广却按兵不动，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高百乡则表面敷衍，并不积极配合，后来又带队全部溜走，只有冯成真心实意和群众一起，击退日军几次进攻，打死日军40多人，最后迫使日军撤走。事件中，蒋石波、杨广看到冯成部队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自己则十分孤立，从此便制造事端，与冯成发生磨擦。1943年8月，“六独”正式成立，冯成队伍改为“六独”牙叻顶分队，冯成仍任队长。1944年4月，牙叻顶划归“五独”领导，牙叻顶分队被编入“五独”第12中队。从此，蒋石波、杨广、高百乡等更与第12中队分道扬镳，从制造磨擦到制造血案。1944年4月，第12中队小队长孙增祥带领侦察班到本路港侦察，遭到杨广人马的袭击，腹部中弹牺牲。同年5月，蒋、杨背信弃义，率队偷袭第12中队营地，战斗中使杨获（原吉兰丹部队第2分队党代表）和一名小队长牺牲。后来第12中队发动全面反击，迫使蒋石波、杨广撤至槟榔畲，第12中队派刘旺为代表，前去谈判，竟遭杀害。“五独”忍无可忍，展开军事围剿，

终于将蒋石波、杨广队伍击溃，并逐至泰马边境，成为流寇。高百乡的队伍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投向抗日军，一部分随高百乡流窜外地。后来，高百乡在“五独”追击蒋石波、杨广的战斗中，在吉兰丹河上游东岸一个不知名的小居民点被俘，畏罪自杀身死。冯成自接受抗日军领导后，始终表现很好，他战斗英勇，一直坚持斗争，坚持抗日，直到后来被捕出境，病逝于广州。

蒋石波、杨广率残部逃往泰马边境后，一直到1945年12月1日人民抗日军复员，才又回到宜力(grik)、玲珑一带活动，并对抗日军复员战士进行报复。在巴眼色海(Bagan Serai)的瓜拉古楼(Kuala Kurau)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杀害了抗日军复员战士陈惠民等2家共12口人！

五、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来源

战后，一些不知情的人士以为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来源，全由英国人提供。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实，英殖民当局在新加坡沦陷前夕提供给抗日军的武器，只有二百件左右。很明显，单凭这二百支枪，不仅谈不上武装全马八个独立队的近万名战士，更不可能仅凭这么一点武器，跟日军展开三年多的战斗。

不错，正如现在许多人所知道的，1945年5月以后，联军依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关于协议的内容，请参阅本书第五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东南亚联军的合作关系”)开始向抗日军空投武器，但空投的武器数量有多少，恐怕就不是很多人都清楚的了。这里不妨引用英国人自己提供的数字，根据1945年9月13日由及尔·戴维斯中校(Lt. Col. D. G. Gill. Davis. 注意：不是负责跟抗日军联络的那个台维斯)在新加坡公布的136部队备忘录称：联军原计划向抗

日军空投 3 5 0 0 件武器，后来因日军宣布投降，仅提供了 2 0 0 0 件。（见英国军管政府档案 PSD / 3 9）那么，抗日军复员时，英国人从抗日军那里又收到多少武器呢？有二个数字：一个数字说是 4 7 6 5 件（见英国作家克拉特考特·李查特《1 9 4 5 — 6 3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革命和暴乱》一书），另一个数字是 5 4 9 7 件（见英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英军 1 3 6 部队”一文）。前者数字是根据抗日军复员时交给英军的武器得来的，后者的数字则没有注明出处。我们暂且以前者的数字为依据，那就是说：英国人从抗日军那里收回的武器较之它所提供的还多出 2 7 6 5 件。由此可见，认为抗日军的武器都由英国人提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顺便说一句，英群提供的数字也并非凭空臆断，因为参加抗日军复员的战士共有 6 8 0 0 人，这个人数和交出的武器数还是较为接近的。）

其实，抗日军在复员前，所拥有的武器远非 4 7 6 5 件，也不止 5 4 9 7 件。现在大家都知道，抗日军是分为公开队和秘密队的，公开队参加复员，秘密队在日军投降后开出城市不久便解散了，武器都收藏起来。根据公开队和秘密队合计总兵力计算，抗日军在复员前至少拥有 8 0 0 0 — 8 7 0 0 件武器，虽不能说绝对准确，但相信离事实不会太远。那么，在联军空投的 2 0 0 0 件武器之前，抗日军靠自己的力量已拥有 6 0 0 0 — 7 0 0 0 件武器。（例如：第七独立队在日军投降时拥有长短枪 5 0 0 余件，这些武器没有一件是从英军手上得来的。）这些武器是怎样来的呢？靠自己制造或从走私的渠道购买？答案是否定的。

先说第一种情况：自己制造。为了作战的需要，人民抗日军是拥有一些小型军械厂的。这类小型军械厂配备有简陋

的维修工具如手摇磨床、铣床、台钳等，条件好些的还配备有车床和发电机。这类军械厂，各个独立队都有1—2处，但它实际上只能做些修补工作，或制造一些小零件和地雷等，限于设备和材料的缺乏，是没有能力从事武器制造的，更不要说批量生产了。因此，说抗日军的武器来源于自己制造的说法可以排除。

从走私的渠道购买？也没有可能。因为当时毗邻马来亚周围的地区都被日军占领，或在日军的势力范围内。加上战争期间，走私武器一被发现，就有生命危险。即使有人走私武器，按当时的情况，人民抗日军也没有财力购买。

那么人民抗日军是怎样拥有武器的？答案是：

第一，靠和日本军警的作战中获得。这是游击队获得武器的最主要来源。

第二，从英军遗弃的，从民间贡献的，包括从收编群众自发武装中获得武器。抗日军因为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即使当时抗日军在收集英军遗弃的枪械时有漏掉的，最后都由群众收集起来，献给抗日军。收编群众自发武装所得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民间贡献的一种。

第三，在日军投降前后，从个别日军手中获得武器。这种事各地都有。当时个别日军为求自保，或者把手中的武器交给抗日军，或者打开军械库让抗日军去搬运，甚至有开车把武器送上门的。但这种情况为时很短暂，前后大概只有十天时间。

这就是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来源，尤其是第一，第二两种途径。因为武器来之不易，有些还是用性命换来的，所以人人养成爱护武器的习惯，把武器看得比性命还重要。

六、人民抗日军的政治教育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一支有理想、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每个成员都明白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这就是打倒日本法西斯，争取马来亚的民族解放。

抗日军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首先是来自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大家的生活经历不同，认识也有差别，为了步调一致，增强战斗力，部队从一开始，就把政治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政治教育是在求得政治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人民抗日军之所以能在日军的重重围困下，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不被打败而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坚持政治教育所产生的结果。

总结几年来的经验，人民抗日军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1、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抗日必胜信念。这在初期尤为重要。当时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和南洋各地，大肆吹嘘其所谓“赫赫战果”，编造种种“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看不见抗日斗争的前途，悲观失望，丧失斗志。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扫除这种错误认识，提高胜利信心，分析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日必胜”的道理，以及出路在什么地方，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战士们和困难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加强了团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般来说，对于为什么要抗日，许多人从自己切身的体验中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但对于打倒日本法西斯的最终目的为的是什么，就不一定人人都能自觉理解了。有些人有抗日的要求，却不一定有民族解放的意识。部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提高战士们的民族解放觉悟。因为只有明

白为什么而战，才能更好地去作战；明确树立为马来亚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目的，就能更自觉、更勇敢的去进行抗日斗争。提高政治觉悟当然不仅仅只包括民族解放觉悟这样一个内容，但民族解放觉悟却是当时提高政治觉悟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自从1943年3月马共发表了“抗日九大纲领”以后，把“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作为政治教育内容也就更明确、更具体了。从此，“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就成为人民抗日军的基本宗旨，也是抗日军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内容。

2、密切军民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人民抗日军来自人民，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帮助，抗日军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如何使每一个战士时时刻刻牢记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建立起军民鱼水关系，也是抗日军政治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这个要求下，决不允许任何人擅取群众一针一线，损坏群众一草一木，如有违反必受处分。为此，抗日军制订了四条纪律、十项注意（注3）。这些纪律的制订，除了有利于军事行动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建立军民鱼水关系。执行四条纪律、十项注意，是抗日军保护群众利益，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的最起码要求。在三年八个月的斗争中，有多少抗日军战士，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而英勇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为了解除对群众性命财产的威胁，而深入敌人据点，打狗除奸；为了保护群众免遭土匪和暴徒的蹂躏，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打退或制止了各种暴行……至于为群众治病，减轻群众的痛苦，协助调解纠纷，帮助群众组织起来保卫自己……更是不胜枚举。因为人民抗日军把人民看做是自己的父母，自己是人民的子弟，所以才会有此民拥军、军爱民的动人情景。这是军民鱼水关

系的最好体现，也是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之一。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人民抗日军建立军民鱼水关系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促进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和民族团结，特别是马、华、印三大民族的和睦相处和团结。抗日军从建军的第一天起就把这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和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后来，人民抗日军把红底左上角缀三颗金星（象征代表马华印三大民族）作为军旗的标志，更进一步体现了三大民族团结、战斗，和共同争取胜利的思想。沦陷期间，各地都有不少马、印族青年与抗日军战士并肩进行抗日斗争，特别是山地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参与和支持抗日斗争，就是一例。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的殖民统治，“分而治之”的政策，三大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等）和时代的局限，特别是由于内奸叛徒莱特的干扰和破坏，在建立更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

3、官兵平等，团结友爱。这是处理抗日军内部关系的准则，也是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人民抗日军内部，只是工作分工的不同，在人格尊严和政治地位上是一律平等的。凡是要求士兵遵守纪律、服从指挥、爱护人民、保卫人民利益……官兵都要一样遵行；指挥员如果犯了错误同样要受到批评和处分，决不允许有什么例外。生活上，当官的更不能有特殊，大家吃同样的饭菜、睡同样的竹枝床（用山竹子编成），行军、战斗更是如此。除此之外，当官的有更多的义务关心士兵，听取士兵的意见和要求，帮助士兵解决各种困难，协助士兵提高文化和思想认识水平。当官的只要这样做了，士兵就会以加倍、十倍的热情尊敬他，执行他的命令，做好各项工作。这样，部队的凝聚力就会大大加强，战斗力就会大大提高，这样的部队是不容易被敌人打跨的。

以上是人民抗日军政治教育任务最主要的几点。此外，还有如国内外形势、共产党的领导、铁的纪律、军事训练和军事技术、马来亚抗日的前途等等，都是政治教育所涉及的内容。其目的就在于把抗日军培养成一支有政治觉悟的、能密切联系群众的、有严明纪律和团结战斗的队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抗日军采取了种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和方法：如每月举行1—2次讨论会，讨论各种政治时事问题。在这种讨论会上，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言和提出各种问题。每周举行一次生活检讨会，对生活上存在的问题，进行诚意的相互批评和检讨。组织歌咏队、识字班、各种文化娱乐小组等，经常进行交流或者联欢。在有条件的时候，也举行军民联欢会，这不但受到群众的欢迎，对部队也是一种教育和鼓舞。或根据各人爱好，组织打篮球、跳高、赛跑，甚至举行运动会。或出版墙报，进行自我教育……。除此之外，各独立队还根据需求和可能，举办短期干部训练班，抽调骨干进行系统的轮训……。所有这些，对于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密切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加深彼此的了解，提高干部战士认识水平和觉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注③：人民抗日军四条纪律：

- 一、绝对服从指挥，
- 二、严守军事秘密，
- 三、没收敌产归公，
- 四、爱护群众利益。

十项注意：

- 一、态度要和霭，
- 二、买卖要公平，
- 三、借东西要还，
- 四、损坏东西要赔，
- 五、内务要整洁，
- 六、肮脏要打扫，
- 七、不打骂俘虏，
- 八、不调戏妇女，
- 九、大便上厕所，
- 十、洗澡避女人。

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功绩和历史地位

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现在六十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当时的情况。虽然人民抗日军存在的时间不足四年，但它对马来亚人民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尽管战后有人出于种种动机，想尽千方百计企图歪曲它，诬蔑它，甚至想否认它的存在，但历史将会证明这种企图是不会得逞的。从广义来说，否定人民抗日军，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马来亚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人民是不会允许的。当法西斯侵略者入侵的时候，马来亚人民没有逃避，更没有屈服投降，而是挺起胸膛，面对敌人的屠刀，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这就是马来亚人民的浩气，这就是马来亚人民的反抗精神，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在马来亚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这是一。

第二，人民抗日军的建立，开创了马来亚历史上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武装，为保卫人民利益，反抗外来侵略，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并在国际条件的配合下取得胜利的历史。马来亚人民是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的，例如发生在19世纪末的霹雳战争、彭亨战争、森美兰战争，以及爆发在雪兰莪的反英起义，这些战争，揭开了马来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新篇章，是正义的。但是，由于这些反抗或者是由封建贵族所领导，或者是缺乏革命的政党作核心和明确的政治纲领，最后都失败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则不同，它是第一次真正由人民自己掌握，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民武装，仅从这一点来说，它在马来亚的历史上就是空前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种种原因，在日本投降后没有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但从此之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奴役和宰割马来亚的人民了。马来亚最终在1957年取得独立就证明了这

一点。

第三，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统治，牵制了日军在马的七万兵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抗日军的存在，日军掠夺了马来亚资源的企图受到沉重的打击。为了巩固其统治和镇压马来亚人民的反抗，它不得不在马来亚保持一定的军力，一般维持在七至八万人之间。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八个月的斗争中，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日军作战 3 4 0 多次，（其中一百多次是主动进攻，十多次是反击敌人大规模围剿）毙伤敌 5 5 0 0 余人。抗日军本身也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见《大战与南侨》第 3 0 页“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记”）

最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存在和发展，抗日九大纲领的提出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提高了人民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战后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除了国际因素之外，不能不看到这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三年多武装斗争所引发和影响的结果。

总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三年八个月的武装斗争，就是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就是依靠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首先是马、华、印三大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就是马来亚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拥有武装，为保卫人民自己的利益，进行有组织抵抗的战争。

这就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功绩和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所应作出的公正评价。

第四章 人民群众

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马来亚抗日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其特点是：军民一体，血肉相连，生死与共，互相支援，协同作战。特别是在人民抗日军没有稳定根据地这一特定的条件下，这种不可分离的军民鱼水关系，就更加显示出其重要性。

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疯狂入侵，及其对马来亚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武装抗日成为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和自觉行动。而人民抗日军不但要依靠人民来求得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利益而战，因而必然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大力的支持。在广阔的抗日游击区，除了有一支人数逾万的人民抗日军武装部队外，尚有数十万有组织的抗日群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半武装组织的抗日后备队员），作为人民抗日军的坚强后盾，形成一条广泛的抗日战线，他们不但在粮食、物资、药品等方面给以部队最大的支援，而且在军事行动上，与抗日军密切配合，提供情报，参加或配合作战，救护、医治部队伤病员，掩护部队安全转移，源源不断地为部队输送新的兵源，……等等，从而保证了人民抗日军在敌人的反复围剿、进攻中，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得以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去战胜敌人。在这一条广泛的抗日战线上，军是民、民亦军，鱼水相依，驻马数万日军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穿着军装的上万抗日军人，而是数十万有组织和半武装的抗日军民，就更加显得力不从心，疲于奔命。这就是人民抗日军战斗力的源泉，是人民抗日军胜利之本。

毫无疑问，只有人民才是马来亚这场抗日游击战争的真

正主角。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战争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华人为主组成，华人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广阔的华人农村成了抗日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游击区，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马来亚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所造成的。三、四十年代，在马来亚人口中华人的比例很大，约占43%，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在前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下，华人和各族人民一样，政治上受欺凌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压榨，具有反帝、反殖的优良传统。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早已引起新、马广大华人的义愤，他们既拥护中国的对日抗战，更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抗日战争期间，群众踊跃参加抗日军打日本的事例，比比皆是，涌现出很多激动人心和可歌可泣的事例。如雪兰莪州武来岸埠有一家群众四兄弟——连奇、亚球、邬来、亚光，都一齐参加人民抗日军，家里是部队的交通站；还有一家罗勒（罗秋炳）兄弟三人均先后参加部队，母亲（叶婶）是地方抗日组织与部队联络的交通员，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穿梭来往于敌占区，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北区古毛埠的雷英、观锡、阿竹等三户人家，也是全家一齐参加抗日军，家里是地方抗日组织的交通站，在1944年夏季的一次日军大围剿中，三家人的房屋同时被日军烧毁，观锡的父亲被日军逮捕后杀害，阿竹的哥哥被捕坐牢牺牲，雷英的妹妹被日兵强奸致死，二弟被捕受酷刑以致重伤，医治无效，于日本

投降后逝世。“二独”新队副队长斯科（肖克科）一家八人，除父母外都参加了抗日军，三弟肖运先、四弟肖云华在战争中牺牲，妻子陈秋蓉被捕坐牢三年，受尽酷刑，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出来，因伤致残。其父母支持抗日军，在日军扫荡时房屋被焚毁，其父被迫投河自尽，母亲亦遭迫害而病逝。吉打州美农埠的郑金利几兄弟都参加了抗日军或地方抗日工作，并先后英勇献身。彭亨州文德甲三英里客家村，在一次动员参军的群众大会上，有一位名叫梁雪梅的中年妇女，当场鼓励她的独生女儿卢兰花报名参加人民抗日军，并为女儿准备戎装，送女上队。以后，她还与其丈夫卢江分工负责村里的抗日组织工作，卢江专职搞好粮食生产，支援部队，而梁雪梅本人则隔天便到文德甲镇一趟，了解日军活动情况，并代部队购买所需物品。当时文德甲驻扎有日军警备队，日本奸细在市内活动猖狂，她随时都有遭到逮捕和被杀害的危险，但梁雪梅却置生死于度外，坚持为抗日而工作，被当地群众誉为“革命母亲”。

人民群众在参加抗日战争的过程，必需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这个时期的抗日群众组织计有：抗日同盟会（简称“抗盟”，有些地区称为抗日联合会或抗日总会，名称不同，实质一样）、抗日后备队（或叫抗日自卫队，是群众半武装组织）、抗日别动队、流动队、锄奸队、抗日妇女会、儿童团等等。这些抗日群众组织，都是在马共地方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其成员遍布华人农村和中、小城镇，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给了日本占领军以沉重的打击。

除了广大华人以外，马、印两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由于觉悟程度的差异，虽然不像

华族人民那样踊跃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初期对人民抗日军普遍持中立、同情的态度，后来同样是不满日本的统治，有部分人也直接投身抗日的行列，与华族人民并肩作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马来族人民逐渐看清日军残暴侵略本质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假谎言以后，部分人也陆续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和其他抗日活动。“六独”一六四中队曾经建立了一个马来人小队。加央马来青年小组协助吉北人民抗日军驱赶一股华人土匪团伙。1945年，从吉打到柔佛，参加抗日后备队的马来青年约有百余人。1945年1月，北马“疋各周”地区，有100多名马来青年，组成马来抗日游击队，后来受日军进攻冲散，其中80多人仍然集中整训，准备配合联军反攻，坚持到日本投降以后才复员。

印族人民因受波斯领导的国民军的影响，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要争取印度的独立，必须和日军合作反英，因而对抗日表现中立，未能单独组成抗日游击队。但仍有不少头脑清醒者，参加各地的人民抗日军或参加抗日活动。如“一独”、“五独”及其他一些独立队，就曾有一些印度籍战士。参加抗日军的印族青年，作战表现都很英勇。“一独”模范中队的风机枪（重机枪）手印度籍战士金水，在顿巴央反围攻伏击战中，射击既准且狠，杀敌成绩最为显著。

原始森林的土著民族秉性正直，忠诚勤劳勇敢，他们纯朴的信仰是：“人是应该平等的”。在其部落生活中，分配生活物资，男女老幼一律平等。因此，他们对日军的凶残暴行，自然会深恶痛绝。在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各地山区，土著民族在粮食供应，巡逻放哨，交通传讯，营地住宿等方面，都给人民抗日军大力支持。1943年“二独”司令部遭日军

围攻，撤退到原始森林土著民族的村落，由土著民族提供粮食，并带路选择营地。“六独”有两位土著民族交通员，名叫乌巴和亚水，负责开辟山路交通线，并常为部队猎取野兽改善生活，有时猎物较多，还制成肉干分送给各个部队。上彭的土著民族部落，都是部队的交通站和临时宿营地，土著民族把抗日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军民关系非常融洽。1942年底，日军围攻“五独”第四中队，在外围放哨的土著村民，迅速绕道通知抗日军，使四中能在伏击中消灭日军10余人。他们开辟山路数百英里，由阿均带引抗日军从霹雳到吉兰丹合击土匪，阿均后来坚决要求参加抗日军，终于被接纳。另一位土著民族的英雄人物阿央，被日军逮捕，受尽毒打酷刑，宁死不肯供出抗日军行踪，被囚禁两个月才乘隙逃回。“三独”还组织了一支纯粹由山地土著民族参加的小队。“五独”的长途运输，也多是由土著民族协助的。

二、大力支援人民抗日军

各民族和各界人民对人民抗日军的支援，是多方面的，包括捐助粮食、药品和现金，协助锄奸，惩治败类和叛徒，提供日军和警探动态等情报，掩护抗日军工作人员和伤病员，输送新战士参军等等。人民抗日军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人民群众孕育自己的武装队伍，像爱护自己的亲人一样，竭尽全力来帮助抗日军，并为此受到日本军警的逮捕、杀害，房屋被烧，蒙受重大牺牲和财产损失。

1、捐助物资及经济。人民抗日军的粮食，90%以上依靠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供应，其中华族农民提供的占最大比重。很多农民省衣俭食节约粮食支援抗日武装部队，多数交

由交通站民运工作者收集后，分段分批运送到部队驻地附近，才由战士下山驮背上营地。部分粮食是用群众捐助的现金在农村圩镇购买。药品、日用品大部分也由民运人员购买。抗日同情捐一般是逐月缴交。1943年11月在新山区农村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当场就捐献千余元现金和一批药品。每逢铲除重要日探和败类，群众解除心中恨，最外围的交通站就会收到不少粮食和猪肉、鸡鸭等副食品，既是慰问，也是鞭策。雪兰莪有些群众绕道回避日本军警的检查关卡，肩挑背负粮食，跋涉十几公里送交人民抗日军，协助解决了两个中队因受进攻而遭到的粮食困难。华玲日本粮仓管理员，制造“半途被劫”的假象欺骗日军，将3卡车大米，在半途公路边，交给抗日军组织的各族群众搬走。士乃抗日会青年组成“飞车队”，多次将行驶火车的货车厢门打开，将粮食、副食品甚至整箱手榴弹掀下路旁，由抗日会组织群众运走。日军罐头厂工人将大量海鱼偷出供给抗日军。和平港抗日会组织群众煮晒海盐，运送给抗日部队。柔佛一些群众甚至给前线正在作战中的抗日军送上饮食。雪兰莪、柔佛、彭亨各地建成十几个集体农场，既供场员食用，又大量支援抗日部队。彭亨立卑榴莲港有一位姓黄的华人（广西籍），自己开芭种粮食，在抗盟会亚福（颜天迎）的发动下，一次就捐赠60袋（面粉袋）粮食。

土著民族对抗日军的粮食支援一贯很慷慨，“五独”第四中队在受日军围困期间，90%的食物，依靠土著民族支援木薯、地瓜叶等度过难关。1944年下半年以后，部分马来农民看清人民抗日军全心全意打击日本，保护人民的实际行为，开始捐赠粮食给抗日部队，吉打牛英村由马来村长带头收集粮食交给民运人员运走，森美兰简塘尾马来村也出售

大量粮食给“二独”，板底、兰那港、冷甲、山番港等地都有马来群众向抗日部队捐赠粮食。

沦陷期间，市面药品不多。抗日军生活艰苦，缺衣少食，多吃野菜山果，病人增多，伤员不少，主要是依靠群众冒险输送药品和协助治疗。新山日军医院的护士和工人，不断从医院偷出药品暗中送给抗日部队。不少城镇商人和中小资本家，也捐助各类成药、酊粉剂和棉花绷带。各地都有一些医生，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部队伤病员免费治疗。武来岸印度医生索多甘（Doctor Kam）在两年间为“一独”八中数十伤病员义务医治。古毛万春堂老板张宝臣，长期义务捐赠和帮助抗日军购买药品医治伤病员，被暗藏败类告密，为宪兵逮捕杀害。天吉港、美罗、雅姆山等抗日军驻地的中医、西医和草药医生，都是来自乡镇的抗日群众。

各地抗日游击队成立初期，武器的主要来源，是同情抗日的群众所捡拾的败退英军丢弃的武器，或是捐献家藏猎枪，少数是用募集的同情捐，向群众购得。由群众收集和捐献的步枪、猎枪和少数手提机关枪，总数约800余支。牙叻顶抗击进犯日军时，群众不但捐献猎枪、连几代收藏下来的土炮都推出给抗日军助战。各地所办抗日刊物的出版用具和纸张，很难购买，部分由商店捐赠，部分靠日机空袭时群众从外国洋行的仓库里搬运出来，供报社使用。

群众提供大量的物资和经济支援，丝毫没有希图得到补偿或报酬，唯一的愿望是打败日本法西斯。很多群众遇难临被日军杀害时，迸发出充满仇恨的最响亮口号，也是“打倒日本法西斯”！

2、协助锄奸及提供情报。各州锄奸活动，消灭日本宪兵部和警备队的暗探线人，以及作恶多端的民族败类和叛徒，

主要是由抗日武装部队派出锄奸组（别动队）执行任务。部分是由抗盟会或地方抗日组织建立的别动队动手处决，有时是由两者联合行动。不论如何执行任务，情报来源都是依靠地方群众组织派人调查、侦察和配合。

“一独”二十九中队依靠群众提供准确详细的情报，才能清除在吉磷山边伪装设厂造纸的十几个日军便衣侦察员。1943年3月在隆邦路上咖啡店顺利消灭凶恶叛徒廖奕林等4人，也是端赖群众组织所提供的准确情报。吉打锄奸组在美农闹市，在警备队和警察的眼皮下，击毙凶狠残暴的日探组长李亚狗父子，就是依靠一个毫无组织关系的老伯，以又惊又喜的心情，向素未谋面的锄奸组员，非常仔细地介绍李亚狗等活动地点、时间和有关情况，而获得成功的。在吉隆坡半山芭枪毙大汉奸黄铁珊，是由参加抗盟的一个菜市卖鱼青年提供情报和现场指点。在雪州清剿怙恶不悛的青龙山匪徒，是由抗日群众先在匪帮中进行分化工作，以削弱匪帮的战斗力的，然后取得成功的。

1945年“二独”在芙蓉沙都律消灭大叛徒亚铁、暗探李彦章等人，除亚铁受伤未死外，其余全部被消灭，缴获了几支短枪。抗日军能顺利消灭这些叛徒、走狗，是通过当地的抗日群众组织，事先争取了暗探黄涛做内应，假借宴会的名义宴请那些叛徒、走狗，抗日军战士化装成群众潜伏在外面，趁他们酩酊大醉时，冲入宴会厅突然袭击。

1943年4月，“五独”一中组织敢死队在怡保市郊袭击日本特高科便衣队7人，也是由地方别动队协作行动。“一独”模范中队锄奸队在间津、甲洞、文良港一带的锄奸活动，基本上是在地方武工队配合下进行。

安顺、美罗地区消灭为虎作伥的汉奸保长，捕捉和处决

日本暗探和奸细，都是由地方别动队执行。吉隆坡近郊有4个地方抗日别动队，在鹅麦消灭叛徒陈观龙兄弟，在间津枪毙叛徒记才，在暗邦百六间伏击今野宣传队队长，都产生较大影响。华玲牛英村的马来村长，放出大办喜事筵席的虚假空气，引诱警备队暗探阿歪自投罗网，由锄奸队加以处决。

各地人民抗日军的军事行动，对日军据点和警察局的进攻，粉碎日军的围剿，群众情报网都起决定战役胜负的耳目作用。“三独”“五·一三”战役进攻17所警察局（另一说是23所），天吉港反围攻战，布劳镇伏击战等等重大战役，群众情报工作都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情报的传送，主要依靠爬山越水奔跑面告，不少群众和交通员因此在途中或事后被日本军警捕杀，每份情报都沁透广大人民力争击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3、输送武装战士和掩护抗日人员。在粮食供给困难，日军连续进攻的时刻，还有一批批新战士相继参加部队，使抗日军不断发展壮大，主要依靠抗日同盟会等群众组织，持续选送经过挑选甄别的抗日青年参加武装部队。多数是先参加抗日后备队、自卫队，然后从中择优选送。“一独”的武装队员当中，400多人来自抗盟所选送，新队队员有500余人从后备队、自卫队调配。城镇青年要求参加抗日部队，也是经由抗盟等群众组织或可靠人士介绍。抗日青年都以能获选送上部队为光荣，所以新战士的抗日积极性普遍很高。玻璃市州苏丹就以侄儿皇碑能得参加抗日斗争，看作是为王室增添光彩。

群众对抗日人员的掩护是多方面的。一些外派锄奸队员和地方抗日工作人员，大都靠群众用“雇工”、“土产收购商”等等名义，给予寄宿，倍加掩护和照顾。

群众对抗日军伤病员的掩护和帮助医疗诊治，是出于内心的同情和爱护，也是高尚的人道主义体现。马共雪兰莪州地委书记杨果病重时，由群众掩护在家医治，这家人冒的是杀头、烧屋的危险。“一独”的伤病战士，由群众在野外林中，搭棚收容，请医生治疗，三餐秘密送饮食，轮流放岗哨。当日军进攻时，群众背负着重病号协助转移。“一独”有一名病重的女政工干部，由梁氏几姊妹轮流背负，走了20几公里山林小路，送至安全地点疗养。模范中队有几个病号，更是在马来农村由马来族人民掩护寄宿医病。“二独”队长马丁，1942年2月中旬发大热症，由当地抗日群众组织护送至冷宜附近一家由印度人管理的橡胶园治病，不料碰上日军在马口至冷宜一带进行检证、大屠杀（共杀了千多人），几十名日兵来到该胶园入屋搜查，将屋内30多名华工驱赶出门前空地。当时马丁高烧至昏昏沉沉不能走路，日兵见他病得不省人事，用枪托推了他几下便走出门前，叫那些华工列队逐个查问：有无参加共产党？有无外来游击队？同时叫他们脱下上衣，作出准备刺杀的姿势。那些华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知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后来找到那位印度经理查问，也说本园没有外人，这些华人都是做了很久的老工人。一位日本军官要他担保，他毅然答应。结果日军找不到借口下毒手，马丁和30多位华工获救。待日军离开后，印度经理才吩咐华工把马丁抬到胶园山后治疗。各州群众对抗日武装人员的救治，情况大同小异，不少是当作亲生儿女，掩护在家里治疗。

群众对人民抗日军的支援，无微不至，甚至超越了军队后勤部门的作用，这是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显著特色。

三、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工作蓬勃开展

对各族人民广泛宣传反对日军侵略，揭露日军残暴罪行，介绍国际反对德、意、日侵略同盟战争形势，以提高和加强群众反对日军侵略的信心与决心，主要是依靠各地抗日群众组织进行的。这些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工作，比较长期持续的，是各州出版的秘密小报。这些小报多数由马共地方组织领导，少数由抗日军组织编印，但是大量的编写、印刷和散发工作，则由有组织的群众按不同的地区、路线分头进行，互相保密，单线联系。抗日小报多是八开纸，钢板腊纸油印，不定期出版。印好的小报，交通员走山路传送，走公路的则装于自行车钢管内，菜篓底，米袋内，远的送往近百公里以外，交由地方群众组织散发传阅，并秘密分派给城乡同情抗日的群众。这些抗日小报，成为当时群众的最主要精神粮食，一张小报往往经上百人传阅，影响面很广。各州的主要抗日小报先后出版有 37 种，部份出版时间不长就被敌人破坏。计有：

新加坡：《自由报》中文版，《解放报》中文、英文版。

柔 南：《群众报》中文，《打日本》中文、英文、马来文，《抗建报》中文，《胜利呼声》英文。

柔 北：《抗日新闻》中文、马来文，《大众报》中文。

森美兰：《大众报》中文。

雪兰莪：《抗日先锋报》中文，《人民抗日报》中文，《民主呼声》英文，《解放报》中文，《自由报》印文、马来文，《抗日新闻》马来文。

东彭亨：《民意报》中文、英文、马来文。

西彭亨：《人民报》中文，《抗日新闻》英文、马来文、印度文，《游击报》（后改为《革命军人》）中文。

霹 雳：《人道报》中文，《光明报》中文，《马来亚之声》英文，《人民呼声》马来文，《自由呼声》印文。

吉 打：《活路报》中文、马来文，《先锋报》中文，《爱国报》中文。

檳 城：《真理报》中文，《公道报》中文，《真报》（初名《光明》）中文。

各地有时还印发中、英、印、马来文的传单，如公布被消灭重要敌探或民族败类的严重罪行，揭发日本侵略者制造排华阴谋等等。各民族觉醒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雪兰莪的《自由报》分别由印族的马林、阿亮编译印文版，由马来族阿勇编译马来文版，三人又合编英文版《民主呼声》。东彭亨的英文版《民意报》，由日本南侵时避入山林中的英国妇女白娜编辑。西彭亨的马来文版《抗日新闻》由雪兰莪巴生苏丹的弟弟亚荣（华文名）编印。吉打马来文版《活路报》是由印族青年辛格协助编印。

各地抗日同盟会或部队分别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开展宣传工作。“六独”的战士在马来族抗日青年带领下，到马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七独”和抗日群众联合组织琼剧宣传队。“四独”还组织有马来战士参加的武装宣传队。其他各州都有由群众组织分别成立的文艺宣传队。沦陷时期群众文娱生活单调贫乏，歌舞剧团宣传队在人民抗日军保卫下，在农村、胶林演出，很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在吉东日落湾、东彭兴隆火锯厂林场等地区演出后，且有日宪线人主动向宣传队表态认

错，表示此后愿为抗日工作效劳。

更多的经常性的宣传工作，是由与群众劳动生活在一起的民运人员逐家逐户以谈天的方式进行，群众的同情捐和捐赠物资，也是靠他们收集以后逐级上缴给武装部队。民运人员绝大部分是没有参加政党的抗日人士。传播最广，深入千家万户，越传越生动，影响最大的是抗日群众的口头宣传。新路反击战的胜利，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全吉打。群众的宣传活动，反映出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显示出广大群众与抗日军同心同德、苦乐相连的亲密关系。

四、各阶层联合共同抗日

抗日群众组织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孤立日本侵略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

对中上层的团结工作，一开始就受到各级抗日群众组织的充分注意。部分华族资本家，被迫当上维持会（华侨协会）会长，既怕得罪日本侵略者，又怀有民族受难的内疚意识，抗盟通过会长的平时好友和打进协会工作的人员，加以说服劝解，使知知港、文德甲、芙蓉、马口、淡边、双溪大年等30几个华侨协会（维持会）会长，秘密参加抗盟或暗中捐助粮食、药品和现金给人民抗日军，通报有关日军动态、日军调动、宪警活动等情报。吉打州华侨协会或维持会会长还将藏在碾米厂中的短波收音机提供给抗日报社收录新闻，将协会作为抗日小报转运站。士乃维持会会长等5个老板，捐助粮食药品和副食品。雪州《抗日先锋报》是在一位资本家的别墅中收听新闻和编写印刷的。茹嫩华侨协会会长通过警

备队长妻子（华人）的关系进行劝导，使警备队的镇压矛头转向盗抢案件，全区抗日工作人员无人被杀害。

联合各民族人民的工作，相对地比较逊色，但也争取到不少马来族知识分子和马来村长，对抗日工作给予不少支持。彭亨、柔佛、雪兰莪、吉打各地由马来族知识青年参加的宣传队，在团结马来农村的群众支持抗日活动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各地森林土著民族对抗日部队的大力支持，是一批民族工作者深入其部落宣传，最后以杀鸡为盟的形式，将联合抗日的关系固定下来。

对于不满侵略战争的日本统治机构工作人员，以及被迫参加镇压群众的一些警察与侦探，抗日群众组织运用各种不同途径和方法，加以争取，化敌为友，促使其为抗日斗争服务。较大量的争取对象是马来籍警察。武来岸警察局 40 名警察，自称是为吃饭才当警察的，经过当地抗日群众做通其思想，由抗日军假装战斗场面，收缴了其全部武器。柔南笨珍 27 碑警察局 30 名警察，经马来村长说服，将 24 支步枪全部交由抗日军和平收缴，然后回到农村务农。上彭直凉警察局的警长经过抗盟会的教育和争取，答应作内应，当抗日军进攻时，下令警察投降。吉打监狱的马来籍狱卒阿末，将被捕人员的情况通知抗日工作人员，抗日组织据此及时采取措施，从而减小损失和牺牲。争取暗探的工作，一般都是通过其亲属和亲密朋友进行，危险性较小，效果却较好。阿罗斯打警察局的 10 名暗探，经其抗日友人劝说，宁愿受拘禁和罚款，长期不和抗日人员作对。芙蓉市个别暗探，还作锄奸队的内应，消灭叛徒和暗探头子。各地区维持会所属自警团，由华族青壮年被迫组成，手执木棍轮流在路口放哨，在抗日组织影响下，很多成为向抗日人员通风报讯的耳目。吉

打日商真锡武之，不满侵略战争使他远离娇妻幼儿，抗日群众使用华侨协会名义，促他协助担保一些被捕无辜群众及尚未暴露身份的抗日人员。

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对人民抗日军的武装斗争，产生非常重要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为马来亚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第五章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 东南亚联军的合作关系

一. 合作的初始阶段

在南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驻防新加坡的少数军官,根据日本不断加强南中国海海军力量;并向法国维希傀儡政权施加压力,驻军印度支那;使用威慑、利诱两手交替手法,强使泰国銮披汶政权签订日泰协议等迹象,已感日本侵略阴影逐渐逼近。在古泛罗上校(Basil Goodfellow)、台维斯上尉(John Davis)、布伦米上尉(Richard Broome)主持下,制订马来亚别动队计划,于1941年5月间在新加坡裕廊区(Jurong)设立“101特别训练学校”(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101 S. T. S)。然而,由于英国远东军总部盲目自信防务实力,过低估计日军侵略能量,所以对此并不重视,缺乏支持,形同虚设。

马共与英方达成共同抗日协议以后,12月20日开始就从新加坡、霹雳、雪兰莪、柔佛前后4批派送165名马共党员参加101特别训练学校学习。但因战局急转直下,加上英方本来就缺乏诚意,每批学员仅进行7—10天的学习,便仓促“结业”,随即被派往敌后单独作战。除上述人员外,马共还先后派出15名骨干到吉隆坡、25名骨干到柔佛州的居銮,参加英军所办的军事情报训练班,也是学习了10天便告结束,结果他们都和101学校的第一、第三批学员一起,回到内地参加各地的抗日游击队。

101学校4批学员,分别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南

北地区和当地马共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结合，在组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独立队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骨干作用。这些州的抗日游击队，由此得到充实和加强。上述4个独立队早于4批学员到达之前，已经分别组织抗日游击队。除了以上四个独立队外，其他独立队，并无101学校学员参予。第五独立队于1941年12月下旬就在霹雳朱毛和仕林河地区，分别建立抗日游击队；第六独立队于1942年4月，也已建成2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第七独立队不仅没有101学校学员参加，在1942年2月组成抗日部队，甚至从未得到联军空降武器支援；第八独立队前身，是战火刚在新加坡燃烧时，已在吉打中部和北部分别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不仅没有101学校学员参加，也未得到联军帮助军训。

新、马沦陷后，英军一些人员来不及撤退，流落各地山林，部分先后向日军或警察局投降，或被搜捕或被击毙，部分在群众的秘密掩护和指引下，终于找到人民抗日军，由抗日军给予收容照顾。其中少数英军尚能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和战斗。“二独”收容的炮兵亚影（苏格兰人），在部队三年多，能坚持艰苦生活，与战士共同生活战斗，以后转到“六独”，在日本投降前夕病逝。东彭亨林明矿场总经理白克和妹妹白娜，1942年初就为第七独立队所收容，白克熬不住山林艰苦生活，不幸病逝。白娜参加抗日小报《民意报》英文版的编写出版工作，她和抗日军战士关系颇为融洽。曾由第三独立队收容的英军第60炮排排长、澳洲籍人舍菲尔德（Sherpherd）和野战部队小队长罗耶（Royah），这两个性格开朗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和抗日军战士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

当时流落在霹雳州仕林河的原101学校教育长查普曼

上校 (F. S. Chapman)，也是靠当地游击队的收容，并护送他到雪兰莪州的第一独立队营地，后因日军频繁进攻，安全没有保障，又由“一独”派人护送他到西彭亨加叻路 1 2 碑板厂，西彭抗日军获悉，派人将他接到人民抗日军营地，给予特殊照顾。直至 1 9 4 3 年 5 月东南亚联军第一批联络员在霹雳州西海岸登陆后，西彭亨人民抗日军再将他护送到霹雳州的美罗，与联军第一批联络员汇合，并与东南亚联军总部恢复了电讯联系。

在这一期间，人民抗日军并未曾与联军正式签订合作抗日的任何协议，也未曾获得联军的任何军事援助，但出于联合抗日的良好愿望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将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共同抗日的患难士兵区别对待，对流落马来亚的英军散兵，竭尽所能加以保护。这种举动使被收容的英军人员深受感动。查普曼和布伦米等人对于人民抗日军优待流散英军的情景，有着深刻的印象和切身体会，战后他们回忆这段经历时不能不承认：转移营地时，患病的英军由抗日军战士抬运；较好的食物（鸡旦、鱼肉）留给英军官和患病兵士吃食，人民抗日军指战员则吃木薯、野菜。他们感慨地说：“我们赖他们为生”，“如果没有人民抗日军的照顾，是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英国军官奎利 (Quayle) 坦率说，他对游击队的待遇非常赞赏，他能生存下来，全归功于游击队的照顾和尽量给予的帮助。

可是，由于荒山丛林中，营养缺乏，疾病侵袭，医药困难，平时养尊处优的英军官兵，无法适应，所以病亡颇多。全马各地人民抗日军前后收容的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军官兵合计 7 0 余人，大部分患病逝世，坚持到日本投降时幸存的，只有数人。

在 1 9 4 3 年 5 月，联军东南亚总部发出了军事行动

Gastavus 1 号命令，由台维斯上尉率领 5 人（其中中华籍 4 人）于 5 月 11 日乘坐陈旧而且小的荷兰 024 号潜艇离开哥伦比亚，24 日夜 8 时到达霹雳州邦咯岛（P. Pangkor）以南，天定（Dinding）以北靠近昔加里山的地区冒险登陆，几经转折，台维斯终于会晤马共霹雳地委负责人，台维斯带来了联军东南亚总部的委任状，表示希望与马来亚共产党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合作抗日的意愿。双方基于共同抗日的强烈愿望，立即决定了加强联系的方法。随后由地方抗日组织将台维斯等人带往美罗山区抗日军营地，派出精悍武装分队，加强护卫。此后，人民抗日军才开始正式与联军东南亚总部建立了电讯的联系。

二、马共暨人民抗日军与联军 签订合作抗日协议的经过

1943 年 11 月 2 日，联军联络员林谋盛乘潜艇在巴眼那督（Bagan Datoh）登陆，同样由人民抗日军派人接应，带领到美罗（Bidor）山区营地和台维斯等会合。经过先遣人员用无线电和在印度的联军总部联系，按照总部的指示，查普曼、台维斯、布伦米、林谋盛四人作为联军方面代表，于 12 月 30 日与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会的代表张红（莱特）、陈平，在美罗山区白兰丹（Blantan）营地举行正式谈判，次日双方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一三六部队代表得到总部指令，任何会商只谈军事，不涉及战后的政治问题。故此，双方只讨论合作抗日的意图和要求，联军代表要求抗日军加强开展抗日军事、政治活动，配合联军反攻。马共及人民抗日军代表要求联军支援武器、弹

药、药品、财物及帮助军事训练。

可是，双方各自抱着不同的政治目的。马共及人民抗日军期望在消灭和驱赶日本侵略军以后，为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得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经济繁荣和文明富裕的生活，创建独立自主，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这是符合马来亚各族人民长远利益的。联军代表则是企图利用人民抗日军牵制日军，减少英军反攻马来亚的阻力与损失，消灭和驱逐日本守备军以后，恢复英国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殖民统治，夺回大不列颠帝国的“美金奶牛”。彼此尖锐对立的政治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为了达成抗日协议，双方代表经过两天的详细讨论，制订合作条款，最后签订协议全文如下：

一. 合作条款

1. A. 张红先生宣称代表马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会，承诺凡在此会议达成的协议，将予遵守并实行之。

B. 台维斯、查普曼、布伦米和陈春霖（即林谋盛）是联军东南亚统帅部的军事代表，他们被授权与在马来亚抗日的任何党派进行合作。

2. 张红先生同意，在联军反攻马来亚时，马共将予充分合作，为此目的，将接受和遵守联军统帅在马作战的有关命令。

二. 建议和决议细节

1. 在扼要介绍了马来亚抗日组织的人数和力量之后，张红先生探询联军方面，如何希望这些抗日组织与之合作。联

军代表在概述了军事上和谍报活动上的要求之后，双方一致认为，除了使群众继续保持抗日斗争精神外，当前唯一应做的事，就是煽起劳工纠纷，对水上运输和海军舰艇修理厂进行破坏等等。至于其他方面，双方同意要有一个准备阶段，以便联合行动。张红先生同时强调，他们现在要大力宣传在联军反攻马来亚时与联军完全合作的必要性。

2. 在问及抗日组织需要何种帮助时，张红先生提出要求如下：

- A. 武器弹药； B. 药品及医生；
- C. 军事训练； D. 财物资助

关于 A 点及 B 点，军事代表表示联军统帅部将尽一切可能运送至马来亚，以加强合作。至于提供医务人员，暂时还有困难，但允诺进一步研究实现的可能性。

对于 C 点，答复如下：①在运输条件许可时，将尽快把在印度的华人教官派遣来马。②由抗日组织选派华人学生至印度接受训练，结业后回马执教；目前先尽快派一个六人小组至印受训。③派遣欧籍教官稍后来马事将予研究。

对于 D 点，军事代表已向上级提出要求给予财政援助，预料月内将有答复。张红先生估计抗日组织月需 50,000 至 70,000 元，方能应付需求。

3. 在军事代表再三强调建立无线电联系的急迫性后，有关第 2 项第 2 点（如上述）的细节，表示尚须讨论。但对于第一批武器及弹药立即付运的详细计划已经拟订，进一步了解具体运输路线事也已获同意。

上述条款除必须获得马共、抗日军、抗日同盟会组成的联合总部批准外，还必须承认如下附加条款或类似附加条款精神的文字，方为有效。

附加条款如下：“马共与联军的合作，必须持续到联军能完全维护马来亚的和平与秩序的时候为止。”

签字者：

张 红

台维斯

布伦米

陈春霖

协议未获联军总部核准前，1944年10月马共于吉隆坡间津召开全马党、军高级干部非常会议，主要讨论如何与联军合作、配合联军反攻、和争取实现国家独立等问题，并作出如下决定：要求各独立队扩大队伍，抽调部分骨干和战士作为基础，建立与联军合作的新队，新队接受联军武器装备，接受联军派联络官驻队；原有的队伍（称为老队）不与联军接触，保持其独立性，另建立参谋本部进行领导；各州加紧开办军事训练学校（班），培养军事、行政管理人才；筹建“民族解放同盟”，为实现国家独立作准备。因此，1945年2月联军空投“一三六”部队人员来马后，老队并没有公开和他们接触。与联军合作建立的新队，也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立队番号不变，并无“一三六”部队之称。

协议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联合东南亚联军共同抗日的战略部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增强了双方的联系和配合，使口头承诺契约化，提高了联军反攻马来亚的作战信心，也有利于处于迅速发展中的人民抗日军充实武器装备和加强军事训练，改善医药和生活物资供应情况。显然，这是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件大事，也是东南亚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一块碑石。只是由于日本在东南亚联军计划发动反攻马来亚战役之前25天就宣布投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配合联军里外

夹击歼灭日本守备军的作战行动，才未实现。

协议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反映出英国的叵测野心。首先协议规定“马共……将接受和遵守联军统帅部的有关命令，”而不是“马共……将遵照联军统帅部在马作战的有关计划，积极配合作战。”这是英国隐藏祸心，企图日后提出要求指挥某些人民抗日部队的伏笔。如果实现此条款，即可能丧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立性，也可能接受其一石二鸟的命令，为英国殖民当局火中取栗，使英军借手日军，达到同时消灭日军和抗日军的阴险目的。其次是马共“承诺凡在此会议达成的协议，将予遵守并实行之。”联军方面即不作出同等的“承诺”，遵守不遵守，实行不实行，由联军酌情审势而定。再次是双方代表在会议开始时，同意不讨论战后的政治与政策问题，然而附加条款却写上：“马共与联军的合作，必须持续到联军能完全维护马来亚的和平和秩序的时候为止。”言外之意，就是要恢复原有殖民地统治的时候为止。英国殖民当局一刻也没有忘记千方百计恢复其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附加条件暗藏人民抗日军不要阻碍英国恢复殖民统治的含意。

三. 一三六部队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英军撤出新、马后，设在哥伦坡（Colombo）的联军东南亚总部，准备加强马来亚敌后的情报工作，以便对反攻马来亚作军事部署。但是，那时联军东南亚总部对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缺乏了解的。要进入马来亚日本占领区进行敌后工作，白种人难于胜任，最合适的人选是中国人，尤其是广东、福建籍的华人。为了利用华人参与开展敌后工作，古泛罗、台维斯及布伦米三人受命在印度招募华人，筹组一支别动队——定名为一三六部队，准备潜回马来亚进行敌后

活动。起初是邀请“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合作，后来在原新加坡华人林谋盛、庄惠泉的联络沟通下，由吴铁城及英国驻华大使山森（Samson）在重庆分别代表中国和英国政府，签订协议共同组织一三六部队。中国政府委派林谋盛为驻锡兰联军总部的联络官，兼任一三六部队中由华人组成的龙组马来亚区区长。1943年8月9日，增补委任副区长庄惠泉。台维斯和布伦米因熟悉马来亚情况，又懂华语，故被委任为一三六部队顾问。

一三六部队实为情报组织，并非作战部队，其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军事情报员，一类为电讯员，华人成员由中国国民党海外部派遣，军官全是英国人，由联军总部（实际是英军）直接指挥和控制。在日本投降前，一三六部队的组织是保密的，联军总部派出与人民抗日军联络的人员，也从未使用过一三六部队的番号。战后曾经有人宣扬说什么人民抗日军是由一三六部队提供装备、训练，并由其组织、指挥，这是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不值一驳的。

一三六部队人员潜回马来亚后，在人民抗日军的保护下进行工作，他们一旦离开了抗日军保护区就寸步难行。他们初期也曾计划单独行动，有部分人不听人民抗日军劝告，冒然离开抗日军部队，潜入城市活动。但由于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都以失败告终。

1944年2、3月间，其部分人员在霹雳州先后被捕，2月27日，林谋盛也在打巴十字路被捕，于6月29日病逝于华都牙也狱中。一三六部队进入城镇人员大多数被捕，保藏于山林营地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又因损坏无法使用，半年多时间，断绝和印度联军总部的一切联系。

1944年5月29日，由美国运输舰运载一批一三六

部队人员到澳大利亚接受军事训练半个月，几经辗转秘密转移，延至9月中旬，17名队员（英人8人，华人9人）才乘澳洲潜艇离澳北上，偷渡爪哇浪博海峡，于10月5日由马丁少校率领，在柔佛南部东海岸登陆，处境十分困难，无法单独活动，直至12月中旬，才到农村找到抗日民运工作人员，带领会晤人民抗日军。后来在第四独立队战士带领下，在新加坡军港海峡对面侦察日本海军活动情况，将情报发回印度联军总部，联军飞机及潜艇据此击毁击伤数艘日本军舰。

有的一三六部队人员，由于得不到抗日军的帮助，更是一事无成。据1945年5月6日空降到霹雳与吉兰丹边界的华籍成员蒋伯钧等给联军东南亚总部的报告说：“由于领队的英人军官粗鲁、骄傲，与当地抗日分子和人民发生磨擦，引起公愤，多方干扰工作，且在敌人水陆封锁之下，更无法开展工作（未和人民抗日军联系上），直至日本投降，还滞留在山中。”

美罗山区营地的一三六部队人员，经过多方拼凑修理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在1944年10月恢复了和联军总部的联系。根据1943年底马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代表与联军东南亚统帅部军事代表签订共同抗日协议（互助条约），延至1945年2月才获联军总部核准，从1945年2月26日开始，空投联络人员，同年5月以后以美国远程轰炸机B24及B29，自加尔各答起飞，逐次按电讯联络指定地点，向各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营地附近山林之间旷地空投武器、军用物资、医药及生活用品。一三六部队人员从此改由飞机空降至马来亚。

一三六部队从1943年5月至1945年9月1日，乘坐潜艇登陆或乘远程轰炸机空降马来亚的总人数140余

人，其中英、美、澳籍军官、军医90余人（包括21名校官）。另华人23批次，共49人（不包括林谋盛），其中在霹雳7批次14人，柔佛南部3批次9人、柔佛北部1批次4人，森美兰5批次7人，雪兰莪3批次5人，吉打2批次6人，彭亨2批次4人。此外，尚有十几批次只空投物资不投人。

联军东南亚总部明确指示，潜入马来亚的一三六部队，并无作战任务。因此，基本上都是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尽量隐蔽躲藏，遇到日军进攻时，都是在抗日军火力掩护下先行安全撤退。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一三六部队在马来亚敌后的两年三个月时间里，除了协助联军东南亚总部沟通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之间的联系外，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以及人民抗日军的情况），用密码电报发回联军总部和重庆中国国民党“中统”情报机构。

人民抗日军对一三六部队人员的护卫照顾，普遍都是尽力而为，在柔佛、雪兰莪等地，都是派出武器装备较好、能征惯战的分队（排）来护卫一三六部队小组；美罗山区一三六部队驻马总部的抗日军护卫精锐战士，最多时达150多人。饮食的照顾，待为宾客。查普曼说：“我们有机会尝到中餐的各种美味，如海蛞蝓、鲨鱼翅、牛肉、猪肉、各种鱼、鸡、旦及蔬菜等。”布伦米也说：卫队每天搞椰子油炸糖薯粉糕饼给联军当餐，人民抗日军则吃小地瓜拌豆酱。实际上，抗日军在粮食供应紧张时，多是吃木薯或野菜。

联军东南亚总部，显然曾经发出过试图争取控制与指挥部分人民抗日军的指令。1945年4月18日，联军代表台维斯等和人民抗日军代表进行一次会议，重申1943年

底的共同抗日协议，人民抗日军代表要求联军继续提供武器装备、医药用器和经费。联军代表则要求人民抗日军提供外围的军事、政治与经济情报，由联军指挥霹雳一带的人民抗日军部队。抗日军代表表示乐意提供外围情报，愿意积极合作配合反攻马来亚，但是无法同意将霹雳一带的人民抗日军部队交由联军指挥。驻“六独”的联军联络官伦纳少校，曾强迫而连突营地升英国旗也遭坚决反对。联军企图直接控制和指挥人民抗日军的图谋，终于未能实现。

日本投降后，一三六部队人员则留在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司令部和各中队担任“联络官”和翻译员，联络官实是监视官，密切监视人民抗日军的行动。不少联络官更是毫不掩饰其骄横无礼和轻蔑态度，引起抗日军战士的很大反感。陪同潜入敌后，担任翻译员、电讯员的华人，幸存者49人，其中大部分人员对人民抗日军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三数月后，一三六部队遂即取消，先后遣散，英军官大部分回国，部分参加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机构，成为镇压马来亚人民民主运动的帮凶。华人成员35人回归中国，9人因家庭关系留在马来亚。他们的感受归纳出一条：“为了配合联军反法西斯战争而投身异域探虎穴，固然神圣，可是实质上总不外是为英帝国主义收复马来亚，……为帝国主义重新奴役殖民地人民效命。”（《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第421页），这段话，可以反映出一三六部队华人成员的矛盾心情。

四. 人民抗日军积极准备配合联军反攻

联军反攻马来亚的计划，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几经修改，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最后，对马来亚的

反攻日（Dday）被确定为1945年9月9日。

反攻马来亚，在东南亚军事战略部署上，被列居首要位置，因为反攻与收复马来亚，将把日本南方军拦腰截断为南北两段，用以分割孤立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及泰国、安南的日本侵略军，以便各个击破，分别围歼。但是反攻马来亚计划却比反攻菲律宾推迟了11个月，这是由于英国想要借助于美国海军与空军优势，进一步削弱曾经嚣张一时的日军制海制空权，切断日军海上运输补给线（船队），最大限度地孤立马来亚日本守备军队，以便轻易摘取大西瓜。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不断发展壮大，使联军取得与人民抗日军联系以后增强了反攻的信心，相信人民抗日军将会积极有力地配合反攻，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拔除日军小据点，分散日军的兵力，阻滞日军的调动，骚扰日军的后勤，振奋各民族的抗日决心，打击日军的士气，瘫痪日本在马来亚的统治。

联军反攻马来亚的重要桥头堡，霹雳州西海岸被认为是合适的选择。在那里登陆可以避开雪兰莪巴生至波德申一带的日军防守主力，切断南北马日军的联系，配合分别在南北马敌前登陆和东海岸的突击登陆，包围歼灭中马的日军主力，使新加坡日本守军成为釜底游鱼。

为此，联军特别加强对霹雳州第五独立队的联系，要求直接指挥该区的人民抗日军，并于1945年8月首次在霹雳空降了30名廓尔喀（Gurkha）武装士兵。

出于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考虑，联军空降给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的武器装备，都是以“轻、旧、差、缺”为标准：1. 没有重机枪、迫击炮等进攻性武器，火力配备不强；2. 所供给的卡宾枪、斯汀枪，只适宜于丛林作战；3. 子弹盒

配备数量只有英美士兵的三分之一（每支卡宾枪只有150—200发子弹，仅够2—3次持续1小时战斗的消耗）。

自从1944年10月，美军在菲律宾人民抗日军配合下，展开反攻，于4个月后全歼日军；德国法西斯败局日益明朗，东南亚联军对马来亚的反攻时间，已是屈指可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不约而同地对各地的日本警备队和警察局加紧袭击，从1944年底到日本投降之前，各独立队主动出击百余次。

第一独立队进攻并拔除雪兰莪大港武装警察据点，收缴步枪30余支。又攻占双波和武来岸警察局，并在吉隆坡市警察局附近击毙大汉奸黄铁珊和日军情报站——今野宣传队队长杜船；奇袭雪邦胶园日军巢穴；在新街场咕要路口伏击一中队日军；在咕腰击毙击伤日军30多人。还在林金港、古毛埠那督勘伏击歼灭大批日军。抗日军日渐逼近市镇作战，日军已感草木皆兵。

第二独立队进攻瓜拉庇拉警察局和马来义勇军兵营，缴枪数十支，救出20几个被囚禁的抗日人员。在日本警备队和武装警察严密防守的森美兰州首邑芙蓉市内，在有敌警参加的宴会上消灭了几个狂妄嚣张的日本宪兵部暗探，日本爪牙，相顾失色。

第三独立队各中队于1945年初，相继派遣锄奸队潜入日军戒备森严的城镇，狙击暗探，严惩走狗，搞得敌探风声鹤唳，十分恐慌。5月份全面开展“红五月”活动，统一组织“五·一三”战役，各中队分工负责对麻坡、金马士以外的柔佛州北部17个城镇警察局进行强攻，除在昔加末、巴罗及麻坡遇到抵抗外，其余警察局兵不血刃，300多名警察全部缴枪投降。昔加末近百名警察稍为抵抗，就在强烈火

力下弃枪投降，附近数十名日本警备队冲锋3次，企图救援都受阻击，伤亡重大。巴罗警察局在驻局的日军被击毙后，几十名警察全部俯首缴枪。

第四独立队于1944年9月在天吉港地区多处设伏，前后歼灭日军200余人。多次袭击日军运输车、小据点。从1945年1月到6月，在柔佛南部地区发生较大战斗30余次，给日军很大震动。

第五独立队在霹雳地区和日军战斗比较频繁，在美罗、玲珑等地区多次袭击日军，在近打河上伏击日军巡逻艇，战果显著。远征吉兰丹的第十二中队突击日军据点，解放了麻叻坡。

第六独立队在北彭亨和吉兰丹州连续追剿杀害枪掠老百姓和抗日战士的土匪队伍（部分窃用“华侨抗日军”名义），以免人民继续遭受残害，消除联军反攻时后方可能受到骚扰的隐患。六独进攻直凉警察局获得全胜，袭击文积路27碑警察局共收缴步枪20余支，轻机枪2挺。日本暗探到农村有去无回，日本警备队从此不敢进入山区捣乱。

第七独立队在东彭亨及丁加奴一带，依靠夺取日本军警武器，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伏击林明公路日军运输车，进攻邦振警察局，深入东彭日本军政统治中心关丹市，在游乐场击毙特高科特务张禄，没收林明伪维持会会长潘先兴的财产及粮食，都使日军及其爪牙惴惴不安，士气低沉。

第八独立队前身吉打人民抗日军，锄奸活动比较频繁。袭击新路敌人，伤毙日军40多人。进攻泰国南部日军据点及昔罗古务警察局，夜袭亚顺及武吉茹嫩警察局，伏击进犯日落湾的日本警备队，都取得较大胜利。

马来亚各地人民抗日同盟会，为配合联军反攻，积极进

行扩大组织，加强统战工作和民运工作，加强抗日宣传和收集情报，密切和各该地人民抗日军（锄奸队）的联系。

受到日军屠杀残害最酷烈的柔佛州南部，人民对日仇恨最深刻，组织发展最迅速。仅士乃区抗盟，就有专职干部10人，由马共区委领导组织训练班，对抗日人员进行轮训，每期2—3天。同时还培养了一些马来籍干部，少数马来青年农民参加了抗日民运工作。各族干部逐家逐户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大好形势，宣传新任务，提高各族人民必胜的信心。

各地抗盟还加强对中上层的争取工作，争取尚有民族意识的头面人士对抗日工作给予秘密支持，捐钱、捐粮给人民抗日军，部分侨领在这段期间参加了抗盟。有些马来农民开始捐助粮食给抗日部队，由民运人员收转。对日本鹰犬走卒，即用各种方式给予警告。多数地区分别争取大量不带枪械只执木棍值班的自警团，同时向警察局发动政治攻势，少数警察参加抗日情报工作。各地抗盟还组织抗日自卫队，由附近的抗日军派员给予训练。

“七独”成立周年庆祝大会，在农场举行文艺晚会，演出抗日歌舞话剧及琼剧，几个农场的群众代表300多人观看演出。宣传队还到附近林场演出3天，敌伪自卫队及暗探参加观剧，不敢上报，反而向当地抗盟人员汇报日军动态。

“一独”在吉隆坡郊外伏击毙伤日军30余人后，随即在新街场农村召开祝捷大会，在接近日本统治核心地区只有20多公里的地方，就有1000余群众参加，更是反映出各民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普遍深信不疑，为联军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会的主动出击，使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消沉挨打，士气日益低落。一

些马来族人民开始公开支持抗日活动。为了挽救败局，日本马来战区司令部曾下令逼迫各地日军对人民抗日军发动中队规模以上的“围攻”、骚扰，不下50次，结果都是损兵折将，劳而无功。后来，日军又在霹雳、彭亨、柔佛各州，都向人民抗日军提出“分地而治，彼此停火，共同抗英”的诱降花招。这些花招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抗日军的严词拒绝。此事明显反映出，日本马来军区司令部已经充分觉察到，人民抗日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日军抗御联军反攻作战时的最大威胁。

打败日本法西斯，解放马来亚，已经指日可待了。

第六章 日本投降与人民抗日军复员

一、战局急转直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东京广播电台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国于7月26日所公布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正如日本马来亚军政部总务部长滨田上佐所说：“中国问题使日本陷入泥沼，举凡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消耗殆尽。”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及1943年2月结束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以后，日军败势已经萌现，日本南云舰队被歼灭后，制海制空权丧失殆尽，战火逼近日本本土，美国空军连续五个月猛烈轰炸日本本土及东京，造成21万多人伤亡。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7月，美英舰队开始大举轰击日本沿海及各大城市；8月6日，美国空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13万人伤亡。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进军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面临被全部歼灭危机；中国军队战略大反攻全面展开，9日，长崎受到第二颗原子弹轰炸，伤亡8万人。至此，日本内外窘迫，四面楚歌，国内经济严重困难，侵略者力尽气竭，已成瓮中之鳖。御前会议经过8月14日最后一次剧烈争吵以后，终于作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

驻防马来亚的以第五师为主力的日本侵略军，士气早已明显低落。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日本海空军的濒临覆灭，马来军区的日益孤立无援，都使日本官兵感到无比的恐慌；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斗实力的不断发展增强，

更使各地的日本警备队胆怯气馁。各地日军年余来数十次围攻，都是战场上稍微接触就草草收兵，回营交差，谎报战果。这充分反映出日军中下级军官与士兵的沮丧心理和消极情绪。

《终战诏书》宣布后，各地日军初期还是极力捂紧盖子，不愿公开承认战败投降。槟城和哥打巴鲁等地，都发生过狂欢的群众在大街上讲述传播日本投降的消息，因而被日本宪兵捕捉的事件。槟城日本当局到8月21日才公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吉隆坡的各族人民，甚至到了8月20日，看见威武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列队行进街市，并开展维持治安的工作，才敢肯定日本确已投降，纷纷赶制和悬挂三星军旗。

各州的日本驻军，在得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一般都龟缩在营房之内，很少出外，尤其是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以后，更加少见外出。各州的警察局，大多数被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后备队、别动队所缴械，被限令不得随意离开警局活动。吉打州和少数在抗日时期同抗日组织有联系的警察局，则由人民抗日军授权参加维持治安工作。

日本侵略军士兵对无条件投降的反应不很一致。绝大部分是服从东南亚联军司令部的命令，维持现状，等待联军前来接受投降，静观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维持治安、惩治敌特、叛徒和歹徒，收缴警察局枪械弹药，没收敌产和释放政治犯，不予干涉过问。

部分日军主动和人民抗日军联系，如：驻打巴、安顺一带的日军，在太平日本军政监部的授意下，曾经派人到霹雳州“五独”第四中队寻找抗日军进行试探性的谈判，要求与抗日军“联合抗英”，表示如果抗日军接受这个“要求”，其所属部队可交由抗日军统一指挥。及后，霹雳州警察总监和

宪兵队长也先后找到进驻太平附近的“五独”第十六中队，进行试探，提出同样的要求。“五独”司令部分析当时的形势，看出日军缺乏投降的诚意，而是企图假借与抗日军合作的名义，负隅顽抗，于是断然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也有少数日军，表示愿意向人民抗日军靠拢，希望得到抗日军的宽恕。小队规模的日军和个别下级军官、军士，携带武器向就近的人民抗日军投诚的情况较多，大多数独立队都遇过。有些会讲闽南话或普通话的日军，则化装成平民，转移地区，在农村边沿开荒种植，或远走外地，乔装居民。

少数日军警备队，经过谈判，向人民抗日军交出部分武器，全属轻武器，多是三八式步枪、子弹、手榴弹，有些还交出军靴、望远镜等军用物资（较少手枪、轻机枪），枪械数量多者超过百支。

在和人民抗日军作过激烈战斗，而且饱受人民抗日军铁拳滋味的日军，如雪兰莪中部、森美兰西部、柔佛南部、吉打北部的日本警备队，则对人民抗日军怀着相当强烈的敌对情绪。吉打州驻日德拉的日本警备队，曾经阻挠过人民抗日军的通行。日本投降后21天，9月5日，马六甲日本宪兵部大本率领数十名日军包围马六甲人民委员会，将抗日军代表老雷，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吴世健、以及郑学琛、陈应祯、林振锡、林揆义、谢重生、陈易经、康景南、彭玉楼、张森森、曾才等12人绑架，途中跳车逃脱两人，其他10人被押上汽艇载往五屿，途中二人挣脱捆绳跳海逃生，其中1人（郑学琛）溺死，另一人（陈易经）侥幸生返，余人全被日军残忍屠杀，壮烈牺牲。（注：抗日军闻讯立即派出队伍前往救援，抵达五屿岛时，发现吴世健、彭玉楼、曾才三人尚在奄奄一息，于是立即将死者及伤者用船载回马六甲海岸，然后用专

车将伤者送往野新医院救治，由于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这些日军的野蛮兽性，临死还是毫不收敛。日本马来军区司令板垣大将，初时曾想率领2、3万士气低落的孤军，负隅顽抗、蛮干一通，由于卧病的南方军最高司令寺内寿一规劝阻止，才放弃“神风”敢死队式孤注一掷的念头。

马来亚日本占领军获悉投降讯息以后，就积极进行一些企图掩盖其罪行的秘密措施。首先是烧毁大量罪证文件。从新加坡日军军政监部到马来11州各城市的宪兵部、警备队等暴力镇压部门，到处焚烧有关暴行档案，显然这是出于由上而下的秘密统一布置，造成战后搜集日军严重罪行具体资料的巨大困难，也是日占期间军政档案严重残缺的主要原因。同时，各部队、机关、商行大量抛售粮食、布疋、胶锡、杂货，以及家私、衣服，收回军票销毁，用意在于抵赖和减轻日后赔偿责任。其次是消灭罪证活口，日本南方军冈第1061部队参谋部所属第八特别班的浪机关和海军潮机关，专干间谍特务活动，成员洞悉日军卑鄙凶残行径，投降后，曾由暗杀班布置毒杀或屠杀非日本人成员，以求杀人灭口。再次是纵容包庇一些罪恶昭著、血债累累的日本凶犯潜逃。如新加坡大检证大屠杀要犯、日本第三军参谋战犯十政信化装逃匿；各地都有一些双手沾满人民血迹的日本宪兵突然不知去向。檳城两个亲手斩杀无辜华族几十人的宪兵，化装成华人，企图搭船逃往威省，在码头被工人群众认出来，结果被愤怒的人群当场打死。也有少数日本军官畏罪或绝望而自杀。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东京湾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签投降书表。9月12日，日本马来军区司令板垣大将代表已患重病的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在新加

坡市政厅大厦签递投降书，由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接受降表。续后，分驻马来亚各地的日军分别在以后几天内，向各该地（州）的联军代表举行投降缴械仪式。除槟城、玻璃市以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八个独立队，都派出代表分别参加各该州日军投降仪式。

马来亚地区日军俘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部门的文职人员、职员、商人及其家属，超过10几万人。从1945年10月下旬开始，日军俘虏分批运往新加坡南面的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度过一段耕种生活以后，不久就被先后遣返日本。

对于日本侵马期间的滔天罪行，（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各族人民强烈要求严惩日本战争罪犯及其帮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认真执行了人民的嘱托，分别在各地逮捕、审讯和惩罚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特务、投敌叛徒与民族败类。不过，由于那时国内外形势的限制，审判与惩罚日本战犯的工作，只能留待联军回归马来亚后，组织军事法庭进行调查与审讯。

使马来亚人民、被害群众和抗日烈士遗属大失所望的，是英国政府出于对人民的深刻偏见，对大量屠杀与残害马来亚人民的日本战犯，惩罚的人数特别稀少，惩罚程度也明显偏低。由东南亚联军所组成的战犯委员会，审查并提出控诉的东南亚日军战犯1101名。实际上违反国际公法，屠杀无辜平民，酷刑虐杀犯人，无故伤害百姓，杀害无辜老幼妇孺的日本战犯，最少高于此数几倍。如新加坡参予策划大屠杀的重要罪犯，和参谋部的铃木中将，政信、林少佐、警备大队长宫本与市川、水野、乡市、小园、绪方等等，血债累累，民愤极大，都未受到传讯，逍遥法外。而且绝大部份凶

残战犯仅被判处徒刑，监禁不久，新马 2 2 7 名战犯就于 1 9 5 1 年 8 月 1 4 日，被遣送返日本，在英国对日和约签订后，即被释放。最明显的不合理判决，是对新加坡大检证大屠杀 5 万华人的重要战犯的审判，1 9 4 7 年 4 月 2 日判决，只有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及宪兵总队司令大石正行被判处死刑，另 5 人无期徒刑，其他凶手全无罪责！英国统治者对新马人民的轻视蔑视和仇视心理，是不加掩饰，昭然若揭的。

二、马共提出“八大主张”， 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

在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下，作为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支柱的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正处在一个转折的关头。日本侵略的外部矛盾虽解决了，而新的矛盾——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突出起来。马来亚的前途如何？这是各族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

马来亚共产党在领导各民族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由于日本法西斯的野蛮残暴和内奸、特务的出卖破坏，蒙受严重的牺牲，优秀的党员，从中央委员到一般武装战士及民运工作者，为抗日战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占马共原有成员将近半数，加上无党派的抗日群众，总人数超过万余人。（其中在作战中牺牲或被捕遇害以及因病、因伤致死的抗日军人约三千余人），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是保卫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因此，在 3 年 8 个月的残酷斗争中，马共的组织在浴血战斗中得到锻炼，茁壮成长，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劳动群众的鱼水关系日益密切，党员人数由不足 2 0 0 0 人增长

到8000多人。

原昭南岛日本宪兵分队长大西觉少佐，曾领导专门破坏抗日活动的谍报机关。战后他于1977年写成并出版回忆录《昭南华侨被肃清事件》，揭露马来亚共产党书记莱特充当日本间谍，在新加坡出卖13名马共中央委员和大批埋藏武器军械，出卖1942年9月1日在石山脚召开的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出卖大批的抗日领导干部，出卖“不胜枚举的各种情报”。

可惜当时马共广大党员，没有人能够及时识穿并揭露这条化为美女的、隐藏党内窃据领导岗位长达8年之久的毒蛇。这个当过法国、英国、日本间谍的无产阶级叛徒、内奸莱特，赶在英国回归马来亚之前9天，于1945年8月25日召开了中北马党军会议。莱特“分析”战后国际形势，强调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政治大势趋向和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和平环境，以加强经济建设、治疗战火创伤。马来亚各民族之间，政治觉悟不平衡；群众饱受3年8个月的战争惨祸，希望和平宁静，厌恶战争，但不分析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尤其是英国）已经筋疲力尽，十分虚弱，人民厌恶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亚非拉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思潮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马来亚周围各地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方兴未艾；马来亚各族人民不愿重过殖民地奴隶生活，等等重要因素。

莱特根据上述片面的似是而非的分析，指出当前实现抗日九大纲领第一条“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和第五条“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于是提出马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决策：加强和平斗争，争取实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民主和自治，首先争取在英联邦

内部的制宪自治。并提出以“八大主张”替代抗日九大纲领。人民抗日军老队率先解散，新队开进城市，配合各地开展和平民主运动的政策意见。

当时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接受了莱特的论点，这是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悲剧。这些领导干部都是长期坚定、勇敢地分散领导抗日斗争的革命坚强骨干，得到广大人民抗日军战士和抗日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因此他们怀有对战士和人民负责的强烈责任感，艰巨的武装斗争和日本的突然宣布投降，使他们对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组织准备。莱特提出新时期和平民主斗争理论，虽然引起他们的思想混乱与疑虑，但未能提出有力的反对论证。长期分散的地下工作环境和艰巨严酷的武装斗争，要求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统一，也造成使他们对莱特的决定，产生盲目服从的态度。

会议最后由莱特提出马来亚共产党“八大主张”，获得了通过，作为此后和平民主运动的指导纲领。马共八项政治主张的内容随即向全马公布，并广泛进行宣传：

一、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联盟，拥护新国际和平组织——联合国。

二、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普选的民意机关。

三、废除日本统治的一切机构及其一切法令、法律。

四、实现言论、出版、组织、集会、信仰的绝对自由。

五、振兴工商业，改善民生，加饷加薪，救济失业和难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六、实行民主教育，废除旧教育，用各民族语言，发展民族文化。

七、平抑物价，审判贪官污吏和投机黑市分子。

八、优待抗日士兵，救济死亡将士家属。

在马共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人民抗日军决定和平进驻各地城镇。但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Admiral Lord Mountbatten），为了维护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于8月17日就对联军先遣队下达不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驻各地城市的命令。其险恶用意，非常清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维护马来亚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作为蔑视殖民主义者反动图谋的答复，南自柔佛的新山，北到玻璃市的加央，包括昔加末、麻坡、马六甲、芙蓉、瓜拉庇拉、加影、吉隆坡、巴生、安顺、金保、怡保、金马仑、太平、居林、双溪大年、哥打巴鲁、瓜拉丁加奴、关丹、瓜拉立卑、文冬等等50多个大中小城市，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都先后派遣中队或分队进驻。第四独立队还派遣一支精锐武装队伍进驻新加坡。第八独立队曾派一小队短暂进驻檳城。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普遍受到各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多数城镇的各族人民，都建扎牌坊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欢迎自己子弟兵的光荣进驻。饱受3年8个月苦难折磨的人民，狂喜心情，可以想见，真是万人空巷，途为之塞，鞭炮铺地，胜过春节。印度族和马来族人民，大都表露出很高热情。

人民军队进驻城镇，主要任务是保障各民族人民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这是当时维护人民利益的最重要措施。做法是收缴各地警察局枪械和弹药，防止他们混水摸鱼，继续残害人民。各地抗日同盟会协助抗日后备队，组织青年工人和城镇青年，成立治安巡逻队或临时治安委员会，帮助人民抗日军维持治安。由于人民抗日军在各族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拥护，所进驻的城市，治安都很安

宁，偷盗案件极少发生。个别离开驻地较远的市镇，偶有出现偷盗、流氓行为，人民抗日军派出武装小队赶往巡逻或暂驻后，治安秩序就恢复正常了。吉打州不少警察局在抗日时期和第八独立队或抗日同盟会有过联系，未对抗日活动采取敌对行为的，一般不予缴械，而是要他们在人民委员会（自治会）指导下，协助维持当地治安秩序。

人民抗日军还支持人民委员会或人民自治会稳定市场物价。第一独立队于8月20日进驻吉隆坡以后，随即发出安民布告，禁止乱涨物价，禁止征用民间物资及摊派捐款，同时派员巡视肉菜和粮食市场，严防非法提价。吉隆坡市场物价因而相当稳定，各族人民很感满意。被当地报刊誉为“在联军未抵达接管前对吉隆坡市区维持秩序的良好功绩”（见《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第798页）后因英国军管政府宣布日本军票作废，加以管理无能，竞相掠夺，才造成黑市猖獗，物价高涨。

人民抗日军在各州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派出中队驻扎，以加强和各民族人民及群众团体的联系。在人民抗日军进驻城镇前后，抗日同盟会发动各民族人民以协商方式，选派代表，成立该地人民委员会或人民自治会。雪兰莪、森美兰、霹靂、柔北、柔南、马六甲、丁加奴、东彭、西彭等各州都成立州级人民委员会，执行部分的政府职能。其他各地的人民委员会，都是当地各族人民的自治机构，新加坡、檳城、吉隆坡、怡保、阿罗斯打、加央、芙蓉、新山、哥打巴鲁、瓜拉丁加奴、关丹、文冬等各市、州的主要城邑，以及双溪大年、居林、大山脚、太平、安顺、金保、巴生、加影、万挠、瓜拉庇拉、昔加末、麻坡、文德甲、劳勿、立卑、瓜拉吉来等30几个城镇，尚有人民抗日军较多活动的牛仑、华玲、纯

笃、拉务勿刹、新古毛、煤炭山等几十个乡镇，都建立不同规模的人民委员会（吉打州原称人民自治会，后改为人民委员会），在各自行政区域内行使地区性初级自治权力。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多数是该地区同情抗日、有一定群众威信的华人和少数马来人、印度人参加（如加央、巴都巴辖、新山、马六甲等地的人委会，都有马来王族或战前马来副市长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活动，得到人民抗日军的积极支持。

人民委员会的大量工作，是维护各民族人民的正常生活，活跃市场，平抑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营运。平抑物价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各群众团体，尤其是刚从地下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各业工会，发挥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工人的热情普遍很高。人委会宣布取消日本会社、组合的各种垄断规定，取消中间强制性克扣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见面，市场顿时活跃起来。以华人为主的工商界不少人向人委会提出投诉，要求收回被日本侵略军及垄断组织所掠夺的印刷厂、碾莪厂、砖瓦厂、火柴厂、板厂、碾米厂、榨油厂、树胶制品厂等企业和客货汽车（这些汽车多被东京急行株式会社所抢收），经过调查属实，由人民抗日军协助从没收的敌产中，拨还给民族资本家，经过修整复原，恢复生产。多数客货汽车运输，在9月间已经陆续恢复营运。

人委会通过群众团体的配合，将人民抗日军没收的敌人物资、粮食和布匹，一部分救济和抚恤抗日烈士的遗属，一部分直接分给仓库附近的各民族贫苦群众。

多数城市由人民抗日军派员和日本宪兵部及警备队谈判，责成释放被拘留的抗日工作人员与抗日群众。少数没有抗日军进驻的县镇，由人民委员会责令警察局释放抗日嫌疑犯人。全马各州规模较大，囚禁犯人百人以上的14座监狱，

多数是由人民抗日军派出武装部队，直达狱内，强令狱吏释放政治犯人。太平监狱迟至9月15日经人民抗日军办事处与日本狱长交涉，才将250余名抗日政治犯人释放出狱。三年多来共有1860名抗日烈士和无辜群众已在太平狱中牺牲。

人委会还发起并联合各民族、各阶层团体，召开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军民联欢大会和欢迎人民抗日军的各种活动。带动各群众团体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安排演出场所，提供运输工具方面，支持歌咏队、话剧团的工作。

数年间，被敌特暗探诬告杀害、酷刑毒打、敲诈勒索的各族人民有十几万人，绝大多数是华人。受害者及其亲属纷纷向人委会和人民抗日军办事处控告，或是口头，或用书面，络绎不绝。人委会对其中罪证确凿，情节严重的案件，通过抗日军办事处转送给人民代表组成人民法庭审判裁决。对严重罪犯，民愤极大的，一般都是由别动队（或锄奸队）进行过捕拘押候审。经过调查核实，由人民抗日军代表宣布罪状，经过法庭审议，陪审的群众代表多数同意，军事代表定讞，然后召开群众公审大会，由人民抗日军派出执刑队或由别动队执行枪决。除了罪恶深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无法宽恕的特务、敌奸、叛徒以外，大多数是在受到教育，认罪悔过，并对受害人有所赔偿以后，觅人担保释放。

各地人民委员会成立时间只有20到30多天，于9月下旬，先后被各该地英军军事管制政府强行接管，组织机构随即撤销。人民委员会是马来亚人民历史上第一次当家作主的实践演习，虽然执政施政都不全面，但已为人民掌握政权斗争提供初步的经验，且为促进各民族人民团结，安定人民生活，增强各族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思想意识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他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三、马来亚重新沦为英帝国殖民地

1945年9月3日，东南亚联军的英军先遣部队，在檳城登陆。第十五军于9月5日在新加坡登陆，第三十四军主力部队9月9日在马来亚西海岸中部的摩立（Morib）登陆，分左右两翼，迅速沿公路推向加影（巴生港口一带为日军驻防重点地区），于12日就进驻吉隆坡，14日进驻怡保。英军的登陆地点和进军的路线，都是出于安全的选择，预防可能遇到意外的敌对军事行动。英军控制了檳城、新加坡和吉隆坡3个战略据点，然后由3地分兵逐步进驻吉打、玻璃市、柔佛、森美兰、霹雳和东海岸彭亨、丁加奴、吉兰丹各地。英军假设可能遭遇敌对军事行动的对象，除了抗拒投降的少数日军外，同时怀着对马来亚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日益高涨情绪的恐惧心理而登陆的，登陆以后，时时、处处、事事都表现出对马来亚人民的敌对意识。

9月12日，蒙巴登在新加坡接受日本南方军代表板垣签递降书以后，在半个月內，就收缴了全马各地日军的全部武器和军事装备。9月15日，宣布成立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实行军政统治，由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任马来亚民政长官，隶属于东南亚英军最高司令部，由蒙巴登直接领导。同时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统辖第十五军及第三十四军。新加坡和马来亚完全由第十四兵团武力支持下的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所统治，从政权和国民经济上加强控制，逐渐旋紧高压螺丝，勒紧殖民统治的绞索。

英国梦想恢复对马来亚殖民统治，最露骨的表白，是1945年10月10日英国工党政府主管殖民事务的国务

大臣，在答复下议院议员关于统治马来亚前途施政方针的质询时，明确宣布：“对马来亚的前途，……在适当时期内，使其成为不列颠联合邦的一员，我们已作了审慎的考虑。因此，英国政府的政策，要求一个制宪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和一个马来亚的公民制度，使得一切认马来亚为其祖国的人民，均能获得平等公民权，为达到此一目的，非常需要马来诸邦的统治者商订新的协议，并在海峡殖民地方面采取新的制宪步骤。马来亚联邦将包括马来半岛的九个邦和檳城及马六甲两个殖民地。现阶段的新加坡将需要个别的制宪工作，考虑到它的特殊经济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利益，我们将另有规定，使其构成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但新加坡与半岛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能最终会达成统一的目的。檳城与马六甲的人民将不致丧失作为英国属民的权利。……”

这篇政策性谈话，是用锦绣外衣加以乔装打扮的，其真实嘴脸即是麦克麦考尔爵士周游马来亚各邦，施展威迫利诱的手法，诱使马来各邦苏丹签订“允许英王陛下在各邦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的协议书，马来各邦的统治者，将把政治主权转移给英王委派的马来联邦总督。这种维持新加坡殖民地地位和坚持对马来亚联邦管辖权的设想，实际上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已由英国殖民部的马来亚策划组制订出来，用以恢复和巩固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分为两个，就是为了贯彻上述图谋。日益衰落的不列颠帝国的殖民部，没有公开讲出来的内心设想是：首先要争取英王对马来亚各邦的管辖权，使新加坡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用以加强对马来亚的影响，万一失去对马来亚的直接管辖权，也要抓紧新加坡这块“英王皇冠上的宝石”。因此，不难理解，军管政

府何以极力打击马来亚人民抗日战士，用软硬兼施的手法镇压马来亚人民争取民主自治的正义活动。

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急不及待地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先后撤销全马来亚各城镇的人民委员会。具有初级人民政权的组织被无条件撤销，意味着人民手中的抗日胜利果实，民主权利得而复失。人民的民主自治权利和殖民地统治的内涵性质，显然是水火不相容的。各地的军事管制政府，大量收容、雇用原日本宪兵部、警备队和警察局的特务、暗探，使一部分欺压人民的民族败类，又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人民抗日军还没有复员之前，就公然在丁加奴等地的大庭广众之间，撕毁人民团体所贴的标语，扯破旗帜，非常嚣张。军管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曾逮捕了若干通敌嫌疑犯，但最后他们几乎都被释放了。”（巴素博士《东南亚之华侨》）阿罗斯打和槟城等城镇，都发生过耀武扬威的日本——英国两朝暗探，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抗日工作人员的事件。

英国本土在6年战争期间，城市受到战火的严重破坏，全国财富损失四分之三，工农业生产下降衰退，还损失了11亿英镑的国外投资，增添了30亿英镑外债。“英帝国主义的市場被美国抢去了，英国的殖民地危机四伏，它的落后的基本工业濒于危机。”（《三十年的斗争》高兰）特别是食品供应相当困难。因此，英国统治马来亚的军事管制政府，另一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来亚各族人民的剥削，将英国本土的经济困难转嫁给马来亚人民。首先，于1945年9月8日，悍然宣布无偿地废除在马来亚流通了3年半的70亿到80亿之间的日本军用票，使马来亚与新加坡500多万各族人民蒙受极大损失，生活顿时陷入严重困境，不少人因此绝望

自杀。为了吃饭度日，人民只好变卖各种物资财产。从当时的物价和商品流通情况估算，英国新发行的通货数量高于战前1—2倍，也就是说，从日本军用票作废一举，最少从马来亚人民身上，刮去各种树胶油脂农产、锡铁矿产、工业物资和各业劳务5—8亿新加坡元，多于日本所敲诈劫夺的5000万元奉纳金10几倍。

英国的垄断资本，随着英军的炮舰、坦克开进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争先恐后地蜂涌而来，夺取锡矿、胶园、煤矿、铁路、炼锡厂、油类加工厂等等工矿和农林、交通企业、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利。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浪潮，很快就冲击到马来亚来，同时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家，不再依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美国经济也在东南亚地区逐渐排挤英国固有的优势地位，但是马来亚树胶年产量很快就恢复到60万吨以上，占全世界总产量40%左右；锡的年产量很快恢复到7万多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胶锡的出口总值占总出口总值的70%左右。加上铁砂、棕油、椰油、木材、罐装菠萝的出口，两三年内就从几亿元增加到10几亿元。输入除食品与石油类以外，化工品类、交通器材和以纺织品为主的轻工业产品，多数来自英国及联邦各自治领。新加坡的转口贸易，所得利润每年也有2亿美元以上的收益。因此，新加坡与马来亚在战后几年岁月里，为贫困拮据的英国所赚的外汇，多于大不列颠帝国的其他方面所得。因此，被称之为是英国的“美元制造厂”。1945年至1946年之间，新、马许多邮局所收大量寄往英国的私人包裹当中，很大比重是白糖、鸡旦等食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利益使军事管制政府决定坚决镇压马来亚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各种合理活动。

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图谋维持殖民统治的主要手段，一是进行改良欺骗、施放虚假民主烟幕；二是挑拨民族团结，制造马来人排华事件；三是露出狰狞面孔，实行血腥镇压。

军管政府在强制撤销各地人民委员会的同时，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编导咨询委员会的虚假民主闹剧。实际上是继承日本统治马来亚粉饰太平的旧花招，玩弄假民主，实施小恩小惠，用于欺骗人民。从英国军管政府所导演咨询委员会所讨论的议案中，可以看出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1945年12月12日，新加坡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的议案是：公共卫生福利问题，贿赂社会罪恶问题，货物保险，雇用女招待，小贩食物档，为妓女设立居所等等，根本不敢接触重大的政治问题。

“分而治之”是英国殖民当局几百年来统治各处殖民地的主要手法。军管政府在存在的半年多期间，充分使用了这套罪恶手段。在人民抗日军还没有复员的时候，就组织和怂恿马来民族当中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事端，蒙骗广大马来群众，提出“马来人万岁！打倒中国人！”的口号，煽起排华事件。少数暴徒乘机进行屠杀男女老幼华人，抢劫烧屋。北自吉打，南至柔佛，各州大都发生过此类仇者快、亲者痛的不同规模的排华流血事件。马口发生排华，人民抗日军战士，为维护民族感情，坚持不开枪，有五人惨死在暴徒的巴冷刀下。这些血债，必须记算在英国殖民统治工具——军管政府的身上。

英国政府先是派遣麦克麦考尔爵士于1945年10月18日至12月21日期间，逐个诱使各州苏丹签订承认英王对各该州享有充分管辖权的协议，然后抛出明显不顾各族人民强烈要求合理公民权利的《白皮书》，既维护英国的殖民

利益，又贯彻分而治之的诡计，挑拨马、华民族和睦共处、融洽友好关系，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1945年末，全马来亚人口总数约520万人，如果撇开新加坡不算，只计马来半岛的人数约为432万人，其中华人约占38%，马来人约占49%，华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已经在新、马境内居住10年以上或在当地出生的合法居民，他们在日本统治期间，是反抗日本侵略者最积极的力量，蒙受最大牺牲，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主要是由他们当中的青壮年子弟所组成，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是，拟议中的马来亚联邦计划，却对华人严加限制，规定华人申请公民权，“必须具备良好的品格，具备充分之马来语或英语知识……。”所谓“良好”的品格，“充分”之马来语或英语知识，都是统治者用以排斥广大华人的关阻、铁栅，其目的在于制造民族偏见，煽起民族纠纷。

四、和平民主运动遭到残酷镇压

英国政府于1941年12月18日，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共产党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已经确认马共的合法地位。1943年12月31日，东南亚联军总部派遣代表台维斯等在霹雳州和马共、人民抗日军、抗日同盟会代表，签订联合抗日、配合联军反攻马来亚的军事协定，再次肯定马共的合法地位。日本投降后，马共立即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和群众运动，加强和各民族各阶层的联系，这有利于扩大民族民主联合战线阵营，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

马来亚共产党内大多数人已估计到，英国为维护其反动的殖民权益，有朝一日将可能全面镇压以马共为首的人民民主力量。所以尽管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

员身份，尚是保持秘密状态。为了便于加强和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以及各民族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各市各州分别设立马来亚共产党办事处。

马共各州、市办事处成立于1945年9月，在各该州、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办事处是马共对外联络的窗口，主要是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宣传和解释马共八大主张，向各界人民阐述马共对各项政治事件的见解和意见，向英国军管政府转达各界人民的正当要求，对英当局侵犯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行为提出抗议和交涉，带动和联合各阶层人民进行和平民主斗争的统一行动。1945年10月，全马各地庆祝抗日胜利的大游行，新加坡一地就有450个群众团体参加；1946年2月15日在各大城市举行纪念“沦陷日”大游行；以后，多次领导举行争取民主自由与反对迫害的游行和斗争。1946年初，吉打东部部分马来农民受到怀有险恶居心的统治者挑拨离间，造成该地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矛盾逐涨激化，马共吉打州委办事处党代表及时赶往会晤马来村长，说明事情真象，消除误会，平息了一起可能引起流血冲突的严重事件。

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主力的人民民主阵营，是反帝反殖最坚定的和平民主力量，经过抗日战火严峻锻炼的一万多名人民抗日战士，分布在职工联合会、农民联合会、新民主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学生、教师会中，发挥骨干作用，站在反帝反殖斗争的最前列。组织起来的数十万各族工农劳动群众，是民主斗争的基本力量。新马华人资产阶级，战后初期绝大部份希望争取比较合理的“华人权益”，对争取马来亚民主自治的斗争，一般也积极支持。受压迫、剥削比较深重的印度工人，也积极参加当地工人运动。战后马来民族的民族主义

思潮迅速发展，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小市民，受着封建制度和宗教体系的双重影响，上层人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带动部份工人，提出联合各民族共同争取实现民主自决的要求。

在此形势下，建立马来亚和平民主联合阵线是非常必要的，也符合新马各民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马来国民党 (Partai Kebansaan Melayu Malaya) 于 1945 年 11 月 30 日在霹雳州怡保成立。该党由布哈努丁 (Burhanuddin) 博士领导，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 8 项决议，要求在马来亚实现自治，施行民主政治，保障各民族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反映了马来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和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愿望，得到众多马来知识青年的拥护，在北马、阿罗斯打和吉隆坡等城市都成立办事处。在反帝反殖，新、马联成一体，优先照顾马来民族的利益，各民族人民获得公民权利机会合理均等，和发展各民族文化教育等方面，马来国民党和马来亚共产党有着共同的主张，因此被认为是马来民族的左翼组织。

马来亚民主同盟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在马来亚政治地位激烈争论的风浪中诞生，1945 年 12 月 21 日宣布成立。主席是菲力何廉 (Philip Hoalim)，秘书长林丰美，最积极的组织者和活动骨干是约翰伊伯 (John Eber)，同盟的成员主要是受英文教育的律师、教师、医生、公务员，多数是侨生的华人、印度人、欧亚混血人。他们的活动方式受到英国政党的重大影响。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有 8 条，主张“成立一个自治的马来亚政府，参加英联邦；立法议员全部民选；凡满 21 岁的马来亚公民，不论其种族、性别、宗教或财产，皆可参加投票；……”等等。纲领内容是温和的

低级要求。马盟比较关心各民族教育的平等发展，但马来文是必修课程。主张新加坡拼入马来联邦。这些主张，必然受到企图维护特权的阶层的反对，也受到想恢复殖民统治的英国殖民当局的敌视。（注）

在马来亚共产党八大主张的指引下，马来亚人民曾经设想依照英美等国的模式，进行议会斗争。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总团部，就仿效议会的组织形式以作演习。可是和平的意愿，却换来英国统治者的无情打击：全马工人运动，处处受到残暴的压制，多起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工人，横遭镇压和枪杀；民族教育、集会、游行、文艺团体演出都受到严格限制，抗日战士无端受到逮捕、监禁或驱逐出境，就业受到歧视和排斥。加以军管政府重用依附日本的作恶分子，黑市猖獗，人民生活困难，和平民主的八大主张，满途荆棘。出于大不列颠战略利益的考虑，英国宁可选择马来封建集团，而不能容忍人民民主的合理要求。

军事管制政府从1945年9月份开始就大量逮捕和诬陷抗日后备战士及抗日群众。9月22日，一名原日本宪兵部的暗探，死于新加坡铁巴刹（菜市）附近，6个抗日工作人员却因此被当作嫌疑犯逮捕起来，尽管没有充分证据，被告也完全否认，结果还是判处5人死刑，1人监禁6个月。霹雳州江沙万浓区比咯村发生马来人排华事件，进行自卫的18个华人，全部被判处死刑，而砍死华人妇孺老弱百余人的暴徒，却只有两人被判处死刑。及至人民抗日军复员以后，打击镇压抗日战士的行动，就全面加紧进行，不足两个月，就逮捕了几十个人民抗日战士。1946年2月15日，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大中城市，十数万人开会并游行纪念四年前的沦陷日，各地军管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残暴镇压空手群众，

新加坡 5 名青年学生被枪杀，受伤群众几十人，马共新加坡办事处代表林亚亮及群众百余人被捕，卢成、陈如旧等“十君子”被驱逐出境。柔佛拉美士游行群众被杀 15 人，吉隆坡、檳城、怡保各地横遭镇压群众的鲜血洒染街头。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维克多·巴素博士（Dr. V. Purcell）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对于华侨的政策，许多年来均以时常接近敌视边沿的怀疑态度为其特点。”（见《东南亚之华侨》）

五、人民抗日军复员

英国军事当局在英军完成了对新、马各州战略据点的控制，并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中队及分队驻地附近，作了监视布置以后，就向马共中央军委提出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照会。莱特假借马共中央的名义，在 1945 年 11 月 15 日正式接受这个决定，并以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分驻全马各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发布全军复员的命令。

当时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虚设机构，中央军委实际上是由莱特一人所控制操纵。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的决定，在抗日军战士和各民族人民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般群众普遍表示惋惜和失望，感到人民的权益将失去有力的忠实保卫者。

战斗在吉打玻璃市州一带的吉打人民抗日军，早在马共中央发布和平民主八大主张之前，在陈鲁、陈古、张云、刘荣光等领导核心主持下，曾经将“人民抗日军”的旗号改为“人民解放军”，计划以武力抗拒英军回归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英军统领就此向马共中央军委提出抗议，结果，陈鲁等人受到处分，调离部队，部队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

独立队。

广大人民抗日战士对复员的决定，普遍表示不满，认为面对帝国主义殖民者，无条件放下长期流血牺牲换来的人民武装，人民民主权利就毫无保障。

当时，中央军委布置各独立队和中队、分队、层层组织指战员学习国际形势和八大主张，解释复员和进行和平民主斗争的原因。同时通过8月23日创刊的《民声报》及《现代日报》、《南洋商报》等报刊，阐明人民抗日军准备复员的缘由。刘尧也在中央军委作出复员决定的一星期后，假座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对各界代表及记者发表谈话，说明接受英军司令部关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决定的各种理由：首先是日本已经投降，人民抗日军的任务已经完成；其次是国际形势趋向和平，人民要求和平；再次是人民抗日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和马来亚人民一起，协助政府建设民主自由的新马来亚。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士在3年8个月期间，为维护马来亚各民族人民的生存权利，在非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和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定卓越的斗争，以弱敌强，以寡击众，三千余战士和抗日后备队队员，作出英勇壮烈的牺牲，取得显著彪炳的战果，进行了340多次战斗，毙伤敌人5500多人，牵制数万日军，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战后竟受英军当局的排挤打击，甚至被强令复员，实在太不公平了。由东南亚联军派遣，乘潜艇在马来亚敌后登陆，和人民抗日军联络的重庆特派人员张德爵，在《由守备军而远征军再为游击队》文中，对人民抗日军战士的评价是：“在抗日军内，所有老少男女平等，唯一的目标是打倒日本蝗军，没有要求代价。”另一特遣人员

夏士新给联军的工作报告中，也由于人民抗日军的英勇精神而引发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民族的子弟”的感赞。人民抗日军战士虽然大部分不是马共党员，但对中央军委的决定，行动上还是服从命令，思想不通也无条件执行。部分战士抑制不住内心的不满，有的找机会大量消耗子弹，有的将枪械零件拆下丢弃。

1945年11月下旬最后几天，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属下的中队，开始分别地区进行集中。12月1日，以独立队为单位，分别在8个城市，举行复员仪式。8个独立队，包括下属33个中队，1个独立分队的6800名武装战士，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在城市举行的最后一次检阅，在军乐伴奏下，列队通过检阅台，向各民族人民告别，而后乘车回归住宿营地。几个独立队在检阅后立即缴出武器，有的独立队是回营地才逐件点交。第二独立队500多战士，在芙蓉皇家山广场举行复员典礼时，全体起哄，冲上皇家山营房，两天后经过说服，方才忍痛交出武器。此事显示了广大人民抗日战士的激愤心情。

以下是各个独立队复员的地点：

第一独立队5个中队，在雪兰莪州吉隆坡跑马场复员。

第二独立队4个中队，在森美兰州芙蓉皇家山广场复员。

第三独立队3个中队，在柔佛州昔加末复员。

第四独立队5个中队，在柔佛州新山复员。

第五独立队4个中队，在霹雳州怡保复员。

第六独立队4个中队，在西彭亨文冬广场复员。

第七独立队4个中队，1个直属分队，在东彭亨关丹复员。

第八独立队4个中队，在吉打州阿罗斯打市政局广场复

员。

各独立队所缴交的武器，包括卡宾枪、斯汀枪、来福枪、三八式步枪、轻机枪、手枪、手榴弹和子弹。各种枪械合计 5 4 9 7 件，子弹数十万发。战斗于东彭亨和丁加奴的第七独立队，从来没有接受过东南亚联军的空投武器物资，却交出数百支来福枪和三八式步枪。在森美兰州，人民抗日军所交武器数量，也超过盟军空投武器总数。据台维斯 1 9 4 5 年 9 月 1 3 日在新加坡发表的“1 3 6 部队备忘录”披露：“供应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器，总数共为 2 0 0 0 件。”（原计划供应 3 5 0 0 件，后因日军投降而终止）

复员的人民抗日军战士，每人得到复员费 3 5 0 元。复员后就在营地里召开退伍同志大会，议决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总会的领导下，成立各州的分会，选出分会的常务委员和会长。每个战士认捐 1 0 0 元作为退伍同志会的组织基金。退伍同志会是人民抗日军退伍战士团结战斗的组织，分为全马总会、州会、区会 3 级组织。人民抗日军复员后，继续加强团结，密切联系群众，为争取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和全马人民一道继续奋斗。

注：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国民党、马来人祖国青年协会、马来青年党（Angatan Pemuda Insaf，简称 API）、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马来亚职工联合总会、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中华总商会，等等 1 1 个政党及群众团体，于 1 9 4 6 年 1 2 月 1 4 日在新加坡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约翰·伊伯。一星期以后改名“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Pan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提出 6 项立宪原则：

1. 新加坡应该包括在一个团结统一的马来亚之内；2. 通过立法议会的完全选举，以达成马来亚的自治目的；3. 对所有定居并效忠于马来亚的人民，给予平等权益的公民权；4. 马来亚苏丹享有充分主权及立宪君主的地位；5. 回教事务及有关马来习俗之事的的管理，应持于马来人之手；6. 鼓励马来人社团之进步。

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所提马来亚宪制的意见，和马来亚民主同盟于5月间所提意见一样，被英国当局摒弃一边。

1947年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和马来民族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简称 Putera) 结成 PMCJA—PUTERA 联盟，形成广泛的民族联合阵线，提出《人民宪法》：给予马来人55%的代表权；给予各族人民平等的公民权利；设立“各民族协议会”和“统治者会议”。这个委曲求全的《人民宪法》，还是被英国殖民统治当局撇在脑后。

英国政府于1946年4月1日片面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军事管制政府同时撤销)，立即受到马来亚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后，基于分而治之政策和维持新加坡殖民地统治的需要，英国政府与马来苏丹代表以及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简称 UMNO) 的代表协商，制订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 宪制，新加坡终于被分划出去，仍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然而，殖民帝国没有料想到，新加坡人民经过斗争，还是在1959年6月3日实现内部自治，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不列颠“皇冠上的宝石”，终于被殖民地人民摘掉了。

第七章 历史的回顾

在马来亚的历史长河中，三年八个月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时间上是短暂的，但它无疑是马来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能否认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对推动与促进战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独立的历史功绩。但是，对于如何看待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成就与不足？如何评价马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军的历史地位？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持全盘否定或是笼统肯定的态度，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要对这些问题求得正确的答案，就必须持公正的、客观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

总的来说，经过三年八个月的浴血奋战，马来亚反法西斯抗日的任务已经完成，抗日战争已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日本法西斯驱逐出马来亚以后，却没有实现“抗日九大纲领”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战略目标，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这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那么，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究竟有那些成就？其不足之处又表现在那里呢？从军事上说，人民抗日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大量消灭日军，大片地解放农村和城镇、夺取决定性胜利的程度。马来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这个历史条件就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马来亚抗日战争是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日本妄想独霸东亚，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上的广阔战场上对中国、美国、英国、苏联，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作战，最后力竭而降，马来亚人民是与各国人民一道，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马来

亚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从历史的观点看，马来亚各族人民当时是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毫无权利，手无寸铁。到了日军入侵以后，才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捡拾英军遗弃的武器，建立游击队，克服了千难万险，逐渐发展成拥有八个独立队，人数逾万，遍布全马九个州的庞大队伍。在三年八个月中，人民抗日军从无到有，在战争中成长壮大，给日本占领军以巨大的威胁和打击，保护了人民，打击了敌人，这在马来亚历史上是空前的。所以，更不应低估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成就，尤其是不应该低估为战争作出巨大牺牲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和数十万军民对马来亚历史所作的伟大贡献。这些成就和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团结和教育了人民，组织起来保卫自己，削弱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蹂躏，特别是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激起了马来亚人民的极大义愤。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武装部队和多种形式的抗日组织，军民团结，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民力量以打击日军，普遍地反抗日敌、奸细的迫害，肃清其势力，破坏其统治以保卫自己，使日本占领军妄图大肆掠夺马来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阴谋不能完全得逞。抗战期间，全马十二个州（市），数十万有组织的各族人民，团结在马来亚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军周围，形成了一股空前未有的政治力量，这在马来亚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

第二，在军事上削弱了日军，牵制其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八个独立队，将近一万兵力，分散在九个州内，坚持不懈地展开游击战争，使数万日军疲于奔命，

泥足深陷在马来亚战线而不能自拔，而且不断受到损失。据不完全的统计，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损兵折将累计达五千五百余人。对日军来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他们在东南亚各占领区中最难对付的游击部队之一。

第三，明确提出了驱赶日本法西斯，实现马来亚独立的主张，增强民族意识，为发展民族独立运动初步打下了基础。

马来亚主要由马、华、印三族居民组成，这三族都是外来移民。马来族移民较早，建立了九个土邦，而华、印两族移民较晚，加上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大国的传统观念，和英国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愚民政策影响，过去都自视为外国侨民，本土观念较为薄弱。所以，马来亚人民过去不像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具有较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马来亚三族之逐渐团结成一个整体，形成独立运动，是通过反对英、日侵略者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中马共提出以“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为主要内容的抗日九大纲领，及其“三大民族团结起来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口号与实践，成为马来亚独立运动的巨大推动力。日本投降后，全马出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斗争的三族团结的局面，全马各族人民空前广泛团结起来，为反对英国政府发布的关于马来亚新宪制的《白皮书》和《蓝皮书》而进行了卓越的斗争。（注：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间，英国政府派出特使游说各州苏丹，签订了“允许英王陛下在各邦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的协议书，在此基础上，1946年1月，英国政府便单方面公布了《白皮书》，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1948年2月又公布《蓝皮书》，宣布将马来亚联邦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并宣布将新加坡分割出去，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联邦也好，联

合邦也好，当时英国政府仍然掌握着管辖权，连自治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是独立了。因而，英国政府此举，立即遭到全马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这一民族独立运动，后来在马共倡议下，以各社团的抗日复员军人为骨干，联合全马四十一个政团为基础，成立了各阶层更广泛的“马来亚全国行动委员会”（简称“泛马行动委员会”）来领导反对英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斗争。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如此蓬勃发展，不能不追溯到抗日战争中，马共和人民抗日军明确提出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政治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抗日游击战争提高了民族的觉悟，增强了民族独立的意识，为各民族的团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继而在全马各政党、各社团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争取和斗争下，终于迫使英国政府放弃其宗主国地位，于1957年8月31日同意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

人们在肯定上述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成就的同时，不禁要提出如下的疑问：既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其战略目标，在战争期间力量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壮大，抗日群众工作的开展也为战后建国创造了初步有利的条件，但为什么在日本投降后却放弃了独立纲领，而未能取得反侵略斗争的彻底胜利呢？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过去有不少人曾经为之困扰，感到迷惑不解。现在，马来亚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许多历史的真象已经大白，特别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形势发展，各种误解、偏见、成见，都将逐渐消除，只要人们冷静地去反思一下过去，是不难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的。

现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马来亚抗日战争未能实

现其战略目标的最根本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在当时形势下，马来亚自身实现独立的条件尚不完备；第二，作为抗日战争领导核心的马共内部存在严重的问题，造成指导上的失误；第三，英国政府坚持其殖民统治政策，顽固地镇压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三者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马共的失误，致使马来亚自身的不足条件没法及时弥补，也不可能最有效地领导全马各族人民对英殖民当局进行坚强的、长期的、胜利的斗争，结果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轻易地奉送给了英国统治者。

日本突然宣布投降的当时，马来亚自身实现独立的条件不完备，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不平衡。马来亚人民是由马、华、印三个主要民族组成的。因此，要在日本投降以后，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具备各种条件，首先是必须形成对三族人民都具有号召力的、为三族人民共同支持的、能立即率领人民从抗日战争转变为独立运动的具有政权性质的统一机构。但由于三族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局面当时尚未能形成。

马共提出了以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的“抗日九大纲领”，为实现这个纲领，曾经作过广泛的宣传，制定了三族团结的准则。而且在全马各个州普遍开展民族工作，唤醒各民族的觉醒，这对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从全面来看，则还没有使三大民族在这一国家独立的目标下达到最广泛的团结，更不可能产生统一的行动。

在抗日战争中，马共过于依靠华族，使日军和英国殖民当局藉以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制约了抗日战争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全面发展。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华族二百二十余万人，除了在海峽殖民地拥有英属民籍的土生华人（Baba，

马六甲居多) 之外, 当时绝大多数人仍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日本对中国进行罪恶的侵略战争, 早已激起了他们的抗日热情, 掀起了强大的抗日爱国运动。到了日本法西斯南侵, 马来亚被迅速占领, 广大华人面对宿敌, 新仇旧恨, 更萌发了对日本法西斯的刻骨仇恨。因此, 华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是势所必然的。当时在人口中占有近半数的马来族则有所不同, 因受英国的长期统治与压迫, 他们对英国积怨甚深, 而对日本法西斯却未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其抗日情绪是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逐渐萌发的。加上各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条件的不同, 甚难沟通。因此, 除少数与华族较接近的人士之外, 对人民抗日军多采取同情或中立态度。

马来亚的印度人在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十。除少数中上层人士外, 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马, 在英资大胶园里当割胶工人。一般在三年契约期满后, 英国殖民者就把他们送回印度。(也有一部分人仍滞留在马来亚不走的) 所以, 他们的“侨民”思想比华族更浓厚。他们仇视英殖民当局, 更盼望印度取得独立。日军为了利用印度的民族主义力量来打击英国在亚洲的势力, 它在占领马来亚后, 便着手推动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组织“印度独立同盟”, 并诱骗、胁迫在马来亚作战被俘的印军俘虏加入由日军一手策划的所谓“印度国民军”, 诱导他们为日军准备进攻印度的战略目的服务。当时虽然有少数进步人士看清了日军的真正意图, 积极投身抗日运动, 但仍有一部分印度籍民却受了蒙蔽。等到后来日军的阴谋逐渐暴露, 败局日益明显的时候, 一些人又陷入徬徨和悲观失望之中。而马共和抗日军那时对印族中的情况所知不多, 没有做好各民族的统战工作, 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及时揭露日军的欺骗宣传, 争取印度族站到共

同的抗日阵线上来，把争取印度的独立和马来亚的抗日战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争取马来亚独立必不可少的三大民族的团结阵线，始终没能建立起来。

军事上的准备也是不足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还停留在游击战的阶段，装备落后，没有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不可能集中优势的兵力去打规模较大的战争。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一支强大的、包括各民族的人民军队作后盾，要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是不可能的。

不论是抗日战争，或是民族独立运动，都必须依靠一个坚强的、正确的政党来领导。而作为抗日战争领导核心的马来亚共产党，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就被大叛徒、大内奸莱特混进党内，用两面派的手法，骗取了“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以极其卑劣的手段，在组织上对高层干部和党员实行轮番出卖，在政治路线上采取一系列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极左极右、似是而非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以干扰马共党内、干扰人民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给马共，给马来亚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损失。其所犯下的罪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罕见的。

清算莱特的罪行，本是马共内部的事。但因人民抗日军是由马共所创建和领导的，莱特的出卖，不仅危及了马共内部，而且危及了人民抗日军，同时也危及了全马各族人民。为了说明抗日战争未能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本书不得不从已揭露出来并已公诸于世的历史材料中，从马共人士透露的一些情况中，加以综合介绍，让读者有所了解，以便对马来亚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作出公正的、客观的判断。

莱特原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叛徒，最初由法国政府所蒙

养，后由法国转让给英国特务机关，成为国际间谍，于1935年打着“第三国际远东局特派代表”的旗号混进马共，1939年以欺骗手段篡夺了中央书记职务，是马共党内的大内奸。当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奸细，造成马共领导机构受到极端严重的破坏。据现有资料揭露，日军占领新加坡不到三个月，莱特已出卖马共中央委员有黄诚（黄石），阿宁（郑声烈），张锦章，林江石（黄伯遂），阿白衣（李良），刘文（钟步青），小路（陈培青），阿丘（丘联杰）等人，在莱特一手制造的“九·一”事件中当场牺牲的有中央委员小忠（李振宗）和朱老（朱日光）。1943年4月，中央委员蔡克明和小平（林旺生）先后在新加坡和雪兰莪境内由莱特出卖而被捕。至此，马共在1941年第七次中央扩大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成员，除东彭仅存下亚仲一人外，其余全已被捕或牺牲殆尽，中央委员会名存实亡。但莱特仍然以中央书记名义发号施令。与此同时，全马各州（市）的领导干部也大量被捕，机构受严重破坏（新加坡损失最为惨重），以致无人知晓中央情况，也无人揭露莱特的可疑行径，使得这个大内奸仍然能以党的“领袖”身份控制党、军重要事务。

莱特秘密投降日本占领军后，除了大规模出卖抗日志士外，也曾妄图改变原马共中央所制定的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路线，曾经窜到“三独”司令部所在地，假借中央的名义勒令解散抗日游击队，放弃武装斗争，但遭到全体指战员的抵制，其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又向全军发出了所谓“保存实力，等待时机，配合联军反攻”的消极作战方针，妄图捆住人民抗日军的手脚，使部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不是积极作战，从战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幸当时各个独立队司

令部在各该州马共地委领导或配合支持下，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各自独立作战，莱特不可能一一实行控制，干扰还不致太大。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地马共组织对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重视不够，民族工作发展不平衡，不重视抗日游击区域的政权建设，以及各独立队缺乏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等的失误，或多或少都是和莱特提出的“消极抗日”的方针有关。

最关重大的是他代表马共与联军签署的合作条款。1943年12月底，在霹雳地委的接应下，莱特化名张红，代表马共、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会与东南亚联军总部代表台维斯等人会谈，签订了“美罗军事协议”。这一次的谈判，从策略上看，为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各抗日反法西斯军队之间的协作是完全必要的，合作的意向无可非议。但友军之间的合作必须是平等和友善的。而莱特签署的协议却把人民抗日军变成英军的附庸，成为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的牺牲品，完全丧失其独立地位。这是明目张胆的叛卖。但是这个秘密协议除曾经参加谈判的个别人外，当时在马共党内却无人知晓。直至日本突然投降，马来亚独立问题立待决定的时候，莱特急忙抛出“八大主张”取代“独立纲领”，强令人民抗日军复员，完全出卖马来亚人民抗日成果，使英国顺利地恢复其在马来亚的殖民地统治地位。历史证明，大叛徒、大内奸莱特是这段可悲历史的罪魁祸首。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马共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又是战斗力很强的政党，为何对一个混进党内12年，窃据最高领导职务达八年之久，而且犯有严重罪行的奸细却不能觉察，直至铸成大错才来清算？这在不知实情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造成这个恶果的原因有几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首先，马共成员绝大多数是华籍。英国统治者对马共及其同情者采用逮捕驱逐的办法，成批成批地将马共各级干部（特别是高层的领导干部）逮捕驱逐出境。因此，长期以来，马共高层领导的连续性受到破坏，无法形成一个较稳定的领导核心，这就给了莱特混进党内进行破坏以可乘之机。

其次，马来亚地处国际交通要冲，各色人种混杂，外籍人加入马共不觉奇异。加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行个人崇拜，马共干部也盲目地推崇“领袖”，把莱特吹捧为神奇人物，受到盲目的信任。更主要的还是因马共长期处于激烈的地下斗争环境，组织高度机密和分散。莱特利用这种环境，借口严密组织，除了规定的交通员之外，不许任何人接近他，因而使他能够逃避党组织的监督，以售其奸。

最后，莱特不是一般的奸细，他善于运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面伪装革命，用各种巧妙的手段，包括提出各种似是而非的论据和政策，迎合各个时期的各种思潮，骗取党内的信任，这对于当时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马共青年党员有很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他又以极隐蔽的办法与其主子合作，而英、日特务机关，则与之紧密配合，制造各种假像，千方百计加以掩护，也使他的罪行不易被觉察。

莱特的手法无疑是狡猾的，他的罪行确实骇人听闻。但如果把这个内奸看成是能呼风唤雨，能扭转历史航向的人物，那就错了。凡是鬼魅不能见太阳，莱特只有伪装革命才能掩饰其奸细面目，继续其破坏阴谋。加上他在革命阵营中是完全脱离群众的，他只能暗中破坏，却无法阻止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马来亚共产党经过三年八个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把党的队伍扩大了四倍，达到八千余人；创建了拥有上万战

斗员的人民抗日军，和将近五十万人的抗日群众组织，领导马来亚人民坚持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直至取得胜利。这些历史成就的取得，靠的是马共无数党员干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主动性和无限忠诚；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敌忾同仇，团结战斗，不惜任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靠的是原马共中央早已制定的武装抗日正确路线和政策。区区一个内奸莱特，何能螳臂挡车！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共广大党员、干部的视野扩大了，政治警觉性提高了，从实践中逐步识破了莱特的真面目，1947年终于清算了这个大叛徒、大内奸。这个混进马共党内多年的国际间谍，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英国政府坚持其殖民统治政策，顽固地镇压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更是给马来亚人民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早在1943年2月，即9万英军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后仅仅一年，英国战时内阁已责令其殖民地部与陆军部共同草拟收复远东各殖民地的军政方案，马来亚是其中的重要收复目标之一。是年7月成立了由霍恩主持的马来亚策划小组。12月，霍恩小组已经完成了重新占领马来亚后的政制计划。1944年5月，英国战时内阁的“马来亚与婆罗洲调查委员会”接受了那个计划，并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军政官员队伍，准备做接收大员，一到日本宣布投降，便跟随着英军蜂拥而至，按照他们早已拟订的殖民主义政策，重建殖民地奴役制度。

1945年9月3日英军首批在槟城登陆，12日在新加坡接受日军投降，英国以两个军的兵力重新占领了马来亚，随即成立军事管制政府。

英军重返后施行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宣布日本军用票作

废，而对人民毫无补偿，人民不得不变卖物资，去换取英当局抛出的马来亚新货币，一下子就掠夺了数以亿计的人民手中物资。为了防止马来亚人民的反抗，英军迅速接管了刚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委员会，接着又迫使人民抗日军复员。

当英军站稳了脚跟，殖民地政权确立之后，对马来亚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便日益加紧了。

1946年1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马来亚新宪制的《白皮书》，把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分开，均由英王委派的总督为最高统治者。这份《白皮书》立即受到全马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1月29日，新加坡数十万工人首先发起了反对《白皮书》的总罢工，一场反对《白皮书》，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在全马来亚展开。2月15日，全马各大城市举行悼念日军占领四周年大会，英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在新加坡、拉美士等地打死打伤许多工人和青年，当场逮捕了新加坡马共代表林亚亮等人，造成“2.15”流血事件。同时搜查了新加坡总工会，《新民主》报等机关团体，逮捕了全马总工会筹委主席卢成等10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即有名的新加坡“十君子事件”。）英国政府抛出的《白皮书》在全马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对下，同年12月23日又抛出一项《蓝皮书》以代替《白皮书》。《蓝皮书》公布后，除了上层少数人拥护外，各族人民仍坚决反对。

英国统治者把马共和抗日军人视为推行其殖民政策的主要障碍，制造了许多事端加以打击。“2.15”事件和新加坡大逮捕之后，相继在柔佛州搜查该州总工会，逮捕吉隆坡原抗日同盟会干部宋光、霹雳州总工会主席陈洪明、麻坡马共办事处代表符洪亮、柔南抗日军人朱高、霹雳的赵辉煌等人。1947年4月28日，英军警在吉打州的南区芭口橡

胶园 (Dubblin Estate) 对正在开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数百名马、华、印橡胶工人 (其中较多数是印籍工人)，进行武装血腥镇压，当场开枪打死华工罗德，打伤印籍工人数十人，逮捕了总工会代表林苏及印籍工人“三米”等四人，造成震动全马的“罗德惨案”，事件层出不穷。马共和抗日军退伍军人不顾英军的打击，于1947年7月20日和10月20日，两次由全国行动委员会和马来人统一阵线共同发起举行全马总罢工，要求民族自决的口号响彻云霄。但到了1948年2月1日，英国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宣布，根据《蓝皮书》组成的“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顽固地推行其既定的统治政策。

1948年6月，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确定在东南亚搞一个所谓的“防疫带”，准备全面军事进攻。6月初，英当局逮捕了新加坡橡胶工会主席，和新加坡总工会副主席。6月12日新加坡政府下令禁止全马工会联合会的活动。

6月17日，马来亚高级专员授权各州警察局，对抗拒者可就地枪杀，柔北立即出动军警镇压印籍胶工大罢工，造成大流血事件。6月17日，包围马共的机关报《民声报》，逮捕编辑、员工三十余人，并封闭了《民声报》。

6月21日，宣布全马来亚处于“紧急状态”，发布了“紧急治安条例”，向马来亚人民发动军事进攻。从6月20日晚间至21日晨全马逮捕600多人，300多个工会和群众团体被封闭。7月下旬宣布马共及其他许多组织为非法。大批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及无辜群众，陆续被驱逐出境。至此，英国在马来亚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登峰造极。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回顾过去，马来亚人民为了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曾经走了一段漫长的、崎岖曲折的

道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一历史潮流，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看看今天，在世界人民的持久斗争下，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系，终于土崩瓦解。我们庆贺新、马两地人民，在这一世界潮流中，于1957年以后先后获得了国家的独立，殖民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此，我们衷心祝愿新、马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建设一个民族和睦、人民民主、繁荣昌盛的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附录 各独立队成长战斗史

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的

(一) 第一独立队

一、前言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简称“一独”），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马的吉兰丹、吉打、檳城和大半个霹雳州，直逼雪兰莪州之际，于1942年1月1日由马共中央命名成立的。

1942年1月4日，马共雪州地委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队伍，以及十五名曾在新加坡英军101特别训练学校学习回到雪州的马共党员，加上由霹雳州地委抽调去新加坡受训，后因战事受阻滞留在雪兰莪州的30名骨干共160多人，在雪州北区的“双门丹”义山亭举行“一独”成立大会。会议中途，突遭日机空袭扫射，日军先遣便衣队也同时向会场进逼，致使会议中断，队伍被冲散，部分人员被迫撤退至原始森林的一个名叫“榴莲山”的地方。约十多天后，冲散了的人员陆续来到“榴莲山”重新集结，并在“榴莲山”上继续举行了成立大会。从此，雪州各族人民有了自己的子弟兵，马来亚第一支纳入了编制的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宣告诞生了，它肩负着在雪州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伟大历

史使命，它给马来亚人民带来了曙光和希望。

雪兰莪州位于马来亚中部，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群众基础较好。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雪州和全马各地一样，橡胶、锡矿、煤矿工人，店员、洋务工人等各行业都相继组织了地下工会，有组织地开展反压迫、反剥削、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改善生活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如1936年在文良港的东兴隆十二公司，以及在加影埠的割胶工人的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取得了胜利；1937年，煤炭山（马来亚最大的煤矿）数千矿工大罢工，以及新街场两大锡矿工人的斗争，得到雪州及全马各地各行业工人的响应和支持，给了英殖民统治者经济上、政治上沉重的打击。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广大华人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纷纷响应“华侨筹赈会”和“抗敌后援会”的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输，支援中国的抗战。由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店员等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讲演队、歌咏队、戏剧队，深入街道、工厂、农村、胶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声讨日军在华的种种暴行，激发了广大华人的爱国热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打击奸商，义演、义卖、卖花筹赈的抗日民主运动，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主力——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雪州广大爱国华人，进一步认清了爱祖国和反抗日本侵略的一致性，热烈响应马共提出的武装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更紧密地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前线。

同时，也由于雪兰莪州是南北马铁路、公路干线和东西海岸公路线的交通枢纽，境内盛产胶、锡、煤炭等战略物资，

是日本侵略者藉以控制全马的心脏地带，因此，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特别尖锐，斗争也更为复杂、激烈。日本侵略者对抗日军和各抗日组织的活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恐惧又痛恨。在“一独”成立之初，日军即出动数以千计的兵力，接连进剿抗日部队，扫荡地方抗日群众，妄图把抗日力量消灭于襁褓之中，使抗日部队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但是，抗日的正义之师是杀不尽，打不垮的。“一独”建队初期，只有三个分队。这些刚放下工具、书本，拿起了武器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镇青年、学生，面对比自己强大数百倍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毫不畏惧，坚毅勇敢，在马共雪州地委和“一独”司令部的领导下，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由于受到日军围剿而造成的重重困难，支援地方组织恢复和建立了遭到严重破坏的抗日地盘，经历了从农村退到森林，再从森林回到农村的艰苦奋斗过程。在军事上，以小规模的袭击和锄奸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进而发展到主动出击，杀敌夺武，和日军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使抗日力量继续向纵深发展。自1943年起，“一独”从原来三个分队的基础上，在雪州南区建立了第八中队，中区建立了模范中队，北区建立了第二十九中队，从而在南、北、中三个区域站稳了脚根；同年底，又在北区扩建了一个中队——第三十五中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侵马日军日益陷入困境，抗日军在抗击日军的正义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保护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赢得了雪州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支持，抗日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1944年底，在南区第八中队的基础上，扩建了第十二中队；1945年4、5月间，还扩建了第八十一中队。至此，

“一独”司令部已统率了六个中队，共约850多人。（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44年底，第二十九中队和模范中队合并；1945年春，第十二中队奉命开赴森美兰州，支援第二独立队的建军。）

在与联军取得联系以后，为了配合联军反攻马来亚的作战计划，“一独”从老队中抽调一批军事骨干，在地方抗日组织的配合下，积极训练“抗日后备队”，吸收新鲜的血液，分别在雪州北区、中区、南区建立起五个新队，按次序命名为第一、二、三、四、六共五个中队，（以后又缩编为四个中队）共650多人。到日军投降前夕，新旧队合计共拥有兵员1300多人。

在三年八个月的抗日战争中，“一独”进行的大、小战斗如：伏击战、进攻日军据点和警察局、反围剿、破坏交通线、锄奸肃特……等共120多次。较重大的有保卫“九·一”全马高级党、军会议的战斗、顿巴央反围剿战、协利港的杀敌突围战、袭击南区大港日军据点、智取甲洞、武来岸和双坡警局、那督坳伏击战、协利港的杀敌突围战、咕腰杀敌、冲破吉隆坡半山芭监狱、消灭大汉奸黄铁珊、消灭土匪部队为民除害……等，共毙伤敌人约800多人（其中毙敌5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28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这是“一独”全体指战员以及雪州抗日群众，经过长期艰苦战斗，用鲜血换来的显赫战果。“一独”和各州兄弟部队一样，在三年八个月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马来亚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

(一) 在战火中诞生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马来亚,马共雪州地委同全马各州党组织一样,坚决响应和执行马共中央的号召,动员和组织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当时采取了如下一些紧急措施:

1、在吉隆坡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即席成立“雪州抗敌动员总会”,公开号召和组织有志抗日青年武装起来打日本。大会推选出马共党员陈大智为该会武装部主任,负责筹集物资,领导报名参加抗日军的青年转入农村和山区,上山打游击。

2、由地委委员刘石(廖贯天)、阿芳(阿谷)、李白、陈清四人,率领先行撤出城市的部分党员、工人、学生,分别开赴雪州南区、中区、北区宣传组织群众,收集武器,筹建抗日武装部队。

3、与此同时,选派了一批党员、干部共60人,由地委委员余洪(阿福)和陈书领队,前往新加坡英军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训,作为雪州建军的领导骨干。(注:后因吉隆坡沦陷留在柔北“三独”,未能回到雪州。)

4、将从吉隆坡及郊区各地陆续撤出的工人、学生、教师、店员,分为数批,第一批约80人,由刘石、陈大智带领,开赴南区武来岸加蕉山,因途中受阻,被迫绕道撤到森属知知港船子头、突岭山(突岭山与加蕉山毗邻),在该处住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分别从山路和公路返回南区。第二批约70人,开赴龙溪农村;另一队约六十人,由肖林(黄水源)带领,在吉隆坡义山亭集合后,开赴暗邦山区农村,还有一批是由吉隆坡各行业工会组织撤退的70多名工人,由冯明

(冯星灿)带队，撤往暗邦山，并很快与肖林带领的队伍取得联系，两队人马合并为一个队，共100多人，由区委小王暂时领导，等候上级命令。至此，雪州地委筹建地方武装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计划已基本实现。

在新加坡英军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事训练的第一批学员15人，训练结束后，按原计划是派往北马建立武装部队的，后因战局急变，英军节节败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马的吉兰丹、吉打、檳城、霹靂州等地相继沦陷。这第一批15人的军事骨干由新加坡开抵雪兰莪时，受阻不能北上，便决定留在雪州，结合当地初步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共160多人，于1942年1月4日吉隆坡沦陷前在雪州北区“双门丹”义山亭，由许庆彪主持举行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建队的成立大会，朱佬代表马共中央在会上讲了话，祝贺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的诞生。会议进行到编队等具体事项时，突遭日机俯冲扫射，同时接到情报，发现一百多个日军先遣便衣部队由山边向会场进逼。当时一位队员（严岛）背部中弹受伤。由于部队正在组建之中，缺少武器和作战经验，队伍暂被冲散，一部分人由许庆彪率领，靠当地群众引路，迅速撤至附近的原始森林叫榴莲山的地方建营驻扎下来。约十多天过后，其他冲散的队员由老百姓指引，也先后抵达榴莲山集结归队。于是，1月4日未完成的成立大会，在榴莲山营地继续举行。大会仍由许庆彪主持，并由陈天庆正式宣布“一独”建队编制、指挥员名单、部署各队的活动地区和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等。

“一独”司令部第一任领导成员名单如下：

党代表：许庆彪；队长：陈天庆；副队长：廖奕林；

政治部：陈祥；管理部：刘尧。

建队初期，“一独”司令部领导下有三个分队：

第一分队：党代表李白；分队长南盛；分队副彭少雄；政工团有煎熬（吴清琦）、吴连枝；管理部陈金。活动地区是雪州北区的叻思、古毛、吉磷、隆邦等地。

第二分队：党代表林狮虎（后由煎熬负责）；分队长黄清；分队副：×××，政工团有：陈六（吴毓清）、连志超（后由肖林负责）；管理部：×××。活动于双门丹、顿巴央、鸟鲁音、万挠等地。

第三分队：党代表阿芳（初时由陈祥兼任）；分队长阿燕；分队副吴阿克；政工团谢瑞生（女）、扬波（林清丰），杨波调去第一分队后，由惠光（陈忠秋）继任。活动于间津、甲洞、石山脚及吉隆坡郊区。

当时司令部领导机关常驻于第三分队，便于对雪州中区、北区、南区的统一指挥。

初时，每个分队只有指战员 50—60 人，长短武器只有 30~40 支，甚少其它军事装备。当时武器的来源是：1、收集英军遗弃的枪支，和群众捐献的猎枪以及他们捡拾到英军遗弃的长短枪；2、收容了十多名英、澳散兵，他们把武器交给抗日部队，并要求给以保护；3、十五位结业学员从 101 特别训练学校带来的约 30 支长短枪，及后，该校教官查普曼到了“一独”，把他们埋藏的一部分武器交给部队；4、马共霹雳州地委把他们在仕林河战场收集到的武器中，送交一部分（约 70 多支来福枪）给“一独”。

后来，肖林、冯明奉命把集合在暗邦山的 70 多人带回司令部；集中在龙溪的队伍，除了留一部分人在南区开展民运工作外，其余 30 多人也奉命调来石山脚；原来由刘石领导活动在雪兰莪和森美兰边境的部分人员，因刘石病逝，处

境十分困难，上级命令由陈大智带队回到司令部，经整编后分别安插到三个分队中。这样一来，“一独”的人员和武器都得到了加强。

为了开展吉隆坡近郊的暗邦、文良港、鹅麦、淡江等地抗日工作，1942年3、4月间，“一独”司令部派遣迅云、冯明去暗邦，配合暗邦区委小王，建立第四独立分队。分队党代表由区委小王担任；分队长迅云；分队副冯明（冯明出发受伤后改由阿克担任）；政工团李扬（李少奇）、洁萍（女）；管理部韩江，小队长黄杰……等。

（二） 初试锋芒，以小规模袭击 拉开抗日武装斗争序幕。

“一独”建队后一、二天，三个分队就立即开赴各自活动地区，进行伏击日军、破坏铁路运输、锄奸、消灭民族败类等军事行动，以战斗的枪声，正式宣告雪州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始。同时，分别派出武装小组，积极配合地方开展民运工作，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例如“抗日同盟会”、“抗日武装后备队”、“自卫队”……等等，支援武装部队，展开全民武装抗日斗争。

第一分队开抵北区古毛、叻思后，即派出武工人员到市区消灭敌奸杜存贵，接着又派出一小队到古毛至叻思铁路中段，埋下炸药，炸毁日军一列军运火车的机车头，阻碍了日军的军事运输。

第二分队也接连进行了两次军事行动，都获得成功。第一次是派出十多人在双溪珠附近埋伏，袭击日军车，击毙了车上一名日军，夺得手枪一支，这是“一独”从日军手中夺得的第一支枪。第二次行动是组织锄奸小组，潜入双门丹市

镇，击毙了该镇一个为虎作伥、鱼肉人民、无恶不作的第一任维持会长。

第三分队组织了锄奸团、武工队，深入吉隆坡市区和郊区，进行锄奸活动。在鹅麦击毙叛徒、敌奸陈观龙兄弟二人，接着又赶到文良港消灭为他们兄弟效劳的敌情报员两人，大快人心。不久，又派出武工队潜入吉隆坡市“南园游艺场”（B. B. PARK）舞厅，向日宪兵队长和大汉奸黄铁珊投掷手榴弹，虽因雷管受潮而未曾爆炸，但已吓得日宪兵队长和汉奸屎滚尿流，魂不附体。接着不久，活动在蕉赖、半山芭的锄奸队员，跟踪消灭了大走狗——肖二狗后，又潜入暗邦镇除掉了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暗邦警察局局长。另一组活动在吉隆坡市区的武工队员，经过化装，巧妙地潜入日军戒备森严的文良港医院，击毙了丧心病狂的敌奸何××

第四独立分队成立后不久，也派出特务队深入暗邦市镇，消灭了为非作歹的汉奸陈文桥。

这些小规模突击行动，锻炼了部队，提高了各个分队指战员的作战和应变能力，不断唤醒在日本铁蹄下过着悲惨生活的群众，动摇着日本法西斯对雪州各族人民的血腥统治。

（三） 团结战斗，共度难关

抗日军的诞生和出击，以及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持其法西斯统治，也更加疯狂地向抗日部队和抗日据点发动连续进攻。

1942年4月间，日军出动几百兵力封锁了北区由叻思到古毛埠的各处交通要道，由敌奸带路，分两路钳形围攻驻扎在古毛山区仙水港的第一分队，沿途首先破坏了部队刚建立起来的文塾埏、观音堂、仙水港三个交通联络站。由于日军行动迅速，正在仙水港交通站侧山溪冲凉、洗衣服的几

位战士，急忙拿起武器猛烈还击，突破一个缺口冲上山坡；在交通站附近群众家里医病的几个战士，也在群众的护送下冲入森林。第一分队指挥部听到交通站发生战斗的枪声，立即集队冲上营房两侧的制高点，占据有利地形，还击进犯之敌。日军依仗人多分三路进行包抄，攻势异常猛烈，一分队指战员沉着应战，在打退日军两次冲锋后，趁着滂沱大雨，视线模糊之机，迅速撤出战斗，向“顿巴央”和“双门丹”方向转移。日军遭受一分队的猛烈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追击，小心翼翼地爬到营房，扑了个空，盲目向周围放了一阵枪，破坏了营房，随后撤走。后来一分队由于遭到日军连续进攻，周围抗日群众组织也受到严重破坏，部队的粮食、药品供应非常困难，病号增加，更因分队指挥机关领导不健全，处境极为严峻。经司令部研究决定，命令第一分队暂时撤出古毛地区，转移到“顿巴央”与第二分队合并。

同年六、七月间，驻吉隆坡的日本警备司令部也派了二百多名日军，分两路围攻成立不久、驻扎在暗邦山的第四独立分队。该分队当时编制四十多人，但仅有六支长短枪和一些手榴弹，等待司令部补充的武器尚未运到，在此情况下，指挥部决定大部分人先行撤离，留一个小队在阿克指挥下，以排头火的威力压住日军的先头部队，趁日军惊魂未定，即收兵撤走，赶上先撤的队伍，转入深山。一星期以后，“一独”司令部派彭少雄前来把队伍带到顿巴央，与第一、二分队共同整编，组成“联合中队”。

与此同时，在第三分队领导下活动于间津、甲洞、泗岩末、石山脚和吉隆坡市区的武工队、锄奸团、宣传队，以及群众组织，交通站，也接连遭袭击和破坏，有的战士和群众遭逮捕坐牢或屠杀。

1942年9月1日，在雪兰莪中区群众基础较好的石山脚山边举行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简称“九·一”会议），讨论和部署马来亚抗日战争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问题。这是在关键时刻举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除马共中央委员外，还有各州地委代表和各独立队司令部代表。为了保卫会议的顺利进行，“一独”选派了以模范中队队长阿燕为首的警卫班担任会场的保卫工作，模范中队也开赴离石山脚不远的间津山边警戒和接应支援。地方抗日组织也布置了外围警戒线，派出自卫队员沿公路值班放哨。对会场的保卫工作是相当严密的。事后查明，由于内奸莱特的出卖，日本警备队在事前已获得了准确的情报，部署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从日本警备司令部和宪兵队调集了大批精锐兵力，对会场设下了四层包围圈，妄图一网打尽所有马共和抗日军高级干部，扑灭马来亚人民抗日武装力量。8月31日晚，与会代表绝大部分已经到齐，唯独窃踞马共中央书记职位的莱特还没有到会，当晚由马共中央委员小忠主持召开了预备会议。9月1日凌晨五时许，日军完成了包围部署后，悄悄向会场进逼，被警卫会场的哨兵发现，立即开枪迎头给以痛击。在中央领导的指挥和警卫战士的英勇阻击下，代表们撤出会场，冲向后面的小山，以猛烈的火力和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向外突围。这是一场关系马来亚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搏斗，在这场气壮山河的浴血战斗中，与会代表及全体警卫人员，临危不惧，英勇搏斗，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终于冲破了数千日军设下的四道包围圈，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安全转移脱险，粉碎了日军妄图一举全歼所有领导干部的阴谋。这一役，打死日军中佐一人，尉级军官和军曹数人，共毙伤日兵数十人。抗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十

八位与会代表及战士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其中包括马共中央委员小忠（李振宗，福建安溪县龙涓乡人）、朱佬（原名朱日光）、一独党代表许庆彪、三独党代表陈书、四独队长余洪（阿福）、五独党代表张浪萍（张奇生）、特别队党代表小康（钟振康）、吉打州地委书记陈炳宏、檳城市委书记文燕，以及一独派出保卫会场的警卫队长阿燕、战士黄光、彭友、保伦、小林、刘友，服务员刘三耐、刘昆、张观凤（女）等。）

日军在包围进攻“九·一”会场的同时，还出动了四百多兵力，分两路袭击驻扎在间津山担负外围警戒任务的模范中队，致使该中队受到牵制，当日军向“九·一”会场进攻时，无法前往支援，全靠派驻会场的一个警卫班孤军作战，掩护撤退，结果造成比较重大的伤亡。模范中队方面，由于布置了严密的岗哨，当日军发起进攻时，当即迎头痛击，并向后山安全转移，没有损伤，倒是两路夹击的日军发生误会，在左右两个山头互相射击了约20分钟。是役日军死伤多人。

模范中队经“九·一”战斗后，向北撤到双门丹地区的顿巴央，和原来在该地活动的第一、二分队汇合，加上在此之前由南区加蕉和中区暗邦转移到该地的两批人员，合计二百多人，建立了联合中队，联合中队实际保持原来两支部队的编制，党代表是陈杰、煎熬，队长黄清、彭少雄，中队副铁强（老铁）、青红（纯之），政治部负责人肖林、扬波，一独司令部副队长廖奕林是驻队代表。联合中队的建立，使部队得到一个休整的机会。

“九·一”事件以后，日军并未放松对“一独”的追击和围剿，加紧派出奸细四出侦察抗日军的活动情况。当他们侦察到模范中队已转移到顿巴央山中，并活动在双门丹、万挠、乌鲁音、叻思等地时，于10月15日调集了千多兵力，

分南、北、中三路向顿巴央山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战斗在当天下午打响，至当天晚上，日军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进攻，但却被占据左右两边制高点的“一独”战士以猛烈的火力所击退，遗下几十具尸体，狼狈地撤离森林，守卫在山边，封锁了各个路口。第二天（10月16日）一早，日军又重整旗鼓，重新发起了进攻。“联合中队”事前已经作好部署，等到日军接近营房时，从各个山头突然以猛烈的火力杀伤了大批日军后，按预定的计划安全转移。日军进入抗日军营地后，又触响了部队事先埋下的炸药，数声巨响，炸得日军血肉横飞，尸横遍地。这一役，击毙日军尉官二名，重伤日军少佐一名，毙伤日军60多名。抗日军方面，则牺牲一名机枪手，另一战士被打伤，被毁营房一座，损失石灰米100多公斤，番薯300多斤，食油五、六斤，以及一些厨具。这是困难时期“一独”在反围剿战斗中所取得的一次辉煌胜利。

（四） 冲出重围，向南、北区进军

由于日军在进攻“九·一”会场和围剿顿巴央联合中队的前后，同时残酷扫荡附近各地农村，许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群众组织和交通站被摧毁，不少抗日干部和群众相继被杀或被捕，部队与群众的联系暂时被切断，造成部队处境十分困难，生活非常艰苦，不得不以木薯、野菜充饥，由于营养不良，加上缺医缺药，病号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自1942年9月至1943年末这一段时间里，在日军接连围剿进攻下，“一独”司令部党代表许庆彪在“九·一”事件中壮烈牺牲；1943年初，司令部管理部刘尧因出发到吉隆坡郊区农村工作，被敌奸探悉，不幸遭逮捕；不久，司令部队长陈天庆出发到间津一农村布置工作，被暗

藏在农村的奸细发现告密，被日军包围，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此外，司令部政治部陈祥，在“九·一”事件模范中队被敌包围时，在战斗中失踪，下落不明。副队长廖奕林在顿巴央反围剿战役后，骑单车由公路转移，路上被日军所捕，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至此，“一独”司令部原有的五个领导成员已损失殆尽。在这种极端严峻的形势面前，“一独”全体指战员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在马共雪州地委的领导下，发扬了独立作战的精神，上下一心，团结战斗，排除困难，坚决贯彻依靠和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建军方针，冲出重围，向南区和北区进军，先后在南区扩建了第八中队，在北区建立了第二十九中队和第三十五中队。这些新扩建的中队与留在中区恢复建制的模范中队一起，把雪州南、北、中三个区域联成一条战线，使“一独”在逆境中继续发展壮大，在日军的反复扫荡中站稳了脚跟，摆脱了被动的局面，迎来了新的战斗历程。

第八中队建立在雪州南区，活动地盘包括武来岸、士毛月、双溪笼、加影、龙溪、加蕉一带直到与森美兰州的分界处。南区是抗日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区域，当第一批“一独”先遣分队开到武来岸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援。在当地抗日组织的密切配合下，由部队举办了两期抗日军政训练班，吸收当地抗日青年接受训练，结业后，一部分参加抗日军，另一部分人返回农村，开展民运工作，使农村的抗日群众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报名参军的人数也一天天增加，部队获得新鲜血液补充，很快壮大起来，于1943年3月间经司令部批准，正式命名为“一独”第八中队。八中建队初期，指战员共120多人，指挥部的领导成员是：党代表煎熬（吴清琦，后由扬波继任），中队长黄清（后由冯明

继任)，副队长冯明（以后分别由纯之、钢钉继任），政治部扬波（以后分别由梁洪亮、陈忠继任），管理部温岳（后由光辉继任）。中队下属四个分队。（其中一个独立分队，活动在加影埠周围的工矿地区。）八中建立后，先后派出队伍袭击了武来岸和士毛月两地的警察局，并派出武工队消灭了一批在抗日农村活动的走狗奸细，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情绪。而日本统治者对八中的活动则非常恐惧，处心积虑，派出奸细四出收集八中活动的情报，从1943年3月开始至12月底，调遣大批兵力，接连向八中发动了五次进攻。由于部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军民团结对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日军周旋，结果日军的五次进攻均告失败，毫无所获，但附近农村遭日军反复扫荡，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造成部队给养发生了困难。到1944年初，日本统治者又发起了所谓的“春季攻势”，改变战术，除出动大量兵力对第八中队在林金港驻地进行包围袭击外，还采取长期在山边农村屯兵封锁，强迫群众砍木“围栏”，把农村变成变相集中营，对群众严加监视，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军的联系，妄图把八中困死在山林中。面对这一形势，八中采取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狙击、严重杀伤敌人后向外线转移的作战方针。清晨七时半左右，当大批日军进到山口抗日军狙击队埋伏地段时，英勇的抗日军战士从三个山头以猛烈的火力向日军射击，日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狙击队在完成杀伤敌人任务后，掩护主力向外线安全转移。这次林金港之役，日军死伤惨重（其中有三名尉官及几个曹长被击毙），抗日军战士则有两人腿部中弹受伤。经此战役后，八中为了保存力量，暂时撤离南区，长途行军转移到彭亨州，在该州“六独”的支援和帮助下，进行休整，以后再重返雪州南区，投入新的战斗。

第二十九中队是于1943年初在雪州北区的吉磷一带，收编一股当地的地方武装组建起来的。这一带也是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一个区域。日本侵马战争爆发后，当地马共地下组织在这里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顿巴央反围剿战斗取得胜利后，联合中队主力转移到间津、石山脚休整，一批由六位战士组成的狙击队，因最后撤离战场，未能跟上主力队伍一起转移，而各个交通要道的路口已被日军封锁，无法通过，只好向北转移，经过艰苦的行军，辗转来到靠近霹雳州丹戎马林的吉磷农村，通过当地群众的帮助顺利地找到了当地的民运负责人，于是便在吉磷驻扎下来，就地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当时，有一股地方武装（人数约二十人），经常活动于吉磷、隆邦、古毛一带，以中、小资产阶级为对象，进行抢劫、绑票，有时还冒充抗日军做坏事，群众对他们又恨又怕，要求抗日军把他们收编过来。部队经过调查，弄清楚这批人多数是战前在森林中伐木和割山树胶为生的劳动人民，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只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才走上邪路的。于是决定派人找他们联系，向他们耐心宣传抗日的主张和政策，号召他们改邪归正，联合抗日，为马来亚人民立新功。经过多次反复的宣传和动员，这批地方武装最后终于接受抗日军的收编。与此同时，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加上部队派出武工队人员在市镇和郊区开展了锄奸肃敌活动，为群众除害，扩大了抗日军的影响，队伍由原来十多人迅速扩展到八十多人。1943年3月，经“一独”司令部批准，正式命名为第二十九中队。中队指挥部领导成员先后为：党代表肖林，中队长铁强（卢铭，后由程长及青红继任），中队副排超（后由陈大智继任），政治部罗深（后由陈忠秋继任），管理部陈光。第二十九中队建立后，更有组织

地在吉磷、隆邦等地城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支持地方民运工作的开展，并在抗日群众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消灭了大叛徒廖奕林（原“一独”司令部副队长），为人民除了一大害。

第三十五中队建立在北区古毛叻思一带。二十九中队在吉磷、隆邦建队后，日军非大批人马不敢向该两地区进犯，转而向古毛、叻思两地肆意烧杀和抢劫群众财物，使当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3年初，在雪州地委的部署下，派出一批骨干潜回古毛一带，继续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筹募到一批资金，并收编了一小股地方武装，在古毛、叻思交界地方成立北区游击小队（最初队员只有十七人）。游击小队的建立，壮大了抗日的声势，对日、特的进犯给予有力的反击，在群众的配合与支持下，消灭了日军安插在当地的持务黄狗仔、拉也星（印族），警告了古毛埠维持会会长陈××，拘留教育后释放了他的儿子陈××，消灭了杀人放火的土匪罗少吕，从此游击小队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许多抗日青年纷纷要求参加人民抗日军，部队迅速扩大到四十余人，后来司令部又从其他兄弟部队抽调了一批骨干充实了力量，并命名为“一独”第九十分队，直属司令部管辖。第九十分队成立后，积极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取得很大进展。至1943年10月，正式改建为第三十五中队。当时的中队指挥部成员如下：党代表小红，中队长程长（以后由周洋滨继任），中副迅云，政治部周洋滨（以后由流荡、秋萍先后继任），管理部钱锦。（注：小红、周洋滨，在1948年6月后叛变，成为马共的叛徒。）

从此，雪州北区的两支抗日部队互相配合，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活跃在方圆200多平方英里的广阔农村、胶园、矿区，以及由吉隆坡至霹雳州边界的50多英里的公路、铁

路交通线上，与日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在这些地区的血腥统治。

在南、北区扩建三个中队（八中、二十九中和三十五中）的同时，原来在中区活动的第三分队逐渐壮大，也于1943年2月正式恢复为模范中队，当时的中队指挥部成员如下：党代表煎熬，中队长彭少雄，中队副冯明（后由程长、志德、新盈、纯之先后继任），政治部负责人先后有流荡、周洋滨、陈忠秋，管理部符宏开。模范中队建立后，在中区的间津、甲洞、石山脚、泗岩末、淡江、文良港、鹅麦等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在袭击甲洞警察局的战役中，一举夺得长短枪支26支，声威大震。与此同时，在培训军政干部的工作上，模范中队也取得显著成绩，由该队负责编写的军事训练教材，经司令部分发到各个中队推广使用；模范中队也是司令部组织培训军政骨干的中心，由司令部经常从各中队抽调一些优秀队员到模中，通过日常的工作和军事活动实地培训后，又调往各中队充实骨干力量，加速各地武装部队的建设。

（五） 半山芭越狱斗争的胜利

1943年9月7日，被囚在吉隆坡市郊半山芭监狱的106位抗日军战士及抗日群众，在没有外界支援的情况下，全靠狱内难友发扬独立作战的精神，以英勇的行动进行越狱的壮举，并取得了成功。这一越狱斗争的胜利，充分表现出人民抗日军战士的大无畏革命英雄气概，震撼全雪州。（注：当时由于日军封锁消息，事件发生时除附近群众外，外地群众尚未知情，及至后来通过地下油印报刊的报道，消息才传遍全马以至东南亚各地。）大大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斗志。

半山芭监狱地处吉隆坡市郊、四周围墙高耸，戒备森严。

在这里被囚禁着一百余名抗日军指战员及抗日群众。他们有的是在市区执行任务过程，遭奸细出卖而被捕入狱的。更多的抗日群众，则是在日军反复扫荡农村时，被无辜逮捕投入监狱的。这些战士、群众被捕后，都受到日本宪兵部的严刑拷打，什么“灌辣椒水”、“空中飞人”、“坐老虎凳”……等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大多数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头破腿断，体无完肤，惨不忍睹。但战士们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有的战士、群众就在日军的屠刀下壮烈牺牲。

恐怖的环境，死神的威胁，并没有丝毫减弱战士们坚持斗争到底的革命意志，相反，一个拼死斗争的越狱行动计划，在陈大智和陈大龙两人的发起和策划下，正在酝酿成熟。他们利用放风、冲凉的机会进行串连，秘密交换意见，进行越狱前的准备工作。他们把家属送饭时装茶水用的玻璃瓶集中起来作“武器”，把当被盖的麻袋拆散搓成绳索作为越狱爬墙的工具。一切准备就绪以后，5月7日傍晚，大家按照预先约好的计划，乘狱警打开牢门送饭的时机，突击组闪电般冲出牢门，用玻璃瓶把狱警打昏，迅速夺过各个牢门的锁匙，把各个牢门打开，难友们蜂涌冲出牢房。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开始了！在警卫室里值班的日兵发现后，慌乱中向人群开枪射击，有几位难友受伤倒地，但谁也没有后退，众人扶起受伤的难友，不顾一切地分两路向监狱的大门和侧门冲去。监狱的大门和侧门被打开了，人们像汹涌的潮水般冲了出去。当时，有一位因受刑遭致断腿的战士叫陈志伟，他不肯让难友们背着走，坐在牢门口高声鼓励难友们往前冲，光荣牺牲在监狱的门口。越狱的组织者陈大龙，为了掩护难友，自己留作后卫，走迟了一步，在冲出监狱不远的广东义山附近，被狱卒追上抓住，当场被杀死在监狱门前。

冲出监狱的难友，有的由于在狱中长期受尽酷刑和饥饿的折磨，身体极度虚弱，冲狱时用尽全身气力，当走到吉隆坡郊区时，已是全身乏力，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日军急忙派出重兵分头把郊区重重包围，进行搜索，结果有十多位难友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被搜获，重新押解回监狱，以后惨遭杀害。绝大多数人终于脱离了虎口，陆续到事先约定的地点集合，冲散了的难友，则自己隐蔽起来，通过群众的帮助，安全回到抗日根据地。

这一气壮山河的越狱斗争的胜利，其政治影响是很深刻的，它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敌人是可以战胜的！难友们那种坚贞不屈，在强敌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成了“一独”全体指战员学习的榜样。

“一独”建军的头两年，就是这样以其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毅力，披荆斩棘，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坎坷的道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吸取了不少的教训，取得了建军、杀敌、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伟大胜利，以雄健的步伐去迎接新的战斗。

三、从被动到主动的重大转折

从1944年开始，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联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在这一形势下，侵马日军惶惶不可终日，预感到其末日的来临。但它并不甘心于失败，仍在作垂死的挣扎。1944年5、6月间，日军部动员三千多兵力，在雪州各地进行了持续半年穿梭式的扫荡。因而，雪州的抗日武装斗争，仍然处在比较艰难的阶段。这一时期，一独在上级的领导和地方抗日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认真总结经验，扭转被动局面，主动出击，进

一步把抗日武装斗争引向纵深发展。

(一) 健全指挥机构，加强部队建设。

首先是充实了司令部人员。1944年初，马共中共决定由刘尧任一独司令部党代表，(注：刘尧曾一度遭日军逮捕，后在抗日组织的协助下，逃出虎口。)并由彭亨州调刘光前来雪州，任司令部副队长，不久，又从柔佛州调来石韦任司令部队长，原模范中队党代表煎熬被提任为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后由彭少雄继任)，1945年初原第三十五中队队长周洋滨被提任司令部管理部负责人。从此，一独司令部指挥机构逐步健全，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接着，司令部对各中队指挥部成员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并根据实战需要，把活动在北区的第二十九中队调到中区，与模范中队配合，活动于吉隆坡市郊。原活动在南区的第八中队转移到彭亨休整后返回武来岸，为了不让日军乘虚而入，占领农村抗日地盘，司令部从其他部队中抽调了部分人员和武器，以原属八中的独立分队为基础，吸收了一批抗日后备队员参军，于1944年6月间正式扩建了一个中队，命名为“一独”第十二中队，中队指挥部成员是：党代表黄清，中队长乾明，副中队长吴敏，政治部梁洪亮，下辖三个分队，共100多人，活动范围由士毛月、加影直到与森美兰州毗邻的武来岸，还经常抽派流动小分队深入到吉隆坡郊区的公蕉园、蕉赖、新街场等地活动。

由于部队迅速扩大，抗日游击区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培训一批军事干部和群众工作干部。为此，雪州地委和一独司令部共同决定，以“九一”营房为基地，在模范中队的保卫和协助下，于1944年10、11月份，分别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各一期，训练班教员分别由雪州地委和一独司令

部负责。学员从各中队和地方抗日组织中挑选。先后两期学员共32人，分别经过一个月的短期训练后，分配到各中队和地方抗日组织工作，使各中队和各抗日组织的骨干力量得到了充实。

雪州抗日游击区广大农村，经过日军反复扫荡后，从1944年开始，在人民抗日军的支援下，逐步得到了恢复，开始比较稳定下来，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抗日同盟会”组织遍布城乡各地，对支援人民抗日军、打击日特的进犯，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占领期间的艰难环境下，一独指战员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部队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于是，部队的一切行动都从保护人民利益这一大前提出发，把“保护人民，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作为军事行动的基本方针，因而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例如，当时在暗邦一带有两股土匪武装，一股名为“里利队”，约20人，另一股叫做“青龙山”约有50多人，经常出没农村、市镇，鱼肉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恨之入骨，迫切要求抗日军前来将他们消灭。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一独司令部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第二十九中队去完成。中队指挥部立即派出武装小队，在当地抗日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于1944年11月间的一个晚上，当“里利队”的匪徒们抢劫回来蒙头大睡的时候，武装小队悄悄地将他们包围起来，不费一枪一弹，全部捕获，收缴其全部武器后，对作恶多端的为首分子，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处决，其余全部教育后释放。对“青龙山”匪帮，部队会同地方抗日组织首先发动政治攻势，派出代表与之谈判，宣传人民抗日军的宗旨，号召他们改邪归正，共同抗日。经过宣传教育，土匪队伍内部开始分化，一部分人愿意接受抗日军的改编，但为首的头目

则执迷不悟，不肯接受改编。于是，二十九中武装小队于1944年12月间，利用这股匪徒派人下山打劫的机会，将计就计，派人伪装到匪徒指定的地点交款，一举将前来收款的匪徒抓获。另一方面，通过匪帮内部觉悟过来的人员作为内应，潜入其驻地，出其不意，一举冲入营房，匪徒们措手不及，只好举手投降。这一役，共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十余支，手榴弹、弹药等一大批，胜利地完成了清剿任务。至1945年初，雪州的广大森林、农林、工矿区、小城镇，基本上已掌握在“抗盟”手中，成为连成一片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雪州抗日战争的形势，从此扭转了被动的局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二）、军民团结，共同对敌。

抗日军来自人民，群众是抗日游击战争之本。一独在三年八个月的对日作战中，得到雪州人民的大力支援，这是人民抗日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源泉。

由于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华人）在日本侵略马来亚前，已踊跃参加支援祖国抗战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日本在中国残杀人民的暴行切齿痛恨，敌忾同仇。而今又亲身经受着其残暴的统治，更恨之入骨，积极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斗争。全马沦陷后各地纷纷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例如“抗日同盟会”、“抗日军之友社”、“抗日后备队”、“别动队”、“自卫团”、“锄奸团”、“儿童团”……等，并以各种实际行动，热烈支援抗日军打日本。

在农村抗日游击区，“抗日同盟会”的信誉很高。群众有大小事情，都找“抗盟”。许多地方的维持会、自卫团，也改变了它们的立场，表面上是日军派出维持“治安”、为日军服务的机构，实际上是抗日军赖以掩护活动，供给重要情报，为

抗日组织站岗放哨的“白皮红心”机构。由于“抗日同盟会”的工作秘密地伸展到敌占区大、中市镇，许多抗日、爱国、有名望的民族资产阶级，如锡矿家张昆灵兄弟，张尧盛兄弟，实业家廖荣枝等，以及许多行业老板，如陈××等都是热情拥护和支持抗日正义事业，慷慨解囊，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抗日军，同时提供有关敌人活动的重要情报。如张钟灵先生，不怕冒杀头的风险，凭借其平日交游的广博，活动的方便，主动承担起绘制吉隆坡郊区——古打磷日军军用机场平面图，以及侦察机场的军事设施、飞机库、汽油库，出入通道等，供抗日军和英军即将联合反攻马来亚之用。以后虽因日本无条件投降，用不上这些绘好的日军重要设施图，然而作为当时群众不怕死，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事业的动人事例，是值得在此记载的。

当日军围剿抗日部队扑空后，往往赖住不走，在进出山林的路口和农村的交通要道，设关卡封锁，严格检查过往群众，妄图隔绝部队与群众的联系，使部队断粮缺医，饿死山中。许多群众却冒着生命危险，扛起筹集到的粮食和盐或自己的口粮，偷越敌人封锁线，跑十多公里山路，把粮、盐运送给子弟兵。有时把粮食运到秘密联络点后，部队已转移了，群众则把粮食在丛林或洞穴掩藏好，千方百计探知部队的宿营地时，则把掩藏好的粮盐亲自运送到部队或交通站，才放心回家。故每当部队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候，这种冒着生命危险支援部队的动人事例就越多。

为了保护抗日战士，群众冒着杀头焚屋的风险，把受伤或生病的战士安排在家里或在山边建立秘密医疗点，请来可靠的医生看病，群众则送粮送药，轮流站岗放哨，每时每刻提防敌情报员探获告密。每当得到敌人进村或进山搜索的情

报，就迅速带领伤病员转移，对重病号则背着走，一直到战士们养好伤，治好病归队才安心。例如第一分队在古毛遭敌人进攻时，有一位病重的女政工干部无法跟部队撤退，安排在群众家里治病，情况十分危急，这家姓梁的群众把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把她抢救到安全地带，秘密掩护起来为她治病，朝夕不离，直到这位女战士病情稍为好转，又接受部队委托，几姐妹轮流背着她，摸黑跑二十多公里山路，穿过敌人两处封锁线，把她护送到指定的联络点，乘车前往目的地治疗。第八中队撤离南区去彭亨时，留下的十多位病伤员，也是在群众收留掩护下治病养伤，在此期间，曾遭敌人数次进山清剿，每次都是群众冒着杀头危险，迅速掩护撤出包围圈，转移到安全地区。还有，在武来岸的十八碑有一位印籍西医，名叫 Doctor Kam，二年来为第八中队数十名病伤战士义务治疗。

模范中队安排在泗岩末马来族农村治病部分战士，有一次遭日宪兵部特高课 40 多人围捕，武装起来的群众英勇地开枪顶住敌人的进攻，掩护这批病号撤出农村，安全转移，使敌人扑了个空。

由于工作开展的迅猛，抗日工作的深得人心，群众参加抗日组织的人数越来越多，抗日地盘越来越大，在抗日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迫使日本侵略军龟缩在几个大城市据点里，不敢蠢动胡作非为，人民抗日军则在人民的支援下不断壮大。

（三） 站住脚跟，主动出击

过去两年多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群众基础尚不稳固，“一独”一直遭到日军反复围剿进攻，部队在持续不断的反围剿战斗中建立和成长，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到了 1944 年的下半年，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部队才开始稳定下

来，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各中队相继主动出击，杀敌夺武，扩大战果。主要战役如下：

①大港进攻战。

大港是靠近武来岸最大的居民点，日军为了堵截当地群众与抗日军的联系，强迫群众伐木围栅，把整个居民点团团围住，在村内设立据点，派日警长期驻守在那里，在村口设岗哨，在周围构筑工事，严密监视进出的村民。平时日警在村内为非作歹，群众怨声载道。一独第八中队为了拔掉这个据点，为民除害，先是派出侦察小组，由中队长冯明亲自率领，化装成村民，在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通过岗哨，进入日军据点附近进行侦察，作好战斗的部署。在一天的黄昏，当外出劳动的村民陆续返回居民点时，突击组人员化装成村民，把武器藏在木薯秆和薯叶中，混入围栅内，出敌不意，首先缴了一个哨兵的武器，击毙一个企图逃走的哨兵。与此同时，由党代表扬波率领，埋伏在附近的主力乘机冲入围栅，向据点发起突然的袭击。吓得守敌魂不附体，纷纷弃枪夺路逃命，来不及逃走的只好缴械投降。这一次进攻战，仅花了约十五分钟时间便胜利结束，共缴获三十多支步枪和一大批弹药，并抓获汉奸傅××和躲藏在该据点的士毛月维持会会长，没收了据点内的粮食和一批军用物资，获得完全的胜利。

② 智取武来岸警察局

第八中队在取得大港进攻战全胜后，声威大振，敌警胆寒。在这一大好的有利形势下，八中接着向武来岸警察局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派人先找警长谈话，向他宣传日本必败的形势，指出他们的出路只有投向人民。同时，通过群众向警员开展宣传攻势，把三分之一的警员争取过来，化敌为友。

十二月二十二日傍晚，八中派人向警长送去第二次手帖，邀请他在晚上八时率领全体警员到该局侧边的小学校集合，并说明为了避免误会，双方都不携带武器，警戒工作由抗日战士负责，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当晚由八中党代表杨波带领一个分队来到警局附近的小学，在小学附近布置好一个小队埋伏警戒，以防万一；另由中队长冯明率领一个分队越过铁丝网，进入警局附近埋伏，等候谈判成败的信号，随时准备冲入警局夺枪。当晚，警长如约带领全体没有武装的警员集中在小学内，杨波当即向全体警察宣布：抗日军已派大队人马占领了警局，请他们到抗日军营地作客，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就这样，警长和全体警员随抗日军回到营房，受到部队热情款待。与此同时，埋伏在警局附近的战士，接到联络信号，立即冲上警局楼房，迅速收缴了枪架上的全部武器和弹药，计有轻机枪一挺，手提机关枪一支，来福枪三十四支，以及一批手榴弹等战利品。撤离时，抗日军还向警局内外猛烈扫射，把警局打得弹痕累累，制造双方曾发生过战斗的假像，好为警察们脱罪。

这批警察在抗日军部队营房住了十多天，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教育，其中有十多人主动要求参加人民抗日军，不愿留下的都发给一笔安家费，护送他们回家。留队的人大多数是原先已与地方民运组织保持着联系的，其中有几个被调去雪那参加民运工作，其余的安排到武来岸附近农村协助开展民族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都有很好的表现。

③ 那督勘伏击战

1944年6月，三十五中派出武装队伍，袭击、破坏了日本在古毛埠的发电厂；9月间又在古毛埠七条石、大石盘合歼了佯装淘洗锡矿实是企图侦察抗日活动情况的十多名

日本特务。这些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由古毛、叻思等地调集百多名日军围攻三十五中营地，结果扑空，一无所获。以后便派出巡逻队，在抗日部队经常活动的农村地带加紧巡逻，妄图切断部队与群众的联系。为了粉碎日军的封锁，三十五中派出侦察员在群众的配合下，掌握了日军的巡逻路线及其活动规律，决定选择离古毛市镇一英里多的那督坳作为伏击点，于十一月初派出十多位战士组成的小分队前往执行埋伏歼敌任务。小分队抵达预定地点后，埋伏了两天，仍未见敌踪。战士们克服了日晒、蚊叮、饥渴等困难，继续坚持下去。到了第三天近午，一支由十名日军组成的巡逻队，果然大摇大摆地向那督坳走来，其中两个是日本军曹。当日军巡逻队进入埋伏圈后，抗日军小分队一声令下，顿时轻机枪、手提冲锋枪、步枪齐发，密集的火力居高临下，打得日军急忙向周围草丛逃窜，企图负隅顽抗。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后，除一名日军带伤钻进灌木林中逃掉外，其余全被击毙。是役缴获的胜利品有轻机枪一挺，冲锋枪一支，日式步枪五支，以及大批子弹、手榴弹。中队管理部负责人钱锦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二名战士受了轻伤。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全胜。

在那督坳战役胜利的鼓舞下，三十五中于十一月间又派出武装队伍，配合抗日后备队员，破坏了靠近叻思河畔日军管辖的一艘机械化挖锡铁船。1945年春节前，三十五中的二个小分队，袭击了叻思的日军粮仓，动员当地群众一百多人进仓搬走了三百多包大米，分发给当地群众过春节。

④ “士毛月”伏击日军车

刚建立不久的南区第十二中队，在雪兰莪至森美兰公路中段的士毛月附近，伏击日本军车，当场击毙十多名日兵，烧毁军车一辆，缴获十多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

这些军事行动，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士气，壮大了人民抗日军的声威，各个中队在一片胜利的凯歌声中，继续前进。

四、与联军合作，准备反攻

抗战进入1945年，日军大势已去，“东亚共荣圈”的黄粱美梦也已幻灭。人民抗日军与东南亚联军协同反攻马来亚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一独根据上级指示，结合雪州具体情况，对部队进行了新的部署，做好准备工作，迎接反攻，把日本法西斯驱逐出马来亚。

（一） 武装力量的新部署

① 二十九中队与模范中队合并，仍命名为模范中队，作为司令部大本营，便于集中指挥。合并后的模中指挥部成员：党代表肖林，队长：程长，副队长：陈大智，政治部：××，管理部：刘欢。从而加强了由双门丹到吉隆坡东北部的活动。

② 第八中队开赴西海岸，配合地方抗日组织开展雪州西区：巴生、万定、瓜拉雪兰莪、雪邦、龙溪等地群众工作。

③ 活动在南区的第十二中队调去森美兰州，支援第二独立队恢复建队工作。

④ 从各中队抽调一批骨干，以原来第十二中队第一分队为基础，发展和吸收了南区一批优秀抗日后备队员，于1945年4月间扩建了一个中队，命名为一独第八十一中队，接管南区的工作。该中队人数约100人，配备有轻机枪三挺，汤姆生手提机枪二支，士丁冲锋枪三支，以及卡宾枪、来福枪、日式步枪、猎枪、短枪等。中队指挥部成员：党代表：铁强；中队长：迅云；副队长：阿求；政治部：流荡；管理部：阿求兼任。下设两个分队。分队长：李来；分队副：雷青，叶金荣；政治战士：张观胜。以加影为活动中心。

⑤ 普遍采取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的灵活战斗方式，四面开花，打击敌人。不断派出流动小分队深入敌占区，伺机袭击和骚扰敌人，使敌人不得安宁，龟缩在城镇和据点里，没有大部队配合就不敢进入农村、山区为非作恶。

司令部五位领导成员中，除负责管理部工作的领导经常留驻模中大本营外，党代表刘尧、队长石韦轮流巡视北区和中区，亲自指挥各队工作，副队长刘光常驻南区，指挥第八中队，十二中队，八十一中队的活动。政治部彭少雄经常奔赴各中队，指导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掌握干部的培养、提拔和调整。

（二）、黎明前的几场漂亮仗

在这一段时间，第八中队和八十一中队主动出击，打了几场战绩辉煌的漂亮仗。

①、第八中队奉命开赴西海岸发展雪州西区工作，骤然由大森林进入平原沼泽地带，营房用树干和亚答建在水面上，进出通道全靠竹、木搭成的便桥，蚊虫特别多，地形环境极不利于部队驻扎和活动，不得不经常转移营地，流动扎营。在如此艰苦严峻的环境条件下活动，完全依靠革命群众的支持，才能立下脚跟。该中队开抵西海岸后，立即派出小分队袭击日军设在雪邦埠一个大橡胶园的重要情报站。该情报站由五个日本军官领导，其中三个是佐级军官，为首的叫松井，另两个叫成田、井上，他们表面上以企业家身份管理和经营大胶园，实际上是领导这个秘密情报站的工作。邬来、钢钉等几位战士乔装成割胶工人，来到胶园办公室，假装有事找主任，刚好见到成田，他们两人趁日军不备，拔出短枪，当场把成田干掉，埋伏在附近的队员听到枪声，立即冲了进去，制服了几个警卫，接着冲向这几个军官居住的洋楼，不巧其他

几个日本军官都已进城去了。当时正在扫地的一个被日军强抓回来做杂役的十多岁青年，战士和善地向他询问日军存放文件和武器的地方，他知道来的是人民抗日军后，如见到亲人般的高兴，毫不迟疑地领着部队找到日军收藏枪枝、文件的地方，缴获了长短枪各一支，及一批弹药，战刀、药品、文件。同时还把这个对日军满腔仇恨，强烈要求参加部队的少年救出虎窝，带回部队，培养成为一个机灵的革命小战士。

八中胜利袭击了雪邦埠敌人的情报站后，留下一个分队继续在西海岸配合当地抗日组织开展工作，其他队员在党代表扬波、队长冯明率领下，披荆斩棘，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开到莆种、新街场、公蕉园、沙戡一带活动，继续主动打击敌人。在新街场咕腰地方的杨桃园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二月下旬一个早上，据情报员蔡扬芳来报，驻扎在新街场的日军中尉警长率领一百多个日兵和杂牌兵，带了炊具，由乌石仔进入农村，观其动向，是要进入咕腰一带搜索。八中指挥部当即研究决定，采取“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战术，选择其搜扰后回营时必经之路，设下伏兵，来一个突然袭击，杀敌夺武。早上派出人员就地侦察，选择了靠近咕腰一个丁字路口的杨桃园作为伏击地点。中午时间，抗日军抓到了正在咕腰茶店喝茶的两个日本侦察兵。从审讯中，证实了事前掌握的情报无误。部队迅速开到杨桃园，按照已订出的伏击计划，借助矮菁（灌木）作掩蔽埋伏，专候“暮归”的敌兵到来。下午五时，当敌人前头部队三十多人迈着疲困而零乱的步伐进入离部队机枪最有效射击圈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手提机关枪、步枪同时射击，敌人一下子惊慌乱叫，纷纷中弹倒地，没中弹的则夺路逃窜，但在后面的日本军官强迫命令下又转身向抗日军阵地冲来，立即遭机枪、手榴弹截

击，迫得他们又丢下一批尸体向后退缩，几个敌兵以矮菁林为掩护，匍匐向机枪射不到的死角爬来，企图强夺机枪，队长冯明眼明手快，拔出指挥刀，带领几个队员从斜坡一跃而上，趁敌人还来不及起身时，使出少林武功，用过去作战夺得的日本武士快刀，把两个敌人的脑袋先后砍下，其他战士也以刺刀相拼，杀伤几个敌人，一位叫赖行的战士抓住一个敌人的枪把，迫其投降，但这个身体高大的日兵顽强抵抗，转身抱住赖行，两人扭打成一团，情况非常危急，这时党代表杨波迅速跳出掩体，冲上前去开枪把这个敌人的肩部打伤，才肯举手投降。经过三十五分钟的一场恶战，把日军的先头部队杀得七零八落，离战场还有半英里路程的日军队长，闻报先头部队已被抗日军吃掉，以为碰到抗日军主力，怕被包围，不敢前来增援，急忙带领其余残部，趁天还未黑，由另一条路迅速撤返新街场营地。

这一仗共毙伤日军 34 人，缴获各类武器 20 余件。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很大，因抗日军敢于在仅离敌人的心脏——吉隆坡市八英里的地方主动出击，打得敌人尸横咕腰，捷报传开，四方的日军为之震惊！吉隆坡市区和郊区的群众听到后，十分振奋和鼓舞！

战斗结束数天后，八中队在新街场农村召开了一次有一千多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受到从吉隆坡等地赶来参加的群众热烈祝贺！大家都预感到日军的末日已经不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就要到来。

②、第八十一中队于 4 月间建立后，也不甘落后，加紧军事训练，历兵秣马找寻战机，杀敌夺武。下旬的一天早上，加影群众送来紧急情报，由日本指挥官率领 40 多兵力，向八十一中队驻地双溪弄红毛胶园方向进军，看来是想袭击中

队驻地。中队指挥部研究，认为这是杀敌好机会，决定打伏击战，把敌人吃掉！派出号称神枪手的分队长李来，带领20多个战士，配备轻机枪、手提冲锋枪和步枪，占据有利地形，伏击这股敌人。

日军很狡猾，在熟识山路的走狗带引下，绕过部队交通站，悄悄向抗日军驻地前进。他们万没想到抗日部队已设下罗网。当敌军进入伏击圈时，伏击队以密集火力迎头痛击，日军指挥官与先头部队纷纷中弹倒地，后面跟上的敌人，遇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又看见指挥官倒地，群匪无首，失去战斗力，边开枪边逃窜，抗日军则以猛烈火力追击。经过三十分钟的战斗，毙伤敌军十人，其中击毙日指挥官一人，缴获长枪七支，以及子弹、手榴弹一批，抗日军也有一位新入伍战士因暴露目标，不幸中弹光荣牺牲，经此一战，日军以后不敢贸然进山搜扰了。

六月初，由李来率领第二小队长和一名战士，在沙戡花果园半路，伏击该试验场日军车。等了好久，只有一个日本军官骑摩托车驶来，被开枪击中，该军官虽受重伤，仍开足马力逃走，大约走了八公里才坠地身亡。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由中队政治部流荡（罗深）带领分队长雷清奔赴双波日警察局，收缴该警局的武器。这是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该警局的局长和部分警察知道日军大势已去，经地方抗日组织派人与他们接触做工作，警长以及他的几个亲信愿意协助抗日军清缴该警局武器，而且约定当晚行动。

流荡、雷清两人在群众情报员的引领下，来到预定地点——警局后院墙边的一间小屋，会晤了警长，向他说明大部队已包围了整个警局，但保证他与他的几位亲信的安全，要他

们把警局内的枪支收集到门外操场中央，听候命令，不准乱动。流荡、雷清两人则奔向东北角的阁楼，收拾该警局的一个日本指挥官。只见这个肥头大耳的日本军官，正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右侧傍着一支长枪，裤带插着一支发亮的日式曲尺短枪，不时发出粗大的鼾声。他俩踢开房门，箭步冲到床边，日本军官从梦中惊醒，手摸腰间短枪，但流荡、雷清射出的两颗子弹，已结束了他的生命。他们夺到一长一短枪飞奔下楼，赶到操场，情报员已与警长等六人把十二支长枪收集在操场中央，并回转到宿舍向听到枪声惊醒的十九个警员做宣传工作，叫他们不要害怕，要听候指挥。

二十六支枪，全部收缴到操场后，机灵的雷清迅速把枪支的撞针卸下，用随身带来的绳子系在腰间。流荡则向集中在操场的二十四个警察宣传抗日宗旨，号召他们不要替日军卖命，要安份守己，协助抗日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并宣布愿意为抗日效劳的警长和六位警员上队参军，其余的警员则发给路费、伙食费、安家费回家另找工作。

这场清缴双波警局枪支的行动胜利结束了，流荡、雷清领着六位愿意跟随部队的警长和警员，背着二十六支长短枪，踏着胜利的步伐返回营房。

其他中队，也采取多样活动方式，袭击日军巡逻队和敢于进村搜扰的日兵。不断袭击日军据点，严重动摇了日本统治者的军心，取得不少成绩。

（三）、建立公开队（新队）

为了执行与联军东南亚总部签订的联合反攻马来亚的协定，“一独”由1945年初开始筹备建立公开队的工作，由各中队组织若干小分队，离开大森林基地，开进农村、工矿区和橡胶园。在开展军事活动的同时，协助地方深入开展群

众工作。发展组织“别动队”和“后备队”，加强军事训练，吸收优秀队员参加抗日军，为建立公开队输送新鲜血液。至六月间，各地吸收的新队员已达500多人。

四月间，一独组成了与联军合作的公开队司令部，由原来几个中队抽调部分骨干和战士共200多人加强公开队的建设。至六月间，公开队编成五个中队，番号为第一独立队第一、二、三、四、六，五个中队。（注：以后经整编、合并，至复员时实为四个中队。）公开队指挥部不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只有正、副队长和管理部，分队则设正、副分队长和管理员。

（四）、接受空投

一九四五年初，一独司令部为了迎接联军空投人员、武器、军用物资，曾作了特别部署，在间津山建立一个特别分队，负责保护联军首批空降人员及其装备物品的安全。

五月份，联军开始用B24型远距离轰炸机分批空投人员、轻武器及其它军事装备到雪州几个空投地点：①双门丹与万挠之间的河沙坝（开采锡矿后遗下的广阔沙滩），②叻思与新古毛埠之间的河沙坝，③吉磷，④间津和鹅麦。每次空投前都先通过无线电与驻在印度的联军东南亚总部联系好时间、地点和地面引降标志（一般用篝火为号）。

在双门丹的空投次数最多，由抗日军派出武装队员警戒，动员群众协助搬运；叻思和吉磷各空投三次；间津、鹅麦各空投一次。初次空投的时间是在5月30日午夜12时左右，英军首批空降人员和一批武器、弹药、粮食、药品、无线电收发报机，及其它军需品，分别在间津山和双门丹、万挠之间河沙坝降落。这批空降人员是中校布洛赫斯特，空军上尉鲁宾逊，华籍翻译员、情报员是梁愈明（梁操政）、黄奕霞、

余明德，无线电通讯员汤少山。后来黄奕霞担任第一中队军事教练。7月10日和7月28日空投武器、物资时，先后又有华籍电讯人员两人降落，他们的名字是谢金栋、秦文英。

空降初期，英籍联络官把武器、粮食……等收归己用，不愿意执行原先双方总部签订的：“英军向抗日军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和军需供养，抗日军有义务配合英军反攻马来亚”这个协定，不愿把良好的武器来装备抗日军。及至后来多次受到日军搜扰，始发觉他们的活动和宿营，如果没有抗日军的保护，则寸步难行，才不得不转变态度，开始提供抗日军军事装备。抗日军获得空投的军事装备后，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军心振奋，战斗意志风发，枕戈待旦，期待着反攻马来亚这个日子的到来，决心把日本法西斯驱逐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五、日本投降，抗日军挥泪复员

1945年5月，苏军和英、美联军攻克法西斯大本营——柏林，罪魁希特拉自杀身亡；苏军乘胜挥师远东打击日本法西斯，协助中国解放东北，消灭了日本主力关东军；英美空军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大势已去，走投无路，被迫于1945年8月15日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根据上级的命令，经过三年八个月抗日浴血战争中建立起来，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独主力部队（老队）就地复员解散，人员分别安排到各条战线，开展群众工作。新建各队（新队）则开赴城市。

8月20日，一独各中队在英军返回马来亚前，便进驻各大、中城市。当时，第一中队进驻吉隆坡，管辖暗邦、蕉赖、沙叻秀、新街场、蒲种、沙登、文良港、甲洞、间津、石

山脚、淡江、泗岩末各镇；第二中队进驻加影，管辖武来岸、加蕉、士毛月、龙溪、呀屹、双溪弄等镇；第三、五中队进驻巴生，管辖巴生港口、万津、摩立、瓜拉雪兰莪、双溪威等镇；第六中队进驻新古毛和万挠，管辖煤炭山、双溪丁宜、双门丹、顿巴央、乌鲁音、叻思、吉磷、隆邦等镇。

当部队排列着整齐队伍，扛着各种武器，雄纠纠气昂昂地唱起革命歌曲开进城市时，受到各族人民的夹道欢迎。部队进城后，立即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维持社会治安

抗日军进城后第一个任务是镇压敢于趁机抢劫、杀人越货的坏人，维持城市治安，保卫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和工厂复工，维护了城市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二）、严惩叛徒、汉奸、走狗、土匪， 没收和看管敌产，赈济贫苦人民。

日本宣布投降后，但尚未放下武器时，雪州地委已派人进入敌宪兵部特高课，向部分不愿顽抗到底的叛徒、走狗做工作，要他们当机立断，趁早携带武器，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人民投降，立功赎罪。当时有十多个叛徒、走狗携械到暗邦的新芭和间津向部队缴械投降，获得宽大处理。对那些不表态，不缴械，坚持顽固立场的，部队进城后，即在群众的配合下，坚决镇压，如在吉隆坡镇压了日本特高课负责人之一、大叛徒小青（新辉）、小龙（叶自雄），在暗邦镇压了大走狗“滑哥头”；在新古毛镇压了反动的维持会长及其儿子，并把躲藏在巴生的大汉奸叶德汉，抓回古毛处决。

曾被一独第二十九中队清剿暗邦青龙山时漏网的一批匪徒，听到日本投降消息，竟捷足先登，进占了沙叻秀警察局，

仍然干着抢劫老百姓和奸淫妇女的强盗勾当，英军曾派出巡逻队进剿，但被他们拦腰截击，失败而回。为了保卫该地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持地方秩序，第一中队派遣一个分队，在一个夜晚开车去沙叻秀巡逻，一部分队员在靠近沙叻秀镇时先下车，静悄悄地步行前进，在靠近该警察局的店铺两侧设下伏兵，让巡逻车直接驶向警局前大街巡逻，以引诱该批匪徒出来袭击。当这批匪徒走出警局袭击巡逻车时，埋伏在警局附近的队伍即从左右两侧冲出，猛烈开枪射击，断其后路，当即把这股强盗头目之一的刘××以及几个匪徒击毙，其余的则四散逃命。

另一个分队进驻暗邦警察局后，即发动群众，打开日军谷仓，把谷仓里的粮食、罐头食品，搬出来赈济农村和城镇中的贫民。

抗日军进域后采取上述种种爱民措施，获得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各城镇人民在抗日军维持秩序和保卫下，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复工，学校筹备复课，人民带着喜悦心情，各自做他们应做的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三)、保卫民主团体的建立和活动

抗日军进城后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护卫雪州人民委员会、马共办事处以及工、青、妇、商联、文联等人民群众团体，以及民主报刊的建立和活动。

各中队进驻吉隆坡市及雪州各中、小城镇后，雪州地委（后改为州委）即着手筹备在吉隆坡建立马共雪兰莪办事处、雪州人民委员会，并号召和组织各地群众，以城、镇、乡为单位，分别召开各行业、各阶层人民代表会，选出各地的代表，参加成立雪兰莪州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各地纷纷成立各行业工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业联

合会等社团，并由他们选出代表参加先后成立了雪兰莪的总工会、青联、妇联、商联、文联会，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为争取马来亚的和平、民主、独立而斗争。

(四)、抗日军挥泪复员，“退伍同志会”的成立

1945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代表刘尧向全军宣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解散。”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抗日军全军指战员很不理解，思想混乱，纷纷责询上级，为什么抛弃了马共中央1943年颁布的《抗日九大纲领》的第一条：“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和第五条“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改编为国防正规军”？

得到的是令人难于理解的解释：“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马来亚人民也要求和平，今后的斗争是争取合法地位与英国开展和平的政治斗争。”

这些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很难说服全军指战员。但为了服从上级命令，只好按规定的、令人遗憾和难忘的日期——1945年12月1日，带着疑惑、沉重、悲愤、失望的心情，排列着参差不齐的队伍，挥泪把紧握了三年八个月用于打日本鬼子，保卫马来亚人民的武器，一件件交给英国殖民统治者。马来亚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被英帝国夺去了！

雪州抗日军复员后，同时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雪兰莪州会”，全体抗日军指战员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总会”的领导下，走上了和平民主运动新的征途。

本文撰写及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张 竹	亚 竹	冯 明	陈 六	扬 波
老 铁	流 荡	排 超	张 维	吴 丹
李 干	叶素娟	陈忠秋	贺逢春	郑天海
邓 秋	陈大智	杨碧芳	高碧峰	陈小明
梁玉萍	叶森磷	叶 海	叶伟秋	吴少强
刘忠峰	英 年	黄秀玲	吴连枝	刘子英
叶正忠	少 光	李 忠	邬 忠	王 静

（第一稿由陈六、冯明执笔，第二、第三稿由阿竹执笔整理。）

(二) 活跃在森美兰州的一支 抗日先锋——第二独立队

一. 概 况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以下简称二独），由马共霹雳州和星洲派往英军 101 特别训练学校训练的党员干部为骨干，于 1941 年 12 月 31 日在新加坡由马共中央命名成立，然后北上至森美兰。1942 年 4 月与马共森美兰地委建立的地方武装队伍汇合正式建队。她是在马共领导下，活跃于森美兰州的一支抗日部队。

森美兰（Negeri Sembilan）是马来语“九”的意思，过去境内原是九个小邦，后来九邦联合成为一个州，森美兰州的命名就是这样来的。

森美兰州位于中马南端，毗邻柔佛北部，雪兰莪州南部和彭亨州西部。是马来亚内陆较小的一个州，面积 2,580 平方英里。东北部多是原始森林、山岭，南部丘陵，西部临海。森美兰州首府设在芙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人口三十六万七千多人，其中马来人、华人各在十五万人左右。其余六万人为各籍人。工农业经济以种植橡胶为主。橡胶工人多是华人和印度人。马来人大都从事农业。马共森州党组织基础在胶工中较好。1930 年马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瓜拉庇拉胶园召开的。1934 年马口胶工大罢工，在马来亚工运史上是很重大的一次事件。马来亚沦陷后，胶业停产，工人都纷纷转业谋生，其中许多华工离开胶园奔向山区垦荒种植，出现了不少临时性的农村，有的胶工则参加了抗日军。

森州马来农村多，位于山边平原或沿河两岸，农民以种植稻谷、捕鱼为生，过着半自给的生活，他们对日本侵略起初认识模糊，存有幻想。战争初期，有些人被日军利用，有的还告密或带路进攻抗日军；华人农村人少而分散，有些和马来村相连。他们以种蕉果、农副产品为主，日本侵马后才改种稻谷杂粮。森州党在马来农村和沿海地区没有群众基础，仅在东北区的知知港、葫芦顶、瓜拉庇拉、马口、冷甲、冷宜和芙蓉郊外的小甘密、沉香岛等地的华人农村有党的组织。在华人较多的知知港，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影响很广，群众经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因此在日本侵略马来亚后，吉隆坡沦陷前，森州党就在知知港建立起一支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为“二独”正式建队创立了良好条件。

“二独”建队初期，面临日本“检证”大屠杀，全州惨遭杀害的群众共三千多人，致使扩军和供给出现种种困难，但他们并未被日军的残暴所吓倒，为了保卫群众的利益，仍然坚持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主动袭击日军，反击日军围剿。在敌强我弱，抗日军尚未成长的头一年里，他们与日军发生大小战斗不下二十次，毙伤敌100余人。斗争是十分激烈和艰苦的。直至1943年6月，群众基础遭受严重破坏，“二独”才奉马共中央命令东撤至西彭亨，与西彭抗日游击队合并，建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到1944年末森州又恢复“二独”建制，重燃武装抗日斗争的烽火。他们为捍卫森美兰州人民的利益，为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下面叙述“二独”的队史，这是一篇森美兰州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史。

二. 知知港是森美兰州游击队的策源地

知知港 (Titi) 是森美兰州一个偏僻的小埠，四面森林环抱，有公路通达首府芙蓉和葫芦顶、瓜拉庇拉等地。大森林东接彭亨文积，北接雪兰莪武来岸，是一块面积宽阔的盆地，也是游击队活动较为理想的据点。市内有一百多间商店，人口约七、八千人，其中华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以种植橡胶、香蕉、菠萝、木薯为主。有几个华人经营的小锡矿和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挖锡铁船，共有二、三百华籍工人。马来人约有五、六百人，以种植稻谷，捕鱼为生。自中国抗战爆发后，知知港的华人在马共森州地委的组织与领导下，在农村、胶园、矿山都建立了“华侨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抗日情绪异常高涨，是森州马共和群众基础最好的地区，因此日军侵马、吉隆坡未沦陷前，这里的群众响应马共的号召，着手组织抗日游击队。首先由森州地委在高杯山公路边的橡胶园召开了群众抗日动员大会，提出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主张，获得群众热烈的响应与支持。次日，即派出宋志群、林中木、钟光三人在双沟罗丹育德学校设立参军报名办事处，不到二天，报名人数多达数百人，从中挑选出合条件的二百多人，组成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与此同时，瓜拉庇拉港尾也集中了四、五十人，准备成立武装队伍。

队伍集中后，首要任务是收集枪支和筹备粮食。当时形势很紧张，英军在霹雳仕林河阵地被日军击溃后，吉隆坡的英军开始撤退。知知港的警察已经逃走，把所有的来福枪毁坏，连同子弹丢弃下水塘里。森州的英国华民政务司曾来过二次知知港，通过当地侨领找到当时马共区委负责人斯科和

黄爱平，说英军准备打山地战，要求共产党派出十名熟悉山路的健壮青年作响导。后又与马共森州地委联系上，答应提供一些枪支、粮食。但抗日组织按预约在相隔两天后派人去找他时，那位华民政务司和芙蓉政府机关人员已逃之夭夭，警察也解散了。抗日组织随即派出几十人，并从锡矿场借来二部货车，分头开到日叻务、芙蓉英殖民政府的粮仓搬运石灰米，共运回一百多包，同时收集了十多支枪，其中六支来福枪是从当地警察逃走时丢下水塘捞起的烂枪，其余猎枪是群众捐献的。

队伍成立时设总指挥部，由地委、区委抽调人员组成。地委派亚山任党代表，亚铁任队长，亚海任副队长，政治部中木，保管部老何。编成二个中队：第一中队党代表老陈，队长宋志群，副队长曾忠，跟随总指挥部驻扎在突岭山营地；第二中队党代表黄爱平，队长斯科，副队长罗木，驻扎在船子头山中。在船子头村，还有七、八十名由雪州地委刘石（廖贯天）带领的队伍，多数是雪州党的骨干，有少数是学生和文化教育界人士，他（她）们原拟撤退到武来岸加蕉山，后因形势紧迫，途中受阻，被迫临时改变主意，先撤退到知知港，待恢复联系后，走山路返回武来岸（知知港突岭山与武来岸加蕉山相连）。

总指挥部成立后，除进行初步的军政训练外，还派人锄奸，消灭汉奸、印奸多人；在市镇、农村组织抗日同盟会，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支援游击队；他们还从团结抗日和爱护友军出发，收容了七、八十名从霹雳仕林河战败走散的英、澳官兵（其中有几名校官）和廓尔喀兵，给他们提供伤病治疗和生活服务，并派人分批护送他们回金马士英军阵地（当时金马士尚未失陷）。1942年3月18日，日军在知知港余

郎郎村进行大屠杀，被杀害的群众共一千六百多人，如民运干部赵全（赵佛祥）一家被杀了十二人，只剩下父亲、婶婶。刘石队伍的亚明（即王民）在路上被惨杀，丢下水塘里，事后发现将尸体捞起来时，他右手还高举着，紧握拳头，可看出他在临牺牲时，还在呼喊抗日口号的。当日军屠杀余郎郎村村民时，部队尚在突岭营地，不了解情况，派出一个小队侦察，走出村边凑巧与日军相遇交火，逼使日军赶紧撤出余郎郎村。接着部队在山边救出十多户村民，使数十名群众免遭日军屠杀。接着又派人抢救被杀伤幸存的群众共二十多人，用担架抬回营地，搭起简易医疗所进行治疗，有的治好了，有的抢救无效死亡，如有一位老人全家被杀，只剩下自己和一个男孙，男孙胸膛被刺了七、八刀，伤口随着呼吸溢出脓液，不到一周便死了，老人泣不成声，由于思想打击太重，以后变为痴呆；有的治好後，安排到别处农村居住。这个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知知港人民是世代难忘的。

三. “二独”的军事骨干来自霹雳和新加坡

（一） 军事骨干的集中与“二独”的诞生

日军入侵马来亚后，英军节节败退。只是在这危急的情况下，英殖民当局才被迫同意于1941年12月18日与马共达成联合抗日协议，释放全马政治犯，同意马共选派干部到新加坡英军主办的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游击战训练，以便到敌后组织游击队伍。马共于12月20日在新加坡就地选派出第一批15位骨干参加受训。12月下旬马共中央书记莱特来到霹雳州抽调第二批人员，在双溪古月街场背一间白铁屋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除霹雳地委委员外，还

有准备派往新加坡受训的骨干十多人。会议开得很匆促，主要是传达中央与英当局达成的协议，和确定受训人员的名单，会议只开了一天就结束了。

参加受训的人员于26日下午在金保东兴港路红船村一间学校集中，(连同撤退去新加坡的女同志共有40多人)，当时怡保告急，怡保至吉隆坡的火车已停开，整队人从金保骑单车到吉隆坡。在途中因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在仕林河学校住了一夜，29日上午抵达新加坡芽笼马共中央交通站。

第二批人员到达交通站时，因第一批派去受训人员尚未结业，便留在交通站学习了三天。12月29日下午开始学习，由中央常委委员黄诚主持，亚宁协办。莱特作动员报告后，由黄诚讲课，内容有：马共党史；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马来亚抗日形势和与英军合作抗日政策；抗日军任务与党军关系等问题。

学习结束进入101学校受训前，中央将这批来自霹雳的人员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并任命黄国平为司令部党代表，队长赖莱福（杜龙山），副队长刘冠文，政治部廖德（曾权），管理部马丁（曾冠彪）。在101学校学习期间，中央通知又将赖莱福调整为党代表，黄国平为队长，马丁为政治部，廖德为管理部。

由霹雳州派来新加坡受训共39人，抵达交通站次日，中央抽调了15人（以汤国柱为组长）返回吉隆坡学习情报工作。事后据汤国柱（此人于50年代返回中国，1980年病逝于广州）说：他们回到吉隆坡只学了几天，因形势急转便解散了。他和几个人跟随雪兰莪州刘石（廖贯天）的队伍撤退至知知港，另一部分人返回霹雳州去了。参加101学校受训的人数，因从霹雳州调来的人员中抽了15个人学情

报，当时中央考虑人数不够，临时在星洲抽调了六人来补充，共30人，其中霹雳州的人员有：赖莱福、黄国平、刘冠文、马丁、廖德、邓昌、徐国保、胡力、李明（李侃）、刘白、林明（林润）、关友（吴群威）、丘瑞华、黄东安、邹育林、张天带（张佐）、汉飞、徐达、老冯、钟萍、克力，亚唐、陈亚毛，徐根本，星洲的人员有：陈庆（陈文庆）、汉元、汉臣、绍宾、友重、朱裕。

（二） 在新加坡101军校受训

“二独”的骨干于1942年1月1日进入101军校学习，该校所在地原是一间犹太人别墅，位于西海岸裕廊的海边。学校的训育长叫查普曼，当时他不在校内，还有几位英国教官，原怡保警察局长台维斯，在校内担任联络工作。参加学习的人员因通晓英语的人少，由赖莱福当翻译。

学习内容武器常识；步兵基本动作；游击战术；爆破技术；学完一项后就进行简单的射击和投掷实习。

学习原定半个月，因日军进攻急速，缩短为10天，学习结束时，学校当局要设宴欢送，因配给的武器数量太少，又陈旧，大家拒绝参加宴会，以示不满，经过一番交涉才解决。发给的武器计有：英式风机一挺，轻机枪二挺，汤姆生手提机枪10挺，左轮手枪15支，菠萝式手榴弹60箱（每箱12只），黄、黑炸药，雷管，引线一大批，还有石灰米，罐头等食品。宴会结束后点收武器离开该校回到芽笼交通站时已是晚上十一时了。

四. “二独”军事骨干转战敌后

(一) 滞留在森美兰淡边

哥岛山扩充了力量

“二独”30名受训骨干于1942年1月11日分乘二部军用卡车，向炮火纷飞的前线出发，沿途歌声嘹亮，情绪高昂，同垂头丧气往南撤的英军成了鲜明对比，也使不少英军士兵和沿途老百姓感到惊异！下午四时多抵达森属淡边镇，原定要继续前进，乘坐吉普车前头带路的英军联络官台维斯看见大批炮车、坦克后撤，便停车截拦后撤的军车了解前方情况，得知吉隆坡已失守，日军正向森州首府芙蓉推进（芙蓉距淡边20多英里），他十分恐慌，要求全体队员立即将武器搬下车，自己乘卡车掉头星夜溜回新加坡去了。

“二独”受训成员原定是返回霹雳州的，没想到滞留在森州的淡边镇，困难之大之多，可以想见。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决定当晚先把武器、弹药等搬到山边找隐蔽的地方藏好，次日派人到淡边镇了解情况。当时谣传日军晚上进占淡边，商店都关了门，居民跑光，队伍除派几人看守武器外，其余的人携带短枪和手榴弹化装成难民走到街上，叫开一间杂货店，买了几十包饼干充饥，然后问路向难民所走去。

队伍在难民所住了四、五天，才找到当地党组织与马共马六甲市委关系，决定暂时转移到马六甲野新。（按：野新不属柔北，而属于马六甲，但抗日武装属三独管理，当时马六甲地委亦集中一批人在野新）。在野新农村住了七、八天，一月下旬中央决定“二独”在森美兰州活动，他们就返回淡边，在哥岛山建立营地，把队伍编为三个中队：一中党代表李明、队长徐国保，二中党代表张天带、队长汉飞，三中党代表陈

庆、队长邓昌。因为人数不多，中队下不设分队，只设小队，小队队员有一部份是当地胶园吸收的琼籍华人。在哥岛山营地主要组织人力把存放淡边山边的武器运回来，同时也过军事生活，派人放哨，到农村运粮，上午训练、下午学习。初时由于队员不习惯军事生活，有些队员闹无原则的民主，不服从指挥的倾向，经过教育才逐步克服过来。在这期间“二独”司令部还派人化装成群众到淡边镇和公路边刺探日军军情，试图爆炸日军军车，但条件不具备，未行动。

淡边是森美兰州与柔佛州接壤的界镇，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公路南通新加坡；北通檳城、吉打；东通彭亨关丹、吉兰丹；西通马六甲，因此日军格外戒备。加上淡边周围多是马来人居住，他们受日本人的欺骗宣传，觉悟较低，以致部队粮食供应非常困难，每天靠吃杂粮充饥。由于营养不足，又住在潮湿和瘴气密布的森林中，缺少阳光，生癞疮的不在话下，不少人还患上疟疾，使部队战斗力受到影响。

为了改变环境，一月下旬司令部派人找到了瓜拉庇拉党区委的联系，约好了庇拉党组织派人打通庇拉至哥岛山山路，并协助先将武器和队伍转移到瓜拉庇拉港尾，然后设法到知知港，同时还派党代表赖莱福，走公路到知知港找寻森州地委关系。队长黄国平则带了一批人到淡边山加紧把武器运回来。赖、黄两人走后次日，瓜拉庇拉区党委派来肖兆麟，亚禄，刘三（即颜兆基）、符钦等三十多人从山路走来，说是来带“二独”队伍和帮运武器到瓜拉庇拉港尾营地去。因赖、黄二人不在而不敢决定，至第三天（即二月四日）中午，交通员发现山下铁路边有几个形踪可疑的人，误以为营地已被敌发现，立即派人来营地报告。当时因没有情报工作经验，未加认真研究，同时因队伍初建，在当地没有群众基础，为了

免遭日军进攻，因此决定当天下午撤走，由瓜拉庇拉来的交通员带路，先转移到瓜拉庇拉港尾营地去。

(二) 转移瓜拉庇拉营地， 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

由哥岛山至瓜拉庇拉港尾营地要走一天多山路，在行军中由于带路交通员迷失了方向，竟走到离瓜拉庇拉镇只有几英里的公路边，考虑到走山路已无把握，决定在夜间走一段公路，然后绕过瓜拉庇拉镇至港尾营地。

队伍在下半夜二、三点出发，走了二、三英里，巧遇一部敌军车经过，队伍立即散开隐蔽，待敌军车通过后，继续向前走。由于天黑能见度小，又没有夜行军经验，队伍脱节分成两批。前一批跟随副队长刘冠文和管理部廖德，走到离瓜拉庇拉不远转入胶园走小路，至瓜拉庇拉郊外时已拂晓。因携带长武器不便白天行军，便将武器收藏在胶园的草蓬里，人员走出公路到港尾交通站。政治部马丁带一批人，因没有交通带路，至天亮时将长武器藏在路边丛林中，人员也从公路走到瓜拉庇拉镇，凑巧在街上碰见交通员亚禄，把队伍带回港尾交通站。由于思想麻痹和缺乏经验，武器没留人看守，约上午八时多，发现放在胶园的武器被敌奸运到瓜拉庇拉警察局去了，并摆出来展览。为了夺回武器，司令部与区委书记陈群（邓福龙）商量，决定攻打警察局。当时队伍武器配备不多，除取回第二批收藏在路边丛林的武器外，当地队伍也有几支来福枪和猎枪。

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是在1942年2月7日上午10时左右进行的，后称为“瓜拉庇拉二·七事件”。攻打部署分为五个小组，每组4—5人，其中两个组担任两头路口警戒，

防止日军增援，两个组冲入警察局内夺武器，一个组在警察局外掩护撤退。同时考虑到白天袭击，易暴露目标，先把武器放入麻袋、竹萝内，分组用单车运入镇上，然后潜伏在警局周围，待下令后出其不意冲入警局夺枪。由于初战没有经验，有一组还没有到达潜伏地点，便擅自呼喊冲锋口号，有些组听到也跟着叫喊，结果引起日军警觉，当队伍到达警局门前时，日军即先发制人开枪射击，刘副队长举起手提机枪奋不顾身还击，刚打完第一盒子弹便中弹倒下，马丁在旁边拿过其手提机枪伏地继续向日军扫射，因警局前面无掩护物，日军火力很强，双方交火约十分钟，始终无法冲入警局，加上在白天不利久战，最后只好下令撤退。撤退时，日军似欲追击，被投掷了一颗手榴弹才止步。

战斗结束后，队员先后回到港尾交通站，查实除二人轻伤外，另有三位战士牺牲。一位是副队长刘冠文，（揭西县河婆人、出身农民，家住霹雳朱毛农村、马共党员，对党的事业忠诚，工作刻苦耐劳、战斗英勇，牺牲时年约三十岁），另一位是姓张的海南人（当地胶工，马共党员，脸上长有一粒乌痣，大家叫他乌痣张，他在交火中向前冲时中弹，牺牲时年约25岁。）还有一位是当地参队的队员，记不清其姓名了。事后了解，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也有死伤，但数字不详。

这次战斗在军事上是完全失败的，但在政治上却有收获。群众纷纷传说是联军反攻，后来知道是抗日军所为，又赞扬抗日军的大胆和英勇。在当时沉闷的气氛下，对提高群众斗志，无疑起了鼓舞作用，给了群众一线光明的希望。

港尾交通站位于瓜拉庇拉市三四英里的公路旁，区党委集合了三四十人准备成立抗日队伍，临时营地设在交通站后半英里多的山坡上，攻打警察局后，当地和“二独”的队

伍都集中在此营地。交通站因攻打警察局时暴露了目标，隔了二天日军就前来包围，交通员符钦被打死，还有一位队员（似名金本）受轻伤逃脱了，房屋被烧毁。过二天日军又动员百多人进攻营地，幸得队伍早有准备，发现日军来进攻，迅速撤回淡边哥岛山营地。

（三） 队伍辗转哥岛山 至知知港突岭营地

队伍撤回哥岛山之前，黄国平已回到哥岛山营地，赖莱福也从知知港回来，他们对队伍匆忙转移和丢失武器有意见。当时森州地委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二独进驻森州的决定不了解。因此队伍继续留在哥岛山活动。在这期间除总结攻打瓜拉庇拉警局失败的教训，（包括建议中央给刘冠文开除党籍处分，马丁、廖德未予阻止应受警告处分）加强军事训练外，还派人配合当地抗日组织在华人农村、胶园开展群众工作。至三月上旬营地又遭日军进攻，一中队党代表李明在哨站外教练手枪时发现日军，立即反击，不幸受伤被俘，队员徐达轻伤逃脱。日军进攻未达到其消灭“二独”的目的，不久便在淡边、冷宜、冷甲、瓜拉庇拉一带的胶园、农村进行绝灭人性的大屠杀，被杀的华人共千多人，其中冷宜有些胶园的工人全遭惨杀！群众在日军的白色恐怖下，幸存者纷纷逃离胶园，农民逃入山里，造成粮食供应异常困难。后派人再与森州地委联系，决定队伍离开哥岛山转移到知知港。当时除留下小队长胡力和队员二人照顾三名伤员外，其余人员，身体健壮的携带武器弹药走山路到知知港，体弱的战士化装群众走公路。整个队伍是在1942年3月18日知知港余郎郎村大屠杀前后，分批先后到达知知港突岭营地的。

五. 依靠地方群众力量，

在知知港正式建队

(一) 结合地方游击队，壮大武装队伍

“二独”骨干到达突岭山时，加上当地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共有三百多人，初时因统一领导问题意见不一致，未能统一建队，后获中央指示：当地的抗日武装队伍除指挥部和中队的地委、区委人员调回原岗位外，其余人员编入二独。“二独”结合了强大的地方部队后，四月份便在突岭营地正式建队，人数共230多人，编为二个中队，司令部人员不变，副队长刘冠文已牺牲，由邓昌接任。刘石带领的队伍返回武来岸，派小队长佐明带领十人打通了突岭至武来岸的山路，并恢复了与雪州抗日组织的关系后，他们行军到加蕉山，不料遭日军伏击，打了一仗，被困在山中数天，后来被迫撤回突岭营地。刘石不久病死在山中，其队伍一部分从公路返回武来岸，一部份编入“二独”，少数调往外地工作。

(二) 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

1942年5月中旬，马共中央在柔北三合港召开中南马高级干部会议，朱佬、亚乌以中央交通名义来知知港通知森州地委书记亚里（罗须磨）、“二独”党代表赖莱福两人参加。据他们会后回来向森州地委和二独司令部传达：莱特在会议上分析了全马沦陷后的形势，提出“保存力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的方针，并指责各独立队袭击日军的战斗为“冒险”行动，暴露了目标，招致日军进攻，向附近群众报复，吓跑了群众，造成孤立。同时还强调武器弹药来得不易，不能随便消耗。谈到“二独”进攻瓜拉庇拉失

利一役，他特别愤慨，对牺牲了的副队长刘冠文予以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事后无正式通知不了了之）。并勒令解散第二独立队，把武装收藏起来，队伍分散到各地做群众工作。当时司令部成员听后都不满意，认为目前敌奸在农村横行，如无武装力量，徒手做群众工作等于自杀。因此未认真执行，祇是抽调了一部份队员到农村协助当地抗日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将中队缩小为分队。这一决定得到森州地委的支持。

在这期间，队伍处境异常困难，来自内部的压力是：莱特勒令“二独”解散；外部的压力是：日军屠杀余郎郎村后，发现突岭山有游击队，常派兵到知知港搜扰，有时到余郎郎村用迫击炮轰击突岭山，以致粮食物资供应只能由梨望、葫芦顶走山路远道运来。因供应不足，每餐只吃木薯稀粥充饥。由于缺乏营养，疟疾、伤寒等疾病蔓延，患有疟疾，烂脚的人约占队伍总人数三分之一。剩下三四十名不愿归队的英澳兵，因经不起丛林的艰苦生活，除少数私自出外找吃，被日军逮捕外，大部分患上疟疾、伤寒而病亡。

“二独”在上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将二个独立分队，一个转移到梨望山；一个跟随司令部转到葫芦顶，不久又派人到马口，芙蓉小甘密筹建队伍，同年6月下旬，中央派蔡克明和朱佬两人来了解“二独”的情况，司令部向他俩汇报未执行中央解散部队的原因与实际情况，他们听后亦表示同意并加以赞扬。因此“二独”重新得到中央承认，才继续保存下来。

六、“二独”的编制和队伍分布情况

“二独”在淡边哥岛山初期成立了三个中队的架子，人

数50多人，1942年3月到达知知港突岭营地，当地抗日武装编入“二独”正式建队时，中队重新调整为二个队，人数230人。1942年6、7月间，受中央柔北三合港会议的影响，抽调了一百多人开展群众工作，缩编为二个独立分队。到1942年10月增至五个独立分队，后来人数逐步扩大，其中有四个独立分队改编为中队，合计有520人。

中队主要负责人和活动地点如下：

模范中队：第一任党代表邓昌（兼），队长张天带、政治部末流（邢益岛）。张天带调回霹雳，由邓昌兼队长，副队长叶爱克，政治部末流（兼），在知知港简塘尾一带活动。

第15中队：是由32分队与15分队合并组成的，原32分队指导员胡力，队长陈庆，15分队队长徐国保，副队长绍宾。该队收编当地广西、罗定人组织的一支队伍，共有50多人，枪支30多支。不久其头目何泽因过不惯抗日军艰苦生活，带了十多人叛逃。司令部将32分队的胡力和队员几人调到芙蓉小甘密筹建51分队，亚康、陈庆，带了一部分人到冷甲一带扩建32分队，剩下的人并入15分队改编为中队。党代表廖德（兼），队长徐国保，副队长绍宾。在葫芦顶一带活动。

第43中队：建队时称分队，是最早成立的独立分队，党代表黄爱平，队长汤运兴，副队长叶爱克。改编为中队后，党代表和队长照旧，副队长叶爱克调模范中队，由思泉接任，政治部××，管理部肖毓儒。在知知港的梨望、半芭、双沟罗丹、船子头一带活动。

第24分队：原是独立分队，由瓜拉庇拉港尾当地队伍与马六甲撤来的一批人员合并组成，党代表陈辉，队长半天（郭育明），副队长伟民，半天牺牲后，调伟民任队长，副队

长培华。后来32分队并入24分队改编为中队，党代表陈辉，队长胡力，副队长钟乡，政治部陈群（邓福龙），管理部陈庆。这个中队在马口、芭隆、冷甲一带活动。

第51独立分队：筹建时党代表胡力，队长林明（林润），副队长李寿成。正式建队时，党代表汉元，队长汉臣，副队长何年（原在葫芦顶收编队伍的队长），在芙蓉小甘密、横窝一带活动。

1942年7月中央委员小忠来芙蓉召见赖莱福、马丁传达中央意见：调赖莱福回霹雳任“五独”队长，并选带原“二独”受训四队员返回霹雳。党代表一职由黄国平接任，马丁为队长，政治部由亚铁接任。后来黄国平在出席“九一”会议途中遭叛徒黄东安出卖而被捕，亦叛变投敌，成了叛徒。“九一”事件后，中央派蔡克明来“二独”司令部，任命马丁兼任党代表，但不久政治部亚铁又被捕叛变，司令部仅剩马丁、邓昌、廖德三人，和中央亦失去联系长达几个月。

七、“二独”在战斗中成长

“二独”在三年八个月的抗日战争中，第一年是最困难的阶段。日军占领全马后，就以武力大屠杀来威迫人民服从它的野蛮统治，同时宣扬它的“赫赫”战果，用欺骗手段收买落后群众，掩盖其强盗面目。当时群众还未广泛发动起来，也缺乏武装斗争经验，抗日军困难重重。“二独”在这极端困难的一年里，还受到莱特提出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化整为零”的谬论干扰，但他们始终坚持战斗，在战斗中成长。队伍由正式建队时的二个中队230人，发展到四个中队一个独立分队共520多人。并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

1943年6月，“二独”转移西彭亨之前，与日军发生的大小战斗不下二十次，其中有主动袭击日军的战斗，更多的是反围剿战斗。

（一） 主动袭击日军

上面提到的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就是一例；日军在知知港余郎郎村进行大屠杀后，“二独”为了打击日军的凶焰，就在4月下旬，派第43分队，进攻知知港警察局，毙伤警察数人。抗日军也牺牲了一位战士丘盛。当时驻扎在六英里外的日叻务日军，接到电话也不敢来援救，次日才派兵到知知港耀武扬威，把抗日军牺牲战士的头颅砍下摆在路旁吓唬群众。

1942年底，陈群带领第32分队在冷甲公路旁伏击日军吉普车，击毙庇拉日商务参赞一人、士兵一人，缴获手枪一支，指挥刀一把，并将吉普车烧毁。

1943年2月（即春节初三下午），日军获悉“二独”司令部在知知港简塘尾，动员200多人，乘坐七、八辆卡车，由日叻务向简塘尾进发，“二独”司令部接到情报，布置驻梨望的43中队在中途沿山边分四个伏击点，当敌军车进入伏击圈内，即遭到猛烈火力扫射。敌人跳下车顽抗，抗日军一面派人上车拾武器，一面与日军交火，交战约一小时，虽未全歼日军，亦毙伤日军数十人，缴获手提机枪二支，长枪二十多支，自己无一伤亡。事后日军对“二独”无可奈何，只有用屠杀群众来泄愤。

（二） 反围剿战斗

在全马沦陷前，由于“二独”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和地方武装在农村锄奸行动频繁，早就引起日军的注意，但日

军对“二独”各中队的进攻，大都是失败而归。如对淡边哥岛山、瓜拉庇拉港尾、知知港突岭等营地的进攻，均得不偿失，日军在知知港梨望观音庙背后山搜袭第43中队，在马口龙滨山伏击转移行军的第24中队，也未能得逞。后来，日军又数次围攻葫芦顶第15中队，反而被抗日军毙敌数人，其中佐级军官一人，第15中队则无一死伤。事后日军强迫当地群众在路过岗哨时叩头致哀悼念。

1943年初，“二独”在冷宜召开各中队党代表和队长会议，会议由马丁主持，分析了当前形势，调整分队为中队编制，布置反击日军的进攻和围剿。但会后不久，日军发现“二独”司令部所在地后，便大量增兵围困，驱赶群众离开山边，隔绝群众与抗日军联系，妄图消灭司令部。1943年春，司令部营地在简塘尾贝必政胶园的后山，日军利用叛徒和强迫当地个别落后的马来群众带路，连续二次进攻司令部。一次在三月中旬，动员了数百兵力，星夜进山，绕过哨站，三面包围埋伏，天亮就发动攻击。抗日军发觉日军进攻后，在司令部马丁、亚铁的指挥下，英勇地边抵抗边撤退，除一名女护士受伤被俘外，其余均安全突围，营房被烧毁，损失了一些衣物。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便派出成百兵力驻扎在马来村沿河上游，封锁抗日军与简塘尾和贝必政胶园群众的联系，而抗日军也派出一个小队驻扎在马来村沿河下游伏击日军，牵制日军追击，相持了将近二个月，在这期间政治部亚铁因事外出被捕叛变。

另一次在五月底，司令部转移到新营地，日军又动员数百兵力再次围攻，抗日军接获情报后，严阵以待，分二道防线抵抗日军。待日军尖兵进入哨所后便顽强抵抗，双方交战了半个小时，日军才以十多人的伤亡代价冲上了哨所。但进

入司令部营房时，又遭撤退到营房高地的抗日军猛烈的炮火阻击。战斗由上午十时打到下午二时，日军共伤亡数十人，由于日军伤亡人数多，无担架将尸体、伤员抬出公路运回日叻务，被迫退回山下对面河的山头住宿。抗日军不知日军未走，当晚与日军同宿一个山头，一在东，一在西，直至深夜哨兵巡逻时才发觉，日军误以为抗日军摸营，猛烈开枪扫射，每15分钟扫射一次来壮胆，直至天亮，可见其狼狈情况。

八. “二独”奉令东撤

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特别是对游击区人民的烧杀抢掠，造成群众很大的牺牲。为了保存力量和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6月，“二独”奉上级指示，撤离森美兰州，开往西彭亨地区，结合西彭武装队伍建立抗日军第六独立队。

“二独”东撤前，将各地部队整编为二个中队，即第一中队在知知港，第二中队在马口地区。其余人员留下一部分移交当地搞民运工作，另拨一个武装小队协助地委开展工作。一个分队移交三独，由三独党代表小林（即吴梦超）前来接收。第一中队和模范中队撤退到西彭亨文积，第二中队撤退到西彭亨明光。从此，森州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暂告一段落，只留下少量武装队伍配合地方组织坚持抗日斗争。

九. 1945年春森州恢复“二独”建制

（一） 队伍组成及机构编制

1944年开始，太平洋战争形势发生变化，美军开始反攻，猛烈轰炸日本本土。英国最高军事当局积极部署收复各殖民地的战略计划。派英军一三六部队马来亚组与马共取

得联系，达成了联合抗日协议。

1945年春，马共中央决定在森州恢复抗日军第二独立队建制，由“一独”、“六独”、“三独”各派一个中队（日本投降后“三独”的马六甲流动中队又划归“二独”领导），共四个中队五、六百人组成。组织机构和活动地区如下：

“二独”司令部：队长邓福龙（陈群）、副队长斯科（兼政治部），管理部商钦。

第一中队：队长吴敏，副队长洪亮（兼政治部）、管理部郑炎，活动地区芙蓉一带。

第三中队：队长何一山，副队长王昌海（兼政治部），管理部洪彬。活动地区瓜拉庇拉一带。

第五中队：队长陈光，副队长陈华（兼政治部），管理部×××，活动地区马口一带。

第七中队（马六甲流动中队）：队长郑作华，副队长陈振华（兼政治部），管理部恩梅，活动地区马六甲。

“二独”恢复建制时，没有秘密队和公开队之分，因与英军合作关系，各级机构均不设党代表，由正副队长兼顾政治职能。

（二） 军事斗争

重建的“二独”司令部率领第一中队驻冷甲，日军侦知后，即调集数百兵力，三面包围，但司令部避实就虚，于瓜拉庇拉至冷甲的路上设伏，结果消灭了森美兰州招安会会长林吉英和瓜拉庇拉区警长及二名卫兵，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二独”重建后最漂亮的一仗是在1945年夏，攻打瓜拉庇拉警察局和马来义勇军兵营的战斗，事先经过细致的侦察，集中优势兵力，先以一小队破坏交通电讯和封锁路口，然后分兵二路，以偷袭战术，同时进攻上述两个地点，使其

不能互相呼应。这次战斗的目的是为营救被关在警察局内的20多位战士，夺取警局和马来义勇军武器共八十支枪。由于计划周密，指挥统一，行动迅速，出敌不意，取得了完全胜利。

进入1945年夏以后，“二独”的军事活动更加频繁。如在芙蓉沙都律，第一中队指挥部通过民运组织，事先争取了暗探黄涛做内应，假借宴会宴请叛徒亚铁、暗探李彦章等人，趁他们酩酊大醉时，化装便衣的抗日军进行突然袭击，除叛徒亚铁受伤未死外，其余都被消灭，并收缴了几支短枪。日军鉴于抗日军活动深入到城镇，严重影响其反动统治，3、4月间又动员了二百多人向芙蓉板底第一中队进攻，但在日军进攻前，中队指挥部已接到情报，迅即作好战斗准备。当日军进攻时，抗日军顽强阻击，共毙伤日军十多人，抗日军一边战斗，一边撤退，日军见状也不敢追击，只在进入营地后鸣枪壮胆，而后撤退。

（三） 与英军“一三六”部队的关系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共领导的一支抗日军队，不属于英军一三六部队。1945年7月，一三六部队派人在芙蓉板底兰那港空降，其中有芬拉中校、艾伦上尉、索少尉及一机务员，共四人。二独奉中央指示，与他们联系合作抗日，由他们供应武器弹药、食物、军用物资等，但部队仍然是由独立队司令部指挥。一三六部队派来人员，其任务是代表联军与抗日军联系，传达联军总部合作抗日的意见，当时并无“一三六”部队之称，称他们为联军联络官，并无指挥抗日军权力。

经一三六部队联系，联军先后在森美兰州芙蓉的板底兰那港、冷甲生番港、冷宜马来农村空投武器弹药、军用物资

三次。这些武器对加强抗日军武装力量无疑起了一定作用。

十. “二独”的政治工作与民运工作

(一) 部队的政治工作

“二独”前期的政工人员，政治部有末流、逸春、碧玉等五人，以末流为主。各中队2—3人，其中第15中队有亚光、丹星；第24中队有玉玲（即叶碧红）、周燕；第43中队有小英、亚群等。小队配有政治战士春红（女）等。他们除对上级文件、指示组织学习，进行辅导外，也抓队内各个时期政治思想教育。如建队初期，队员不习惯军队生活，出现无原则要求民主、自由的倾向，对命令不是绝对服从，而要讲讲价钱，要求官兵一样放哨，运粮，否则不算平等。后来加强了政治工作，通过政工人员组织军纪学习，强调军队服从指挥的重要性，才逐步把军纪健全起来。

为了活跃部队中的文娱生活，政工人员每天教战士唱歌、识字，辅导文化低的战士学习文化，组织战士排演话剧。如无特殊情况，还定期举行战士联欢晚会。这些文娱活动和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战士们仍毫无怨言，个个斗志昂扬，就是政治工作保证的。

(二) 民运与统战工作

主要配合当地党组织、抗日同盟会，发动群众捐粮、捐钱支援抗日军。日军为了孤立抗日军，亦派人到农村、胶园或收买当地坏人进行破坏活动。但一被发现后，抗日军即派出武装人员锄奸，因此在农村中敌我斗争也是激烈的。第24分队长半天（邬育民），就是带领二位队员到冷宜马来农村开展工作时遇害，林勉遭敌奸打伤后逃脱，其余二人遭惨杀，邬

育民烈士被杀后砍首挂在路边树旁示众。

“二独”不但在农村积极配合开展抗日后备队，抗日同盟会的活动，1945年后，在大中城镇也吸收了一批华族侨领参加了抗盟。如芙蓉、文丁、瓜拉庇拉、马口、淡边、金马士等地区都有一批华族侨领参加抗盟。对日军分化瓦解的工作也做得很成功，如上述争取暗探做内应，消灭敌奸、叛徒的斗争，迫使有些敌奸不敢死心塌地替日军卖命，反而找抗日军联系，提供敌情。

对于日维持会，区、村长，除非极端反动，死心蹋地为日军服务，一般都派人争取。维持会人员既怕日军，又怕抗日军。抗日军便抓住其弱点，以软硬兼施办法对他们进行抗日教育，要求他们少做坏事，应付日军，暗中支援抗日军。如知知港维持会，就暗中和43中队联系，定期捐款、捐药给抗日军。葫芦顶、马口维持会初期较反动，经过警告后，也暗中和当地抗日军有联系，有时提供一些日军的动态和协助解决一些紧缺的粮、副食品、药品的供应。

(三) 民族工作

森州是马来人聚居相当多的一个州，做好马来群众的工作相当重要，“二独”各中队教育战士们到马来农村要尊重马来人的宗教信仰，保护教堂，尊重马来人风俗习惯，通过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抗日军的立场，获得马来群众拥护，如当时驻扎在板底、兰那港、冷甲、生番港、瓜拉庇拉、马口等地的抗日军各中队和马来人关系就很好。他们筹集粮食支援军队。在这期间还培养了一批马来族干部，如拉曼、鸭都拉等。他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组织马来国民党的活动，起了积极作用。“二独”与马来上层人物也有接触。在1945年8—9月间司令部队长邓福龙、副队长斯科，一中队队长吴

敏、洪亮、郑炎、翻译亚勇和英军联络官芬拉中校、艾伦上尉、索少尉等到瓜拉庇拉神安池马来皇宫与苏丹会谈日本投降后马华两族合作问题，并宣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宗旨，关系融洽。

在知知港简塘尾的司令部营地靠近马来村，抗日军常在马来村出入，关系很好。1943年春夏间，司令部受日军围攻这段时间，不少粮食是靠马来族群众支持的。但从整个森州来看，民族工作还是很薄弱的，主要是缺少民族干部，马共对民族工作不够重视，在马来农村没有马共和抗日群众组织，不少马来群众受蒙蔽被利用，使抗日军活动地盘受到限制。

各地居住在山上的土著民族与抗日军关系都很好，他们协助抗日军开辟山路交通，有的青年当抗日军交通员，他们的村庄成为抗日军山中行军宿营地。抗日军常与原始部落的群众举行联欢大会。

十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二独”进城与复员

(一) 收编小股自发武装

日军投降后，1945年9月3日，“二独”第七中队（马六甲流动中队）进驻马六甲市。当时在麻坡路六英里处一寺庙内，有一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队伍，约四五十人，拥有十多支长枪和几支短枪。他们仇恨日军，积极捕捉敌奸走狗，但没有什么军事纪律，对群众有霸道行为。当地群众要求抗日军解决这支队伍。于是副队长陈振华到该部队驻地商谈，赞扬他们抗日锄奸的精神，宣传抗日军宗旨，说服他们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结果大部份人参加了流动中

队，少部份人回家谋生去了。

(二) 镇压汽水厂日军的顽抗

第一中队进驻芙蓉后，负责维持治安，接收日军财产工作，芙蓉一家汽水厂有几个日本军人，拒不投降，持枪反抗，气焰嚣张。中队指挥即派分队长叶青、快刀二人率领几个战士进入该厂，武力迫使其缴械，经过短时间枪战，终于击伤并俘虏了他们。这个胜利影响很大，一些敌奸走狗慑于抗日军军威，自动到抗日军指挥部自首坦白。

(三) 平息排华风潮

在瓜拉庇拉一带，英国统治者居心恶毒，在1945年11月派走狗挑拨马来人仇恨华人，唆使个别受蒙骗的马来人坏头头率领成百名佩刀的马来人突袭马口巴都基基农村，华人经营的商店被烧毁，数十人被杀害，第三中队闻讯后，由中队长何一山、洪彬带领全中队开入农村，加以制止。部队进入农村时，留下5名抗日军战士在公路上看护军车。这时，一部分杀人队由反动的头目带领，绕道走出公路，突然向护车的五位抗日军战士袭击。五位抗日军战士不忍误伤马来群众，仅仅鸣枪警告，没有开枪射击暴徒，却遭暴徒杀害！这是英国殖民当局制造排华事件的又一笔血债。当天刘尧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赶到现场，与“二独”司令部队长邓福龙在第三中队部商议，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只辑拿杀人队首犯，平息了这场排华的严重事件。

(四) 协助成立森美兰州人民委员会

1945年9月3日后，抗日军进驻芙蓉、瓜拉庇拉、马口、马六甲等地，设立了抗日军办事处，负责维持治安、接收敌产及处理民事纠纷等等工作，同时进行宣传、动员、组

织群众，对支持筹备和成立人民委员会起了很大作用。九月初，召开了森美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森美兰州人民委员会，主席刘一帆，秘书长钟春华（钟文静），副秘书长颜天伍，下设职工、妇女、青年、农民、治安、文化、工商等部委员，开展各部门工作，具有初级人民政权性质。可惜，由于缺乏建立政权的经验，在叛徒内奸莱特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叛卖下，于1945年9月被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强迫解散了。

（五）抗日军解散复员

由于马共内奸莱特的叛卖，马共中央错误估计形势，采取错误路线、政策，当英军登陆进驻各大城镇后，就无条件地将马来亚人民和人民抗日军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轻易地断送给英殖民主义者，同意于12月1日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1945年12月1日，“二独”四个中队共五、六百多抗日军人集中在芙蓉皇家山广场举行复员仪式。当时气氛紧张，谁也不愿缴出手中枪。突然有些战士高呼：“冲啊！”顿时全军骚动起来，冲上原来抗日军的皇家山营房，作好战斗准备。在场的一三六部队代表见状口呆目瞪，手足无措。后来他们找司令部商量，乞求司令部队长向各中队做说服工作。当时各中队目标不明确，也不知该怎么办。结果过了二天，破坏了一些武器，才忍痛复员。

本文撰写及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马丁 亚里（罗须磨） 梁洪亮 黄爱平 胡力
斯科 徐国保 邱佐明 亚光（倪玉英）陈振华
钟木（林依清）林明（林润）陈庆 亚珍（曾月华）
关友 肖兆麟 施惠文 肖纪友

（由马丁、梁洪亮共同执笔整理）

(三)转战在柔北和马六甲的第三独立队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简称“三独”），是马共领导下活跃于柔佛州北部（简称柔北）以及马六甲州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部队。

柔佛州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是马来亚面积较大、人口比较稠密的一个州。由于境内地势比较平坦，贯穿南北的联邦铁路和公路干线也经过这里，陆路交通比较发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柔佛州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加工业就很兴旺，树胶园、油棕园、黄梨园、木薯园等星罗棋布，其中有不少是面积达几千英亩至一万英亩以上的大型种植园。一些加工业的规模也相当大。因此，种植园工人和工厂职工的人数，在全州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柔佛州也是受革命影响比较早的一个州。战前，这里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就已经蓬勃发展，群众基础相当好。由于地广人多，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抗日组织划分为柔北和柔南两个部分。“三独”活动区域包括：麻坡、昔加末、巴株巴辖（北部）、东甲等地，以及马六甲州、和森柔交界的部分地区。

一、踏上抗日征途

“三独”是在马来亚战争已到了最严重关头，战事已打到了的昔加末——麻坡一线，马来半岛即将全面沦陷，新加坡攻防战即将开始时成立的。当时，被派到新加坡英军“101特别训练学校”学习的第三批学员结业后，于1942年1月20日正式成立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并于当天开赴柔北。

这批学员共60人，都是从雪兰莪、霹雳、西彭以及新加坡抽调来的职工、学生运动骨干和马共地下组织的干部，其中来自雪兰莪最多，来自新加坡的有六人，包括余洪等四位工运干部。1月20日早上，这批学员集中在新加坡芽莪32巷一间平房里，举行了“三独”的成立仪式。会上由马共中央代表宣布了“三独”的成立和“三独”司令部领导成员名单：党代表陈书，队长小杨（吴科雄），副队长袁治英、政治部肖尔新，管理部李明（李镜明）。同时宣布成立二个中队，第一中队党代表陈田（后在四独未到任），中队长林文光；第二中队党代表胡萍（此人后来成为大叛徒，改名何浪），中队长李开发。

成立仪式结束后，“三独”的58位指战员，（李明及陈田二人因事留下，未随队出发，后均调往四独），分乘英军的三辆大卡车，越过柔佛长堤北上，目的地是昔加末或昔加末以北的地区。途中为躲避日机袭击，只得走走停停，下午两点后才到达永平（Yong Peng）附近。这时昔加末已被日军占领了。队伍抵达永平时，已经听到隆隆的炮声，从前线败退下来的英军和印军状甚狼狈。有一英军军官拦住陪同“三独”北上的警官台维斯（就是后来136部队的总联络官），诉说前线的情况，力阻队伍继续北上。台维斯听了以后，便不愿再继续前进了，他交代了联络信号后，便只顾自己乘车回新加坡去。“三独”的58位指战员，这时也只好在离三合港（KR. Chaah）约两英里处向西拐进一条黄泥路，到达一片胶林，这里叫做“顺天港”，距离拉美士还有十多英里。这片胶园的西面、北面都是原始大森林，有一座几千英尺高的大山，穿过这片山林，翻越这座大山，就可以到达武吉甲蓬和麻坡的巴克利，以及沙于、余民打、东甲，直至马六甲、森

美兰边界，是比较理想的游击区。当晚，队伍便摸黑开进山林，建立了临时宿营地。第二天，即1月21日，拉美士也沦陷了。

顺天港是华人村落，这里多数是小胶园，工人群众都受过革命的影响，许多人都参加过工会或其他进步组织，那些小胶园主也都同情抗日。“三独”从新加坡出发时，上级指示要尽快同柔北地委取得联系，配合地方开展抗日斗争，扩大队伍。现在来到顺天港，就碰到了这样多的革命群众，大家真是喜出望外。果然，第二天在群众的协助下就找到了柔北地委的一位交通员，并通过他到麻坡与地委接上了关系。不几天，柔北地委委员小林（吴梦超）亲自来到部队，并发动当地抗日群众给部队送来粮食及日常生活用品，使部队生活暂时稳定下来。经过同地委协商后，司令部决定先在顺天港附近的山中驻扎，着手开展各项抗日工作。

二、艰苦奋斗，创建部队

队伍驻扎下来后，司令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了首先要完成三项任务：第一项是派出阿袁、公干、罗励生等人，分成三批出发到永平、新港至巴罗一带开展工作，筹建部队；第二项是派出一个小组，由顺天港参军的一位队员带路，小杨亲自出马，依靠地图和指北针打一条山路直达丁宁 Tenang（在拉美士附近山林），搬回收藏在那里的武器、药品、粮食和炸药，并且打通去麻坡、永平、昔加末等地的几条山路；第三项是派出一批人由地委领导和当地抗日群众配合，到英军曾经和日军交战过的麻坡至巴株巴辖一带，收集英军丢弃的枪支、子弹。

这三项任务，对于当时完全没有经验的“三独”战士来说，都是十分艰巨的。别说开山路、设哨站，就连许多日常生活事务，如：搭营房、织亚答、剥树皮、架床铺，以至生火煮饭等等，样样都是新课程，都得从头学起，边做边学。起初，大家确实闹了不少笑话，有人半夜起来换哨也会迷路，回不来营房睡觉。当时吃的是石灰米，米里的石灰怎么也洗不净，实在难吃，加上没有锅，只能用火水桶来煮，结果不是半生不熟就是烧成焦炭。那时候，大家除了出发时身上穿的衣服和带的一套以外，就只有牙刷、面巾和一个水杯，其他用品如被单、雨布、包袱布等，只有靠当地群众的支援，才逐步得到解决。砍树木用的柴刀也只有几把，这种刀又长又薄，是英军在新加坡时给的，不好使用，巴冷刀则一把也没有，后来向当地群众买了一些，才解决了开山路、搭营房的困难。

在熟悉了森林环境以后，司令部决定：第一中队向北出发，通过甲蓬（KG BT Kepong）到余文打一带活动，第二中队向东出发，到永平、三合港和巴罗一带活动。同时成立第三中队，小刘任党代表，从第二中队调胡萍任中队长，向南到麻属一带活动。另调林友瑞、李柏，向马六甲的野新（jasin）出发，与从马六甲市撤退出来的队伍会合后，于1942年4月间成立了第四中队，吴炳坤任党代表，阿冠（郑群）任中队长。

由于战前革命影响，柔北各地的群众，特别是胶园职工的抗日热情很高，群众组织基础好，所以派出去开展工作、发展部队的各个小组，都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任务，并取得成绩。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部队已经在永平和麻坡地区，以及昔加末和东甲一带的广阔农村，建立了抗日组织，不少爱国

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军，武装部队的规模日益壮大。中上层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城镇的商店主纷纷捐献物资和金钱，支援部队，一些华侨协会的负责人，也愿意同抗日军合作。例如：永平华侨协会会长的洋楼，当时就成为抗日军病员的临时医院，医药、膳食费用全由他负担，医生也由他去请来。这人一直这样支援抗日斗争，直到日本投降。有些民间医生，则是热心地给部队献药（各种中西药和中草药）、献方（治疗各种疾病的单方），主动为部队的病号诊治伤病。这些行动都充分表现出军民互助的亲密关系，为部队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顺天港通往丁宁的山路，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打通了。当“三独”指战员从新加坡出发的前一天，英军当局就先用卡车把给“三独”的炸药、一部分子弹、手榴弹，以及粮食、药品等，运到拉美士西北的丁宁附近的森林里，用帆布盖起来，等待“三独”派人前往取用。后来，因受战事影响，不能继续前进，不得不绕道来到顺天港。打通这条山路的目的，就是去搬运这批武器和物资。可是，当大家到达目的地一看，由于受到雨淋和在森林里潮湿气候的影响，炸药大部分已经坏了，石灰米和药品也有一部分不能用，最后只好把那些子弹、手榴弹，以及一些还可以使用的物资运回营地。

派出去收集英军丢弃的武器、弹药的任务，更加艰苦得多，现场尸体成堆，空气中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味，有的子弹袋和枪支还挂在尸体上，布满了蛆虫。大家用湿面巾罩在脸上，只露出两眼，还是挡不住那股臭味，但为了抗日这算不了什么，大伙有时顶着烈日，有时冒着大雨，把那些好的、还能修复使用的枪支和子弹一件件捡起来，稍为擦一擦，就挑

的挑、扛的扛，搬回营房，然后再彻底擦洗干净。经过几天的辛勤劳动，总共收集了一百多支来福枪和一大批子弹，从而充实了队伍的武器装备。

尽管有着以上种种困难，“三独”指战员们都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涨，不叫苦，不喊累，不嫌脏，不怕臭，在各自的岗位上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42年4月间，司令部大队也跟随着一中走过的道路，通过甲蓬移营到金山顶（MT，OPHIR）驻扎。希图打通北上路线在香港打游击。

三、粉碎日军第一次进攻

司令部迁移到金山顶不久，营房附近连续三天闯进三批奸细，他们都化装成砍藤的农民，经拘留审问，并通过地方组织向有关农村和地方华侨协会调查，结果证明日军已发现“三独”司令部，正在准备进攻，这些奸细就是日军派来侦察的。司令部马上作了迎击敌人进攻的部署。恰好这时，地委送来了由地方组织收容的两名英兵，其中一个因病重不能行走，虽然这会增加部队的负担，但部队还是收容下来。在枪毙上述奸细时，由于没有经验，布置不周，有两个奸细乘人不备逃跑，警卫战士立即射击，虽然把奸细打死了，但却同时误伤了主持这一工作的中队长。他腹部中弹，伤势严重。部队的草药医生恰好又外出到农村给群众治病，一时赶不回来，战士们尽力之所能，对伤员作了临时救急处理。

第二天上午八时多，大约一百个日军，加上一批地方武装，向营房发动进攻。由于抗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阵地前沿又是一片开阔的茅草芭（坪），日军完全暴露在

部队火力的射程内，经过一阵猛烈的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二、三十个日军，残敌狼狈撤退。战斗结束后，司令部立即召开会议，总结经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上大家估计日军还会再举进攻，而且可能规模更大。司令部决定于当天晚上向顺天港转移。在转移途中，必须走一段公路，所以在天黑前来到芭边，入夜就沿公路走，这样对抬伤员和病号也比较方便。当时，刚筹集到的一批粮食（约三十包米）已来不及收藏，除了一部分交给地方组织，一部分由战士们带走之外，剩下的一小部分只好浇上煤油放火烧掉。为了带走这些大米，战士们把一条裤子的两只裤腿用绳子扎紧，充作米袋，挂在脖子上行走。队伍在司令部党代表陈书、队长小杨两人的带领下，抬着伤病员和两名英兵，连夜转移。党代表陈书，原为雪州马共干部，队长小杨则来自西彭，他们在行军途中，对战士们关怀备至，轮流帮着大伙抬担架。战士们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虽然背得很重，又要摸黑赶路，但大家心情愉快，团结互助，终于在天亮之前到达沙于地区的交通站，并在天亮后进入森林休息。不幸的是那位受重伤的中队长，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伤势恶化，在行军途中牺牲了。“三独”司令部离开金山岭营地后的第二天，几百名日军再次向那里发动进攻，他们动用大炮向山林狂轰一阵，然后分成几路从侧旁和后山向营地包抄，结果扑了个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营房，才灰溜溜地撤走。这一仗，除了被误伤的中队长不治而牺牲之外，部队并未受到什么大的损失，从而取得了第一次粉碎敌人进攻的胜利。

四、排除干扰，坚持斗争

“三独”司令部回到顺天港以后，迎来了一个短暂的、相

对稳定时期，各中队的群众工作和军事训练进一步开展起来。这时部队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以及锄奸，配合地方民运工作的开展。

“三独”从“101特训学校”带来的武器，数量有限，子弹更少，光是用这些武器来装配警卫队已嫌不足，平均每四个人合用一支汤姆式冲锋枪，每人四颗手榴弹，此外还有一些四号曲尺，和一些杂牌枪，炸药倒有不少，大约有二、三吨，但后来大部分被两水淋潮湿而变质，不能使用。至于英国来福枪，则是一支也没有。这就是当时自封为“盟友”的英国当局发给人民抗日军的武器装备。但是，“三独”指战员并不因此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们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从战场上收集英军丢弃的枪支、弹药，从日军手中、从警察局里把武器夺取过来，自己武装自己，终于打出了越来越好的形势。

1942年5月30日，窃踞马共中央书记职位的内奸莱特来到“三独”，他在当时召开的中南马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上（简称三合港会议）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取消武装斗争的谈话，大意是说：“日军已经占领全马，马来亚的战争已经结束。为了不给敌人一片树胶，一斤锡沙，今后要以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为重点，以罢工、怠工等斗争来破坏敌人的生产”。他指责当时各独立队开展的袭击日军交通线，破坏敌人铁路桥梁的战斗为“冒险”，提出要把武器收藏起来，部队分散到农村去“活动”的荒谬主张。当时人们虽然还未能识穿莱特的内奸真面目，但从几个月来武装斗争受到群众拥护而不断发展的事实，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对他的荒谬主张加以抵制。这样，才使他的这一包藏祸心的阴谋没有得逞。

1942年9月1日，代表“三独”出席马共党、军高

级干部会议的陈书，在会场遭到日军重重包围时，英勇战斗，不幸壮烈牺牲。陈书的牺牲，无疑是“三独”的一个重大损失。与此同时，日军也在柔北地区增派兵力，并开始在走狗和叛徒的带领下，到农村搜捕抗日群众，大叛徒阿郑（原名黄雄奋，曾一度代任“三独”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职务，后投敌叛变），带领日军向第一中队外围农村进行扫荡，在刘厝港（甲蓬对岸）杀死了三十多名疏散在那里的抗日军伤病员；在武吉丁宜杀死了民运干部刘木平，抓走了几十名无辜群众，其中大部分后来被处死。日军同时还在巴罗、三合港、巴莪（Pagoh）等地向活动在那里的第二中队、第三中队发动了进攻。除了在巴莪一间板厂用瓦斯毒杀一百余名无辜群众，在永平至拉美士的四条半石杀死七、八十名老百姓外，第二、第三中队都未曾受到损失。但由于敌人的骚扰，群众组织和交通运输线被破坏，部队的处境日渐困难，粮食不继，疾病流行，缺医少药，战士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

鉴于“三独”的领导机关长期处于不健全状态，原党代表陈书在“九·一”事件中不幸牺牲，政治部主任肖尔新一直因病离职疗养，管理部主任李明因事长期留在柔南，司令部只剩下小杨和袁治英二人。1942年底，中央军委对司令部的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和补充，从柔北地委抽调小林（吴梦超）担任“三独”党代表，从第四中队抽调林少南代理政治部主任，又从“四独”第四中队调王香甫任保管部主任。（后来肖尔新病愈归来，才调林少南负责宣教机房工作）经过这一番调整以后，“三独”各方面的工作，又正常开展起来了。1943年5月，在昔加末东北的西隆坡、沙拉格建立了第五中队。胡山为党代表（最初由小杨兼任），李西为中队长（江为成，后来成为叛徒）。

不久，又成立了第六、第七和第九中队。第六中队是一支从土匪改编过来的队伍，主要在金马士一带活动。后来这支队伍在少数原来匪首的操纵下，违背原先达成的协议，把抗日军派去的党代表鲁东和中队长李海山等几个干部统统隔离起来，背着他们又重新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甚至无故杀害老百姓。司令部忍无可忍，终于采取坚决行动，派出王香甫带领一支突击队，把以李铭为首的几个强盗头子处决了，第六中队也予以解散，成员一部分安排到第五中队，一部分编到“二独”。以后再从“三独”第五中队、第一中队抽调一部分战士，在六中原来的基础上，另成立了第十二中队。

第七中队也是在收编一批群众自发武装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张辉（叶汉）任党代表，林洪耀任中队长，活动于永平、张厝港、铁山、巴力士隆、士勿拉、破牛江等地。这些地方华人和马来人杂处，农村以马来人的居多。所以第七中队在1945年间，对于制止当时由日军和英当局先后挑起的民族纠纷，所起的作用较大。

第九中队成立于1943年中，李开发为第一任党代表，彭耀辉为中队长，活动地区在甲蓬一带。这里四面都是大森林，交通不便，只有一条麻河贯通其间。沿着麻河，上可溯昔加末、巴都安南（Batu Anan）下可达巴莪、麻坡，是抗日活动的理想地区。柔北地委的活动中心也设在这里。

五、战胜困难，发展壮大

“三独”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克服了重重障碍，在不断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抗日战争初期，柔北地区强盗的活动甚为猖獗，致使抗

日军在敌人的反复进攻中，处境更为困难和复杂。这些强盗利用英军撤退时丢弃的武器，拉起队伍，四出打家劫舍，勒索群众财物，强奸妇女，无所不为。有的还打着抗日军的旗号，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当时在柔北地区，大大小小的强盗队伍，共有十数股之多。其中最大的有四股，依次为：活动于居銮（Keluang）巴罗、三合港一带的以李桂庭、李有才为首的一股，最盛时有一百余人枪，曾在一个晚上洗劫了三合港街场上的所有店铺；活动于森柔交界处金马士（Gemas）以北一带的，以李铭、封国柱为首的一股，约有七、八十人枪，这股强盗最为猖獗，除强抢青年妇女外，还将一马来人村长的女儿强奸后加以杀害；以吴添成、吴力为首的一股，共有五、六十人枪，活动于张厝港、永平一带；以李单为首的一股，约有三、四十人枪，活动于余文打一带；其余十儿人至二三十人为一股的，或者临时纠合七、八人进行抢劫，分赃后再分散隐蔽亦有。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防止日军利用这些强盗来破坏抗日斗争，“三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对付他们。当时采取的方针是：在争取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把他们收编过来，或者让其保留相对的独立性，由抗日军派出少数干部进驻该队，对他们实行政治领导，逐步将其引上正轨。对那些极少数的顽固不化分子，才采用军事解决办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3年夏天，在“三独”活动的区域，已经没有强盗活动的踪影了。这对于提高群众的觉悟，发动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对于提高抗日军的威信，扩大抗日武装队伍，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进入1943年，日军对“三独”的进攻更加频繁和激烈。部队的处境也更加艰苦，常常枵腹行军、作战，处于经

常流动之中。司令部退回三合港森林不久，就遭到日军的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稍一接战便行撤退。此役仅毙敌一人，抗日军也有一位战士受伤。当晚下着倾盆大雨，大家饿着肚子挨了一夜，天亮后撤往三中垦植场，又被日机侦察发现，日军派了二架飞机前来轮番轰炸，陆上日军近千人分成二路进攻。入夜日军在占领的垦植场宿营，司令部派出战士用冷枪不断骚扰，弄得日军彻夜鸣枪壮胆，天未亮就狼狈撤走了。战斗最频繁的是第五中队，由于这个中队不断的除奸活动打击了日军的统治，日军于1943年5、6月间接连向五中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进攻，并强迫群众从抗日军活动的地区迁走，在柔北首次制造了一个数十英里的无人区域。以后，为了收获被迫迁群众所种下的粮食，日军与抗日军之间发生了十数次的争夺战。最激烈的一次，五中几乎动员了全部的兵力，加上运粮群众共二百余人，趁夜色掩护，攻打位于南北马交通干线上的浮罗加什（Buloh Kasap）警察局，结果缴获日军数十麻袋大米和其他杂粮。在这些战斗中，共毙伤数十名日军。五中的战士也受到一些损失和伤亡。

甲蓬有一个警察局，驻有一批伪军，经常欺压老百姓，气焰嚣张。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第九中队，应群众的要求决定拔除这个据点。经过一番战斗，伪军死伤过半，但仍据险顽抗，不肯缴枪投降。经过动员他们的家属喊话，也不肯悔悟。最后只好决定火攻。结果，除几个最顽固的头目被活活烧死外，其余的都放下武器投降。这场战斗，抗日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日军闻讯，始终不敢派兵增援。过了两天，才派一队日军前来巡逻，但当天就急匆匆的退走了。从此以后，这一带地区就成了抗日军民的天下。

1943年底，第一中队攻打位于柔甲交界处的亚沙汗

(Asahan)警察局，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进入1944年，抗日活动在各方面做得更加有声有色。“三独”各中队不断派出除奸小组，深入敌占城镇，进行打狗除奸活动，如五中就数次派人潜入昔加末，打击敌奸，同时配合民运组织，在城镇中大力开展争取中上层的工作；特别是从1944年初开始，原在《解放报》任编辑的蓝加调来柔化，主持《抗日新闻》油印小报的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柔北地委这时期编写出了许多对内、对外的宣传教育小册子，以及大量的连环画和漫画。部队组织宣传队，深入胶园农村，演出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这些宣传工作，在战士和群众中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大大地振奋了人民的抗日热情，提高了群众的抗日信心，使日军的处境日益孤立。

日军鉴于以往对“三独”的大规模进攻的失败，在1944年之后，就改变了战术，采用小部队长途奔袭，或者在游击队必经的路口，伏击抗日军的交通员和运输人员。日军的这一做法，初期也曾给部队造成一些困难和损失。例如，1944年初，五中夜袭浮罗加什警局后，缴获一批粮食搬运回营地时，天才发亮，日军就已尾随而至，幸而哨兵发现得早，又有大森林的掩护，人员虽无损伤，但营房被焚，损失了一批物资。但是，由于日军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他的小部队行动无法隐蔽，常为抗日军侦悉，反而给抗日军提供了杀敌的良机。如1944年5月间，日军在离西隆坡不远处的“八十格”（地名）伏击抗日军，但被抗日军获悉，在其必经之路设下埋伏，结果日军全队十四人，除一人逃得性命外，其余全部被当场击毙，抗日军缴得十三支武器弹药，全胜而归。

这年七、八月间，第二中队进攻巴罗警察局，也取得了胜利，缴枪十余支，弹药一批。投降的警察，经教育后全部

释放。

此外，第三中队袭击了巴莪警察局，第七中队也袭击了永平港和铁山警察局，都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胜利而返。差不多与此同时，“三独”在拉美士（Labis）地区又宣布成立了第15中队，党代表何明丁（林昌，后来堕落成为叛徒）中队长廖一萍。第15中队成立后，随即在拉美士属的丁能（Tenang）和外芭铁路沿线地区展开活动。“三独”司令部也从被咯（Pekok）转移到勿刹山（MT. Besar）下驻扎。在这里成立了警卫队，又建立了教导团，轮训和培养班排以上军政干部，共办了三期，每期1—2百人。

据不完全的统计，“三独”自成立到1944年4月大约二年半时间里，共作战56次，其中主动进攻敌人据点7次，伏击日军12次，骚扰、破坏7次，其他大多数行动是进攻警局和小规模的除奸战斗，共消灭日军军警470人，破坏火车桥一座，铁路八段，消灭敌奸走狗275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在这些战斗中，抗日军共牺牲了十五位指战员。

六、“五·一三”战役的辉煌战绩

到了1945年，日军在柔北地区基本上以固守铁路沿线城镇，维持南北马交通干线为主，无力再向农村地区的抗日军发动进攻。在各城镇则强迫人民四周筑起栅栏，防止抗日军潜入活动和袭击。针对日军战术方针的转变，“三独”也及时把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城镇中来。1945年5月13日，“三独”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在柔北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柔北各地警察局发起全面进攻。

“三独”司令部对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命名为“红五月运动”，又称“五·一三”战役。部队在发起进攻之前，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侦察，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并在敌伪人员中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便在行动时取得敌伪人员的配合。经过周密的部署之后，部队于五月十三日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间，向柔北地区（麻坡和金马士除外）的大小17个（有的资料说23个）警察局发起了进攻。结果除了在昔加末和巴罗两地遇到抵抗外，其余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昔加末是柔北地区除金马士以外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日军向“三独”进攻的出发点。该地警察局除有上百名敌警外，还常驻有一支日军警备队，人数约有几十人，驻扎在昔加末市政局后面一个叫做水池山的小山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三独”当时的意图不在攻坚，而是要占领警察局和夺取那里的武器。警察局位于市内南北交通干线上，靠近火车站，离日军警备队驻地约有半英里。按照布署，战斗任务由第五中队和第九中队联合执行。五中主要负责阻击水池山上的增援。当战斗一打响，战士们便勇猛的冲进警察局。那些伪警不堪一击，只打了几枪，便纷纷缴枪投降。恰好当时日军警备队一名副队长也在警局内，战士们命令他投降，他却拔出指挥刀进行抵抗，当场被打死。另有一个滞留在市内的日军伍长，亦被活捉，战士们本来打算等战斗结束后将他释放，但他却借机夺枪反抗，也被当场击毙。负责封锁昔加末大桥的战士，也击毙了一名带着指挥刀坐汽车从东甲方向来的日本军人，（后来查明是马六甲州的日军厚生科长）整个战斗只进行了十几分钟，战士们便完全占领了警察局、火车站和邮电局。

在攻打警察局的同时，在水池山上也开始了一场更激烈

的战斗。日军警备队一听到警察局方向的枪声，便立刻整队驰援。刚到山下，就遭到抗日军猛烈炮火的阻击。日军一时摸不清情况，不得已退回山上固守。几分钟后，又冲下山来，但还是无法突破抗日军的火力封锁，于是改变战术，改从左面进行冲击，不料又遭到抗日军猛烈火力的杀伤，只得又退了回去。后来，日军改从两侧进行包抄，但抗日军迅速转移阵地，也从两翼反包抄敌人。就这样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日军始终无法冲下山来。直到警察局方面的战斗胜利后，这里的抗日军才主动撤出了战斗。

巴罗警察局的战斗也很顺利。天刚黑，第二中队的战士便发起冲击。在迫近警察局时，进攻的队伍已被放哨的警察发现，先向抗日军开枪。当战士们冲进警局门前的战壕时，伪警立即把警局的大门关闭，退到屋内固守。大约经过半小时的战斗，战士们终于冲破大门，冲进了警局，伪警们一个个举手投降。

“五·一三”战役，抗日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仅在昔加末一地，就打死打伤日军十几人，包括一名副警备队长，一名日军伍长，一名厚生科长和一个日宣传队长。缴获各种枪械二百余支，弹药一大批。巴罗的战斗也缴获三十二支枪（其中步枪18支，猎枪12支，手枪2支）。其他各地所缴获枪支多少不一。所有被俘警察，经教育后全部予以释放。自此以后，即使在白天，抗日军战士也可以在各市镇街上自由活动了。

七、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中，“三独”司令部得到“四独”的协助，与

英联军取得了联系。经过双方协议，英联军联络官（即 1 3 6 部队人员）首批八人，由迈尔斯少校（MAJOR C. MILES）率领，于 1 9 4 5 年 6 月 8 日晚空降于昔加末地区指定的森林内。“三独”由李山（肖尔新化名）代表，带领一个中队迎接他们空降，并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随后，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在柔北的麻坡、昔加末、巴罗三地建立三个中队（即公开队），枪枝、弹药、医疗药品由英方供给，人员、粮食由抗日军负责，并由“三独”司令部统一指挥。昔加末中队建成后，由林友瑞任党代表，林昌任中队长。林友瑞并代表司令部负责同英军联络。此后，联军联络人员相继在巴罗、麻坡二地的森林空降着陆，该两地的新中队也先后建成。

日军宣布投降前夕，“三独”还在东海岸彭亨河出口处的旁打弄宾（Bondar Rompin）建立了第十八中队，李汉光为中队长；同时，从各中队抽调了一部分战士到马六甲，与当地原有的武装队伍汇合，成立了马六甲中队，由郑作华任中队长。第十八中队成立后，随即在弄宾河上伏击日军一巡逻艇，迫使艇上的六名日军投降，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数支，炸药一大批。马六甲中队虽没有经历大的战斗，但也收编了一批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人员，从而扩大了队伍。

正当抗日军与联军建立了联系，抗日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1 9 4 5 年 6 月间，日军麻坡警署署长，通过一个老侦探叫亚皆的，向抗日组织传递一个口信：日方有意与抗日军进行和谈。当时马共柔北地委驻麻坡代表（兼麻坡地区区委书记）何伟与第三独立队第三中队指挥部研究并经柔北地委批准后，同意与日方进行接触谈判。双方约定于 7 月初（具体日期忘了）在离巴莪四英里的一间座落在胶园里的别墅举行会谈。届时日方先乘车到巴莪警察局，再由抗日军

派人引至会谈地点。日方来了三个人，麻坡警署署长（穿军装）、麻坡宪兵部特高科科长（穿便衣）、以及老侦探亚皆（担任翻译，穿全套白西装）。抗日军方面除何伟外，尚有第三中队党代表符洪光。谈判中，日方提出：要求抗日军与日军合作抗英，为此，日军许诺向抗日军提供武器、医药等物资，抗日军可以自由活动，日军则只驻守在麻坡市区三英里范围以内……等等。对此建议，抗日军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坚决要求日方立即停止煽动排华。由于双方观点对立，会谈无任何结果而告终。在会谈进行时，日方特高科科长手拿一个大型打火机，频频地打火点燃烟支，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间谍用的摄影机。谈判后没有几天，日军即印发了“抗日军放弃抗日，与日军合作抗英”的传单，传单上还印有日方与抗日军谈判代表合影的照片，用飞机广为散发。这件事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三独”司令部得知后，认为这是日军的诱降阴谋，第三中队和个别地委成员不慎上了敌人的当。为了挽回政治损失和粉碎日军阴谋，“三独”司令部决定以进攻麻坡的军事行动，向人民表明抗日军坚持抗日到底的决心。1945年8月13日，“三独”向麻坡发起全面进攻，结果迫使警察署署长以下一百余名警察缴械投降，缴枪一百余支，封锁了麻坡日军警备队（有一百余人）驻地，迫使日军警备队于二日后，弃营连夜逃走。抗日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日军的诱降阴谋，随着这一行动的胜利和日本的宣布投降也就化成泡影了。

1945年上半年，日军为了进行垂死挣扎，除了向抗日军施展诱降阴谋外，同时极力在马来群众中煽动排华。为了实现这一罪恶的目的，日军指使其走狗化装成抗日军，在巴株巴辖地区如宋加兰（Senggreng）、士毛拉（Semerah）等地

的回教庙里杀猪吃猪肉，还在庙里到处大小便，亵渎被教徒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先知穆罕默德，煽动不明真像的马来同胞对抗日军的仇恨。跟着日军又假惺惺的派人前来“慰问”乘机鼓动向华人复仇。然后日军发给枪枝，又派马来兵补和马来警察参与其事，给排华的暴徒壮胆。并声言，凡华人支援抗日者，可就地杀死。这一地区的马来人大多数是从爪哇来的，其中有好战名声的曼惹人（Banjarese）居多。这样在日军的精心策划下，一幕屠杀华人的惨剧首先就在巴株巴辖和柔南文律的龙引（Renzit）、宋加兰等地上演了。排华暴徒们头缠红布，手持长巴冷刀，在坏头头的带领下，成群结队，窜到华人聚居的地方，逢人便杀，见屋就烧，看到财物就抢，而且不分男女老少，统统杀光。事件中，有上千华人老弱妇孺被害，数千间房屋被焚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这一事件，很快地便蔓延至巴株巴辖以北（即巴北）第三独立队第七中队和第三中队所辖地区。首先是地委派驻马来农村担负民族工作的金坚和阿炸先后被杀害，接着士毛拉华人农村遭暴徒包围血洗。当第七中队派出一个小分队前往劝说解围时，不幸全队惨遭杀害。面对这种错综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形势，抗日军和抗日组织清醒地看到在幕后操纵的是日本侵略军，广大马来群众则是受蒙骗的，因而是无辜的。“不能向马来群众开枪”，这是第一道下达给全体指战员的命令。为了粉碎日军挑起的排华浪潮，第七中队、第三中队指挥部暨“巴北”区委民委研究了对策，一方面向马、华二族人民大力宣传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指出日军已面临彻底失败，挑拨民族纠纷是其垂死挣扎的阴谋，号召各民族应该团结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另一方面，由抗日军派出一个分队到永平伏击日军，壮大抗日军声势，同时，派出一个分队结合组

组织来自卫的群众武装，乘夜潜入铁山马来农村，消灭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坏头头。又经过抗日军攻占麻坡，迫使警察署署长以下一百多人缴械投降，后来又瓦解了驻在武吉巴西的有数百人枪的马来特警队，收缴了大批枪枝弹药。接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使广大马来群众逐渐觉醒过来，暴徒方面也派人前来谈判，愿意平息事端和睦相处，一场排华风潮，终于平息下来。

日军宣布投降后，三独便迅速开进柔北大小城镇，维持治安，协助地方建立了各级人民委员会。根据和联军达成的协议，在昔加末设立了公开的“三独”司令部办事处。林昌任正队长，王香甫任副队长。下辖三个公开中队：昔加末中队，中队长周忠（苏生），副中队长吕庆云；麻坡中队，中队长叶彪（陈光杰），副中队长郑国庆；巴罗中队，中队长李昌明，副中队长莫履标。共约有五百人枪。马六甲中队虽是“三独”建立的，但并未包括在公开队内。原来九个老的中队（四中约于1945年合并到一中），则没有公开与联军合作，根据上级的指示，把武器分散收藏，人员疏散到农村、工矿和城镇，从而结束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武装斗争。

“三独”和柔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是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来亚抗日史册上一页光辉的篇章，它是成千上万的马共党员、抗日军人，以及各族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柔北和马六甲各族人民在三年八个月艰苦卓越斗争中所创立的光荣业绩。

撰稿人：林文光

提供材料者：王香甫 林少南 林友瑞 张 辉

何 伟

(四) 马来半岛南端的一面红旗—— 柔南第四独立队

一、建队前的柔南

第四独立队成立于1942年1月30日。正当日军已经占领居銮(Keluang)向新山(Johore Bahru)推进,英军决定退守新加坡,即将炸断新——柔长堤大桥的前夜,60名在英军101军事训练学校受过短期训练的马共党员,抢在炸断大桥之前开到柔佛(Johore)州南部,成为第四独立队的基干队伍。这支队伍结合柔南马共党组织领导下的各地区的抗日群众组织,经历三年八个月的斗争,给予日本法西斯占领军以沉重的打击。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第四独立队已发展成拥有八个老队,五个新队,有兵员二千二百余人的强有力的游击部队。

柔佛州是马来亚各州中幅员较广,人口相当稠密的一个州。因此,马来亚共产党战前在此设立柔南、柔北两个地方委员会,在组织上,形成两个区域。抗日战争时期沿袭下来,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三独立队活动于柔佛州北部(简称柔北),第四独立队活动于柔佛州南部(简称柔南)。

柔南地势平坦,只有东部哥打丁宜(Kota Tinggi)一带略有山丘。境内交通发达,公路有三条主干线和许多支线。中线的铁路和公路自新加坡起,经过境内的新山、士乃、古来、令金、居銮等市镇,北上达吉隆坡直至泰国,是马来亚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客货运输十分繁忙。东线公路自新山起经哥打丁宜至丰盛港、三板头、兴楼,连结东海岸各市镇。西线

公路自新山起，经士古来、大小笨珍、文律、宋加兰、至巴株巴辖，连结西海岸各市镇。沿公路两旁，有延绵不断的橡胶园、油棕园、黄梨（即菠萝）园等规模较大的种植园。沿东、西两海岸则有许多渔村和盛产椰子的椰园。而中部山区和东海岸的大部份是原始森林。木材资源和锡矿都很丰富。

柔南紧邻新加坡、受风气之先，早在三十年代开始，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饱受剥削的华族工人，首先团结起来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斗争。到了三十年代中，工人运动逐步发展推动了青年、学生、妇女等先进分子参加到反殖、反帝斗争中来，掀起了反帝国主义黑暗统治、反对残酷剥削、争取民主政治、经济利益的斗争浪潮。其中较为有名的是1938年，新山一带数千黄梨工人大罢工，和士乃日本胶园工人大罢工。这几次大罢工的胜利，使柔南的工人运动更广泛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支以橡胶、黄梨、锡矿、伐木、交通运输等行业工人为主力的工人队伍。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在华人社会激起了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潮。华侨一向热爱其祖国，支持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华侨早就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抗日。“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社会各界都行动起来，献钱献物，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战，华侨抗日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柔南和全马一样，及时地组织起半公开的“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把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店员、妇女等各界最有抗日热情的群众组织起来，成为运动的核心力量。柔南各地区的合法组织：“华侨筹赈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简称筹赈会）和各种各样的公开社团，成为抗日宣传活动场所，推动广大侨众行动起来，如组织宣传队深入人民群众中进行抗日

宣传，以街头卖花、文艺义演、挨家逐户认献月捐等办法筹集义款，每月汇给“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的义款数以万计。组织救护队，以筹赈会的名义筹款购买救护车、药品、医疗器械等，送往中国，配合筹赈会动员汽车司机回国服务。为了支援在中国敌后战场艰苦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敌后援会建立一个“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专门进行筹款工作，发动广大群众持续不断的捐献援款，集中汇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抗敌后援会还领导爱国青年开展抵制日货，打击贩卖日货奸商的运动，使日本货无法上市，削弱了日本经济的扩张，……。诸如此类的抗日运动，举不胜举。长达数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和遍及大小城镇乡村的抗敌后援会、筹赈会等组织的存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完全改变了华侨社会的面貌。到日本南侵，必须拿起武器，直接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时候，就成为抗日军建队的有利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是有利的方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是由于柔南紧连新加坡，对日军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因为新加坡被占后，已成为日军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日军要确保其后方安全，必然重视其在柔南的防务，加强其对抗日军和人民的镇压，使得“四独”不得不面对敌人频繁的进攻和强大军事压力的威胁。“四独”的斗争比其他各队都要艰苦，柔南人民的损失也更为惨重。可是，柔南军民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忍受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第四独立队的建立和初期的艰苦历程

日军侵马战争一发生，马共中央即发出全民动员，保卫马来亚的号召。同时与英殖民地当局谈判，订立共同抗日协议。抽调马共党员到英军 101 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事训练。

根据上级的部署，柔南地委立即从各地区抽调党员，结合新加坡方面的党员共约60人，到英军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短期军事训练。从1942年1月20日至1月29日，不足十天时间，学员们日以继夜地紧张学习。1月30日，学员们整队从101训练学校开赴武吉知马汉光小学，在马共中央代表主持下，正式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当时的骨干队员共有64人，中央宣布司令部组成人员如下：党代表：陈路（胡天保），正队长：阿福（余洪），副队长：陈培农，政治部：阿川（郑戴明），管理部：李文辉。（注：另据当时曾参加仪式的有关人士提供的情况，当时司令部成员还有政治部副职吴亚浪、管理部副职南学（张天河）两人。）队伍在当天乘军车来到士乃区的德茂芭，那里已经有地方党组织集合起来的干部群众近百人，建立了临时营地，接应部队到来。部队携带英军提供的少量步枪、短枪、手枪、手榴弹等武器，于次日开进泗隆港原始森林，开辟第一个根据地。在这个时候，柔南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侵略军一踏上这块土地，就实行大屠杀。如在哥打丁宜，英兵一溃逃，即炸断铁桥。跟着而来的是该埠的大街、新街二条大马路的所有房屋商店被抢一空，当即一把火烧个精光，日军的先遣兵到达后，包围了四条石鲁骨小镇，逮捕了四、五百人，拉到哥打河边修木浮桥，在第三天修好木浮桥后，当场把这四、五百人用机枪扫射。顿时血染哥打河，满河浮尸。从农历年初一开始，至年初十，在一条半石，在朱马、在鲁骨、八条石、福成板厂等地见人就杀，妇女被奸淫后用刺刀刺死，婴儿也不能幸免。所到之处，房屋烧光，沿路遍地死尸。据以后收尸的人统计有一千多人被杀，跟着又因瘟疫死去几百人。

从1942年2月26日开始，日军在士乃镇杀了五十

多人。逃难到沙冷中正分校的难民二百五十余人被杀；在振林山，自三月五日起，一连数天，先后杀死四百多难民；在文律所属的巴力士隆和张厝港等处，被杀害者也有千余人。在文律屠杀八百余人，在笨珍 27 碑、古邦、渔兰芭一带又杀死一千多人。在这种形势下，柔南原有的工会、抗日会、以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群众、骨干、领导人受到巨大的损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动员计划和建队工作无法实现，部队一开始就面对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司令部与柔南地委研究后，决定克服一切困难，首先选择群众损失较小，组织基础较好的士乃、古来、乌水山、令金等几个地区，派出队伍分头筹建部队。经过数月奋斗，首先建成了四个中队：

第一中队队长：亚年（后由李松接任），党代表：亚莫（莫泽香，又名卢成）、后由马亚光接任。活动地区在士乃至新山一带。

第二中队队长：亚钦（小马来），党代表：陈路，副队长：彭少山。活动地区在玻璃城一带。

第三中队党代表：阿忠，中队长：彭少山（由二中队调来），副队长：陈炳光，军训：阿华。在乌水港、笨珍一带活动。

第四中队党代表：钟彬，中队长：南学，军训：马文川，管理部：王香甫。活动地区在冷金、赖影、居銮一带。

司令部带领第一中队和大本营人员在上泗隆森林内建立第一个根据地，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原来抗日会的会员，开始在各个地区开展抗日群众运动和建立游击队伍的工作。第一年内不但按计划成立了第一、二、三、四中队，而且还在文律地区成立了第十三中队，在哥打丁宜地区成立了第七中队。

这样，整个柔南的西部、中部和东部都建立了部队，开始了抗日武装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各个中队建队的过程概述如下：

第一中队活动于士乃地区。这是最先成立了的一个中队，也是建队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地区，活动范围包括：海南港，恒顺港、瑞林园、定南园、八百吉、德茂芭、上泗隆、下泗隆、红毛园、日本园，直至板兰、南益新山五条石等地。队伍刚开始活动，就被日军发现遭受攻击。1942年4月，日军分数路，从古来、沙冷、士乃和下泗隆向司令部根据地上泗隆进攻。部队为避敌军锐气，立即转移，日军扑了个空。竟对德茂芭、上泗隆和大半个下泗隆进行抢劫，焚烧，将所有的房屋烧光、抢光。把群众赶走，造成无人地带，到处是一片焦土，物资奇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日军想用此种毒辣手段，驱散群众，困死初建立起来的人民抗日部队。日军这一“三光”政策，初时给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主要的食物木薯、番薯不能保证供应，靠食野菜、黄梨充饥，其他供应更不用说了。由于食物和医药短缺，加上虐疾、伤寒等流行疾病的侵袭，有不少战士在这个时期被夺去了生命。

其次是部队刚刚建立，来自四面八方的工、农、学生、知识分子，缺少军事知识，没有作战经验，还须要一定时间的锻炼，才能学会作战，要对付久经战阵的日军，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一旦敌人进攻，只能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还的战术与敌周旋。因此，部队经常处在转移行军之中，处于被动地位。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部队着重于扩展活动区域，加强军民合作，派出武装工作干部，进行宣传、鼓动，建立抗日同盟会，发动群众以粮食、医药支援部队，为部队提供情报。同

时，部队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提高部队素质，加强作战能力，争取在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

1942年8月，部队得到情报，得知古来日军警备队长将乘坐一辆小轿车经过士乃往泗隆园参加所谓“自警团”成立典礼。一中指挥部派出一个小队埋伏在瑞林园，一举击毙该警备队长及其卫兵。这次伏击胜利，狠狠打击了敌人，给饱受摧残的人民出了一口怨气，鼓起了武装斗争的勇气，提高了抗日情绪。另方面，也惊动了敌人，第二天上午，日军如临大敌，包围16碑半和士乃镇，将居民和路过群众都集中在公路边进行验证，抓走两名无辜群众——叶石和肖清。叶石被关了一个多月，经过多方交涉，担保释放出来，而肖清却永远没有放出来。

第一中队在开始的一年多时间内，进行过八次反围攻战斗，保卫司令部从德茂芭迁至老杞，再迁入玻璃城，直至1943年迁入天吉港，而一中队仍留在士乃地区坚持敌后斗争。

第二中队的建立，是由司令部派二中副队长彭少山带领白冰等四人前往玻璃城筹建的。他们找到当地抗日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发动了群众，成立了一个分队（约30人，下辖三个小队），从群众中收集英军撤退时丢下的武器，有几十支来福枪，一批手榴弹和步枪子弹，开始了第二中队的建队工作。不久，司令部调彭少山去筹建第三中队，派阿钦接替彭少山的工作，二中改称为第十二中队，党代表：陈路，（注：陈路原任司令部党代表，后调任中队党代表。）在玻璃城、老杞、新杞一带活动，成为中部山区的一支活跃队伍。在后来历次反围攻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中队的建立是在1942年2、3月间，成员都是

古来抗日会会员。日军占领古来时，他们在抗日会领导人阿忠带领下退入海南港森林里，临时搭盖避难的棚屋，住下许多人，有会员及其家属，男女老幼都有。司令部派彭少山到海南港去和阿忠会合，建立第三中队指挥部，阿忠任党代表，彭少山任队长，副队长陈炳光，军训阿华。在抗日会会员中挑选了一批青、壮年约五、六十人，建立了两个分队。分队长有王琼光、王祥等四人，其余家属老小则由民运干部带领，在外围耕种维持生活。不久，第三中队改为第九中队，将根据地从海南港森林迁至乌水山。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教育。几个月后，为了加强军民关系和配合民运开展各地区群众工作，部队以小队为单位，分散在海南港、乌水港、黄梨山等地和群众杂居在一起，指挥部也设在村中。这样，军民关系更密切，群众也更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在抗日会民运干部的配合下，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扩大影响，壮大了队伍。不久，抗日组织发展到笨珍路 1 6 碑半、黄梨山及振林山一带，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在笨珍路 2 7 碑设立维持会，在各区建立保甲制度，并在笨珍路 2 2 碑至 3 1 碑的广阔范围内成立了所谓“自警团”，晚间在各大道路巡逻放哨，监视游击队活动，阻碍了部队和民运工作的开展。为了打击敌人，九中派出两个小队，由中队长彭少山和阿华领队到 2 7 碑街场，公开枪毙了维持会长，并没收了其店内的货物。这次行动影响很大，一些曾被日军利用的人，纷纷向抗日军靠拢，敌人内部发生分化，使维持会和自警团变成抗日军的耳目，经常向抗日军提供援助和提供情报。以后，在笨珍路 2 7 碑一带又成立了第三分队。

第四中队是由司令部派出南学（即张天河）、马文川、王香甫等人到令金地区开创的。当时在亚逸依淡山上有一个英

军留下的小军火库，有一小队（约30人）澳州兵把守，四中队和他们取得联系后，派人上山取出了军火，用以装备第四中队。计有冲锋枪4支，平射机关枪2挺，步枪15支，手枪15支，手榴弹10箱，和一批炸药、子弹。这批军火是英军撤退前运来储藏，准备用作敌后破坏敌军运输用的。现在这些武器都成为游击队的装备了。

第四中队最早的队员只有十余人，以后陆续扩大，活跃于冷金、拉影拉影与居銮一带。首任党代表钟彬，队长南学，军训马文川，管理部王香甫（不久王香甫调去柔北第三独立队）。

1942年12月20日凌晨4时，四中队袭击了冷金警察局，救出了一名抗日志士，并将牢房打开，捣毁了警察局，凯旋归来。

第四中队共有三个分队，有一个分队后来开到兴楼地区，开创了第十八中队。

第十三中队建立在文律地区，在巴株巴辖以东的宋加兰、龙引、文律三镇至大笨珍、水池路一带，市镇上大多是华人，而农村（甘榜）则大多是马来人。

1942年1月，柔南被日军占领后，文律的马共党员陈亚福，陈文龙、苏森水等人，结合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去收集英军溃退时丢弃的武器，筹建武装队伍，第四独立队派陈振耀等人到文律，五月正式成立第十三中队。陈振耀任党代表，陈升平（文海）任中队长，陈亚福任副队长，根据地设在文律港顶。七、八月间，在笨珍——巴礼山村内，由略有军事常识的刘其伟先生主持军事训练，约一个多月以后，这些学员便成为十三中的军事骨干，其后收编了据有武器的群众自发武装组织林金水等七人入伍。但在年底日军加强了这一

地区的统治，汉奸走狗和警察活动猖獗。陈振耀被捕投敌，初建立的队伍，受到破坏。林金水劣性不改，杀害了陈亚福后，拉队逃走，余下的队员，一部份由司令部调往哥打丁宜地区，只留下一部份在原地活动，直至1943年夏，再建第二十中队。

第七中队的建队工作比其他中队更加艰苦。哥打丁宜地区，原来是抗日群众运动相当活跃，组织基础较好的一个地区，但遭受日军的疯狂烧杀抢掠之后，整个地区受到严重破坏，幸存的群众大量外逃，到处极目荒凉，群众组织暂时瘫痪。司令部与地委研究后，于1942年5月，决定派出吴亚浪、德平、阿汉、马全、阿存等30多人为武装工作队，挺进哥打丁宜区，进行恢复组织和建立武装部队的工作。他们首先从南亚、帝文等偏远地区做起，找到哥打丁宜方面的关系，先后恢复了组织。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同盟会，在此基础上，筹建第七中队，司令部从四中调南学为党代表，从九中调王琼光任中队长，德平、发仔任副队长，于1943年初，正式成立第七中队。下有三个分队，分别由马全、阿全、阿存任分队长，卢坤为军训员，每个分队约五、六十人，中队根据地设在哥打路13碑以东的万浮胶园内。阿存的分队，跟随中队指挥部，其余一个分队分散在南亚、帝文港、边加兰等地；还有一个分队北上至哥打丁宜附近的水山、鲁骨、四条石、八条石等地。另一个分队由德平、阿汉等领导北上至老港、新港、和平港等地活动，一部份进入丰盛港路中段福茂板厂一带。他们瓦解了一股土匪后，建立分队根据地。这样，在柔南的东南部也建立了武装队伍，其后还向北面伸展，与第四中队配合发展成兴楼——丰盛港地区的第十八中队。

三、中部山区三次反扫荡战斗

从1942年初至1943年初，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日军对“四独”司令部所在地，柔南中部山区士乃——古来一带，进行过八次进攻，不但不能消灭初建立的抗日军队，反而经过残酷的战斗，激励了抗日军士气，提高抗日军威望，使抗日武装斗争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感受到了脚下的危机，惶恐不安。于是策划了大规模的围剿。一场持续半年，运用上千兵力的大扫荡开始了。

第一次大围攻

1943年6月初，日军调集大批兵力，集中在新山，日夜进行野战演习。至6月12日，将其主力秘密运到德茂芭。另一部份，从新山到古来实行戒严，并用装甲车在新山到板兰和新山至士乃一带的公路上巡逻。

从抗日会提供的情报中，部队觉察到日军的行动，第一中队立即化整为零，将部队分布在有利的伏击点，准备打一场遍地开花的游击战。

十三日清晨，日军开始进攻，一路从一百八十依吉，一路从德茂芭，向上泗隆根据地扑来。第一路日军在通往上泗隆的路上首先中伏。从一百八十依吉进来的日军，也与游击队接触，毙伤日军数人。十四日早，敌人转变方向，从德茂芭的另一路发起进攻，结果在半途又中伏击，日军三次受挫，不敢再盲目冒进，在十四日下午直至十六日上午，发射了几百发炮弹，向山林轰击，然后退走。

这次反扫荡战斗，由于军民团结，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抗日会的情报工作，给部队提供可靠的敌情，使伏击获得巨大胜利。群众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还想尽办法给火线上的战

士们送食物。战士受伤，得到极好的照料。

六月十三日开始的大围攻失败了，日军露出更加狰狞的面目，接连几天进攻外围人民，毁坏了人民种植的粮食，企图困死游击队。十九日和二十日进攻茨廊，二十二日进攻一百八十依吉。在十九日的战斗中，部队救出一批茨廊群众，转移到山上安全地带。二十二日，五个抗日突击队员在一百八十依吉埋伏，把二十多车撤退的日本兵打得叫苦连天。

到了八月十二日至十六日，日军接连三天再次向茨廊进攻，也被抗日军击退。这样敌人持续两个月向士乃区和第一中队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大围攻

距第一次大围攻不足一个月，九月初，日军又开始第二次行动，九月九日晨，日军数百人又向一百八十依吉进犯。抗日军早有准备，在重要路口设下阵地，给日军重大杀伤后，立即撤离。

午后，日军才进入山林，向部队根据地进攻，抗日军选择在营地前方哨所的制高点，严密设防，击退了日军连续四次的冲锋。另一路企图从侧面迂回的日军，恰遇抗日军巡逻队，把其指挥官和机枪手击倒，这一路日军也被击退。

第一天战斗，日军达不到目的，干脆住下来，按兵不动。到了第四天，日军大量增兵后，又分三路进攻，第一路在瑞林园受突击队狙击；第二路和第三路从一百八十依吉，和德茂芭开大炮向根据地轰击，然后前进。可是抗日军早已不知去向，敌人又扑了个空。

隔了一天，敌人再增两路兵力，一路从哥打路22碑，一路从南益园，配合从德茂芭方面的一路，转向十二中队的老杞方向进攻，在老杞遭第十二中队迎头痛击，被迫驻兵不动，

只用大炮向森林轰击。十五日午后，敌大队才敢进山，找不到目标便退走了。

日军退返士乃镇，向群众宣传说：“抗日军没有了。”可是，神出鬼没的抗日突击队在十七日夜间突袭士乃镇，驱使日军从新山开来两辆装甲兵车，待装甲车来到，突击队已不知去向。历时九天的第二次大围攻，日军又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

第三次大围攻

相隔一个多月，日军向乌水山一带，九中根据地大举进犯。这次进攻开始于1943年10月24日。敌动员千余兵力，分成三路，一路从笨珍路，一路从古来，一路从士来三间店、新港一带，形成一个大包围圈，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海南港和古来35碑，第九中队活动的重要地区。

敌人所以急于向九中进攻，是由于九中力量日益壮大。九中为了保护群众，曾派出两个流动队专门伏击敌人的巡逻军警，消灭汉奸走狗、暗探，并配合主力攻打警察局。这两个流动队非常活跃，他们的领导人，队长黎深和翁祥两人分别在振林山和笨珍路27碑，伏击军警时壮烈牺牲了。

在敌人这次大围攻之前，九中在一个晚上同时攻打了笨珍22碑和27碑两个警察局，这次行动虽没有把警察局攻陷，但影响很大。群众纷纷传说抗日军反攻了。紧接着又在大白天巧攻16碑半的警察局，夺得大筒机枪一挺，来福枪7支，及一批子弹。此役的胜利给群众提高了信心。附近各地如海南港，乌水港16碑半的群众兴高彩烈地扛了两头猪和鸡鸭等来慰问部队，欢庆胜利。因此，敌人对九中的壮大非常害怕，继士乃——古来地区的围攻之后，转向乌水山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敌人一开始进攻，先将海南港、乌水港、笨珍路 27 碑居住在山边的居民赶走，房屋烧光，企图把九中困死在深山里。九中当即派出突击队在外线各地袭击敌人，分散敌人兵力。有的转移至公路边伏击敌运输车，截断敌人供应。而主力则留在山上与敌人兜圈子，捉迷藏。整整与敌人周旋了九天。直至敌人一无所获而又筋疲力尽，只好撤兵。

这三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改变了整个柔南的抗日形势，人民抗日军的威信，群众的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都大大提高了，抗日组织蓬勃发展，要求参加武装部队的人越来越多。抗日军控制的地区也在扩展，迎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四、建立天吉港根据地

1943 年 3 月，司令部迁入天吉港。

第四独立队建队以后，经历一年多的艰苦战斗，司令部从上泗隆迁到玻璃城，这一带靠近公路和铁路主干线，是柔南工农业最发达，人口较集中的地区。也是敌人极重视，驻有重兵的地区。因此，敌我矛盾极为突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敌人连续进攻达九次之多。在这期间，第一任党代表陈路，因不能胜任此职，在部队建立不久，即 1942 年 4 月由中央解除职务，暂由刘文代理党代表。不久，政治部阿川，和管理部李文辉患病，由刘文带往新加坡治病，不幸在新加坡同时被捕。其后，中央委任朱老为党代表，朱老与正队长阿福（余洪）后来在“九·一”事件中壮烈牺牲，继由柔南马共地委书记阿潘兼任党代表。不久，阿潘又被日军逮捕。到 1942 年底，只剩下副队长陈培农一人，司令部工作人员、管理员老苏（即杜边）和秘书陆虚等人，常常背负着必要的装备和文件，在频繁的转移行军中作战，直至司令部迁来天

吉港，才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使部队建设走上轨道。

天吉港位于哥打河上游，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大盆地，距哥打丁宜市三十多英里，原先是荒无人烟的大森林，后因发现锡矿，由英资锡矿公司投资开采才成为一个大矿场。有工人、职员约三千多人。场内有发电厂，有小型铁轨，挖锡铁船等各种设施。日军占领柔南之前，英国资本家已逃走，矿场停采。附近的小锡矿、小木材厂也无法经营。工人纷纷外逃寻求生路，但仍有一千余人无处可去，留下来开荒种地，过着半自给的战乱生涯。

司令部在1942年夏，派出武装队伍到哥打丁宜区恢复地方组织，并建立了第七中队后，才发现这个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方。于是决定将司令部从玻璃城迁至天吉港。这里地形好，又有几百户人家，一千多居民。部队生活在群众之中，军民团结，可以发挥无穷力量。此地远离中心城市，没有公路，只有哥打河一条水路可通，是敌人不易到达，易守难攻的地方。而林中小路却四通八达，司令部依靠森林中土著部落的帮助，可由交通员联系分布四方的各个中队，正是聚集和壮大革命力量的好地方。

迁来天吉港时，司令部人员是：队长陈培农，政治部陆虚（陆在新），管理部阿甸（林达）和领导天吉港建设的吴亚浪。1944年初，司令部人员大调整，中央委任家雷为党代表、正队长陈田，副队长卢成，政治部阿甸，管理部小刚。陆在新调去搞报社，吴亚浪、陈培农调去搞民运工作。

司令部进驻天吉港后，即作长期据守的打算，故对天吉港进行全面建设；部队建设和地方建设同时进行。先从第七中队调来一个分队作卫队。接着从各个中队抽调指挥员与战士，建立模范中队，保卫天吉港。吴亚浪为中队党代表，任

亚年为中队长，亚宏为中队副，军事教官是林进，下设四个分队，有二百余人。

抗日战争期间，把根据地建设在居民点之中，军民团结，自成一体，成为一个小社会的条件是少有的。各独立队所属部队的根据地绝大多数是建立在深山中的。所以这里的抗日根据地建设经验，可看作是建设民主政权的一种实验。故此，比较详细的记述是必要的。

天吉港最大的群众组织是抗日总会，主要负责人是杨木（别名亚森）、邓华亮和李运生。会址在三板头“红毛楼”。下设四个分会；第一分会在对面港，第二分会在联丰街场，第三分会在半港，第四分会在泗色。会员遍布全天吉港，是最有权威的组织。在抗日总会领导下还有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等组织。

自卫队是半军事组织，由青壮年男女组成，接受军事训练。平时站岗、放哨、防范敌奸。在敌人进攻时，则配合部队作战。共有两个分队，约70人。

抗日总会对居民实行户籍管理制度，有亲朋来住宿要登记，出入要领取路条。没有路条，进不来，也出不去。自卫队的岗哨和巡逻哨很严密，敌奸难越雷池一步。

总会创办抗日公学，整个天吉港儿童可以免费入学。晚间则办夜校，吸收青壮年接受文化、政治教育。这在天吉港是破天荒的大事。

学校的礼堂，操场，又是文艺演出和召开大会，举行操练的好地方。因此，抗日公学就成为天吉港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的中心地点。学校首任校长陈如旧，教员有钟植松、李球等。

天吉港不使用日本军用票。由司令部印制一种流通票，作

为境内货币使用。居民外出可凭流通票换取日本军用票，回来时将日票换取流通票，这样可以维护居民生活不受日本军用票扰乱。

部队在这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每期约三个星期，学员由各中队选送。先后办了六期，对提高各中队作战能力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建立一支有力的宣教团，派到各中队、各地区进行工作，由老苏（杜边）任团长。这个团对整个柔南的抗日宣传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由政治部领导出版的《打日本》报，是抗日军的喉舌，有中文版和拉丁化马来文版。每周出版一期，报导各地区抗日斗争形势，报导胜利消息和动人事迹。同时有系统地报导国际反法西斯各条战线的胜利喜讯，揭露敌人的罪行，从而打破了敌人的新闻封锁，使真实的消息传遍柔南，成为广大群众和战士喜爱的报纸。

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在居民已有的开荒种粮的基础上，扩大种植面积，开办军民合作农场，由部队派出农作队伍，抗日总会也发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种植杂粮、蔬菜供应部队，大体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

抗日总会还建立了军民医院，虽然房屋和设备都因陋就简，医生却是非常负责的，有中西医生各一人。护士、卫生员三人，西药和中成药靠各个中队和各区抗日同盟会供应，但已经近于枯竭，主要靠中草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药品始终是巨大困难之一。直至1945年初，联军空投物资之后，才有缓解。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医护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想方设法治好战士和群众的疾病。

抗日总会和司令部还为整个天吉港军民的生活必需物资操劳，建立了供销社，组织运输队，到哥打丁宜、丰盛港、和

平港等地购回油、盐、布等物资供应市场。抗日总会实际上成了当地人民政府，事无巨细，都由抗日总会来解决。在居民中抗日总会行使着政府的权力。这就是天吉港军民创造的具有初步政权性质的社会工作经验的可贵之处。但因当时在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加上对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进行系统的总结，并在各地的游击区内推行。

五、扩大部队，增强作战能力

司令部迁入天吉港以后，对部队的领导工作逐步加强，发挥了指挥中心的作用，各个中队步入发展的阶段。

建立第二十中队

第13中队在文律区建队失败后，地方党组织和部份队伍仍然存在。1943年5月，司令部派林亚奉到文律找到熟悉地方情况的苏淼水，带着新颁布的“抗日九大纲领”重新建队。不料林亚奉在一次外出工作途中遭遇敌人，在战斗中牺牲。继派士乃区区委蓝清（陈桂清、文龙）任党代表，苏淼水任中队长，中队副周树。首先建成第一分队。跟随中队部在港顶15条石活动。分队长阿狗，（海南人，后调往第二分队任队长）指导员颜亚比（颜应中），有四个小队长，共约60人。

继建第二分队于双弄港顶，调阿狗任分队长，分队副为郑亚天，指导员梁良基，有三个小队，约50人。

第三分队建立在眼冬港顶大芭内，分队长兼指导员刘动（郑士照），分队副陈亚莲，有三个小队，一个突击队，共55人。

第四分队建立在文律顶14条石，是最后成立的一个分队。

第二十中队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至1945年初，已扩展成为拥有四个分队，二百四十余人的大中队。

第七中队长途转移，东渡哥打河

第七中队在万浮园建队后，于1943年中，受日军进攻，指挥部和阿存的分队一百多人突围后，经过三个多月行军，虽然受到敌人追踪袭击，略有损失，但仍然摆脱了敌人，经南亚、帝文进入东海岸大森林。又经过半个月行军，到达新港、老港，然后北渡西里里河，经和祥港进入和平港，与德平、阿汉领导的分队会合建立第七中队的新根据地。此后，第七中队发展成为活跃在哥打丁宜以东，北至和平港，南至哥打河口，沿柔佛东海岸这一广阔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对日军海上运输造成巨大威胁，并与天吉港的模范中队及兴楼——丰盛港的十八中队互相呼应，在柔南东线狠狠打击敌人。

新建第十八中队

1943年初，司令部派邵荣率领四中的一个分队挺进东海岸。在兴楼（Endau）、三板头（Semaluan）、丰盛港（Mesing）一带建队，成立第十八中队。建队后邵荣调回拉影拉影（Layang—Layang）负责民运工作。（不幸在一次与日军遭遇战中光荣牺牲）后由叶秀能任党代表兼中队长。叶秀能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后，司令部为加强十八中队的领导，抽调一帆（彭少山）任党代表，阿东任中队长，叶秋林任军训员，阿海、阿凤负责民运。这个中队初时只有几个分散的小队：如兴楼小队，三板头小队，武器也很少，因这一带原来组织基础薄弱。所以，部队发展较其他地区困难。到1944年，经过几次小战斗后，才有较大发展。建立成三个分队，共一百余人。第七中队曾派叶伟等人挺进丰盛港开展工作，以后并入十八中队。

1945年6、7月间，日军在东海岸派重兵布防。十八中队活动地区受到巨大威胁。司令部决定将十八中队与第四中队合并，由沉着（即阿钦、小马来）任党代表，一帆任中队长，根据地设在加坑至兴楼之间的森林中。不久，日军即投降。

发动红十月运动

抗日军经过士乃、古来、乌水山等地区三次反扫荡战斗取得了胜利，保卫了人民，打击了敌人，极大地提高了士气，鼓舞了群众，各地区的抗日组织与武装部队都在发展，军民联合组织的抗日宣传队、锄奸团、干部训练班、武装自卫队等，非常活跃，多数农村和小墟镇逐渐为抗日军所控制。在这一时期，部队结合地方组织开展了一场红十月政治运动，在全柔南各区普遍行动起来，造成一个强大的声势。

在笨珍路方面：笨珍路10碑、15碑、22碑、27碑及笨珍镇等大小街场，于11月7日早晨，上空飘扬着三星军旗。各警局、各店铺贴满抗日标语和宣言。六日晚，各地武装队伍，就把电话线割断，袭击警察局，把16碑新建的一所警局加以毁坏。27碑击毙一巡逻警察，驻守于22碑的日军，不敢出门一步。至7日早才在各街场戒严，如临大敌。

古来街场和士乃也是贴满抗日标语和宣言，并升挂三星军旗。六日晚，抗日武装队伍出发袭击古来日本兵营及警察局，破坏桥梁。

哥打方面：抗日武装队伍于6日晚在哥打市街贴标语、发宣言，并围攻日军营盘，敌营玻璃窗全被击碎。

新山海皮路一直到士乃各街场以及哥打路之陈厝港、班兰、13碑等地，于7日晨也发现贴满抗日标语、宣言和挂

满抗日军旗。

冷金、居銓等地，街场红旗飘扬，贴满标语、宣言。吓得日军手忙脚乱，临时大戒严。此外，各地还举行群众集会。如：

古来：于11月15日，由第四区军民联合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群众六百余人，抗日军人各执武器保卫会场。大会于十时许开始，主席致大会词后，相继登台演说者有抗日军代表，抗日会代表及各界同胞不下数十人。“团结、武装、抗日！”的怒吼，台上台下响成一片，充分表现对抗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闭会后，于当晚又继续开了军民联欢会。

新山的一个区举行的群众大会，有各民族群众千余人参加，盛况空前，当场捐献千元作抗日军战斗基金，并捐赠大批药品。

红十月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地区的群众情绪普遍有所提高，部队士气高昂。在这个基础上，抗日军部署了第一个春季攻势。

1、四打古来

第十二中队从1943年末到1944年春，连攻古来四次。在这四次战斗中，救出了被敌人抓去的壮丁，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

2、哥打东兴之战

哥打东兴镇是遥对新加坡北面的一个小市镇，日军在那里驻有小部队，存有大批汽油、粮食，还有军需库。第七中队在12月末调集了队伍包围该处驻军，展开一场猛烈的战斗之后，将该处所有的汽油、胶轮、粮食烧毁。火光冲天，直烧到第二天。

3、第七中队攻击东山之战

在东山，日军有石厂及汽油屯积库，派有小部队驻守。1944年3月4日晚，七中向东山进攻，密密地将敌营包围。日军于睡梦中仓惶应战，被击毙二人，其余纷纷逃命。拉日军将汽油库和罗厘车（即大货车）烧掉，荷枪凯旋。

4、勃兰东之战

在哥打马西一带，经常出现一批掠夺人民财物的日军爪牙。1944年3月26日，部队无声无息地夺取他们三支枪，这就是进攻勃兰东的先声。

4月10日夜里，英勇的摸营队出发了，他们静静地摸过了铁丝网，摸进了警察局，警察正在那里赌钱。枪声一响，先打掉了电灯，屋内顿时漆黑一团，枪声“卜、卜”乱响，正要夺枪时，日军援兵从马西冲来，部队不得已撤退，只夺得一支枪。虽然没有完成预定任务，但已经给日军以巨大威胁，使它不得安宁。

5、进攻白板

4月18日，进攻白板附近日本人公司，缴了一个投降的日兵的武器后，毁掉敌人所有军需品。

完成任务后，英勇的战士们跳上敌人的罗里车，车头上架起了机关枪，威风凛凛地开到街场去，当战士们唱着雄壮的歌声中抵达街场时，人们兴奋得无法形容，不断地欢呼着“抗日军来了！”“抗日军来了！”

六、击退日军两次围攻天吉港之战

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春，日军分布在柔南各地区的警备队、警察局不断遭抗日军袭击，军火库、汽油库、粮食仓库，屡屡遭破坏，大批敌奸、走狗、探子被逮捕处决。

余者不敢踏入抗日游击区，形势对日军越来越不利，于是集中兵力向抗日军指挥中心天吉港发起进攻。

第一次大围攻

1944年4月，日军向天吉港的第一次进攻，动员了陆、海、空军及“兵补”等约三千人，分五路向天吉港根据地进犯，声势凶猛。

3月30日上午8时，一架敌机掠过天吉港上空，过了两分钟，十多架敌机俯冲投弹、扫射。整个天吉港受敌机攻击，房屋被炸塌，电厂、学校、铁路被毁坏，人们四散躲避。日本侵略军用最残酷的手段来摧残天吉港。疯狂的轰炸和扫射宣告日军大围攻开始。

4月10日，日军兵分五路向天吉港进逼，一路从太盛抵泗色码头；一路从玻璃城经新杞；一路从哥打丝罗丹；一路从哥打8条石；一路从德茂芭山路。来势汹汹。但抗日军早有准备。30日敌机轰炸后，抗日总会就按照早已演习过的居民撤退计划，有秩序地由各居民小组长领队，将应撤退的人员疏散到预定的深山安全地点，以保护老弱妇孺的安全。在各个安置点，都预备好了粮食和用具等等，有足够的生活物资。自卫队则配合模范中队，加紧设防，严阵以待。

司令部的作战方针是：面对日军大军压境，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根据地必须避实就虚，坚壁清野，以小队为单位，选择有利时机，大量杀伤敌人，困扰敌人，把敌人拖垮、打垮。同时，把战场扩大到整个柔南，进行外线作战，发挥抗日队伍分布地域广阔，有广泛人民支持的优势来打击强敌。

第一个胜仗是在太盛河边打响的，突击队选择有利地形，拦腰突袭来犯之敌，打死打伤数十敌兵。

在玻璃城方面，日军到达深山中的玻璃河边，砍下一棵

老树作桥梁，企图过河。抗日军据守河对岸，在居高临下的工事内，对准首先爬过河的日军，一枪将其打落河中。可惜当时唯一的机枪坏了，再也打不响，无法压制对河敌人的密集射击，只好后撤。敌军渡河后，摸到军民合作农场，将来不及撤走的群众叶顺叔抓去，乱刀刺死。

敌人数路进入天吉港，不是中地雷，就是遭机枪扫射，但却找不到抗日军踪迹。晚间敌军宿营，又受袭击，整夜不得安宁。以致敌军不得不在夜间用空罐头装上小石，用绳子串着吊起来，围在四周，以防偷袭。即使如此，敌兵晚间还是不敢走出房门一步，在屋内拉屎拉尿，弄得臭气熏天。

与此同时，抗日军在外围展开进攻，袭击敌人运输队，破坏桥梁，连古来 3 5 碑的铁桥也被第十二中队爆破队炸得不能通车。敌人围攻天吉港历时十天，既找不到抗日军踪迹，又因补给困难，没有粮食，人困马乏，士气不振，而不得不退兵。敌人撤退时又多次遭到伏击。日军对天吉港的大围攻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司令部于“5·1”节发布抗日军粉碎敌人围攻天吉港一役的战绩如下：“战斗 4 1 次，其中二十多次是我主动向敌驻扎地进击，十次是迎击敌人围攻的，敌死伤一百多名，（包括一少将，一大佐，一中尉），其中尤以敌人在泗色码头损失最大。敌人受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中伏击，中地雷，受奇袭，抗日军夺得了六支长枪（包括 1 6 碑之役则为 1 4 支）破坏敌人无数军需、粮食库和交通铁桥。”这次天吉港根据地反围攻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柔南军民。

第二次大围攻

到了 9 月，日军又调集大军，一面以精锐主力分四路向天吉港根据地进攻，一面陈兵哥打丁宜、新山、古来、居銮

等地，同时向各中队攻击。在各地同时实行肃清、招安，妄图一举消灭抗日军，瓦解各地区抗日组织，扑灭柔南抗日力量，其野心之大，前所未有。司令部与地委综合各地情报，早已察觉了敌人意图，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司令部几位领导亲自到各中队指挥部召开会议，介绍当前形势，传达司令部指令，帮助中队做好战斗准备，地委号召各地区党组织，抗日会、自卫队普遍动员起来，迎击敌人。

9月24日，日军开始进攻天吉港。一路从哥打河口逆流而上，运来“亚答”木料等建材，准备筑营长驻天吉港。一路从古来进入玻璃城，直指天吉港。另两路从哥打路进兵。司令部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壁清野，从内线转移到外线，变敌人进攻为进攻敌人，变敌人封锁为封锁敌人。更多地杀死杀伤、消灭其有生力量。各中队互相配合，抑制敌人，不使其战略意图得逞。

活跃在古来地区的第十二中队，立即化整为零，由党代表陈卓（亚钦），中队长亚标、副中队长阿南、叶茂生领队转往外线，部队只留管理部吴清川率一个小队24人留守。各中队以小队为单位，分散协助民运工作，动员群众埋藏贵重物品和粮食，妇女和小孩，以及主要道路沿线群众撤退到安全地带，在外线的队伍则对铁路、公路、交通，小镇内敌据点主动出击，牵制敌人，使敌人后方不得安宁。

扼守在玻璃城河要隘的第十二中队狙击队，接到侦察员报告：敌六百余人，已从古来拨营前来，队伍立即进入河西阵地。阵地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能清晰地望见河对岸敌人动静。日军老远就一路开枪搜索，前进到达河边，一日军官指使士兵测量水深，大队人马簇拥而至，狙击队长一声令下，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怒吼，敌指挥官及旗手首先倒地，水中。

岸上的日军纷纷中弹，后面日军继续直向河边冲来，狙击队居高临下，将开阔地内的日军一个一个地击倒。后来，日军佯作退后，诱狙击队冲锋，但狙击队只以有节奏的枪声打击敢于冒犯之敌。日军不敢恋战，拖走数十具尸体后退，直至援兵开到，才又前进。这时狙击队已转到“才成芭洋”（沼泽地）阵地去了。在“才成芭洋”阵地上，不足一个分队的狙击队伍，据守两处高地，交叉射杀轮番冲击的敌军。杀得尸横遍野，芭洋染红。抗日军达到狙击目的后，撤出阵地，日军直到次日，才开车把遗下的尸体拉走。

四路敌人进到天吉港，却找不到抗日军踪迹，而这时抗日军却在外线主动地寻敌厮杀。在此次战役发展到二十天时，司令部发表如下公报：

“日军自从今年四月大围攻柔南，遭受我英勇战士痛击以及人民紧密团结所粉碎以后，联军反攻马来亚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在这危机四伏的关头，日军为了掩饰其薄弱与失败的面目，为了破坏抗日军在反攻前夜的战斗准备，为了守住马来亚这个战略据点，为了更疯狂地掠夺人力、物力以挽救其危急的战争局面，日本法西斯向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全面进攻。可是这几个月来，由于全体抗日军战士及人民坚持斗争，日军的一切阴谋都告惨败。因此，便于9月24日再次向天吉港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出动其驻军约千余人，加上“兵补”、警察和败类爪牙共约数千人。其残酷性为前所未有，它一方面分四路以精锐主力进攻哥打天吉港。并运来“亚答”建营长驻，封锁我粮食，断绝我交通，寻找目标向我挑战，长期围困以图达到其招安及破坏这重要（日军认为是重要的）抗日军地盘的目的；另一方面则用一半兵力在周围各地普遍进攻，在进攻中实行招安，肃清和战争

动员（如抓壮丁，夺铁器等）的工作，以配合围困打击抗日军及抗日人民。

在日军围困和进攻的二十多天中，各中队英勇的指挥员和战士表现出空前的果敢和忠诚于反法西斯抗日事业。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坚持苦斗，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在玻璃城，抗日军神出鬼没，杀得日军在泥浆中打滚，死伤百余人（其中一海军少将）……。30日中午，在泗色路上，抗日军集中兵力伏击日军退军，日军死伤百余人，其中有一高级指挥官。8日，在太盛码头，抗日军乘敌他往，烧毁日军建筑用物资，破坏了日军建营长驻的一部份计划。此后，敌人仍继续长驻天吉港，司令部被迫转移。直至1945年初迁回天吉港。在此之前，各中队全面展开的反围困斗争，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各地区军民团结，破坏敌粮食，袭击运输车辆，夺取其物资，封锁其补给线。自卫队、锄奸团、突击队散布整个柔南，对敌奸、走狗实行打击、瓦解或争取的政策，极大地破坏了日军的统治系统，削弱了日军的力量，这些持续不断的斗争，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到12月15日，三个月以来共战斗29次（其中26次主动打敌），消灭日军、兵补、敌奸共187人。（包括消灭日本海陆军官3人），夺取5支步枪，6支猎枪，子弹482发，消灭敌奸、密探136人……。”

七、抗日同盟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抗日同盟会（又称抗日会），是遍及全马的人民抗日组织，它与人民抗日军同时产生，互相依靠，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两大支柱。

抗日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人民创立了自己的军队，没有国家力量可以依靠，只能由人民自己建立，自己供养和扶

持。而人民抗日军是人民的军队，不但要依靠人民，更重要的是为了人民利益，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保护人民，削弱日本法西斯的军事、政治力量，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达到驱逐日本法西斯，解放马来亚人民的目的。因此，抗日会与人民抗日军是缺一不可的孪生兄弟，同时肩负着战争重任。

柔南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陆续建立起抗日同盟会，其任务就是宣传抗日，组织群众，输送抗日青年参加人民抗日军。当部队成立以后，则全力支持抗日军与敌人展开武装斗争，如募集粮食、药品、和捐款供应部队；收集情报，配合抗日军消灭奸细，为部队带路，传递消息等。这一切为部队提供了可靠的后勤服务，而部队则负起保卫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汉奸走狗；帮助地方上训练自卫队，派出宣传队加强宣传工作。事实说明，抗日同盟会与人民抗日军是鱼水相依，不可分离的两个部份。抗日军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抗日会的努力。而人民更离不开抗日军的保护。

以下几个军民合作，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说明：

1、抗日会员扒火车，夺取军火：士乃抗日会有几个青年，为了生活，经常扒火车。即从古来、士乃等地搭火车去新加坡贩卖一些粮食、物品，回来时爬上火车顶，撬开货车门锁，将日本军需品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推下，由另一部份群众搬走。有大米、白糖、香烟等等。后来抗日会要求他们与部队配合，不但扒物资，还要扒军火。约好行动口令，抗日会派人在铁路旁守候，抗日军负责武装警戒。晚上，这些青年人都从新加坡或新山车站上了车，到了约定地点，迅速撬开车门，将货卡内的物品推下，他们跟着跳下车来，每次都

有不少的收获。最后两次共扒了一百多箱手榴弹，还有四箱炮弹和其他物品。部队把生活物资大部份分给群众。鬼子发觉了失窃弹药，又不知为何失窃，只好派兵押运，自此以后，火车飞行队的活动就困难一些了。

2、武工队拦截日军货车：1944年士乃区抗日会争取到士乃警察局印度籍警员的同情，乘警察设卡检查来往车辆的机会，拦截日军运货车，取得物资，供应部队。当警察检查货车时，碰上是日军的货车，二个化装成老百姓的武工队员就上前要求搭顺路车，当货车行约两英里，迫使司机把车开入沙冷地区，把全车货物卸完，才把空车放走，这样搞了两大车食品，供给部队，日军知道了，派兵来搜索，但找不到抗日军的踪影，以后又干了两次。

3、说服警察，收缴武器：1944年“五·一”节前，古来区抗日会计划夺取笨珍路27碑警察局的枪。这个警察局有三十多名警察，多数是本地马来人，由于马来村长（蓬姑鲁）和部分警察已经和抗日会有联系，同情抗日。在这样的条件下，部队使用说服全体警察，和平收缴的办法夺取武器。先由抗日会领导人钟元找村长谈话，请求他帮助说服马来警察。（因为马来人一向服从他们的村长）。经过耐心的宣传，村长终于说服了一些倾向较好的警察，约定一个晚上在28碑附近开警民联欢会，13名警察依约带枪来到。陈炳光队长带着6名战士，全部配带清一色的新式武器，警察们看见盛装的军容，听了讲解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道理，都愿意把枪支交给抗日军。当场交出13支，并且回去警局动员另11名警察，把尚有的11支枪也都交了出来，然后全体逃离警局，不再为日军卖命了。

又如和平港一带的抗日会动员群众煮盐，供应各个部队

和天吉港军民，解决了食盐困难。士乃的抗日会把工作做进新山日军罐头厂，工人偷运大量鱼类食品供应部队。新山医院的药品，被偷运进部队卫生队等等，都是抗日会努力工作的结果。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同盟会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做了许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抗日同盟会机关报《群众报》，是柔南人民的喉舌，除了有华文版外，还与《打日本》报一起编印马来文版和英文版。报社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定期出版，通过地下交通网将报纸输送到各族人民手中，三年多时间内甚少间断。在新闻和政治战线上起到了揭露敌人，鼓舞群众，加强军民团结的良好作用。

抗日同盟会在团结马来和印度族群众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有专设的民族工作机构，由懂得英语或马来语的干部负责。民族工作的开展，改善了部队的斗争环境，打击了日军的民族分化政策，加强了中、马、印三大民族团结。

扩大反法西斯抗日联合战线，也是抗盟的重要任务之一。各地区的组织结合除奸、打狗、惩办首恶等活动，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在战争形势逐渐转为有利的情况下，争取到了不少原抱中立或观望态度的华人中上层人士和马、印族开明人士。到1944年之后，因欧亚各条战线不断传来喜讯，联合战线的工作就更有成效了。这方面的工作对孤立敌人，发动群众支援抗日军，争取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有巨大的贡献。抗日会的干部在敌人的眼皮下，置生死于度外。在整个战争时期，抗日会各级干部被捕、被杀或意外惨死、病死的人数，多于阵亡将士。这就说明了抗日同盟会任务艰巨和处境的困难了。

到了1944年，不断传来捷报，苏联红军反攻，英美

在北非作战胜利，美军在太平洋上打击了日本法西斯。形势明显的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到了1945年，形势更加明朗。德、意、日败局已定，马来亚抗日战争的形势也更加有利了。在这个大局之下，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会都有很大的发展，抗日组织不但遍及各处乡村，而且向市镇发展。因此，抗日会加强宣传工作，加强了民族团结工作，经常派出宣传队，召开军民联欢会，使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会的威望更高了，对部队的支援也更为有力。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抗日同盟会已发展成为实力强大，极富威望，能控制局势的半政权组织了。

八、三大斗争和全面鏖战

到了1945年，斗争更加激烈，抗日军取得几个重大胜利，这就是著名的反排华斗争；海上夺粮斗争和粉碎“昭南新村”移民垦殖计划的斗争。

1、反排华斗争

第二十中队活动地区，是马来族占多数的沿海人口稠密区。自北面巴株巴辖起，逶迤向南延伸向宋加兰、龙引、文律、笨珍。这方圆约六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活动着以华人作为主要成员的第二十中队，和抗日同盟会。日军对这一地区内日益强大的抗日力量，既恨又怕。到了1945年，日本法西斯临近崩溃的阶段，妄图垂死挣扎。对柔南所有抗日地区实行全面的疯狂进攻。这时，驻巴株巴辖的日军，兵力不足以施行围剿，便阴谋煽动民族冲突，利用马来族中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掀起一股排华恶浪，妄图借刀杀人，达到其消灭抗日军民的目的。为此，日军花了很长时间作准备，它们到处向马来人散布“抗日军是华人的组织，将来华人掌权，马

来人要受华人统治”云云。同时以给马来亚独立，让马来人掌权为诱饵，收买柔佛州封建头目，和一些亲日的“彭古鲁”（村长）、神职人员，并发给他们一批武器。日军在散布离间民族的谣言同时，还派日本兵化装成人民抗日军到回教堂杀猪，拉屎，烧回教堂，用渎犯“真主”的行为激起不明真相的马来人的仇华情绪。首先由麻坡的神职人员“阿依沙里”（Kiyai Salleh 来自苏门答腊的一个马来人）在巴力爪哇纠集马来暴徒在神像前宣誓杀尽华人。令所有成年男子手持长刀，配合持枪的“兵补”和警察向华人居住区杀去。终于在1945年5月爆发了马来人滥杀华人的民族大屠杀惨案。

日军挑动的民族大屠杀，来势很凶猛。一到华人区，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不论是否和睦友邻，也不论男女老幼，连刚出世的婴儿、孕妇、老人都不能幸免。排华之风日甚一日，一面向北蔓延到麻坡，一面向南越过巴株巴辖，向宋加兰、龙引、文律、巴力拉惹、四卡亭扩展。这一广阔范围内华人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场大规模民族冲突的危机迫在眉睫，形势十分严重。第二十中队指挥部来不及向司令部请示，经过与文律区委共同研究后决定：①立即把部队分散，开到椰林、胶园、村庄去，配合地方自卫队与抗日会群众一起，组织全民联防。②组织一个由马来族战士和地方民族干部参加的武装宣传队，以最快的速度开到发生大屠杀的地区——龙引去，协助第三分队进行宣传，阻止大屠杀蔓延。③在部队控制区内，与地方抗日组织结合，组织民族宣传队，向马来族群众宣传，挨户收缴杀人武器，预防在外部影响下，内部发生大屠杀。④在必要时，攻打文律日军据点。指挥部一面把方案上报司令部，一面与区委取得一致后立即行动。到龙引去的宣传队连夜出发，

各分队下乡的队伍，限在天亮前到达目的地，立即组成军民大联防。

人民抗日军处理这次排华事件的原则是：杀人队伍来时先喊话宣传，揭露日军阴谋，宣传无效则向天鸣枪警告，而不伤害马来族群众。如果发生战斗，着重惩办首恶，以武力压制在幕后指挥杀人队的日军。

首当其冲的龙引地区，由第三分队结合抗日会、自卫队员组成战斗队伍，立即布防。一日清晨，侦察人员发现，由二个日本军官率领兵补及警察60多名，带着几百名马来人长刀队在中江港，飞八港集中，向眼冬方向而来。军民联防队伍立即赶到新邦（叉路口）布阵。正在这时，中队长苏淼水和卫队从中队部赶到，他随身带来新式武器“士丁”冲锋枪一支，随即交给“打狗英雄”郑秋菊使用。不久，前面出现了杀人队，成群结队的马来人头裹头巾，下身着沙笼，光着上身，手持一尺多长的“巴冷刀”（砍草刀），嘴里念念有词，在反动头目率领下，蜂拥而至。第三分队在指导员兼分队长刘动（郑士照）的指挥下，以一个小队居中，第一、三小队居右，突击小组居左；先由中路以猛烈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压制前沿，右路两个小队突然在敌中部出现，拦腰袭击，使日军慌了手脚，突击小组这时正从密密的茅草丛中摸到敌后，见日本军官在椰树下摊开地图，正在指挥杀人队。战士们忽然从水沟中跳出，郑秋菊用“士丁”冲锋枪猛烈扫射，其余组员的手榴弹同时飞到，当场击毙日本指挥官二人，打死兵补、警察三人。敌人受两面夹击，乱作一团，三分队乘势发起冲锋，杀人队、警察，兵补四散逃窜。此战役敌死伤五十余人。其中有日军官二人，警长三人，缴获短枪二支，步枪四支，猎枪三支及一批子弹。

不幸的是，中队长苏淼水在战斗打响之时，被站在他身后的抗日会青年交通员失火误伤，因伤势过重，不幸在胜利声中牺牲，年仅24岁。

敌人的杀人凶焰虽被压住了，但危机还未完全消除。部队加紧向各村镇马来群众宣传。这时《群众报》社编印的马来文宣传品大量运到，内容特别强调中、马、印三族团结，反对自相残杀。一面挨户收缴杀人凶器，收缴时发给收据，说明一待局势平静，就会交还。这时，许多马来群众都自愿配合，华族人民额手相庆，对抗日军有更高的认识了。

敌人在龙引一役失败后，好几天没有动静。六月初，却由巴株巴辖派了一个所谓“慰问团”来文律镇，由日本县长、警察局长带领华侨协会会长粘天生携带一车物品，还有台籍医生与几名护士，说是“慰问”逃到文律来的各地难民。

第二十中队指挥部接到情报后认为，敌人可能以“慰问”为名，在文律发动一场大屠杀，决定先发制人，攻打文律镇。把被困在文律的人民拯救出来。此举也可牵制敌人，减少敌人对龙引的压力。此时，司令部派了一个小分队，携带新式武器支援第二十中队，真是如虎添翼。

进攻的路线分三路：第一路以第四分队为主，由四分队长率领，朝双弄出发，插到水岸港，封锁通往笨珍的水岸公路桥，同时派一小队从小路进入文律；第二路由第一分队长率领，沿文律河出发，封锁通往巴株巴辖的三条桥；中路由第一分队的大部份和司令部支援分队联合组成，由副队长指挥，沿巴力丁雅胶园小路攻打文律新邦警察局，然后由公路直插文律市区。布置完，立即行动。当大队抗日军出现在新邦警察局时，警察吓破了胆，乱作一团，争先逃命，有些举手投降。抗日军不发一枪，占领了警察局。正在这时，三车

日军从巴株巴辖开来，他们是尾随“慰问团”来的。刚到三条桥，受警戒部队伏击，先头车被击毁，敌略有伤亡。车上日军架起机枪盲目扫射，但在一分队坚持阻击下，始终无法越过大桥，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被牵制在桥头。占领新邦警局的部队沿公路进入文律。这时四分队也已由水岸河的东山庙旁进入文律。敌“慰问团”发现人民抗日军，欲向新邦逃走时，正遇上中路部队。两个佩带指挥刀的日军官，见势不妙，跑进一间杂货店躲起来，我先头部队在商店伙计的指引下，把这两个家伙揪出来，当场击毙。年迈的台湾籍医生吓得说不出话来，站着直发抖，其余人员都被俘。部队没有伤害他们，带他们回营地。台湾医生吓得不能动弹，只好用担架把他抬回去。后来这些人多数转变成为部队的医护人员。

桥头阻击敌人的枪声，和打死日本军官，使文律居民感到恐慌，害怕敌人报复，又来大屠杀。抗日军立即动员全镇居民撤退到游击队控制区去。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收拾衣物，拖男带女，跟着部队撤离。直到最后，坚守三条桥的队伍才在猛攻敌人后撤走。日军经受这次打击之后，排华风潮暂时平息了，但在巴株巴辖、宋加兰、四卡亭等地仍有余波。

2、海上夺粮。

第七中队活跃在哥打河下游和东海岸水域对敌人的水上交通和海上运输，构成了威胁。1944年中，七中得到抗日会情报，袭击了由哥打丁宜乘车到马威镇，然后乘船到西西里的伪警长，并进攻伪警局。其后不久，又攻打敌水上警察局。这次战斗，不但缴获了十多支枪，还缴获了一艘电船（即机动船）。

1944年底，七中侦察到日军常从泰国购买粮食，用

· 大型机动木帆船运来新加坡，东海岸是海上粮船必经之地。于是七中队结合地方组织开展了一场海上夺粮斗争。在数日之内连续夺得大批粮食，既打击了敌人，又缓解了抗日军民的粮食困难。这一役，第七中队派出有三十多位精干战士组成的水上突击队，用两只汽艇（其中一艘是战利品），在一天下午开出西西里河附近海面，截击敌人运粮船。汽艇上插上太阳旗，用来迷惑敌人。这次敌人用七艘大型机动木帆船运粮，每船有三至四个日兵押运。当七中的汽艇靠近最前头的三艘粮船时，不待船上的日军弄清是怎么回事，战士们迅即登上粮船，缴了他们的枪，将敌兵俘获。这样，一枪未发就夺了三船粮食。当后面四艘大船上的日兵察觉有异，向前面开火时，已经晚了，抗日军已截住他们，以优势兵力猛压过去，当场打死四、五个日军，其余十多个被活捉。这次战斗只用了十多分钟，夺得七艘大船，缴获二挺机枪，三十余支长枪，七艘粮船押运到接近和平港的港口，动员部队和抗日会群众搬运粮食。获得大米数十吨，和一船的咸猪肉、红糖等大量食品。部队一面将战果上报司令部，请求天吉港派运粮队，将大量大米、副食品运往天吉港；一面配合抗日会，发放给和平港抗日群众，动员群众用最隐蔽的办法，收藏粮食。日军兵被关押起来，船工更受到良好的接待。到了一切布置好了，七中便又在海上截获一艘机帆商船。然后利用这艘空船，把所有的日本兵和船工们释放回新加坡。果然不到三天，大队日军从水陆两路来包围和平港基地。但抗日军已转移，附近群众也已疏散，敌军占领的仅是一座空营地。敌人放火烧了营房和附近房屋，沿途骚扰群众，愤愤然退兵了。

3、粉碎“昭南新村”移民垦殖计划的斗争

日本法西斯占领新加坡后，将新加坡改称为“昭南岛”，

妄图永远霸占。为了稳定其后方，解决其远征军队的补给，1943年8月计划在柔佛的兴楼，与森美兰的马口，开辟两个大垦殖场，兴楼开辟的垦殖场名为“昭南模范新村”，原计划招收三十万名新加坡华籍移民，前来开垦兴楼的荒地，种植粮食。这是日军为了摆脱粮食不足的困境，实行变相拉夫，强迫人民种粮，为其服务的一个阴谋。日军在新加坡以供应充足粮食（当时新加坡粮食奇缺）等优厚条件为诱饵，号召新加坡居民报名参加。当时日军在新加坡征用青年劳工，抓兵补，许多青年及其家庭宁愿到新村去，逃避日军征召。因此，确有不少人报名参加，陆续从新加坡移居兴楼新村。

第十八中队与兴楼地区的党组织、抗日会，针对日军的垦殖计划，结合建队与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的工作，坚持不懈地给予打击。十八中先后在兴楼、三板头和丰盛港建立三个分队。为了粉碎日军强迫人民无偿劳动的阴谋，先后在兴楼茶楼枪杀新村汉奸李俊民，策动新村村公所人员携枪投向抗日军，数次袭击新村建设指挥部，击毙指挥部黄某。丰盛港分队又在公路上数次伏击其运输车辆，并于1944年冬击毙“昭南岛”华侨协会理事、主持兴楼新村事务的大汉奸陈某和一日军指挥官，使日军的新村建设和垦殖计划受到沉重打击。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止，“昭南模范新村”移民总共不足三万人，还不到日军原计划的十分之一，所谓垦殖农场，也成了泡影。

到了1945年初，日军在太平洋屡战屡败，法西斯阵营的崩溃已经指日可待了。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英军取得联系后，获得空投武器物资的援助，力量成倍增长，日军更加惶恐不安，在排华阴谋失败，海上运输受阻和“昭南新村”计划惨败之后，更加老羞成怒。于是一场全面鏖战在柔

南展开了。

在文律地区，日军调动了庞大兵力，分别从龙引、冷金、笨珍三面进攻。沿途烧屋，破坏农作物，抓人，矛头直指文律森林，妄图围歼第20中队。部队早已得到情报，各分队以小队为单位，分散到椰林、胶园、村庄去，与广大群众一起。当敌人劳师动众来到抗日军营地时，只剩下一座空营房。敌人驻下来四处搜索，找不到抗日军，只糟塌了道边群众的房舍。而在冷金敌人却受第四中队伏击。当敌人集中兵力于冷金时，四中队已不知去向，敌人再次扫荡文律，动员了一千多海军陆战队，陆军兵补和警察等，分十三路向第二十中队各分队根据地，进行篦梳式地围攻。各分队充分依靠群众，把队伍分散各处保护群众，选择有利时机，伏击敌人。第二分队队长郑亚天带一小队在双弄港伏击敌人，伤敌数人后安全撤退。指导员等人在分队营房守卫，被敌人摸进营地，击毙哨兵，三名病员被害，营房被烧，损失较大。第一、三、四分队分散作战，使敌人死伤累累。晚间宿营，到处是枪声，日军感到遍地都有抗日军，但又找不到踪迹。

古来方面：三车日军，进攻乌水山地区，被第九中队埋伏在公路旁胶林中伏击，消灭了一车日本兵，抗日军牺牲一名指挥员，伤了二名队员。在士乃至新山一带，日军出动坦克，直攻到玻璃城、老杞等根据地，但第一中队和十二中队早有准备，转移到有利地带。抗日会干部和群众则撤退到街场或公路边，避过敌人锋芒。抗日小分队则趁敌不备，以小队袭击敌人，飘忽无定。用这种战术与敌人周旋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第七中队根据地和平港、哥打河下游一带，日军海、陆军配合，大举进攻大华港等地。以致中央直属特别队不得不

带着英军情报组西移至天吉港根据地，敌人甚至派遣“敢死队”，深入丛林深处，施行突然袭击，即所谓“丛林战”。有的地方抗日军也蒙受损失。如受抗日军保护的联军先遣人员马丁少校（Major Martin）就是在一次日军进山时，在一条山溪里洗澡遭到突然袭击而身亡的。在哥打丁宜以东的广大地区，第七中队在和平港、老港、四湾岛、七湾岛、南亚等地与日本军警、特务、走狗进行剧烈的战斗。毙伤敌人甚多。而抗日军亦有损失，中队长叶秀能在万浮园一役中壮烈牺牲。

关于这一时期的战况，据当时的柔南地下油印报登载，“四独”司令部做了一个扼要的总结如下：

“从1944年9月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中，我们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战斗。这个时期是我们开始与联军取得联系的时期。十月底，也是我们力量有了大的增强，敌人也最疯狂进攻的时期。可是我们在这期间，完成了光荣的任务，保障了联军先遣队的安全，粉碎了敌人各种各样的进攻，粉碎了敌人挑拨民族分裂，互相残杀的阴谋，做好了配合联军反攻的准备工作。

敌人在这期间进行了二次大围攻，第一次是春季东海岸的大华港，第二次是日本投降前的夏季，西部、中部两路的围攻，又攻到老杞，这些战斗中，我们夺取了敌人一些武器，战斗三十多次（大规模的），敌人及走狗死伤一千多名，我们也蒙受较大损失，我们损失了一些优秀的指挥员，这期间的损失，等于我们几年战斗中的一半左右。”

九、与联军合作迎来胜利

1944年10月，东南亚联军从印度派遣联络员乘潜水艇在柔南东海岸以橡皮艇秘密登陆。领队人是曾任新打山

英资橡胶种植园经理的马丁少校，随行的有两位英国人，几位重庆派给英军的马来亚华裔报务员。他们乘橡皮艇登陆后，躲在草丛中不敢出来。几天后干粮吃完，不得不叫二个华人装作平民出来觅食，被抗日军交通员发现带到部队来。经盘问，才知道他们是英军情报人员，立即把他们七人请到部队，由中队领导人黄勇（即张天河、南学）、德平派队员保护他们到安全地区去。从此，柔南部队与联军代表发生了联系。此外，在第七中队根据地附近，也有一个中央直属的特别队，保护着一个英军情报机构。领头的是巴里和克罗斯，他们有收发报机等配备。在日军占领吉隆坡之时，即已开进柔南，不知何故未与联军总部联系上。1943年中，英军从哥伦比亚派遣台维斯等人从霹雳登陆，找到人民抗日军以后，同年底与马共、人民抗日军代表签订了共同抗日的协议，至1945年2月获联军总部批准，于是空投武器，物资支援抗日军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了。1945年5月，在天吉港至玻璃城的大森林内，开辟了一个空投地点，英军B24型飞机在约定的信号下，空投一批武器、装备和数批英军联络官和工作人员，抗日军获得一批新式轻武器和必要的物资，装备了五个新队。（约有八百人，而原有的老队不动，另建与英军合作的新队）这就是在1945年初新建的五个中队。计有：由七中队负责筹建，活动于哥打河口沿岸的第33中队。由第四中队筹建，活动于居銮地区的第5中队……。这几个中队都是从老队抽调干部和老战士为骨干，大量吸收自卫队员和抗日同盟会会员，而扩建的，他们都配备有英军空投的新式武器和装备，各中队普遍使用“士丁”冲锋枪和卡宾枪，指挥员配带新式自动手枪，双筒望远镜，军事地图，手表式指南针等等。分队配备有收发报机与中队联系。英军则派有联络

官和工作人员驻在各中队，负责与他们总部的联系，他们就是所谓的“136部队”人员。在建立新队的同时，成立了一个与英军合作的新队司令部，也称作“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负责人是：正队长：陈田，副队长：张天和（南学），政治部：陈路，管理部：蓝青（陈桂清）。

正当人民抗日军密锣紧鼓地准备配合联军反攻马来亚，消灭日本法西斯，解放马来亚各族人民之际。日军突然在1945年8月15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马人民欢欣鼓舞，人民抗日军奉马共中央命令，立即离开山区根据地，进驻各大小城镇。当抗日军高举三星红旗，意气高昂地进入各地大小城镇时，受到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热烈亲切的欢迎。部队所到之处万人空巷，道为之塞，红旗招展，欢声雷动。人们以各种方式来慰问部队，表达他们对人民抗日军的爱慕、敬仰之情，部队一进入城镇，立即接管警察局和敌人重要机构，肃清敌奸走狗，封存日军占有的粮食、物资、没收敌产、维持社会治安秩序。与此同时，各地区的抗日同盟会在扩大了的社会基础上迅速建立人民委员会，执行管理城镇的职责，为保卫人民利益做了许多工作。如建立治安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召开公审大会、惩治汉奸走狗、开仓救济难民，恢复商业、交通和市政服务，使社会生活日趋正常。人民委员会在驻守部队的有力支持下，起到了初步的人民政权的作用。

抗日军进驻的城镇如下：第二十中队由陈亚振率领，进驻巴株巴辖及所属宋加兰、龙引、文律各镇。

第五中队由朱高率领进驻居銮及所属金、拉影等地。

第一中队进驻新山。

第十二中队进驻士乃、古来。

第七中队（派两个分队）进驻新加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抗日军在日军还没有放下武器，英军未曾登陆之前，率先收复新加坡，把胜利的军旗插在新加坡岛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

新加坡在沦陷初期，日军实行检证大屠杀，数万青年惨遭杀害，接着又大搜捕，大批抗日志士被捕被杀，加上内奸莱特的出卖，抗日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其后日军反复摧残，致使抗日游击队伍一直无法在新加坡活动。日本投降后，四独司令部受马共中央指示。立即派队开赴新加坡，由老队副队长卢成与七中队指挥员率两个分队，乘船顺哥打河出海，经贡贡、边加兰等港湾，于1945年8月22日在新加坡东部勿洛渔村登陆。作为人民抗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取得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和抗日自卫团联系后，立即开展消灭敌奸走狗，封存粮食物资，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待新队从新山浩浩荡荡开到新加坡后，才正式设立办事机构，没收敌产，救济难民，着手恢复工商业，……。9月5日英军先头部队在新加坡登陆，9日英国派大军在巴生港沿海登陆，12日接受日军投降，完成了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的计划。从此，马来亚再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抗日军经过三年八个月的浴血奋战，给予日本法西斯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保卫人民，争取马来亚的独立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在战争胜利结束时，“四独”司令部在当时的油印报上发表三年多的战斗总结如下：

“总结三年多的战斗过程，我们与敌人战斗共150多次，其中80多次为主动进攻，袭击敌人。共打死、打伤敌伪军警、走狗、叛徒五千名以上。破坏敌人桥梁、火车、军

火库、铁路、电线、汽车无数。而我军抗日同盟会干部、战士、抗日群众也蒙受了巨大损失……。”

日本宣告投降后，人民抗日军为了进驻城镇，在新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有少数老队开进城镇，多数老队奉马共中央命令，秘密收藏武器，将干部战士遣散，分布到工、农、商业或文化界找寻工作，成为新建的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各种群众团体的骨干。

12月1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新队（少数老队）奉中央军委代表命令复员。五个新队集中在新山举行复员仪式，被迫把人民手中的武器交给了英军。随后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柔南分会。

本文撰写及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彭少山	吴亚浪	杨诚忠	钟植松	陆明	黄香甫
肖小红	叶佛青	罗须磨	岑其原	陈森	吴平浪
丘隆	钟元	郑士照	郑少忠	陈诚志	陈炳坤
何仕伦	梁家强	陈小燕	叶伟	罗茜萍	周南星
黄铁礼	陈学平	朱小康	刘富华	刘秋心	韩亚光
许世荣	雷重荡	李光良	张志明		

（第一稿由陈森执笔，第二、第三稿由罗须磨执笔整理。）

(五)中、北马的一支抗日劲旅—— 霹雳州第五独立队

一、前 言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简称“五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马来亚霹雳的一支抗日武装部队。她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全马沦陷后的艰苦环境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与各州的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坚持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动摇了日本侵略者对各族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牵制了日军的大批兵力，有力地、成功地支援了联军对日反攻，在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马来亚抗日战争，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全民性的丛林游击战争。其主要特点就是军民一体，结成一条广泛的抗日联合战线，在城乡铺开战场，军民协同战斗。霹雳州的各族人民，是“五独”赖以生存发展的坚强后盾，是“五独”取得一切胜利的力量源泉。“五独”从建队开始，就得到了霹雳州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部队的营房虽然驻扎在丛林，但和群众却保持血肉的联系，广大农村就是抗日军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城乡遍布抗日后备队、抗日同盟会的组织，成了部队行军、作战的坚强后盾。抗日群众为部队输送兵员、粮食及各种军需品，为部队提供情报，直接参加战斗，掩护部队转移，从而保证了抗日军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得于顺利完成各项军事任务，不

断发展壮大。

这种全民丛林游击战的特点，是由当地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环境等条件所决定的。霹雳州地处中北马，面积20668平方公里，幅员比较辽阔，东部是纵贯南北的全马最大原始森林——中央山脉，联系着吉兰丹、彭亨、吉打等州和泰国边境，西部海岸线面临马六甲海峡，马泰铁路干线从南向北跨越州境，公路线四通八达。全马第二大的河流——霹雳河发源于宜力东北部的泰马边境，由北向西南流经宜力、玲珑、江沙、巴力、安顺等地出海。这一地理环境，给了抗日游击队以广阔的回旋余地。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聚居着八十三万马、华、印各族人民，其中华人约三十四万，占人口40%左右。这又是“五独”得于建立和发展的群众基础。

霹雳州的经济比较发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来亚锡的产量居东亚首位，而霹雳产锡又是全马之冠，故有“锡都”之称。霹雳（Perak）的名称就是由锡而起，全州各大小城镇的兴起，都和锡业有关。百多家露天矿场（华人资本）、机械化挖锡铁船（多属英资）星罗棋布，尤其在靠近州首府怡保市的中区最为集中。橡胶业是霹雳州第二个重要经济支柱。橡胶园沿着西海岸、霹雳河两岸，以及在南区、北区靠山西侧，连绵不绝。这种经济结构，形成了各个民族按不同产业分布而聚居的特色。大体上，华人以矿工、胶工、农民为主，集中居住在城镇、郊区及山边农村；马来民族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胶园主，聚居在霹雳河两岸；印度人（大部分是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移民）则散居在英资的大胶园内。各民族之间由于宗教、文化、生活习惯的不同，平时很少沟通。这一状况，给广泛建立抗日民族联合战线，带来了不利因素，但也不易产生民族之间的直接矛盾与磨擦，有利于对敌的斗

争。在抗日战争期间，直接参加抗日的马来人虽然不多，但靠近华人聚居点的马来农村，对抗日亦表同情和拥护，沿河两岸的马来人，则是持中立的态度。如督亚冷一村（彭古鲁），章嘎丁满山光村长 Mesai 等，都曾积极支持抗日军的活动，虽曾遭到日军警备队的逮捕和恐吓，仍然坚持斗争，毫不动摇。

自三十年代开始，霹雳州的人民，在马共的领导下，为反对殖民统治，反对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为争取民主、改善生活，和英国统治者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游行示威的斗争高潮。特别是 1939 年，世界经济萧条，严重打击了霹雳州锡矿和橡胶两大行业，许多矿场停产，胶园停割，广大工人面临失业、饥饿的威胁，更激起了群众对统治者的不满，反饥饿、反压迫的群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广大的工农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变得更加坚强。

1937 年 7 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华人为主体的抗援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广大华人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卖花筹赈，抵制日货。到南太平洋战争前夕，这一抗援运动进一步与马来亚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要求释放政治犯，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建立人民武装，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在这一形势下，各种群众团体，如：霹雳州布先矿业工会（后改称“霹雳州近打矿业工会”）、霹雳州华侨胶工会、霹雳州华侨机器公会、怡保市店员互助社、怡保市卷烟女工工会、印刷工会等等，相继成立或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同时，半公开的工人、青年、学生、妇女各界的抗敌后援会，也在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发挥了骨干和带头的作用。这些都是在马共直接或间接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据统计，当时

霹雳州华侨矿工工会会员达一万多人，其他各行业（如橡胶、火锯、卷烟女工、印刷、店员、机器工会等）组织成员，合计约有四万多人，正是这种抗日群众运动，为“五独”的创建和抗日游击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五独”就是这样一支以华人为主体的、以马共党员为核心，由矿工、胶工、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抗日武装部队，先后建立了九个中队，指战员一千多人（不包括地方半武装的抗日后备队员），是马来亚抗日军一支较强大的部队，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州每一个大小城镇、农村、海岸、及深山密林，还伸展到吉兰丹州和吉打部分地区，支援了这些地区抗日武装部队的建立和发展。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战争岁月里，“五独”经历了近百次大小战役，消灭了一批日军及其豢养的奸细、走狗、叛徒，牵制了日军大批兵力，以武装行动支持抗日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粉碎了日军妄图挑拨民族冲突的阴谋，稳定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削弱和动摇了日军对马来亚的掠夺和统治，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艰苦战斗的历程

（一） 初创时期（1941年12月～1942年）

①日本南侵，英军溃败。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南太平洋侵略战争，马来亚人民从此面临着战争的严酷考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长期坚持其对马来亚的反动统治，加上当时英国政府对日本存有幻想，对马来亚防务采取消极

态度，虽然拥有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但却不堪一击。在日军的闪电袭击下，驻马英军仓惶南逃，日军长驱直入，于12月26日占领霹雳州首府怡保市，继续向南推进，至霹雳州南部与雪兰莪州交界的仕林河镇，受到英军的狙击，激战一昼夜，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中北马唯一较大的战役。这一役英军伤亡惨重，溃败时丢弃大批枪支弹药。

②第一批抗日武装——朱毛、仕林河部队诞生

战争发展得很快，当太平已失守，日军正向怡保推进时，约在12月中下旬，莱特来到霹雳，在双溪古月街场背召开霹雳地委及部份受训人员紧急会议，主要传达马共中央同英殖民当局已取得释放政治犯、选派人员去新加坡参加101特别训练学校“军训”的协议；以及在敌后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的决定。会议开得很匆促，仅开了一天就结束了。

在这战争的紧急关头，马共霹雳州地委迅速作出决定，组织抗日武装部队，带领全州人民从和平斗争转入对日抗战，革命力量分成几路转移：一是根据马共中央的部署，挑选一批骨干南下新加坡，接受“101特别训练学校”的军训。二是大部分马共党员和革命群众骨干转入农村，首先在朱毛（Chemor）、仕林河（Selim River）创立抗日根据地。三是少数人留在城市，坚持地下活动，为抗日游击队筹集各种物资。

当时，霹雳州先后派出二批骨干南下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训。第一批三十人，在金保埠东兴港红船村小学集结，然后由公路骑自行车到吉隆坡转搭火车至新加坡。第二批四十多人，在布先集结，经小路至美罗南下，因仕林河被日军攻占，交通受阻，一部分人留下转入当地抗日根据地，一部分人留在“一独”。第一批受训过的人员回到森

美兰的淡边，吉隆坡已告失守，芙蓉告急，无法继续北上，便留在当地组建“二独”。少部分人到了1942年秋，才被调回“五独”。

朱毛部队是霹雳最早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之一，也是全马较早不是由“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后才建立起来的队伍之一。朱毛、和丰在怡保市以北，是通往北马的主要通道，东西两面是高山峻岭，山边是胶园和华人农村，当地华人思想觉悟较高，抗日热情高涨，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地区。在怡保沦陷前夕，第一批来自布先、端洛、甲板等地矿工协会会员三十余人，响应马共霹雳州地委的号召，来到这一带山林，开始建设营地，接着各地城镇、农村的青年纷纷入伍，很快就发展到七十多人。当时部队武器来源，主要靠发动群众捡拾英军溃逃时丢弃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在怡保市沦陷的一夜之间，就捡获了近百支来福枪、日本三八式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枪等，还有一挺平射炮和一台迫击炮。此外，有的群众也把他们保存的猎枪贡献给部队。这些武器不但武装了当时的朱毛部队，还用来在和丰的沙叻扩建了一个分队。

在朱毛部队创建的同时，仕林河部队在当地马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相继诞生，仕林河一带在霹雳州南部，东面与彭亨州相邻的地带是大片原始森林，南面与雪兰莪州接壤，山边的华人农村与周围的橡胶园连成一片，伸延至西海岸安顺一带，形成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活动的天然屏障。仕林河部队初建时，指战员共有七十多人，大多数是来自霹雳州南区的胶工和农民。仕林河战役后英军遗下的大批武器，成了该部队主要的武器来源。英军在仕林河战役后，仓促向南逃窜，日军则乘胜追击，来不及收拾战场，仕林河一时成了真空地带，

南区马共组织立即发动群众，昼夜出动，前后共查获四百多支长短枪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批武器后来除了抽调一部分支援雪州“一独”和运上北区支援外，还用来筹建美罗部队（即以后的第四中队）。

③ 成立“霹雳州军委”统一指挥全州武装斗争

霹雳州全面陷落后，抗日武装部队已初具规模，建立了朱毛、美罗二个中队和沙叻、仕林河二个分队，在怡保市还建立一支别动队。指战员人数达三百多人，拥有各种枪支四百多支。这时，地委和中央的联系已为战争所隔断，为了适应形势，加强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霹雳州地委发扬独立作战的精神，成立“霹雳州军委”，并决定由地委委员张奇生（又名徐清）作为霹雳州军委代表，统一指挥全州各个抗日部队，部队番号定为“霹雳州人民抗日军”，对外以“司令员马志洪”的名字（实为军委的代名）发布抗日文告和出具募捐收据等。至此，一支由霹雳州党组织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宣告诞生。当司令员“马志洪”宣布“霹雳州人民抗日军”正式成立的文告公布时，城乡人民为之鼓舞，日军为之震惊。

④ 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

全马沦陷后，日本为了巩固其法西斯统治，立即开始了大肃清和大屠杀。日军倾巢而出，挨家挨户强迫群众到指定的地方集中，由蒙面的奸细逐个指认，凡被认为有参加抗日活动的嫌疑的人，就难逃浩劫，有的被抓去集体枪杀，有的被抓回日宪兵部严刑酷打，灌水、晒太阳，迫供审问后秘密处决，搞得满城腥风血雨。如督亚冷街场一排商店被放火烧光，年青妇女为逃避日兵，女扮男装，纷纷出逃。据不完全统计，仅是在这次大肃清中霹雳州被杀害的群众，就有一万多人。日军在大肃清的同时，还网罗一些民族败类成立了

“霹雳州华侨维持会”，通过维持会出面，勒令华人无条件向日军捐献“奉纳金”，实行经济压榨；强征民夫服役，驱赶到泰缅边境去修筑“死亡铁路”。在日军这种白色恐怖的摧残下，使战前经济颇为繁荣的霹雳，一下子变得百业凋零，广大华人纷纷逃入山芭，垦山种粮自救。沿中央山麓以西，从南到北，从仕林河至马泰边境的宜力、华玲，中部地区布先、端洛、督亚冷一带，连绵数百公里的山边，被开辟成为新华人农村。这种新农村的出现，并随之而产生的战时自给经济，使广大华人在日军统治下得于生息，同时也形成了更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军的残暴镇压，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同盟会、抗日武装后备队等抗日群众组织蓬勃发展，一批批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积极参加人民抗日军，抗日武装力量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迅速壮大起来。

霹雳州军委成立后，部队有了统一指挥，加强了战斗力，开始派出除奸小组、抗日武装别动队深入到日军心脏地带，除奸灭叛，破坏交通，配合地方开展民运工作。例如：朱毛部队派出武装别动队员九人，由黎浪清带队到怡保市近郊的文冬、万里望、狮尾等地，没收维持会正要上缴给日军的奉纳金；中区在地委委员刘平的领导下，也成立了一支精干的除奸敢死队在怡保市内活动，向日军寻欢作乐的“天然俱乐部”投掷手榴弹；美罗部队也派出武装小组，由曾庚友领队，化装老百姓，在美罗公共汽车上击毙两名日军，缴获了一笔奉纳金；除奸组长张子宏，在金保的公共汽车上枪杀两名日军，夺枪回队。这些小股武装突击，神出鬼没，使敌奸、走狗吓破了胆，日军则龟缩在其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为民运工作开展扫除了障碍。

⑤ 保护英军散兵

新加坡沦陷前，“101特别训练学校”一批由英军临时凑合组成的敌后爆破小组（约十余人），从新加坡潜入马来半岛，原打算深入日军敌后搞爆破，配合英军作战。但他们刚进入内地，还来不及行动，新加坡便沦陷了，结果和总部失去了联系。这批平时养尊处优的英兵，正在走投无路面临覆灭命运的时候，被根据地群众发现，加以保护起来，并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到抗日部队。当时被护送到仕林河分队的英兵共五人，他们是：查普曼上尉（F. Spencen Chapman，101特训学校教育长），奎利（Frank Qualye），格列斯托尔（Chrystal），海伍德（Haywood），和罗宾逊（Robinson）。（罗宾逊原是和丰某橡胶园经理，他因年纪较大，1943年在部队病逝）。他们来到部队后，获得特殊的照顾。在物质生活上，尽管抗日军战士当时吃的是红薯、玉米等粗杂粮，也千方百计通过群众为他们采购一些牛奶、鸡蛋、肉类等食品，使他们深受感动。部队初创时，缺乏各种军事知识，他们便主动给以协助，把各种武器画成图解，教会抗日军战士如何使用和保护枪械，如何使用炸药进行爆破，如何摸营偷袭敌人等。虽然他们所教的许多内容都是脱离实际的，并不适合用于丛林游击战，但经抗日军消化吸收，重新加以修改整理，编写出适合实际的军事教材，使军事训练逐步走上轨道。

1943年，联军与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络以后，这批滞留马来亚的英军残兵除查普曼外，其余由抗日军护送到西海岸，搭乘盟军派来接应的潜艇安全离去。抗日军这种不计前嫌，优待英兵的政策，使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英国军人深受感动，他们回到英国后，著文赞扬“马来亚共产党是忠诚的抗日同盟，具有高度的组织和训练，在沦陷区能在不受人注

目的情况下开展活动。”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保护和帮助，他们在敌占区的丛林根本无法生存。

⑥ 日军的首次进攻

日军侵占霹雳州后，其宪兵部特高科便开始网罗一批华人奸细，混入抗日群众组织，为其提供情报，带路搜捕抗日群众，进攻抗日部队。这一期间，日军向游击队先后发起了多次的军事行动。朱毛部队由于叛徒出卖，日军封锁了各个交通要道，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向部队发起了进攻，好在部队早有防备，连夜转移，冲过铁路和公路交通线，转移到了东部的地骨山。当日军进攻到朱毛山上时，等待着他们到来的却是一座空营房。沙叻分队和仕林河分队也先后遭日军进剿，虽没有受到严重损失，但外围的群众组织却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各部队与群众之间联系暂时中断，粮食供应困难，抗日武装斗争面临着更加严峻、尖锐、复杂的形势。

(二) 坚持斗争（1942年—1944年）

① 马来亚人抗日军第五独立队正式成立

霹雳州抗日武装部队成立较早，但正式纳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编制却是较迟，这是当时战争环境造成的。

1942年3月，霹雳州地委与中央恢复了联系。马共中央委员小忠（后在“九一”事件中牺牲）来到霹雳州，在朱毛抗日根据地召开霹雳州地委会议，表扬了霹房地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以后，果断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的独立作战精神，并传达了中央关于统一全军番号、编制的决定。同年五月，小忠再度前来霹雳召开地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霹雳州人民抗日军”的番号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

队”，成立了“五独”司令部。

当时“五独”司令部及各中队指挥员名单如下：

“五独”司令部——

党代表：张奇生（张在“九一”事件中牺牲，后由廖伟中继任，直至日本投降。）

队长：赖莱福（原名杜龙山，曾由霹雳地委选送去新加坡受训，后在“二独”工作了一段时间，1942年7月调回霹雳“五独”，参加“九一”会议脱险，1943年牺牲后由斯科接任。）

副队长：黄立（原霹雳州北区区委）。

政治部：萧力（何小力，曾任《人道报》编委。）

后勤部：蔡福（黄南兴，曾任霹雳州矿工会主席）。

第一批四个中队指挥员及活动地盘如下：

一中——（后改为模范中队）

党代表：钟贵添（被捕后由傅定邦接任）；中队长：黄松；
副中队长：蔡大地；政治部：彭烈扬；后勤部：郑良友。

一中前身即朱毛部队，初期活动在朱毛、和丰一带。1943年南下至务边，1944年以后转到金马仑高原，创立比较稳定的根据地，直到日本投降。一中也是“五独”司令部的所在地。

二中——

党代表：李华；（1944年以后由扬林继任）

中队长：陈铁民；副中队长：曾庚友；

政治部：梁明；后勤部：×××

二中的前身是朱毛部队的沙叻分队。初期活动在和丰一带农村，后来转移到玲珑、宜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底调回和丰，全队出发吉兰丹，参加牙叻顶围剿土匪战役，以后大部留在吉兰丹，改编为第十二中队。

1945年在和丰成立新的二中，由扬林担任队长。（以后的公开队都不设党代表）

三中——（后改为十三中）

党代表：江雁； 中队长：钟剑川； 副中队长：曾庚友，（后来调二中，由刘旺继任）

政治部：阿刚（张天带）； 后勤部：刘方。

三中的前身是怡保武工队和甲板分队，原在怡保东面的波赖、暗邦一带活动，以后转移到布先、端洛，1944年底向西海岸推进，在木歪、尧沦一带创立新根据地，改番号为十三中。

四中——

党代表：刘子忠； 中队长：汤汉波；（后来调去十二中，由吴新民继任） 副中队长：刘子辉；

政治部：曾绍舜； 后勤部：房春来。

四中的前身是美罗部队。自成立以来，一直活动在南区。

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相继成立了十二中（在吉兰丹州的牙叻顶）、十四中（在太平 Taping）、十六中（在实兆远），十九中（在朱毛 Chemor）、三十五中（在玲珑 Lenggong）。到1945年，“五独”已拥有九个中队，兵员一千多人。

“五独”的诞生，进一步鼓舞了霹雳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是对日本统治的沉重打击，日军为了扑灭这支强大的抗日武装，调集了数千兵力，在1942年的下半年，接连向“五独”各中队发动了猖狂围剿，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五独”的指挥机构受到比

较严重的破坏，首先是党代表张奇生在“九一”事件中光荣牺牲，继而是司令部的蔡福、斯科及一中党代表钟贵添等人先后被捕，“五独”队长赖莱福中伏牺牲。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五独”以英勇的战斗回击了敌人，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② 波赖山的战斗

在日军的重重封锁和围剿中，“五独”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打退了敌人多次大规模的进攻。1942年底，波赖山的反围剿战斗，便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战例。波赖(Simpang Pulai)山位于怡保的东面，山高林密，石壁磷峋，是三中初建时的营地。日军进攻时，起初动员了一千兵力，向三中发起所谓“铁臂围剿”，还出动空军配合，狂轰滥炸。抗日军坚守有利地形，给日军迎头痛击。第二天，日军又增兵二千多，并动用大炮，分三路以密集的火力猛攻波赖山头。英雄的三中指战员，英勇抗击，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共毙伤敌人一百余人（其中有尉官六人），抗日军损失甚微。为了保存实力，不打消耗战，三中于第三天下午撤出战斗，安全转移。这一战役，打得日军丧魂落魄，炮声、枪声震撼怡保市区，大灭了日军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

③ 除奸灭叛，如火如荼

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妄图从内部瓦解抗日武装。1942年冬，日军把霹雳州列为施行政治瓦解的重点，从全马各地抽调一批最猖狂的叛徒高克平、黄国平等十多人，组成所谓“昭南队”北上来到怡保市，协同日宪兵部特高科，制定了“三个月灭共”的计划，搞假地委，出版假《人道报》，诱骗群众上当；对被捕的抗日群众收买利诱，再释放出来，混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策反和破坏。为了打击和惩治这批叛徒和内奸，粉碎敌人的阴谋，“五独”派出了几批

“别动队”，在群众的掩护下，深入到城市、郊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除奸活动。

各中队为了迷惑敌人，配合别动队的除奸行动，还多次出动，先后进攻了朱毛、双溪、埔地、端洛、红毛丹、务边等地的警察局。除端洛一役缴获十多支步枪外，其他虽无大的收获，但也牵制了敌人，掩护别动队的活动，支持民运工作的开展。

到1942年底，日军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五独”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步胜利。同年12月1日，在司令部所在地一中，召开了隆重的“五独”成立大会，用战斗的胜利庆祝“五独”的正式诞生。

1943年初，一中选派出了由六人组成的特别流动队（简称别动队或特流队），由若冰带队，深入怡保近郊，在狮甲尾的吉灵当公路上，和敌人遭遇，当场击毙敌奸一人。第二天，日宪特高科全体出动搜索，遭到别动队的伏击，击毙日军二人、敌奸八人，缴获长短武器十多支。别动队亦有一人牺牲。在双溪古月，别动队伏击六名特务和大叛徒小秋，打伤敌人两名，夺得冲锋枪、短枪共三支。在和丰灵丹路，一中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伏击从吉隆坡来犯的一批叛徒，毙敌二人、俘敌一人。这种小规模的战斗，此起彼伏，打得日军、敌奸丧胆，只好龟缩在宪兵部内，不敢轻易出动。“昭南队”三个月灭共的计划宣告破产，夹着尾巴撤离了霹雳州。

④ 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朱毛、和丰是霹雳抗日武装部队的策源地，这一带的革命群众，为抗日部队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连遭日军疯狂摧残。“五独”正式成立后，在这一片靠近州首府、面积只有约五十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集结着一、二、三中，

部队过于集中，给养有困难，容易暴露目标，同时也不利于抗日游击战争向纵深发展。因此，到1943年4、5月，司令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三个中队向不同的方向转移，向新区进发，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首先是三中的在波赖山战役后，由东向西，跨过近打平原，穿过马泰铁路线，来到布先（Pusing）、甲板（Papan）山林。这一带原来矿场林立，战后都已停产，矿工转向山边开芭种粮，群众基础好。三中的到达，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很快便站稳脚跟。以后三中便以此为基地，继续向西，伸展到霹雳河沿岸，并渡过霹雳河，在尧仑建立一个分队，以后扩建为第十四中。

一中则是从和丰向南转移，在务边（Gopeng）的石山脚停留了一段时间。一中转移至石山脚时，日军分数路进行围剿，部队依靠森林中土著民族的帮助，在辽阔的原始森林，与日军周旋十多天，终于摆脱日军的追踪，安全转移。1944年继续向东南进发，在金马仑高原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根据地，直到日本投降。金马仑高原，位于霹雳、彭亨、吉兰丹三州的交界处，海拔六千多英尺，公路盘山而上，四面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地势非常险要。山边农村的华人种菜、养猪，山上散居着为数众多的土著民族，战前这里是避暑的胜地，战后变成三不管的“边区”，由于交通不便，日本统治比较薄弱。“五独”以这里作根据地，为以后向吉兰丹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按照司令部的部署，二中的任务是向北转移到霹雳河上游的玲珑、宜力（Gerik）开辟新区。这一带农村的华人，大部分原籍广西，以种烟为业。战后有一股武装队伍打着“华侨抗日军”的旗号盘据在那里，不断向群众勒索，在公路上拦

车抢劫财物，却从未向日军开过一枪，群众深受其害，恨之入骨。二中要在这里站住脚，必须以实际行动分清两种部队的不同性质，开展统战工作，把这股武装争取过来，共同抗日。

1942年底，二中誓师北上，从和丰出发，依靠山林土著人带路，经历一星期的艰苦行军，到达玲珑山边驻扎下来，派出多批民运工作队，挨家逐户向群众宣传人民抗日军的性质和宗旨。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部队刚到达初期，使用北上时打通的山路，建立长距离的运输线，从和丰运来给养。经过耐心、细致的宣传，群众才逐步看清楚人民抗日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正义之师，逐渐转变过来。原来盘据在这一带的武装队伍，听到二中北上的消息，慌忙退到马泰边境躲藏起来，不敢正面对抗。后来二中派出谈判小组，由党代表李华率领，主动前往宜力和他们的首领谈判，向他们发动政治攻势，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促使其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愿意接受人民抗日军的政治领导，由二中派出政工人员进驻该部；另一部分则坚持顽固立场，逃到吉兰丹，继续鱼肉人民。到1943年底，二中经历了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建立新根据地的任务，在群众中扎下了根。1943年，在玲珑遮薄甘榜伏击日军，毙敌二十四人，缴枪二十余支，声威大震。1944年底，二中撤离玲珑地区，回到和丰(S. Siput)，在那里留下一个分队，以后扩充为第三十五中队。

一、二、三中的转移，使霹雳州的抗日地盘大为扩展，从东部山林伸延至西部海岸，从南部的仕林河到马泰边境，基本上连成一片，使部队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从此牢牢地掌握着抗日游击战的主动权。

(三) 发展壮大 (1944年—1945年)

① 部队和丛林根据地的建设

各中队相继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根据地以后，相对地减少了流动性，使部队的军政训练，逐步纳入轨道。制定了严格的营地作息时间，每天早晨举行升旗礼，然后早操，上午有一节军事操练和两节军事、政治课；下午劳动，由各班战士负责砍柴、修建营房，下山运粮。军事课的内容，包括各种武器的构造、使用和保养，各种地形、地物的利用，突破障碍的技巧，攻防战术等等，还经常进行实地操练和演习。政治课进行纪律和抗日纲领等基本内容的教育，参考《人道报》等地下报刊的材料，进行形势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每星期开一次联欢晚会，指战员自编、自演各种文娱节目，有时则到农村举行军民联欢。这种军政训练和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大大提高了战士们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自觉性，为坚持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马来亚游击战争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丛林为屏障，在丛林安营扎寨。因此，丛林的交通线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有了畅通无阻的交通线，各部队之间、部队与群众之间，才能保持紧密的联系，免于陷入孤立的境地。战争期间，“五独”在丛林地带，建设了纵横数百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点。部队的交通员，凭着两条腿，常常是只身一人，背负着几十斤重的文件、物资、干粮，在深山密林步行几天，甚至十几天，穿过日军的封锁线，通过铁路、河流，出色地完成了交通联络任务。

在丛林交通网点的建设中，山上的土著民族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来亚原始森林的土著民族，总人数约有一万多

人，大部分住在霹雳、彭亨、吉兰丹交界的原始森林中，以“耶亥”(Yahai)族为主。英国人叫他们为“沙盖”(Shakai，意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华人则称之为山番。这些土著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仍处于半原始的部落时代，他们以森林中各条河的流域来划分地盘，作为各部落的聚居点，互相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其生活来源靠狩猎和耕种些木薯、旱稻来充饥，生产工具非常简陋，物质生活简单而艰苦，实行平均分配的制度，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头人”(酋长)具有无上权威，一声令下，全体成员无不服从。他们没有文字，但有其共同的语言。他们纯洁、善良、忠厚，对华人友好，对统治者较为不满，从不受英、日统治当局法律的约束，在山林中自行其是。

这些土著民族成为“五独”可靠的、忠实的盟友，“五独”也非常重视做好对他们的团结工作，和他们的“头人”杀鸡歃血为盟，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部队经常帮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他们也把部队当作自家人看待，保守部队营地秘密，遇到日军进攻时，宁死也不肯给日军带路。部队转移时，他们男女老少齐出动，为抗日军带路、运粮，一站一站地接驳下去，直至到达目的地为止。抗日军在三年八个月的丛林游击战中，能够做到神出鬼没，南来北往行动自如，就是靠了这些土著民族的掩护和帮助。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他们的支援是分不开的。

② 向吉兰丹(KELANTAN)进军

1944年中，经历了两年多战火磨炼的“五独”指战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战士的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逐步从小队、分队规模的伏击战，过渡到以中队为单位、或几个中队协同作战的规模。进军吉兰丹，围剿牙

叻顶土匪的战役，便是一个由“五独”司令部直接指挥，三个中队各派队伍统一行动、协同作战的一场较成功的战役。

牙叻顶（墟镇布劳），是吉兰丹（KELANTAN）与霹雳（PERAK）、彭亨（PAHANG）交界的一个山乡。它四面环山，交通极为不便，没有公路，水路靠乘木船向南可往“立卑”，北去“吉赖”。陆路要步行七、八哩山路去毛生埠才能搭乘火车前往吉兰丹首府；西南面有山路可通彭亨州；西面翻过丛山峻岭，与霹雳州的金马仑高原、和丰、玲珑、宜力等地相连。这里的乡民都是华人，共有二百多户，二千余人，据说其祖先是明末清初就移居此地，起初以淘金为业，后来发展为养殖，以种粮食、橡胶为主，经济上基本是半自给自足。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战前这里是英国统治者鞭长莫及的“世外桃源”，沦陷后日本也没法在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牙叻顶的人民，具有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精诚团结的优良传统。多数人家都收藏有猎枪、土炮，平时用作狩猎和保护庄稼，也用来防御土匪的袭击。马来亚沦陷后，这里的乡民自动成立了武装自卫队，在1942年上半年，曾两次打退了土匪的进犯。

但是，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丰富资源，使各路土匪都为之垂涎三尺。1942年底，在牙叻顶周围，就盘踞着三股武装，有的到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给这里的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三股武装：一股是以冯成为首，有当地部分青年参加，约有四、五十人，驻扎在“布劳”，群众关系较好，有抗日的要求，后为上彭抗日军改编成为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一股以高百乡为首，约三、四十人，驻扎在石山下；还有一股以蒋石波、杨广为首，约四、五十人，驻扎在半路港。这两股自称“华侨抗日军”，实际上是无恶不作，打家劫舍的

强盗。为了粉碎这些土匪武装的猖狂挑衅，巩固和发展牙叻顶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中央决定将原来由“六独”管辖的吉兰丹部队，交由“五独”管辖。“五独”司令部于是作出了向吉兰丹进军的决定，分两路向牙叻顶进发。一路是一中派出两个分队，第一批由党代表傅定邦、中队长汤汉波带领，司令部副队长黄立随第二批队伍出发，负责统一指挥牙叻顶战役。他们从金马仑高原出发，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翻山越岭，到了牙叻顶的东南方，与原吉兰丹部队取得了联系。另一路是二中，在队长陈铁民的带领下，从和丰出发，沿灵丹河（霹雳河支流）上游东进，翻越吉兰丹与霹雳的分水岭，行军半月，进到牙叻顶的西边，与一中及吉兰丹部队配合，合编为第十二中队，由“五独”司令部统一指挥，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形成了对土匪的包围圈，开始打响了对土匪的分割合击战斗。杨广、高百乡两股土匪，由于本身存在内部矛盾，不能集结在一起与抗日军对抗，而是分散、盘踞在几个角落，因此，抗日军在外围形成包围圈以后，便对分散隐蔽的土匪采取分散出击，各个击破的战术。经过半个多月的围攻，在半路港、大港边等地战役，毙伤了大批匪徒（被击毙的约二十多人），并俘虏其中一部分，匪首高百乡亦为抗日军所俘（后来畏罪自杀身亡），另一股匪首杨广、蒋石波则率残部逃往马泰边境。是役抗日军牺牲三人，伤一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牙叻顶的人民终于彻底解除了多年来受土匪骚扰、残杀的威胁，无不欢欣鼓舞，更紧密团结在抗日军周围，牙叻顶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壮大了。

剿匪胜利以后，牙叻顶的抗日军，正式整编为“五独”第十二中队，党代表傅定邦（以后调回霹雳、由罗勒继任），中

队长汤汉波（后由陈铁民继任），副中队长洪焰，政治部罗勒，后勤部房春来。十二中成立后，为了进一步扩展以牙叻顶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于1945年7月攻打铁路线上的一个日军据点——麻叻坡。在抗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日军不战而退，抗日军只花了几十发子弹，便攻占了据点，解放了麻叻坡小镇。

③ 接应联军先遣队登陆

1943年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军在欧洲战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转入到战略反攻阶段；英、美两国也在亚洲积极部署反攻，联军派出先遣人员乘坐潜水艇首先在霹雳州西海岸登陆，寻找抗日军部队。霹雳州由于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较好等原因，成为配合联军登陆的前沿阵地，“五独”在接应联军先遣队登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其提供粮食、物资，派出武装人员和交通员掩护他们安全转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抗日军的保护和帮助，他们登陆后是根本无法立足和生存的。

1943年5月26日联军136部队指挥官约翰·台维斯上校，率领五名华籍队员，乘潜水艇在霹雳西海岸的红土坎附近首先登陆。（台维斯 John Davis 战前曾任怡保市警察局局长）他们登陆后，立即受到当地抗日群众的保护，并于同年12月与“五独”取得联系。6月25日，台维斯乘潜水艇回去锡兰，留下的华籍队员，在与抗日军取得联系后，由抗日军护送到一中。8月初，台维斯再次从红土坎登陆，同时带来七名队员；第三批由布伦米（Broome）中校率领，于同年12月2日登陆。他们先后带来了通信设备，此后便与联军东南亚总部建立了无线电联系。

1943年12月31日，在美罗四中的营地上，（注：

台维斯曾经把此营地称为“白兰丹”。)作为联军代表的台维斯、布伦米、林谋盛三人,与马共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此后,联军136部队联络人员,共137人,分批空降到马来半岛,其中有32人分布在“五独”各个中队。

由于在四中营地谈判过程,联军方面对战后关系问题避而不谈,“五独”司令部根据上级的决定,只公开一部分抗日部队接受联军的援助(称为新队),另一部分不向联军公开,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称为老队)。司令部也分为两套班子,公开队由廖伟中任队长,杨林任副队长(取消党代表制);;老队由梁朝北任党代表、斯科任队长。(后因日本投降,老队率先复员,司令部并未正式成立。)

④ 接收空投,发展壮大

合作协议达成以后,因台维斯同其总部的联系中断,直至1945年2月1日才恢复了无线电联络。26日,联军第一批空降人员,在霹雳州和丰的灵丹农村着陆。这天半夜,联军一架四引擎的大型轰炸机飞临灵丹农村上空,投下八名联络官、译员和电台工作人员,以及一批武器装备、生活用品等。他们带来了东南亚联军总部给台维斯的指令,要求立即到大本营会见人民抗日军领导人。第二天,便由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他们出发。半个月后,在“五独”司令部的部署下,一个由136部队成员组成的联络小组来到和丰灵丹农村原二中根据地,新的二中(新队)也同时组建起来,由杨林任中队长,并负责接应空投武器的工作。新二中组建的同时,在朱毛红毛港农村,也恢复了原二中(老队)的建制,改称为第十九中队,由梁明任党代表,钟剑川任中队长。十九中的任务,是与二中密切配合,接收空投武器,扩充装配一批中队。

继灵丹空投以后，在美罗、金马仑高原、牙叻顶，也先后进行了空投，投下各种军用物资，武器的种类以轻武器为主，如卡宾枪、冲锋枪、手枪、自动步枪、轻机枪、手榴弹及各种弹药等。空投一次的数量，约可装配一个中队。

对于联军的空投，日军是知情的。但这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制空权、制海权落在联军的手中，已经无力制止，虽然有时也派出少量日军前来骚扰，但不敢进犯根据地，空投并未受到阻碍。那些联军联络官，大都贪生怕死，空投时不敢到现场监督，对现场的情况无法了解，因此，每次空投丢失多少武器，根本无法统计。

从1945年3月——5月间，在霹雳一共空投了十一次，其中灵丹六次，牙叻顶二次，金马仑、美罗、宜力各一次。（宜力的空投因遭到奸细出卖，武器落入日军的手中。）“五独”利用这些武器，先后扩充了十九中（在朱毛）、十四中（在太平）、十六中（在实兆远）、三十五中（在玲珑）。加上一中、二中、三中（即十三中）、四中、十二中等公开队，共九个中队，指战员一千多人，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比较强大的一支部队，活动范围遍及整个霹雳州每一个大小城镇、农村、海岸及深山密林，还伸展至吉兰丹、吉打部分地区，威振中北马。

⑤ 配合反攻，纷纷出击

“五独”得到扩充以后，士气空前高涨。特别是各个秘密队，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顾阻挠，迅速采取行动，进攻敌人据点，伏击调动频繁的日军，从1945年5月至8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连续出击，其中比较大的战役有：十二中攻克麻叻坡（Merpoh）后，接着在拆除了铁轨的铁路上伏击日军车队，敌人不敢抵抗，仓惶逃窜，当场俘虏日军文职官

员一人。与此同时，十九中、十六中等秘密队，也先后攻打了朱毛、实兆远等地警察局。可惜由于情报不准、备战不充分，均无大的收获。这些军事行动，当时起到了镇压敌人，提高抗日军军威的作用。

日本投降前夕，一艘日军巡逻艇搁浅在甘榜拉也近打河上，另两艘巡逻艇前来救援，碰巧活跃在端洛、督亚冷一带的十三中流动队正在附近活动，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由副队长吴伟汉（东贵）带领，在当地武工队的配合下，袭击了正在河里洗澡的日军，战斗约一个小时，击毙日军四十多人，一军官拒降自杀，两名日军划船逃走。此役缴获高射机枪一挺、重机枪二挺、步枪三十多支，子弹、军用品一批。抗日军无一伤亡，大获全胜。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动员民众，配合反攻，霹雳州的抗日宣传工作也做得较为出色，出版的地下油印报刊计有：《人道报》、《北马战线》、《马来亚之声》（英文）、《人民呼声》（马文）、《自由呼声》（印度文）等，这些报刊，除了粉碎敌人宣传、揭露日军阴谋外，还鼓舞了人民，激发斗志，坚定信念，对抗日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三、抗日胜利（1945年8月—12月）

1945年8月15日无线电波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五独”指战员和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走出丛林，走出农村，接管城镇，投入新的战斗，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然而，英帝国并没有放弃其在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的野心。日本投降后，英当局先是以联军总部命令马来亚人民抗

日军不准进城接受日军投降，限制抗日军行动；同时，调遣大军日夜兼程分两路在马来亚登陆。在其进驻全马，各地建立起军政府之后，不到三个月就逼迫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解除了马来亚人民的武装，轻而易举地摘取了马来亚人民坚持三年八个月敌后抗战的胜利果实。

但是，同全马各州一样，“五独”和霹雳州的抗日组织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特别是在英军登陆前“政治真空”的非常时期，“五独”各个中队和各地的马共地下组织，实际上控制了整个霹雳州以及吉兰丹一带，显示了经过抗日斗争锻炼的革命人民的力量，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唤起和组织民众、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反殖斗争，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① 进驻城镇

第一次进城——日本宣布投降后，“五独”各个中队配合各区的地方抗日武装（包括抗日后备队）和抗日同盟会组织，迅速接管了霹雳州各个城镇以及吉兰丹州的首府哥打巴鲁。（其中霹雳州的太平市，因是日军的军政监部所在地，重兵驻守，集结待命投降，抗日军没有公开进入市区，只是进驻附近九英里的大直弄镇，派工作人员进城公开活动），抗日军进城，普遍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地方还搭建牌楼，敲锣打鼓迎接部队，军民联欢同庆胜利，部队纪律严明，受到人民爱戴，军民关系十分融洽，马共和抗日军的影响和威信空前提高。

第二次进城——“五独”各中队（包括公开队和秘密队）进驻城镇不到一个月，便在英军抵达前夕奉命撤出，公开队同英军一起进城，秘密队则被解散，干部调去加强群众工作。参加联军入城仪式的是以廖伟中为队长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第五独立队共四个中队，司令部设在怡保市。

②个别日军投诚和谈判“合作”

日本投降后，其军队仍坚守在几个比较大的城镇，等待联军登陆，拒不向当地抗日军缴械。但也有少数军政人员向抗日军投诚和进行要求合作抗英的试探性谈判。主要的事例有：

1、太平全马日本军政总监部总务科长在其台湾籍妻子陪同下，携带两卡车日币和纺织品、弹药等物资，到实天区的班底镇向十六中队投诚。抗日军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并予优待安置。

2、十六中队进驻太平市附近的大直弄镇后，先后有霹靂州警察总监和宪兵队长从太平专程来十六中队部谈判，由十六中党代表普生接见。由于没有翻译，双方用汉字简单交谈，抗日军方面提出日军应无条件缴枪投降，交出叛徒给抗日军处置；日方坚持执行“联军总部命令”，不能单独向抗日军投降，也拒不交出叛徒，而是提出“合作抗英”，反复强调“只能合作，不能投降”。双方坚持各自立场，没有达成协议，但警察总监最后表示同意秘密交出警察局的部分武器。

3、驻打巴、安顺一带的日军派人到第四中队寻找抗日军谈判。“五独”司令部派房春来以马共区委书记名义先行接触，再由该队长陪同，到安顺（海防）警备司令部谈判。日方礼宾相待，由警备司令及四名军官、一名翻译参加，进行了三小时的谈判。日方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联合抗英”，表示支持和拥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抵抗英军登陆，并愿接受马共领导，其统率下的日军和印度国民军可交抗日军收编、指挥，条件是联合抗英。日方要求抗日军总部尽快作出决定，并表示可立即送抗日军代表到太平日军总部具体磋商。这是日军

在宣布投降后，向抗日军进行的试探性谈判。“五独”司令部根据当时的既定政策，认为必须执行与联军签订的协议，不能背信弃义；可以接受日军交出的武器，不能共同抗英。因此，双方没有继续谈下去，以后再无接触。

③ 支持各地成立人民委员会，惩治敌特汉奸

各中队及地方武装进城后，支持和协助当地人民以抗日同盟会为基础，普遍、迅速成立了各级人民委员会，并且逮捕和严惩敌特、汉奸、叛徒、走狗，为民除害，大快人心。

在怡保市成立了霹雳州人民委员会，主席林政天（陈天华，原是霹雳州抗日同盟会实天区委员会负责人）。

人民委员会由各界人士组成，具有人民政权的性质，在英军抵达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很快便被迫解散。

④ 维持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抗日胜利初期，由于抗日军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进城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全州社会治安秩序良好，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保护，没有发生过抢劫暴乱事件。这与当年英军溃败、日军入侵时人民遭到惨重损失、社会混乱的恐怖惨状，形成了鲜明对照。

盘踞在太平附近沿海一带渔村有一小股群众武装（黑社会组织），沦陷时期曾经猖獗一时，经常抢劫商船，绑架、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日本投降后，他们在班底附近还假召开庆祝抗日胜利群众大会之名，在村口埋伏，企图杀害应邀参加大会的十六中领导干部，幸得在车抵村口约一百米前察觉，抗日军先发制人，开枪还击，未受其害。以后，抗日军进驻太平附近，争取、团结了当地倾向进步、支持抗日的黑社会上层人士，通过他们向其他黑社会党人物开展宣传工作，并从实天、吉辇区调集一批武装部队驻守在当地，他们才不敢

轻举妄动，从而保护了附近城乡不受其骚扰。

日本投降后，其驻马日军不甘心于失败，曾在全马各地制造了多起煽动马来人排华的血腥事件。华人财物被洗劫，房屋被焚烧，不少华人惨遭杀害。在霹雳州的江沙、安顺等地，极少数受蒙蔽的马来人，也曾蠢蠢欲动，但慑于抗日军的强大威力，而不敢采取行动。

⑤ 救济难民和营救被囚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

进城后，各地抗日军和人民委员会接收敌产，开仓济贫，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太平市，曾打开了太平监狱，救出了一批幸存的、面临死亡威胁的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出狱时，他们由于断粮，靠捕食蟑螂、壁虎苟延生命，个个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他们出狱后，经过休息，调养，便投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继续工作。战后在新加坡任马共办事处秘书的林金盛，便是当时从太平监狱营救出来的。

⑥ 宣传队和《北马导报》

在抗日军有力的支持、组织和配合下，全州各地普遍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怡保市马共霹雳州地委宣传队和西区区委领导的太平市“自由呼声”宣传队，是全州比较活跃、影响较大的宣传队之一。

这些宣传队都是抗日部队所创建，日本投降后随军进城，吸收了许多进步知识青年，扩大了队伍，丰富了演出节目，普遍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太平市“自由呼声”宣传队，就是十六中进驻大直弄镇时，吸收一批从太平前来参军的青年组成的，队长是李公愚（李维纲）。十六中撤走后，李被调去筹办《北马导报》。后来，宣传队进入太平，队伍继续扩大，由原马共霹雳西区区委、十六中党代

表普生直接领导，队长是小何，最鼎盛时期人数近百人。怡保市的霹雳州宣传队，队长由当时马共霹雳州办事处代表应敏饮担任，有队员五、六十人。这些宣传队保持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生气蓬勃，活跃在城乡各地，培养锻炼了一批反帝反殖、民主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不少人以后成为各个民主进步社团的骨干。

与此同时，在太平市出版了日本投降后全马第一份公开发行的大型华文日报——《北马导报》。这是马共霹雳州地委直接领导、从抗日军和地方组织抽调干部在很短的时间内筹备创办的、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具有一定规模的报社。主要负责人是彭友真、李公愚（李维纲）、郭毅。《北马导报》作为人民喉舌，在揭露批评英当局的殖民统治，配合宣传发动罢工、罢市、和平请愿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和平请愿运动被镇压后，《北马导报》也被勒令停刊而夭折。

⑦ 民主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

在马共领导下，抗日军积极支持协助各地筹备建立和恢复各种群众团体。怡保市最先成立的是青年剧社、青年励志社、店员互助会、工会联合会。太平市的女工工会、建筑工会、青年联合会，也在此时建立起来。全州各地的各行各业工会组织和各界人民团体更是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为以后建立总工会、新民主青年团（简称新青团）、妇联等全州性、全马性组织奠定了基础。尤为可喜的是马来民族的民主进步人士，也在这时期筹备创立马来国民党和马来青年团（简称 API），成为战后崛起的马来民族进步政治力量。

英当局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上述民主进步社团的公开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持封建势力，扶植各民族上层集团，

利用华人社会中的少数反共分子，制造民族纠纷，分裂华人社会，藉以对抗打击民主进步力量。例如：1946年10月10日在霹雳州实天区发生了中国国民党右翼分子勾结收买黑社会暴徒，冲击破坏进步民主社团，殴打、绑架、杀害民主进步人士，这就是震动全马的“双十事件”。

⑧ 和平请愿斗争

英军进驻霹雳州不久，霹雳人民在人民抗日军的强大后盾的支持下，先从太平市开始，接着迅速波及全州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总罢工、罢市的和平请愿斗争，要求发给新叻币以补偿战时日军强迫兑换军用票，从人民手中掠夺走的叻币，以及英军返马后宣布日军用票作废而使广大人民蒙受的惨重损失；并要求发放救济物资，帮助广大人民解决由于战争造成的饥饿、贫困，度过难关。太平市以普生（原十六中党代表、区委）和邱明玉（市妇联主席）为首，分别组成领导斗争的秘密和公开机构，前者负责动员组织总罢工、总罢市和集会游行、静坐示威的抗议行动；后者作为全权代表与英当局谈判。英当局最初企图以答应发给少量叻币（每人五元）和一点救济物资，作小恩小惠的妥协让步，以缓和群众沸腾的情绪。由于英当局缺乏诚意，没有接受和满足群众所提的条件，全市人民坚持罢市、罢工，成千上万的和平请愿群众，聚集在英国军政府门前大街两旁，有秩序地静坐抗议，结果被英军开枪镇压驱散，一些人被打死、打伤，邱明玉等代表和部分群众被逮捕。次日上午，数千名愤怒的群众又重新集结，抬出死难同胞的棺材，在太平监狱前面集会哀悼，举行葬礼，并冲击监狱，要求抚恤死难同胞，释放被捕的代表和群众。英军再次出动开枪镇压，并在全市搜捕参加请愿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整个太平市又重新陷入白色恐怖

中。这一事件，影响全州、全马，各地为了声援太平人民的斗争，同时掀起了总罢工、总罢市的斗争高潮，仅怡保市一地，参加和平请愿的群众就达五万多人。在华都牙也、金保、安顺、实兆远等地，也有好几万群众坚持了三天的总罢工。这一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直接威胁着英当局的统治，是对英国重返马来亚、实行殖民统治的一次有力的回击，因而受到英军残暴镇压，许多代表和群众被捕，关进太平监狱。霹雳州总工会主席陈洪明、吉隆坡抗盟代表宋光等人，也在这一时期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关进太平监狱的和平请愿代表和群众，共约一百多人。英国殖民统治者终于撕下了民主的假面具，残酷镇压了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进行的和平请愿运动。

⑨ 复员和复员以后

1945年12月1日，“五独”所属各中队奉命就地复员，举行了复员仪式，交出武器，每个战士得到的仅是350元的复员费。钟剑川等中队长愤慨地离开了队伍，拒绝参加复员仪式；不少战士在上缴枪支之前，或去打靶耗尽子弹，或用生盐塞进枪管，发泄不满，消极对抗复员命令。

至此，坚持敌后抗战三年八个月，在抗日武装斗争中成长壮大，受到全霹雳州以及吉兰丹人民的支持和爱护，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积极贡献的一支比较活跃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终于被英殖民当局以和平复员的方式彻底解散。但是，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组成部分，“五独”和全马各地抗日军一样，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历史任务，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会磨灭的，其历史功勋，永垂不朽！

复员后，各地成立了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霹雳州抗日军退

伍同志会设在怡保市，会长是廖伟中。

抗日军战士复员回到社会上，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重新受到奴役、压迫、剥削，不但得不到抗日军人的荣誉和优待照顾，相反地，要自找职业，面临失业威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复员后不到三年，竟被蒙上莫须有的罪名，成为英殖民当局实施“紧急治安条例”（通称紧急法令）的滥捕对象，首当其冲，许多人被作为违反紧急治安条例的政治犯，被抓去关进监狱、集中营、甚至大批驱逐出境，受到残酷迫害。为反法西斯战争流血牺牲，为反抗日本侵略、争取马来亚民族独立解放，作出贡献的抗日军战士和抗日工作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和残酷迫害，甚至在马来亚获得独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被引起重视，这确实是一次严重的历史错误！

本文撰写及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梁 明 王汕平 张明今 胡鹤年 吴伟汉 郭 毅
张 昌 若 冰 张天平 惠 波 房春来 张亚奖

（第一稿由张明今执笔，第二稿由梁明、王汕平共同执笔整理。）

(六)上彭人民的抗日支柱——第六独立队

一、“六独”概况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于1943年8月13日正式成立，她的前身是上彭人民抗日军。

彭亨是土地广阔的一个州，东海岸有关丹，西部的文冬毗邻雪兰莪，形成东西走向，首府是瓜拉立啤，上彭即在西部包括立啤、劳勿、文冬、淡马鲁四个县。“六独”就是活动在这些地区。

彭亨州马、华、印三族人口的比例大约为：马来人及土著占50%，华人占40%，印度人占10%。其中华人（包括华裔和华侨）将近有六万八千人，大部分居住在上彭地区。他们具有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光荣传统。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彭亨华人就积极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义捐达旧国币五十八万六千余元，购买公债二十四万二千余元。在此期间，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华侨抗敌后援会”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因此在中国抗战开始不久，上彭地区每个角落均播下了抗日斗争的种子，在广大群众的培育下茁壮成长。

日本法西斯入侵马来亚后，英军节节败退，1941年12月31日，日军占领了下彭的关丹，随后日本法西斯铁蹄踏遍了整个彭亨。在日本宪兵、警备队的血腥屠杀镇压下，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反抗日军的野蛮统治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在上彭地区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上彭人民抗日军就是在这腥风血雨中诞生的。

上彭人民抗日军是遵照马共中央关于开展武装抗日斗争的号召而建立起来的，初时只有少数的枪支武器，建队以后，部队经受了敌人的“清剿”进攻，也经受了没有军事经验和缺少武器的困难，受到缺粮、缺药、少医以及山地疾病的困扰，但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部队得到逐步巩固和发展，从小到大，至1942年5月，已发展到三百人左右的队伍，在上彭地区站稳了脚跟。

1943年春，“二独”在森美兰遭到日军疯狂进攻，群众基础遭受严重破坏，部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根据马共中央的指示，于同年6月间从森美兰“二独”调来两个中队的主力，与上彭抗日军合并建队，于1943年8月13日正式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从此，上彭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六独”正式成立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增强了抗日部队的力量，不但人员增加，武器相应地也增加了；其次，在广大农村中更进一步开展锄奸活动，几乎控制了所有华人居住的村庄；再次，相应增强了民运实力，广泛地开辟了民运工作新区，普遍建立了抗日同盟会、抗日联合会、抗日自卫队、抗日后备队等各种半武装群众组织，部队与民运密切配合搞好各项工作，而且竭尽全力保护群众的利益，赢得了群众积极的支援，出现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大好局面。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许多困难如粮食、医药等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便利部队开展整军练武的活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同时主动出击，袭击敌人的警察局，收缴武器，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原上彭抗日军的基础上发展到六个中队共七百余人，在后来与东南亚联军合作时期，又筹建了新队共四个中队，加上各地的后备队、自卫队共有二千

人以上。这是具有较高素质、有战斗力的抗日部队，使日军在上彭的统治受到削弱，未能完全达到其反动统治的目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六独”是来自人民，所走的历程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不愧是上彭人民的子弟兵。

二、上彭人民抗日军的诞生

上彭人民抗日军的诞生首先是由于当地广大华人中早已培育了抗日的根苗，加上日军南侵残酷地屠杀人民，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毅然拿起所能得到的武器，与日军展开殊死的斗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从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

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一踏上上彭这块土地，就大肆进行奸淫虏掠和疯狂的大屠杀，上彭文冬、劳勿、文德甲、立啤等地不少群众死在日军的屠刀下，特别是在双溪镗的检证大屠杀中，就杀了二百余无辜的老百姓，不少人全家被杀光。又如文德甲日本宪兵队逮捕了百余人，关在狭小的看守所里，受尽吊打、灌水、烟头烧身等刑罚，不少人因受刑而丧失生命，死后还不准至亲妻子儿女近前一视，否则遭到株连。日本警备队则是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括民财，无恶不作，这些都是没齿难忘的仇和恨。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上彭人民具有反帝、反殖斗争的光荣传统。自从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有筹赈会的公开活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采用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如义捐、义演、购买公债、卖花、募寒衣等。在这期间，上

彭在文冬地区同时存在“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密切配合，其余地区如立啤、劳勿、文德甲的“抗敌后援会”，积极配合当地筹赈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工作，发动华人群众支援中国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48名机工回国，直接参加中国抗日战争。

上彭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是上彭抗日的主要基础。它就是马来亚共产党上彭地方委员会在上彭这块土地上深深地播下了抗日斗争的种子。

面对日军的野蛮屠杀，经受过火的洗礼的、具有抗日光荣传统的上彭人民，在马共上彭地委领导下，热烈响应马共中央的号召，积极筹建抗日武装部队。当时没有军事常识，派出以小杨（吴科雄）为首七人到吉隆坡参加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学习军事，以便回来当军事骨干，后来因战事变化未能回来留在柔北“三独”。其余人员则积极组织群众做好各种筹备工作：一、贮备粮食，在英军败退时，各地粮仓被迫开放，任由群众进仓搬运石灰米，上彭地委动员所有党员和自卫队员进仓搬运石灰米，把粮食运到胶园和偏僻之处存放。直凉的自卫队到文德甲搬运石灰米时，除向商人借汽车搬运外，还用人力手推车搬回直凉去，运粮的成绩最好。二、自制和收集武器。自制了匕首、长矛和巴冷刀。查访和收集英军溃退时丢弃的枪支和弹药，或者用钱购买，或者动员连人带枪参加部队，同时向自愿者借用私人的猎枪。三、进山建造营房。在森林里砍竹伐木，砍亚答，用最快速度建造宿营地，有志抗日的青年，分批进入森林。

建队初期，进入森林参加部队的人数，以文德甲、直凉、明光一带最多，文冬、劳勿、立卑也有八十余人，总共将近

二百人。

1942年2月，根据马共中央的指示，上彭地委集中了文冬、劳勿、立啤、文德甲等地的骨干分子在文德甲林地金振山附近进行军训，筹建上彭抗日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在文德甲金振山附近的丛林中，召开马共党员和抗日骨干分子的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由小张（即峰云）主持，黄春作关于当前马来亚形势的发言。会议讨论了关于发展抗日武装部队、党军关系、广泛发动群众到抗日行列来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黄春、小张、陈豪、何浪滨、刘光、林之敏、汪清、黄以烈、张良、张剑青、郑清凉、邬章华、陈涛声、陈泮、小汪、小蔡、小李、文祥、颜天迎、官水、陈光来等四十余人，会议开了三天三夜，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正式成立上彭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成员由马共中央委任，党代表由黄春（即紫焰）担任，队长陈豪，政治部小张。司令部属下编为四个分队，第一分队政治指导员张良，分队长李树、副分队长邓平，活动在直凉、明光一带；第二分队政治指导员林之敏（老肖），分队长：黄旭初，活动在加流地区；第三分队政治指导员郑清凉，分队长陈光来、副分队长官水，活动于文冬山番港一带。随后又在文德甲建立了第四分队。从此上彭人民抗日军宣告正式成立，上彭人民站起来了。

三、艰苦奋斗的历程

上彭人民抗日军的建立，标志着上彭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始，也给在日军野蛮黑暗统治下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建队初期的二百人，昨天还是普通老百姓，连枪也没有

摸过，而今天却要拿起武器，敢于对装备精良，凶横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军队作战，而且游击队的装备仅有少数的来福枪，大部份是猎枪、长矛、巴冷刀等原始落后武器，这在过去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现实就是如此。他们凭着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对敌人的仇恨和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走过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历程。

建队后第一个挫折是黄春和官水两人被捕，并由此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黄春和官水二人被逃兵陈斌出卖，在文冬街上被日宪兵逮捕，第三分队的领导闻讯后商讨营救的办法，决定由陈光来 郑清凉带队，当晚攻打文冬警察局，意欲救出黄、官两人，战斗从下半夜开始，持续了一小时，已近黎明，未能攻克，只好下令撤退，战斗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在于事前未经详细的侦察和周密的布置，总之是没有作战的经验。队伍撤退后，指导员郑清凉还逗留在文冬街上，意欲处决一名汉奸走狗。但郑的警惕性不高，裤袋的手枪被日本便衣宪兵发现，宪兵想拦腰抱住郑清凉，郑拔手枪反抗，不料手枪发生故障，不幸受伤，但仍挣脱敌人魔掌向下坡里（地名）猛跑，力争逃出虎口，不巧，前面有名孟加里（印度人），帮日宪兵拦截而被捕。随后押到文冬辛炳街新源昌茶室前被斩首。郑牺牲前高呼：马来亚共产党万岁。郑清凉原是雪兰莪州加影华侨中学学生，后来转学吉隆坡尊孔中学，他是上彭地区牺牲的第一名烈士，为抗日战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事隔两天，叛徒严苟带路，日军一百多人进攻文冬山香港第三分队的驻地，当时有十几位病号来不及转移，全部惨遭杀害，其中还记得名字的一位叫张才（加叻人），是自带猎枪参军的。这是上彭人民抗日军建队史上的

一个不幸事件，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攻打文冬警察局失败后，第三分队剩下二十余人，转移到文冬与古毛交界的双溪陈掌。此地原是一个矿区，已停止开采，是人烟稀少荒凉之地。由于缺粮和居住条件恶劣，病号日增，处境十分困难。幸得“一独”相助，度过了危难。1942年5月间，由老汪、陈光来带队跋山涉水到达文积，回到文积部队驻地，与原文积部队（即森美兰知知港马共区委派赵全组织的队伍）合并组成第六独立分队，由刘光任党代表、陈光来和叶青分别任正副队长。

紧接着不断遭到敌人的进攻，日军妄图乘抗日部队立脚未稳而一举歼灭，但抗日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寻找有利的时机打击敌人，从而保存了力量，站稳了脚跟。1942年5月间，日军集结了200多兵力，由奸细带路，接连进攻文德甲司令部所在地，第一次事先得到敌人进攻的情报，司令部转移了，敌人扑了空。1942年7月，日军又集结了200人以上的兵力，于拂晓再次进攻文德甲司令部所在地，被部队哨兵发现，立即开枪射击，日军就地散开，开乱枪回击，等待了许久，见没有动静，日军才敢继续向前行进。司令部在警卫队的掩护下，安全撤退了，日军却踩响了游击队预先埋下的炸药，被炸死炸伤多人，无奈只好将部队宿营地付诸一炬，然后撤退。据事后了解，毙伤的敌人中，有一名军官被炸死。日军死尸抬到文德甲市区，强迫市民参加追悼会。

事隔两天，日军直扑直凉，把直凉街场封锁起来，所有男女老少都被赶到广场，架起机枪强迫群众两膝跪地晒太阳，然后冲入各家各户大搜查，实际上是搜括民财。在“维持会”头头的乞求下，到傍晚才解除戒严，逐渐准许人们回家，

最后扣留了一名支持抗日的烟丝店老板丘华光，后经抗日组织多方营救，“维持会”的大小头头联名担保，才获得释放，经抗日组织研究，采取顺水推舟之计，安排他到“维持会”做内线工作，充当一个“白皮红心”的人物，外表为日本效劳，实际是为抗日而工作，协助部队采购物资，搜集敌人军事动态情报。丘华光1948年被英殖民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回到中国，病故于海丰县汕尾镇。

此后，日军曾多次“清剿”直凉、明光、文德甲等抗日军驻地，都因扑空而失败，一无所获。但是日军“清剿”的花样不断在翻新。1943年，日军在文德甲抓了不少华族商人，强迫他们打头阵进山“清剿”抗日部队，也一无所获。

就这样，上彭人民抗日军经受了日军频繁“清剿”、进攻的考验，保存了实力，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发展，1943年春建立了第八中队，（党代表黄以烈，队长叶青）和第十四中队，（党代表陈涛声、队长黄旭初）前者是驻明光分队逐渐扩大起来的，后者是在第六分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黄春、官水两人被捕后，抗日军司令部党代表，由小张继任。小张是学生出身，是雪兰莪石山脚“九·一”事件的幸存者之一，当时他的脚股中弹受伤，由“一独”的战士背了回来，治愈后返回上彭。在马共上彭地委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下，抗日游击队一方面要和日军频繁的“清剿”作斗争外，另一方面，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解决一系列的困难和危机。首先是解决了粮食给养问题，当时缺乏赖以生存的粮食，靠吃杂粮来维持生活，有时受敌人进攻连杂粮也吃不上，就采山上野果充饥，由于缺粮，引起营养不足，病号增多，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的影响，迫着

采取生产自救的办法，开办小农场，自己生产粮食，几个月内在文积、文德甲、直凉，相继开辟了农场，部队派人从事农业生产。随后在立啤、而兰突、劳勿、文冬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农场。这些农场经常给部队输送粮食，各地群众热烈献粮，从而保障了部队给养，增强了战士们的体质。其次是改善了缺医少药的状况，抗日游击队的成员原来生活在城镇和乡村，参加部队后却是生活在森林中，普遍不能马上适应这种生活环境的转变，加上粮食奇缺和营养不良，因而发病率很高，特别是患疟疾和生癞最为普遍，部队中的医生寥寥无几，药品仅有一些一般的中成药，处境十分困难。后来群众工作开展了，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这些困难才逐步得到解决，病情较重的战士，转移到农村，在群众掩护下，得到治疗，人民群众把抗日军病号当作自己的亲人，千方百计想尽办法为部队购买药品，特别是治疟疾的“金鸡纳霜”以及其他各种药品，不断送到部队，使病号得到较好的治疗，这与各地的民运干部艰苦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干部决定一切，上彭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起，司令部即注意到培训干部，以充实部队和民运的骨干。为了培训干部，曾举办过游击中学、人民学校等培训机构，受训人数数百人，受训人员结业后，个个唱着“毕业上前线”的革命歌曲，坚决、愉快地背上行装重奔各自的抗日征途，他们有的参军，大部分回到农村，开展民运工作。在部队的协助下，广大农村的抗日同盟会、抗日联合会、抗日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配合部队开展新区群众工作，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彭地委出版了《人民报》，抗日军出版了《游击报》，报导国际新闻，抗日军军事活动，锄奸消息，拥军情况，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这两份报纸成为部队战士和人民群众的主要精神粮食，是抗日战争年代为人们所喜爱、最珍贵的读物。

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是上彭人民抗日军艰苦奋斗的时期。在这期间，抗日军与日军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保存了力量，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四、“六独”的建立

1943年5月间，原在森美兰活动的“二独”，由于群众基础受严重破坏，环境恶劣，奉命移师到上彭，由司令部队长马丁（曾冠彪）率领，带了二百多人枪（合两个中队）与上彭人民抗日军合并。经过整编，于1943年8月13日宣布正式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司令部党代表峰云（小张），队长曾冠彪，副队长陈豪，政治部吴亮明后为陈平（赖文明），管理部汪清，从此，上彭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壮大发展新时期。

经过整编，“六独”编制如下：

司令部驻模范中队，共有130余人，其中司令部直属人员有30多人。政治部有以烈（黄扬）、末流（刑益岛）、陈涛声、连克苏、曾金水（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学生）、亚荣（马来教师）、印度人（原橡胶园会计、记不清其名），并配有印刷房的小何等工作人员，出版与上彭地委合办的人民报和英、马、印文宣传品。不久，马共中央调来雪予（张明令）主持上彭地委宣传工作，人民报移交上彭地委出版，并将连克苏和英、马、印翻译及印房人员随同调到人民报社。接着中央又先后从各地调来陈平（赖文明）、亚里（罗须磨，一小段时

间)、陈六(吴毓清)加强了政治部,将原出版的队内刊物《游击报》改为《革命军人》;管理部下设有机修组、医务、警卫、交通、民族工作等组。医务组有医生老肖(肖济荣)、丘立、老钟,并配有李满妹、小波、小进等护士,各中队遇有伤员或重病号,由管理部派医生出诊。警卫、交通、民族工作人员有:李球、叶祥、亚宏、黄道、谢泰、蒙富、张富、傅弟、黄文、乌巴、亚水(后二人是土著民族)等十多人,除负责司令部警卫工作外,也当交通或派出配合地方抗盟开展民族工作。

模范中队:党代表以烈(兼),中队长叶青,副中队长何友(以后为陈兆),政治部:胡冰,政教员:小蔡、碧玉、小萍。军训教官:老陈(广西人),随“二独”来的一位英国炮兵亚让(有时协助)。

一五七中队(由七十分队与“二独”调来一部人员合并组成)党代表叶爱克,中队长汤运兴,副中队长巫思泉,政治部小英,政教员:明志(陈锦华),繁如(罗焕廉),共有90余人,活动于文积地区。

一六二中队:(原十四分队扩充)党代表陈涛声(后调回司令部),中队长陈泮(后任党代表),副中队长黄旭初(后任中队长),政治部赵全,管理部伟民。政教员:朱燕、温小明,共有100余人,活动于明光、直凉地区。

一五九中队:(以“二独”调来的二中为基础),党代表陈辉,中队长胡力,副中队长徐国保,政治部亚铁,管理部陈庆,政教员:亚群、陈娇,共有八十多人。1944年夏整编,将陈辉调一六二中队任党代表,胡力、徐国保调一五三中队,陈庆调离部队到民运,改为独立分队,共有50多人,调胡冰任指导员(后由亚珍继任),分队长陈来。另成立

一支武装宣传队，共十多人，队长东子（陈其旭），活动于加流、文德甲地区。

吉兰丹部队：原在牙叻顶、毛生一带活动的三股群众武装组织，1942年底由上彭抗日军派人收编成立上彭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共有130多人。“六独”成立后，改编为中队，党代表老蔡（张剑青）、中队长陈冠雄（陈光来），副中队长冯成、梁旺、沈欣，军需（即管理部）刘旺，政工团负责人曾月华（亚珍），并有政工人员黄发新、周燕萍。后来马共中央从雪州调罗勒、杨获二人加强中队领导。同时考虑到牙叻顶与“五独”金马仑部队相邻，1944年3月将吉兰丹中队划归“五独”领导。老蔡、曾月华、黄发新等数人调回“六独”。

一五三中队：是1943年底在解散收编的十八中（群众武装）之后建立起来的，连同原派驻十八中队指战员共有130余人，党代表黄爱平，中队长邓昌，副中队长胡力、徐国保，政治部逸春，政工员亚光、黄广盛、商钦。活动于都奈、劳勿地区。

一六四中队：在1945年初建立，以烈任党代表，叶青任中队长，小英任副中队长，陈六任政治部，政教员小汪（汪友发），共有100余人，活动于立卑地区。1945年5月，英军在立卑地区空降联络官，找到了一六四中队，随后从一六四中队抽出一部份骨干和吸收后备队员建立与英军合作的新队，队长叶青，副中队长小英，政治部小汪。

上述中队领导人员，因环境关系，变动较大。

同年马共中央公布了“抗日九大纲领”和“四大纪律”、“十项注意”。九大纲领明确提出：“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使人民抗日军有了明确

的政治目标，在政治思想上，把抗日军武装了起来，振奋了民心、军心。同时有了统一的军纪、军旗、军帽、军歌，人民抗日军的形象更加明朗了，大振了军威。“六独”成立以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革命军人》刊物作为战士学习教材。并在这一基础上，大力开展整顿部队的工作：

（一）、以抗日九大纲领为内容，对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武装战士们的头脑，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使战士们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司令部将《游击报》改为《革命军人》，每月出版一期，作为教育战士们的读物。司令部政治部还以发出指示信的方式，指导各中队的政治工作，要求做到联系实际。最主要是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活动，有的放矢做好思想工作，定期开好生活检讨会，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觉悟，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良好作风。同时在小队中建立政治战士制度，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基层，做得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特别是严肃军纪方面做出了较好的成绩。通过开展整顿军风纪学习运动，要求全体指战员不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都应有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保持英勇战斗的决心，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做到上操、上课、开会、出外时衣冠整齐，集合迅速，每天洗擦武器，吃饭规定时间。

（二）、以军事化为标准，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上军事课，清晨跑步和上下午的操练，是每天生活的必修课，熟悉拆装、使用各种现有的武器，掌握射击要领，进行作战队形和利用地形、地物的训练，还经常进行射击和紧急集合的训练，此外，举行假设敌人进攻的演习，紧急集合哨令一吹，战士们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的岗位，准备战斗。吃饭、集合按严格规定时间，行动迅速、雷厉风行。战士们在这种严格训练下，穿军装、穿布袜、打脚绑、戴

军帽，树立起雄纠纠的威武形象，部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此外，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由司令部管理部汪清主持，当时只能自制刺刀、匕首和修理枪械，提高了武器的完好率，对保证部队的作战能力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努力配合地方培训抗盟干部，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密切军民关系，扩大部队的活动范围。将“人民学校”改为“民族公学”培养军事、政工和民运干部。参加上述两所学校训练的人数八期共六百多人。他们都成为部队和群众工作的积极分子。部队还常派出干部到农村训练抗日后备队，并协助开展群众工作，与抗日后备队密切配合进行锄奸。日军为了破坏抗日运动，经常派奸细到农村侦察搞情报，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经发觉敌奸潜入，就被抗日军消灭，奸细很难在农村活动，生疏人进入农村也受监视，敌人在农村没有耳目，也就找不到线索向抗日军进攻。群众工作的开展，扩大了抗日军的活动地盘，每个华人农村都有抗盟、抗日后备队、自卫队组织，华人居住的农村都成为“六独”的根据地，日军只得龟缩在城镇。

上彭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事例很多：

在农村有全家参军、送独女参军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军的。如文冬的何英，他的五个儿子（何福昌、何佑昌、何亚来、何亚明、何华安）、小女何九妹（李华），媳妇小芳都参加了抗日军。杨发夫妇及其弟弟一家也参加抗日军或抗盟。文德甲客家村的梁雪梅（女），战前就积极参加卖花筹赈支援中国抗战，日本占领上彭后，他鼓励年仅十五、六岁的独生女卢花兰参军，同时自己不顾安危，担任抗日军情报员，长期出入文德甲市区，为抗日军送情报、购买药物。立卑榴莲港有一位姓黄（广西人）的农民，经过抗盟领导亚福（颜天

迎)的教育影响,将其开芭收割的粮食,捐献了六十包面粉袋稻谷祝贺立卑一六四中队成立。1944年初,日本宪兵队和警备队在立卑市镇大搜查、逮捕群众,警察局、看守所关满被拘留群众,整个立卑镇都被封锁起来,日军把居民驱赶到商店的走廊,不准离开,逐个查问,群众被围困二天。当地群众在马共上彭地委委员老萧(林敏芝)和抗盟干部亚福的领导下采取反封锁措施,发动周围乡村农民不运送蔬菜、农产品上市,整个市场因此瘫痪下来,日本军警买不到东西吃,被迫取消戒严令,释放全部无辜群众。

在城镇,抗盟也很重视做好对中上层的统战工作。例如:淡马鲁县(包括文德甲、直凉、明光等地),抗盟组织就很广泛,威信也很高。直凉警察局长是抗日军同情者,维持会长苏怀持中立态度,丘华光是抗盟的骨干。自警团表面上防共、防抗日军,实际上是为抗盟、抗日军放哨,防止坏人入乡。抗盟骨干卢学礼、颜金智,他们利用家庭经商作掩护,提着脑袋,长期潜伏在文德甲镇做中上层统战工作。原文德甲中华总商会会长颜进迪,比较开明,日军进占文德甲时,他不愿替日军服务,后经抗盟会动员,才答应出来担任文德甲维持会会长,表面应付日军,暗中为抗日服务。在颜进迪当维持会长期间,维持会向抗盟通报了不少日军情况,为抗日军购粮食、药物。南光游艺场向抗日军捐款,也交维持会代转。日本投降时,卢学礼等人还代表抗盟、抗日军找日本宪兵谈判,动员日军交出十多支枪给抗日军。

文冬是上彭的交通要道,日本驻军较多,日宪兵、敌探走狗对群众控制很严,常在街上突击检查,有时窜入郊外乡村骚扰,造成抗盟在文冬县城很难开展工作。而文冬区的抗盟干部陈凤(女)、李志光等人面对这些恶劣的环境,从不畏

惧，依靠群众的掩护进行工作，对维持会中的顽固分子实行软硬兼施，迫使他们保持中立，同时发动开明的中上层人士为抗日军筹款、购物，作过不少贡献。劳勿县的中上层人士陈肇基、陈瑞，原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战前因共同抗日，与“抗援会”有联系，日本来后陈瑞当了劳勿县维持会长。起初还想以势压人，后来听到群众成立了抗盟会，纷纷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军，维持会长陈瑞再也不敢与抗盟作对，抗盟派人找他，有时还暗中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军。到1945年，陈肇基还将其金饰、金条捐献给抗日军。

1943年下半年开始，上彭农村抗日群众组织基础日益巩固，抗日军粉碎了日军多次“清剿”，敌人轻易不敢来犯，这就为群众进行生产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加上部队也开垦了农场，部队的给养逐步得到较好的解决，进入到1944年，战士们每天二顿已能吃到木薯或番薯饭，医药条件也得到较大改善。由于上彭山多，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广大华人农村为抗日军所控制，成为游击战争交通枢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抗日后方的作用，第二、三、四、七独立队与中央的联系，人员的来往调动，地下油印报刊交流，很多都通过“六独”中转。

上彭人口马来人约占一半，做好马来群众的工作十分重要。对民族宣传工作，“六独”与上彭地委曾一度联合建立过出版机构，配有英文翻译曾水金（曾高良，原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的学生），印度文翻译是一位胶园会计，马来文翻译亚荣（华文名，雪兰莪巴生一苏丹的弟弟，原马来学校教师），出版过马、印、英文版的宣传品。上彭的民族工作以地方民运干部为主，“六独”有两名精通马来语的干部（谢泰和黄道）常派出与地方民运配合开展民族工作。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则

邀请马来群众参加军民联欢会，各中队有时派出武装人员配合民运干部进马来村宣传，帮助马来村民治病。在上彭，民族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有：直凉、文积、立卑等地。到了1945年，驻立卑的一六四中队还建立了一支马来人小队。但从整体看，上彭的民族工作还是薄弱的。

五、收编几股群众自发组织的武装队伍

1942年至1943年间，上彭抗日军曾收编几股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为首的有李洪森、冯成、高百香、蒋石波等人。收编的目的是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抗日军对这些群众自发武装队伍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凡是有抗日的要求和意愿，而又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就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他们走上共同抗日的道路；对那些执迷不悟、继续为非作歹，抢劫人民财物，造成民愤极大的土匪，在宣传教育无效的情况下，则采取军事行动，坚决加以镇压。结果有的继续坚持其顽固立场沦为土匪，最后被击溃、逃窜他方。有的觉醒过来，接受抗日军的改编，走上抗日的道路。

详细情况，叙述于下：

上彭地处山区，有不少原始森林，林木参天，林中杂有不少山橡胶。英殖民统治时期，有些人进入深山里割山橡胶为生，马来亚沦陷后，这些人都变成失业者，有的收集了在英军撤退时丢弃的武器，自发地拉起队伍，他们原先也想抗日，但由于他们是乌合之众，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群众观点，在碰到给养困难时，凭借手中的枪支，勒索、抢劫群众的财物。少数坏头头还调戏和强奸妇女，稍有反抗，即遭杀害，群众无不愤恨。1942年5、6月间，根据群众

的报告，部队获悉在劳勿积罗山区有一股武装，约有80人枪，为首的叫李洪森。后来李洪森收容了另两股势力，一名叫老欧，另一名叫阿茂，这些人原居住在霹雳的丹绒马林和上林河一带，以耕山种植为生。英军在仕林河和日军打了一仗，英军被击溃，丢枪逃跑，他们捡拾了英军丢弃的枪支，或向群众购买得枪支，拉起队伍后，开始时表示愿意接受“五独”的领导，但却以抗日军名义经常到马来农村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为非作歹，损害了抗日军的信誉。为此，“五独”缴了他们一部份枪支。老欧和阿茂这部份人枪是漏网之鱼，逃窜到彭亨。他们逃跑时还劫持了一名马共地下党员（区委）陈光作俘虏。老欧和阿茂逃到上彭，由于自己没有地盘，不得不屈从李洪森，三股势力合在一起，共有一百四十余人，有来福枪九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三支、轻机一挺，短枪两支。由于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而是以勒索和抢劫群众的财物为业，当地群众都称他们为强盗，为了保障群众财产和生命的安全，当地人民强烈要求上彭人民抗日部队，消灭这股土匪，为民除害。抗日部队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对这批武装队伍先采取说服教育的政策，争取他们改恶从善，改邪归正，共同抗日。1942年秋，上彭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派代表赴积罗山与李洪森等人谈判，向他们做思想说服工作，晓以大义，以抗日为重。当时，李洪森等人同意接受上彭人民抗日军司令部的领导，编为第十八中队，委任李洪森为中队长，抗日军司令部初期派赵全为党代表，陈秀清为副中队长，“六独”成立后改为一五八中队，调派黄爱平为党代表，还增派了一些政工人员以加强领导。但他们被收编后，仍劣性不改，继续作恶多端，严重危害群众利益，与人民抗日军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对司令部的指示，阳奉阴违，经再三教育，仍不悔

改。1943年底，经“六独”司令部决定，由队长曾冠彪率领六十余战士来到一五八中队营地，原意劝导他们要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对其人员作部份调动，当时李洪森不在，带了一个分队到文冬亚什港活动去了。李洪森部队的老欧、阿茂等人见状心怀鬼胎，乘列队欢迎司令部队长时，就先行开枪反抗，导致双方发生战斗，李洪森部队当场被击溃，战斗结束后，十余名强盗被击毙，收缴了一部分枪支，抗日军副中队长陈秀清，战士黄锦洪、邓庆、肖清泉、林××在战斗中牺牲。（陈、邓两人因负重伤，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而死去的）还有警卫员叶祥下身受重伤，被打掉一个睾丸；符琼脚部受伤；何友亦负重伤，治好后，手臂不能弯曲，成半残废。事发时，李洪森不在场，侥幸逃脱，免于一死，残余的强盗狼狈逃窜，从此，再不敢返回上彭地区，“六独”为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在上彭与吉兰丹州南端交界处有一山乡，全称金山牙叻顶，墟镇名叫布劳，西面翻过山脉可通往霹雳的金马仑高原；日军统治时期，牙叻顶也有三股武装力量，一股是以冯成为首，有当地青年参加，约四、五十人，驻在布劳；另一股以高百香为首，约五十人，驻在本路港。蒋石波部队原系被“五独”击溃的残余。这三支人马中，前一支多为工人成份，与当地群众关系较好，思想倾向进步，真正想抗日，后两支虽自称是“华侨抗日军”，但他们的头头和相当部份的成员，过去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为了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马共上彭地委和抗日军司令部，进行过一系列的耐心争取工作，争取他们不要损害群众利益，共同抗日。1942年秋，继收编李洪森部队为十八中队后，冯成与李洪森有来往，加上上彭地委派连克书、何华安等人，与冯成密切

联系，冯愿意在上彭人民抗日军领导下进行抗日。同年十二月，马共上彭地委和上彭人民抗日军司令部和冯成达成协议，收编冯成的队伍为上彭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十二月下旬，上彭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派出第一批军政干部到牙叻顶，人员是张剑清、陈冠雄，曾月华（女）、沈×、吕秋帆、何华安、小刘等人。领队是张剑清、小刘是交通员。经过十二天的翻山越岭才到达目的地，受到冯成部队和当地父老的热烈欢迎。1943年1月下旬，冯成部队正式改编为上彭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张剑清为指导员，陈冠雄、冯成、梁旺、沈×分别任正副队长，政工团由曾月华负责，总务后勤由刘旺负责。吉兰丹部队的军旗原是斧头镰刀的红旗，后来改为统一的三星旗，从此，冯成部队走上了抗日的行列，成为一支政治目的明确，有严明纪律的抗日部队。冯成本人也表现很好，坚持抗日战争，直至日本投降。日本投降后，冯成被英当局逮捕驱逐出境，回到中国，七十年代病故于广州。

至于蒋石波、杨广、高百香部队的头目是毫无人性的强盗。沦陷初期在毛生，有十多家胶园的华侨被他们洗劫一空，有一位名叫古亚横的一家八口惨遭杀害，只逃出最小的儿子——古春。有一位叫陈带的乡民外出趁墟，回家时却见到妻子被关在屋里活活烧死。他们打家劫舍，谋财害命的行为，遭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抵抗。1942年农历初二，蒋石波带领三十余人到石山下打劫，当抢至黄金仙家时，遭到黄氏兄弟的抵抗，打伤蒋的右手，被迫撤走。1943年3月，杨广一伙二十余人进入大谷畚勒索，被乡民武装包围，并击毙六、七人，乡民刘富荣脚部受伤。尽管他们劣迹斑斑，1943年初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还坚持对他们做团结争取工作，初期他们表示接受，编为抗日军吉兰丹部队的第二、第三分队，

共同抗日，接受党代表杨获及政工人员驻队。“六独”成立以后，奉中央指示，将吉兰丹部队划归“五独”领导，改称十二中队。但是他们劣性不改，继续干其打家劫舍的勾当，在本路港伏击由孙增祥率领的十二中一个侦察班，造成孙增祥腹部中弹牺牲；蒋石波、杨广还带领其部队袭击十二中营地，作战中杨获和另一名班长牺牲。当地群众再次遭到骚扰和抢劫，抗日军派去的谈判代表刘旺又被杀害。后来“五独”司令部从霹雳州调遣部队前往增援，才将这两股土匪击溃，其残部逃往泰马边境。

六、主要的战斗

“六独”的战斗历程表明，它既有初期的惨痛教训，例如袭击文冬警察局的失败和护送英军人员受挫；又有后来的成功经验，例如锄奸活动、反清剿、袭击敌警察局等战斗，战绩如下：

一、锄奸活动：敌人在城镇、农村是靠培植敌奸收集情报来进攻抗日力量的。战争初期，由于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起来，敌奸在农村还有藏身之地，可以任意横行霸道，欺压群众，逮捕抗日分子，带路进攻抗日部队。如1944年162中队党代表陈辉、中队长陈泮，由明光到文冬路23碑司令部开会，途中在文积附近森林一间农民家歇脚，突遭一队日本兵包围，陈辉、陈泮二人虽然脱险，但牺牲了三人，其中二名交通员（一位叫傅弟，海南岛乐会县人），另一位是屋主农民。导致这一遭遇，就是经过农村时被敌奸发觉告密的。因此在农村中清除敌奸的活动，消灭敌人耳目，对保护人民的利益，扩大抗日活动地盘，壮大抗日力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

义、“六独”锄奸工作都是和当地抗日组织密切配合进行的，只要在农村发现敌奸的活动，就坚决把他们消灭。“六独”到1944年中已基本上控制了所有的农村，迫使敌人龟缩在城镇，功绩是卓著的。

“六独”对待敌奸按其罪恶大小轻重，有无血债和民愤大小，实行分别对待的政策，对于非杀不可的给予处决，一般是教育释放，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大汉奸朱维是文冬地区杀害革命人士最多的刽子手，仰仗日军的势力，为非作歹，干尽坏事，上彭的群众恨之入骨，文冬的群众更要剥他的皮，割他的肉才解恨。在日本投降前夕，他想逃往外地，人民抗日军为了实现群众的愿望，派部队在文冬通往吉隆坡、加叻、劳勿的路口设站检查，终于在通往吉隆坡的一辆日本人乘坐的车上，从放行李的车箱中把朱维揪了出来，押回文冬加叻示众，接着在加叻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参加大会有千余人，人数之多，确是空前，公审后，宣判朱维死刑，当即予以枪决，大快人心！

二、反“清剿”战斗：日军对上彭部队“清剿”十多次，其中遭反击最激烈的是在1943年1月间。上彭抗日军吉兰丹部队获悉，日军在毛生地区增兵，大有“清剿”进攻之势，部队立即作好战斗的准备，勘地形，布置工事，加紧训练后备队，抗日同盟会则动员乡民疏散，坚壁请野，部队还主动与高百香、杨广等队伍联系，商议共同抵抗日军的进攻，高表示协同作战，防守石山下，杨也表示愿意共同抗敌，但当敌人进攻时，他们都溜走了。为抗击日军，群众备战非常积极，把祖宗遗留下来的土炮也搬了出来，并有各式枪枝四、五十支。2月12日，得到情报，日军近三百人到了毛生镇，指挥部立即发出警报，通告当地群众疏散进山，武装部队开

进布防地点，严阵以待。翌日，日军开进本路港，又继续前进。上午九时左右，到达布劳镇，当大队人马走到布劳镇东侧离马娘庙一百米远处时，突然遭到抗日军的袭击，猛烈的炮火射得日军血肉横飞。后面的日军，意识到中了抗日军的伏击，立即散开，作钳形的反包围，但日军没有料到埋伏在石山下的部队却用机枪从另一侧向日军猛烈扫射。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抗日军在杀伤敌人后，分两路撤退，一路转移在大谷畚路上埋伏，另一路撤至阿罗心摸山里马娘坡（水坝）东面一带埋伏。两路部队各保护着隐蔽在山里的群众。十四日上午，日军一百多人来到阿罗心摸山边，十时进山搜索，他们沿水路进到山岗下水利沟附近，陷入抗日军的包围圈，指挥员陈冠雄带领战士李细佬、邹云胜、孙增祥等在山上用机枪、步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日兵纷纷应声倒地，活着的狼狈拖尸奔逃。抗日军预先在高处设伏，拖尸的日军又遭到伏击，只好狼狈逃出山口。中午时分，日军拖着十多具尸体撤出阿罗心摸，老羞成怒，下午把该处民房付之一炬，撤回布劳。当晚，胆战心惊的日军，龟缩在布劳镇。深夜，住在马娘庙民房的日兵，又遭到抗日军骚扰射击，搞得日军彻夜不眠，有如惊弓之鸟，盲目开枪射击，次日把水心芭民房焚烧殆尽，最后，十八日也把布劳镇纵火烧掉，这一仗，前后打了五天五夜，抗日军歼敌约四十余人。据毛生的知情者反映，日军把四十具骨灰盒装上火车运走，被歼者中有一名军官。此役缴获枪二十余支和一批弹药，抗日军有一名后备队员刘贵煌受伤，另一名战士冲散，三天后归队，在群众密切配合下，反“清剿”取得了胜利。

三、袭击敌警察局：1944年4、5月间，162中队由陈泮带队，袭击直凉警察局。事先民运干部对警察做了

思想工作，有警长作内应，互相配合，抗日军包围警察局后，立即冲进去，把警察捆绑起来，一枪未放，缴获全部武器，共有十多支来福枪。1944年10月间，157中队袭击文积警察局，原计划在深夜发起进攻，同时在通往文冬、马口两地的公路上伏击打援，但由于警察局四周筑有铁丝网，并挖有壕沟，当进攻队伍接近时，被敌人发觉。敌人马上跳进战壕开动探照灯照明，配合机枪扫射，以致无法接近。战斗持续了二个小时，直至黎明才撤出战斗。事后了解，这次进攻虽未得手，但毙伤敌人多人，影响不小。特别是战斗一打响，警察局便电告文冬、淡马鲁等地求援，但日军一直不敢增援，直至第三天才派一队日军前来，匆匆巡视一下，又匆匆撤走，这次行动对敌人士气打击很大，不少警察表示，今后抗日军再来进攻，缴枪就算了，不愿为日本人卖命，后有不少警察辞职返家，不再当警察了。1944年12月，司令部从各中队调百余人，集中兵力，分成二队在白天同时攻打27碑和文积警察局。进攻前都经过侦察地形，摸清情况，并通过内线做通文积警察局内大多数警察的工作。部队则化装成老百姓，潜入市内。攻打27碑警察局由司令部队长曾冠彪带队，当队伍潜伏在警局周围后，派出副中队长思泉走入警局内找警长谈判，指明警局已被包围，要他们缴枪投降，警长怕死，立即答应缴枪，是役共缴获轻机枪二挺，来福枪二十余支，弹药一批。攻打文积警察局则由司令部党代表峰云和管理部汪清带队，中队长汤运兴和戴贵带领队伍到警局周围埋伏时被发现，警察都逃跑了。等到晚上逃离的警察陆续回到警局，通过内线向他们做工作，才答应投降缴枪，共缴获来福枪三十多支，机枪二挺，以及一批弹药、物资等。两处的警察由部队分别带回农村，当晚召开庆祝胜利的军民联

欢大会，同时动员警察的家属参加，使他们深受感动。这些警察经过教育后，全部释放，并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

七、与联军合作抗日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马来亚，由于形势的变化，马来亚共产党号召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败日本法西斯。英军节节败退，只是在紧急的情况，殖民当局才被迫接受这一主张。同年十二月底释放了所有被捕的政治犯。“六独”的领导人峰云和汪清就是从吉隆坡半山芭监狱获释返回上彭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同时英军在新加坡开办的军事学校，名为“101特别训练学校”。

这所学校的教育长叫查普曼，军衔是上尉，新加坡沦陷前，就奉命到敌后开展对敌破坏工作。1942年初，他流落在霹雳仕林河，后来辗转转到“一独”。同年7月间，他与一位采矿工程师A·滑（译音，受过收发报训练）来到上彭加叻路12碑板厂住了二个月，板厂的老板及部分群众把他们当作盟军人员看待，尽力给以保护和照顾。他们的行踪后来传到附近群众都知道了，也传到日本警备队耳里，于是派出暗探在加叻路一带侦察。上彭抗日军司令部获悉后，立即派陈光来、小刘（张海荣）等人带他们到司令部。当时该工程师正生病，只好用担架将他抬到隔山的千二格胶园。由于该胶园离司令部所在地还很远，抬担架走山路有困难，便向该胶园的包工头黎坤借了一辆汽车运送，汽车由胶园驶出19碑，朝文积方向前进，途经23碑时，遇一辆日军车（内坐着几个日军）拦阻检查，查普曼见状恐慌异常，立即向日军车投掷一枚手榴弹，便跳下车逃走。护送人员也跳下车边掩护查

普曼撤退，边狙击日军追赶。查普曼虽脱险被送到上彭抗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但英军工程师由于不能走路，在车上中弹身亡。汽车被纵火焚烧，汽车主人被日军逮捕，斩首处决，分队长陈光来的拇指也被枪弹擦伤。这次护送工作付出了一定代价。

查普曼在上彭抗日军司令部逗留了一段时间，生活上得到优惠的照顾，搭了一间房屋供他独自居住，除有时请他在“人民学校”讲解武器常识外，别无其他事可做。他常向司令部人员询问各中队情况，还要求到各中队去看看，有空就在屋内写东西。1943年春，他去过森美兰“二独”了解情况，回来后马共中央通知上彭抗日军司令部派人护送他到“五独”，后来在那里与英军一三六部队先遣人员台维斯会合在一起，直到日本投降。他是极少数能生存到日本投降的英军之一，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没有马来亚人民，没有人民抗日军的保护，他是无法生存的。他在战后写的《森林是中立的》一书中也谈到这一点。

1943年底马共和人民抗日军负责人与东南亚联军总部代表台维斯等人签订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同年10月马共在“一独”召开全马党、军会议，谈到了英军反攻和建立新队问题。“六独”队长曾冠彪出席了会议。由于莱特暗中出卖，日军飞机前来会场低空盘旋侦察，并派一千多兵力进山搜索，以致会议草草结束。

由于形势的急速发展，“六独”于1944年冬开始，大力抓紧训练抗日后备队，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

1945年5月，第一批英军空降人员，降落在立啤地区，为首的叫伦纳（Magor G. R. Leonard），少校军衔，另一个叫摩里逊（Capt. T. R. Morrison），还有两名中国人，一个

是翻译李成元（李智），另一个是报务员（胡国柱）。他们降落后，在当地雇用了两名马来青年替他们背行李。“六独”获悉他们降落后，派 1 6 4 中队政治部陈六和他们联系。

在英军降落之前，1 9 4 4 年 1 2 月 7 日六时许，美军四 0 四部队的比杜斯中尉（J. Bithos）和另二名中国人（叶亚才、郭叶）降落在彭亨而兰突关丹路 8 9 英里的黄重吉农场 2 4 号公司屋旁。不久，“六独”司令部获悉后，派队长曾冠彪找他们联系，原拟劝他们来“六独”司令部营地，以免被日军发现，遇到危险。他们带来的收发报机已经损坏，与联军总部失去联络，但他们仍不愿离开该农场，在木薯芭搭起一间木棚居住。后来，一架美军 B 2 9 飞机轰炸新加坡时失事，四名美军跳伞降落在森美兰境内，幸存者三人，他们是亨菲（Humphrey）中校、沙士曼（Sahzman）上尉和达菲（Duffy）上尉，由“二独”护送来“六独”，再转送到黄重吉农场和比杜斯会合。后来，“六独”又派人替他们联络，与降落在而连突的英军空降人员会面，商量修复美军的收发报机，以便和他们的总部联络。在马来亚期间，这些美军没有开展活动，日本投降后，才返回他们的部队。

英军第一批空降物资是在立啤地区的一个小农场，也是一六四中队的临时宿营地，时间是傍晚，信号是三堆火堆和用白布摆成“T”字。可能是因视线的关系，有两桶武器错投在附近的农村。后来 1 6 4 中队转移到而兰突地区宿营，空降继续不断。至此“六独”获得了一批武器和其他装备。枪支计有迫击炮、反坦克来福、轻机枪、士丹枪和卡宾枪、左轮手枪等。

随着武器的增加，在一六四中队的基础上，扩大了队伍，“六独”决定建立与英军合作的新队，名称也称马来亚人民抗

日军第六独立队，不设党代表，调老队政治部吴亮明任新队司令部正队长，管理部汪清为副队长，政治部陈六，老队政治部一职由陈平（赖文明）继任，管理部由副队长陈豪兼。老队不与英军接触，新队受老队的领导。新队共辖四个中队，分别驻在立啤、劳勿、文冬和文德甲，司令部设在文冬。

立啤中队：中队长戴桂。

劳勿中队：中队长徐国保，副中队长王华。

文冬中队：中队长洪义，副中队长培华，政治部明志。

文德甲中队：中队长叶青，副中队长李球，政治部繁如。

进城后，由于工作需要，吴亮明调离部队，由汪清任队长，雪兰莪州调来王杰任副队长。“六独”与英军空降人员并不是很和谐的，主要是伦纳少校心胸狭小，不信任抗日军，在第一次空降物资后，他们不肯将武器发给战士们，有一次传来日军可能来进攻的情报，请他们和部队一起撤走，也不愿意，最后抗日军通知他们：部队决定撤走，对他们的安全不负责任，他们只好向哥伦坡总部请示，结果才肯同部队一起撤走，不得不把部份武器发给战士们使用，一部份就地埋藏起来，后来营房被烧，埋藏的武器不翼而飞，这是他们的一个教训。他们的生存是要靠人民抗日军保护的。另一次是发生升旗的磨擦。在而兰突营地，人民抗日军每天早晨起来后有集队升军旗的惯例，在吴亮明不在的情况下，伦纳少校强迫抗日军升英国旗，吴亮明回队后甚为不满，战士们也很愤慨，第二天升旗礼时，吴亮明队长当着英军的面前拒升英国旗，说：“如果用这些枪支可以收买我们，我们宁愿不要这些枪支，而要军旗”。当场把一支士丹枪掷在地上，重新升起了军旗。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件事，吓坏了伦纳少校，怕把事情闹僵，无法向他的上级交代，只好达成如下协议：人民

抗日军升军旗，在英军小营房升英国旗，各升各的旗，事情才算了结。英军空降人员在上彭至日本投降，前后不足四个月，他们仅为抗日军提供了一些装备，但未和日军打过一次仗。

值得一提的是，英军查普曼不忘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日本投降后，还到上彭来探望“六独”的老朋友，不忘友谊。

八、抗日军进城与复员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出人意料之外，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六独”新建的新队未与日军交锋作战，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此，日本法西斯在马来亚三年八个月的黑暗野蛮统治宣告结束。日本刚宣布投降，抗日军尚未进城前，马共中央于8月25日在吉隆坡郊外农村召开中、北马党、军会议，“六独”老队司令部队长曾冠彪参加了会议，带回和平斗争“八大主张”。“六独”根据会议的决定，将老队解散，武器收藏起来，人员安排：一部分抽调到各条战线工作，一部分并入新队开进城镇，分别进驻立啤、劳勿、文冬、文德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欢迎。人们升起了人民抗日军的三星红旗，争先观看人民抗日军的英姿，呈现一片欢乐景象。人民抗日军进城后，负责维持社会治安，惩罚汉奸走狗，协助建立人民委员会，让人民过好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但英军9月5日重返马来亚后，9月15日成立军事管制政府，不久就着手解散各级人民委员会，对抗日军和各人民团体横加干涉和限制，充分暴露其把马来亚再次变为英国殖民地的反动本质。

由于马来亚共产党已放弃了“抗日九大纲领”，提出了“八大主张”，并于11月15日正式接受了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提出解散抗日军计划，宣布人民抗日军12月1日复员。是日，“六独”各中队战士全体集中于文冬足球场举行复员仪式，战士们无不悲愤地含着热泪放下武器。

“六独”复员后，分别在立啤、劳勿、文冬、文德甲建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分会”，州会设在文冬。他们积极参加战后争取民主的运动，但却受到英当局极为恶劣的待遇。1948年6月21日，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被英当局取缔，到处大肆逮捕抗日军复员军人，并驱逐出境，暴露了英当局的反人民本质。但是“六独”在三年八个月的抗日战争中，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抗日的胜利是作出了贡献的。她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她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为抗日战争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本文撰写和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小 汪（汪友发）	陈 六（吴毓清）
曾冠彪（马 丁）	汪 清 黄爱平
雪 予（张明今）	亚 珍（曾月华）
亚 里（罗须磨）	小 云（刘玉燕）
亚 光（倪玉英）	明 志（陈锦华）
徐国保 陈 庆	陈 辉 亚 容
逸 春 有 妹	郑柏友 卢学礼
东 子（陈其旭）	刘玉梅 汪金妹
小 何（李华）	苏进娇（苏连清）
颜天迎 胡 力	卢花兰 周立萍
赵 全 李满妹	丘碧云 温小明
吕瑞莲 潘柱荣	温运奎 吴 杰
黄瑞兰 小 李（刘敏清）	

（第一稿由小汪执笔，第二稿由陈六执笔，第三稿由曾冠彪执笔整理。）

(七) 战斗在东彭、丁加奴州的 人民子弟兵——第七独立队

一、建队经过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南太平洋战争，把战火烧到马来亚和新加坡，日军在吉兰丹州哥打巴鲁登陆后，分兵南下攻占丁加奴州。英军边打边退，12月31日彭亨州关丹沦陷。马共东彭（即彭亨州东部）地委书记大黎（蔡克明）立即在关丹某地召开地委紧急会议，地委委员肖新民、张祺、刘平（力争）、杨青、庄清等参加会议。大黎传达马共中央指示后，地委决定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配合英军保卫南马和新加坡。会后，大黎与孔锋离开关丹前往吉隆坡，想和中央取得联系，并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西彭文德甲交通站接上联系后，就派孔锋回关丹传达。大黎离开关丹后没有再回东彭，留在中央工作。其余地委委员分工领导党员、积极分子、胶工分头在战场上收集英军败退时丢下的枪支、弹药，寻找英兵败退时埋藏的零星武器。王书、冯芳、李朝、李春等20多人参加收集武器，共收集到步枪10支和猎枪、手榴弹等武器，并筹集了一批面粉等粮食，遂即组成抗日游击小组（1942年2月）。

1942年3月间，趁日军占领关丹后大部队向马来亚中部、南部挺进，关丹守敌不多的有利形势，由张祺指挥，王书、冯芳带队，首攻与关丹毗邻的丁加奴州雅姆警察局。战斗打响，旗开得胜，警察全部投降，缴获步枪20多支。打了胜仗，游击队退守芭边后，队伍开始转移至雅姆山原始森

林中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后，队伍不断扩大，于1942年5月正式成立东彭关丹抗日游击队。

与此同时，洪中浪、高人志等人也在丁加奴州北加港发动以胶工为主的各阶层抗日群众，在“十株胶”处和基里地（社）的广葵岭建立营房基地，成立丁加奴抗日游击大队部。党代表洪中浪，大队长高人志。大队部设在北加港一胶园。后因马共中央和东彭地委不同意这个建制，把该队番号改编为第十六中队，属第七独立队直接领导。

1942年上半年，新任马共东彭地委书记吴田（阿仲）到任，东彭关丹抗日游击大队的领导成员是：大队长张祺，党代表庄清（徐志荣），副大队长杨青，政工处负责人黄敏，军需负责人吴克。不久，继黄敏之后，马共中央又调来小黎、小平、阿山、小李（刘敏清）等人参加部队工作。东彭地委委员除吴田、刘平之外、张祺、杨青、庄清等也参加地委。（小黎负责丁加奴州工作）

经过两年多游击战争，队伍不断扩大。经吴田找到中央汇报后，马共中央批准，东彭关丹抗日游击大队整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于1944年9月1日宣告成立，并于1944年11月7日，在雅姆山根据地操场隆重举行盛大的、为期一周的庆祝七独成立大典，有文艺宣传队的文娱演出和演琼剧等活动。党、军、群众组织（东彭和丁加奴抗日同盟会）和集体农场代表共300多人参加盛典，热闹非凡。

二、“七独”组织机构简介

第七独立队的辖区：包括彭亨州东部的关丹和北根（彭

亨州苏丹王宫所在地)两个县及丁加奴州。

军事机构和编制：独立队设司令部，下设中队指挥部和分队指挥部。“七独”有4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编制为“三三制”，三个小队为一分队，三个分队为一中队。

全独立队指战员700余人，如包括勤杂、医务、政工人员、集体农场民兵、游击区抗日武装后备队共达1000多人。

武器装备：长短枪共500余支。其中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自动步枪1挺、步枪(包括三八式)400多支、短枪(包括左轮、撈轮等)20多支、猎枪数十支。还有地雷、手榴弹、炸药等，上述武器均分别装备在各中队和独立分队。

第七独立队各中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驻地、活动地区和指挥员名单如下：

第七独立队司令部：党代表庄清、队长张祺，副队长杨青、政治部阿山、后勤部吴克。

第一中队：中队长王书、党代表孔锋(后由陈祝继任)、副中队长王孝宣(后调离)、保管员吴克(兼)。第一分队长冯芳，第二分队长李朝，第三分队长潘正保，指战员250人，枪150支，驻地随司令部驻雅姆山营盘。活动地区：丁加奴的雅姆及东彭的关丹、巴落、米昔拉、北根等地。

第六中队：中队长王孝宣，党代表符天(后为孔锋)，副中队长林志，保管员吴开科。日本投降时，中队长肖桐、副中队长漂泊(邬龙华)。指战员120人，枪100支，驻地：在司令部附近的第一、第二集体农场。日本投降时进驻丁加奴州甘马挽。活动地区：丁加奴州的甘马挽地区。

第十一中队：中队长黄星龙(后为王禄全)，党代表吴基，

保管员李亚文。指战员约100人，枪90支。驻地：在林明矿山。活动地区：东彭林明、甘孟等地。

第十六中队：中队长符国盈，党代表小黎（后王秀槐代理），副中队长吴金，保管员陈俊。第一分队长林树锦，第二分队长高如，第三分队长陈经文。日本投降时中队长陈俊、副中队长黄福权。指战员200人，枪130支（多数为猎枪）。驻地：在丁加奴州北加锡山。日本投降时进驻丁加奴首府瓜拉丁加奴。活动地区：除甘马挽外的全丁加奴州。

龙运独立分队：日本投降时建立，由第十六中队代管。分队长王禄英，副分队长符功彬。指战员60人，枪40支。驻地和活动地区：龙运。

三、辉煌战果

第七独立队从1942年日本占领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三年八个月里，对敌作战（大小战斗）几十次，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击毙、击伤日军、奸细共约数百人，其中击毙日军官田岛大佐一名，军警投降60多人。较大的战果有：

1、攻打东彭的巴都沙化、林明、甘孟、班振、巴落、米昔拉和丁加奴州的雅姆、甘马挽、甘马仕、基里地、万利等11个警察局。除两次攻打班振警察局的其中一次失利外，每次都打有准备仗，攻无不克，都获全胜凯旋。如东彭地委领导的丁加奴抗日游击队，探悉基里地和甘马仕两警察局没有日本兵驻防。便于1942年5月20日下午三时，派出游击队员50余人，用三支猎枪和30多把大刀，由高人志带队，从基里地广葵岭基地出发进攻基里地警察局，击毙警察

一人，缴获英式步枪 5 支，子弹数十发。并处决大汉奸陈贵万。接着连夜进攻甘马仕警察局，只开了一响“打象枪”，就吓得敌警举手投降。缴获枪支 105 支（绝大多数是猎枪，其中手枪 1 支。猎枪是日军刚从丁加奴州各地收集起来，用汽车押送至甘马仕暂存放的）。此役还当场抓获并处决一个押解猎枪的日籍情报员，同时释放了被日军逮捕、拘禁的群众 60 多人。

2、1944 年 4 月间，日军动员千余兵力，分兵七路，以小炮艇（运兵）和飞机（扫射和轰炸“七独”司令部营盘和第二集体农场时，一名战士受伤）配合进攻，发动一次大规模围剿“七独”根据地雅姆山区，企图一举消灭“七独”的大战役。“七独”在敌机扫射、投弹掩护陆军进逼根据地营房的强大攻势面前，化整为零，避开正面作战，灵活运用地雷战，在敌人进攻的路上和路口埋下地雷。起初，敌人大摇大摆，毫无戒备，数路敌军均遭游击队引爆成功，炸得敌兵尸体横飞。抗日军同时派出游击小组使用伏击、偷袭，对敌人进行骚扰，并在雅姆至甘马挽中途的丛林里的一次伏击战中消灭敌军数十人，夺枪 20 多支，俘掳 5 名日本附庸兵。一个农场的民兵林龙灿，赤手猛喝一个迷路的附庸兵时，使他惊慌得连忙跪下投降求饶，智缴敌步枪一支。此外，惊弓之敌还发生过一场在黎明前互相误认为抗日军的火拼，互相残杀，到天亮时才停火互相争吵一翻……。结果，粉碎了日军扬言一个月消灭抗日军的计划，仅用十多天的时间就在反围剿战斗中重创敌军而取得胜利，将来犯之敌赶出雅姆山。这一战役，敌死伤 100 余人，俘敌数人，击毙敌指挥官田岛大佐一名，缴获武器一批。此后，日军再也不敢派兵入山到根据地进攻抗日军了。

3、1944年间，埋伏袭击班振至林明间的一辆运输物资的日军火车。缴获战利品除带回枪弹、运回大米外，并将火车炸毁。又一次震撼了日军对东彭、丁加奴的统治。

第七独立队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辉煌战绩，但也打过失利的败仗。1944年1月，因情报不准确（原情报没说有日军驻守），张祺带队进攻班振警察局时，一日军指挥官一面诈降，一面布置反击，抗日军中计，在战壕里遭受日军、警察轻机枪扫射时无法脱身，致使中队长黄星龙受重伤，抬回营房时，治疗无效牺牲。吴忠运、何生两名战士亦当场牺牲，何九等数名战士也受了伤，结果只得撤回营。这次是“七独”进攻警局的所有战斗中，唯一打了败仗的惨痛教训。

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七独”牺牲29人（查不到姓名的烈士，未计在内）。其中有优秀指战员、优秀共产党员和抗日革命干部、群众。计牺牲地委委员1人，中队长2人，分队长2人，战士21人，革命干部、群众3人。他们是被日军逮捕杀害的肖新民（地委委员）、曾家补（战士）、李达（被俘战士）、莫有山（叛徒出卖被捕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黄星龙（中队长）、冯芳（分队长、党员）和战士吴忠运、何生、李吉、尤成、刑丰、伍书典、符可海、陈载钦、符可禄、阿金、黄昆、陈兴、吴章；试投手榴弹误炸牺牲的党员中队长王孝章，服错药致死的分队长黄胜；从西彭调来东彭在途中过河溺死的政工人员邱英华，翻船溺死的战士陈林，病逝的政工干部陈真、文化教员黄幼文（女）、战士陈标和叶成、炊事员符瑞书和集体农场场员颜印等。为了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胜利，烈士们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英雄身躯，长眠在马来亚的土地上。他们是马来亚人民的好儿子和光辉形象，永载史册，名留千古，永垂不朽。

四、粉碎招降

1943年上半年，日军抛出新花招，阴谋用招抚形式来瓦解“七独”，强迫并命令关丹维持会和自卫团等大小汉奸、暗探组成一支32人的招安队伍，由张成庚带队，带着救济品（？）经雅姆胶园到抗日军经常出入活动的芭边进行所谓“招降”，美其名曰“谈判”。“七独”将计就计，先由10多位战士化装成群众为“招安队伍”引路，同时派出第一中队埋伏在谈判地点的四周。招安队伍全部陷入包围圈内时，“七独”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政治宣传攻势，在揭发和训斥汉奸们的罪恶后，采取杀一儆百，当地宣布罪大恶极的关丹维持会长张成庚的罪状后，就地予以枪决，汉奸们和暗探无不吓得目瞪口呆，魂不附体，纷纷认错求饶。为掩敌耳目，同时宣布扣留了林明维持会长潘先兴、甘孟的温寿、雅姆的李林等三个比较开明并可争取的维持会长，带入根据地营盘让他们参观，接受教育后，才让他们分别回家。其余的“招安人员”则进行宣传教育后当场释放。从而巧妙地粉碎了日军的一次招降阴谋。群众闻悉无不拍手称快，抗日军威望增高。这次反招降斗争是由张祺亲自带队胜利完成的。

五、锄奸反特

1943年至1944年，日军软硬兼施，用招降和围剿均告失败后，便躲在关丹城镇不敢出来，游乐场则成为他们龟缩的玩乐场所。日军不敢出动，抗日军就找上门去，开展一场锄奸、反特运动。组织一支精悍的锄奸小组，经常潜伏在游乐场里伺机行动。在此期间，击毙了关丹日本特高科

长、汉奸特务张禄。另几次，还击伤汉奸数人。敌伪丧胆，群众振奋，鼓舞了“七独”战士，斗志更昂扬。

1944年间，在群众要求下，还派出武装到林明没收维持会长潘先兴的财产和粮食。

通过枪决张成庚，击毙张禄，没收潘先兴财产等行动后，汉奸、暗探老实多了，不但不敢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其中不少人转而靠拢抗日军，经常给抗日军送来情报。沦陷区群众的抗日活动从此得到更大发展。

六、具有特色的发展过程

由于马来亚沦陷得快，1942年2月15日英军向日军投降，马共派往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的骨干，还来不及派到东彭建队，“七独”的指挥员均没有参加过军校军训都是游击战争中锻炼成长的，这是“七独”的特点之一。

从来没有联军空降兵参与“七独”协同作战或空降过武器、军用物资、粮食等支援过七独。1945年初，虽然联军在彭亨州而连突至关丹中途87碑处的黄重吉农场里空降一组特工人员，其中一名美国军官和三名华籍特工。“七独”党代表庄清曾带领翻译员岑开星（水恻）和几位战士前往联络，由于他们坚持要独立行动，但收发报机空降时坠坏了，已无法直接与东南亚联军总部取得联络。到日本投降前，再没有联军人员在“七独”辖区空降过，这是“七独”的特点之二。

在英军遭受日军搜捕已无法藏身的时刻，“七独”收容保护了两名英国侨民白克（BAKER）和白娜（NONA）。白克是

林明锡矿总经理，后病死在“七独”根据地。白娜是白克之妹，后参加抗日军，参与编写出版“七独”机关报“民意报”英文版的工作。战后她回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一本书名为《一个英国妇女在马来亚森林里得以活命的故事》的回忆录，书中叙述了她在“七独”抗日游击区的一段难忘的经历。不过，书中有些地方是失真的和误听误解的，甚至对马共不满的，这也许与她战后在英国的处境有关。这是七独的特点之三。

“七独”辖区内的东彭和丁加奴州，在三年八个月的抗日战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有土匪武装的活动，这是“七独”的特点之四。

“七独”的军纪是严明的，所以“七独”指战员中没有出现过大的叛变行为和大叛徒。这是“七独”的特点之五。

“七独”司令部营地建在雅姆山区原始森林中，先在牛路，后在新营，曾几次迁移、扩建。“七独”成立时，司令部的营地周围有大小五个集体农场环绕，营地中央有个大操场，四周的平屋建筑群是司令部、一中指挥部和营房、大礼堂兼军人俱乐部、军医院、出版部、枪械维修加工厂、厨房、食堂，小河边建有男女浴室和男女厕所。从来未受日军攻入占领过。这是“七独”的特点之六。

当日军向抗日群众征兵、征服工役和迫迁家园时，“七独”在1943年间，还收容、保护了当地群众，建立新农场和扩大另两个集体农场，共为三个大集体农场。共有场员300多人进山开荒，种早稻、地瓜、木薯等杂粮和蔬菜，还养猪、鸡、鸭。在军民千人参加劳动生产下，基本上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粮食自给。在农场里办有成人识字班和小学，还组织抗日儿童团和民兵。集体农场场长是吴清俊。副场长英

莫湖、韩宣元。抗日儿童团团长是严世凯（严笃），副团长颜金秋。这是“七独”的特点之七。

“七独”之所以能够坚持三年八个月的艰苦抗日游击战争，而且在对敌作战中不断壮大，除马共的领导外，主要是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支持、支援、作为坚强后盾（包括华、马、印、土著民族）。首先是与大力开展民运工作分不开。在根据地的芭边胶园、农村都普遍建立抗日同盟会和抗日后备队（民兵）等群众抗日组织。密切了军民鱼水的关系，群众在经济上和生活日用品上援助，并为抗日军补充兵源。

其次，为了团结群众抗日，“七独”政治部和东彭地委宣传部合办的出版部，做了有成效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出版部除出版有关战略战术等油印小册子供指战员学习和训练外，还用华、马、英三种文字定期出版“七独”机关报《民意报》，向游击区群众宣传“抗日纲领”，进行形势宣传教育，报导抗日新闻。在出版部工作的有小平、岑开星、周丁、蔡聪敏（惠仁）、白娜等人。

第三，“七独”组织了一支精悍的抗日宣传队（由游击队的政工人员和民运干部组成）和一个业余琼剧团。除节日或开晚会在营地进行文娱宣传演出外，还经常到农村、胶园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和爱戴。如1944年农历正月初，一支抗日宣传队到甘马挽柴山兴隆火锯厂的林场进行文艺宣传演出持续了三天，群众还要求继续演下去。敌自卫团和便衣暗探也夹杂在几百个工人中观看精彩节目演出，不但不敢也不愿向日军报告，反而当众向抗日军认错，表示愿意悔改，与抗日军合作。可见当时抗日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与日本法西斯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这支抗日宣传队的队员有：邹锦生、小李（刘敏清）、林素琴等约20多人。

第四，“七独”在司令部营盘建有医院，中西药和草药医生有5人，军医主任是黄志平。能及时为伤员和指战员及集体农场群众治病。医院还配备一个女护士班共10人。当时的小组长是许素英（许娟）和素华。

第五，“七独”建有枪械维修加工厂，负责人亚秉。可以维修一般枪械，还能自制手榴弹和炸药，以及修复地雷的雷管和引炸线，并进行加工五金小日用品等。

最后，“七独”战士的生活是紧张、活泼的，虽艰苦但愉快。大米较缺少，但加杂粮（玉米、高粱、木薯、地瓜等）的稀饭是吃得饱的。猪肉最缺，但可以猎野兽、山猪等野味和捕鱼来弥补。更有趣的是，用鸭脚栗磨粉加椰糖制成类似“阿华田”的饮料，配上杂粮做的糕点就是一顿丰盛的西餐。小日用品如斗笠、草鞋、橡胶鞋、漱口杯等也都是自行加工制造的。不少指战员还自制象牙筷子和象牙烟斗以及用牛角制成打火机，用一点植物棉便可生火吸烟，解决了当时很缺乏的火柴。

以上是“七独”在抗日战争年代里的成长、壮大过程。“七独”对反法西斯抗日战争是有一定贡献的。但在某些工作方面，如在统战、干部政策、处理战士违纪和集体农场场员违纪，以及对虐疾流行病一度在集体农场蔓延，一日三餐主粮（大米）奇缺和缺药（奎宁）少医以致造成意外死亡，关心和抢救措施不力（后期已纠正）等，也曾有过失误。主要是受“左”的影响，“七独”是有教训的。

七、进城和复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七

独”队伍分别开进东彭关丹和丁加奴州各城镇。在英军尚未到达新、马时，成立了人民委员会。抗日军入城时受到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沿街花絮纷飞，鞭炮震天，欢呼声和口号声如雷贯耳，在挂满彩旗的大街上，欢迎群众万人空巷，在举行庆祝抗日胜利大会上更是盛况空前。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队公开部队司令部，为了与英军配合（“七独”虽未接受过联军的空投武器和物资，但在上级的统一部署下，英军在东彭和丁加奴的抗日军中均派了联络官）不用党代表名称，改任命庄清为队长，张祺为副队长。

人民委员会没收了日伪敌产，在关丹进行公开审判日本走狗，计逮捕了40多人，杀8人，并释放了监狱中的全部政治犯。

1945年9月1日，在关丹举行了纪念石山脚“九一”烈士追悼会，会后建立了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

1945年12月1日，由莱特主持制订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和内奸、叛徒、特务分子莱特操纵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七独”的公开部队700多人，在关丹复员。

复员后，在东彭关丹和丁加奴州首府成立了“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州会和分会”、“总工会”、“新民主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和“马来亚农民阵线”（马族），马共在东彭和丁加奴的设立公开办事处，并任命公开党代表。

本文撰写及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庄清 孔锋 王秀槐 邹锦生 蔡聪明（惠仁）
黄志平 许素英（许娟） 颜金秋

（由庄清执笔整理）

(八)吉打州第八独立队 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吉打州 (KEDAH) 和玻璃市州 (PERIS) 位于马来亚的最北部，州界三分之一连接霹雳州 (PERAK)，三分之二和泰国毗邻。两州面积分别为 9, 479 和 803 平方公里。山岭丘陵和原始森林约占总面积的二分之一，粮食产量却占全马的一半。1941 年两州总人口约有 58 万人。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吉、玻两州华侨的抗日救国热潮，随日俱涨，筹赈祖国难民活动，抗日后援活动，以及与之紧密结合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都为日本南侵后的抗日武装斗争，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吉、玻两州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孕育、生长和战斗的主要地区。

吉打州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历程：（一）日军在宋卡登陆的部队，1941 年 12 月 11 日就侵入北吉打日得拉，次日占领首邑阿罗斯打。英军败退快速，一星期内丢失吉、玻全境。败退英军尚能整队后撤，极少遗丢武器弹药，人民抗日军很难拾到枪械武装自己。（二）吉、玻居民的民族成份，马来人约占 67%，华人约占 20%，在缺乏民族干部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处处遇到诸多困难。（三）1942 年初，吉、玻两州和檳城的马来亚共产党各级组织，遭到日本军警的反复摧残破坏，近 3 年间，基本失去和马共中央及各州地委的联系，吉打人民抗日军长期间孤舟远航，孤军苦斗。因此，抗日军从弱小到壮大

的发展过程，经历了较多的崎岖曲折道路。直至日本投降后半个月，才由马共中央军委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

一、抗日武装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日军占领吉、玻两州及槟城（PENANG）后，先后进行绝灭人性的大屠杀。吉打双溪拉兰、美农各地大肃清中，无辜华人被杀千多人。槟城于1942年4月6日及5月4日，宪兵部及警备队两次进行大检证，被捕4000余人，另局部搜捕和滥捕2000余人，被分批集体屠杀3000余人，受酷刑及病饿而死近2000人。和平后仅占梅岗、天德阁两处掘出的遗骸，就达1100多具。

马共吉打州地委与区委都受严重破坏，地委书记陈炳宏和槟城市委书记文燕都在“九一”事件突围中英勇牺牲；区委刘刚被捕后为保守机密而撞墙自杀；区委谢维汉被暗藏特务谭拔群出卖后跳车牺牲。一年内，马共党员被捕就将近30人。人民的鲜血，警醒大批热血青年，当时流传两句慷慨激昂的誓词：“家已破，人已亡，为何不抵抗？头可断，血可流，亡国奴不可当！”

（一） 人民奋起武装抗日

世界各地游击战争的经验，给马来亚共产党、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很大启迪与鼓舞。日军侵略铁蹄一踏上槟吉地区，以马共党员为骨干，群众纷纷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

日军占领槟城初期，马共槟城市委亚炭，由王海志带往吉打牛仑（Gurun）会见吉打地委负责人和尚，讨论联合在威利斯省（Wellesley）或吉打建立抗日游击队问题，但会谈未能

取得一致意见。

续后，槟城市委指示老党员杨克等人，将几箱从英军遗弃仓库中拣到的手榴弹搬往威省，准备在爪夷（Jawi）山上组建抗日游击队。不料在日落洞将手榴弹搬下舢舨时，被青丁（缉私队）误当走私物品抓获。杨克独自承担一切，解脱其他人，受尽毒刑后英勇献身。

在槟城，初期组织过一组别动队，穿戴日军衣帽，惩诫一些丧失民族气节、与人民为敌的败类，后因受搜捕而解散。

1942年2月，马共党员、钟灵中学学生肖亚河、阿岳等人，到牛仑找到区委黄志成，参加刚成立的抗日游击队，10个人、5条来福枪，50几颗手榴弹。晚上出动，敲诫维持会等傀儡，消灭了一个狐假虎威欺压群众的日探线人。亚河和阿岳外貌体态不似当地劳动人民，引起敌探注目，不久被捕牺牲。游击队数次受到警备队搜捕，立脚不住，暂时埋藏武器，分散走避各地。

日军在槟城进行第一次大检证后，4月29日，一些民族败类组织庆祝天长节游行，锄奸团团员闽籍爱国青年螺珠和乌马，向日本军政人员及傀儡走卒密集处抛掷一颗手榴弹，伤毙敌10余人，大快人心。螺珠、乌马事后被捕，刑后就义。

5月间，槟城近10名钟灵学生在威省青年帮助下，搜集几支英制来福枪和私人猎枪，借着迷朦月光，进攻四叉港警察局，几个警察带枪从屋后跑掉，劳而无功。游击队当即转向当铺钱庄，将穷苦人民借据全部烧毁。数日后在红毛巴进攻一个为虎作伥的槟城邮政局长黄某住宅，黄开枪回击，那时常有盗匪出没，引起村中自警团误会，鸣锣聚众。游击队怕误伤群众，只好撤走。不久在日军警备队追逼下，被迫分

散隐蔽，成员多奔内地。

同此期间，爪夷山上曾由一个客籍工人朱某，组织一个游击小组，活动不久，因为缺少武器弹药和群众支持，几星期后就自动解散。

年底，马共党员阿初、阿水等11人，在威省南部万拉巴鲁（Bandar Baharu）和双溪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受到高渊（Nibong Tebal）日军警备队的追捕，转移到吉打拉务勿杀，受到抗日同盟会的掩护和生活支援。次年初，日军在拉务勿杀进行大搜捕，游击队强行突围，一个队员当场牺牲，阿初等4人被捕。阿水坚毅刚强，宁死不屈，在酷刑中牺牲。在叛徒阿带、阿竹指证下，阿初坚决不肯供认与当地组织的单线联系情况，凛然走上刑场。

武装抗击日本侵略军，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槟吉大批热血青年，不怕力弱勢险，不怕抛头颅，自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结果不幸失败或不能坚持，主要原因一是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二是缺乏坚强有力的核心骨干；三是缺乏组织严密的群众支持。

（二）吉打东部华玲抗日部队

吉、玻两州和槟城地处马六甲海峡北端，是东南亚联军经由安达曼海反攻马来亚的咽喉重地，为日军防守马来亚的战略关隘。日本鲤部队驻防吉玻，雾部队驻防槟威，吉、玻的日军警备队中队、联队的固定据点有12处。吉打的抗日武装斗争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很大。

吉南地区刚沦陷，马共吉打地委成员张云，就在割胶工人中组织抗日游击小组。1942年1月，爪夷一排特警越境到三巴央围捕，游击小组开枪回击，由于火力太弱，众寡悬殊，组员何亚泉在驳火中中弹牺牲，其他人带上猎枪走散。

张云等人转移到美农，当地抗盟帮助找到两支群众拾交的来福枪，张云锯掉木枪托，几个人白天在大街上枪毙一个民愤很大的暗探，缴走手枪，贴出锄奸通告。

年底，张云带领张田、温祥、志月等在华玲东部进行锄奸活动，消灭两个暗探；伏击日本军车，击毙一个日军和两个武装警察。后受华玲警备队的追击，才退回吉打中部牛仑一带活动，吸收十几个当地游击队员，扩大了组织。

1943年初，老杨（杨国璋）摆脱亚罗斯打警备队的跟踪，到牛仑三千廊找到刘荣光（林亚才）和张云。经过整顿重组，武装部队正式命名“吉打抗日游击队”。刘荣光任党代表，兼领导中吉打抗盟工作，只他公开马共党员身份。老杨任队长。28个队员感情融洽，情如手足。初期民运工作未组织好，群众不太敢接近游击队，粮食供应较紧张，只好买南瓜，挖野菜，摘野果充饥。以后，民运工作逐渐加强，群众捐赠大米随之增多，生活才相应好转。

经过派人摸清情况，张云、张田带领10多名游击队员，分组由小路跋涉两天，到达爪夷，更深夜静时，向警察局发动突然袭击。枪械不足，部份人带短刀手榴弹。从睡梦中惊醒的警察，乱开几枪就带着部份枪支从后门逃跑，游击队只缴获3支来福枪。这次进击的主要目的在于儆诫威省肆无忌惮欺压百姓的警察和日本爪牙，扩大影响。

续后，多皆米较工人从鱼塘内捞出两挺手提机关枪，5支来福枪和两箱子弹、手榴弹，辗转送交游击队，增强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军政训练逐步健全，被誉为神枪手的张田，当起教练来显得更有神气。荣光经常讲述国际反法西斯和马来亚抗日战争形势，主导排演抗日短剧；方克明教文化、教唱歌，队员文化生活并不枯燥。

林春奇、林坤山、林坤、温祥等，在吉中一带消灭了助纣为虐残害群众的3个暗探和线人，附近警探从此不敢个别深入胶园山林地带为非作歹，使支持抗日活动的群众减少后顾之忧。美农的警备队前后几次到千二廊、三千廊一带进行扫荡，都找不到神出鬼没流动隐蔽的抗日游击队，只是抓了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影响比较深远、震动范围比较辽广的锄奸活动，是在美农深入险地、虎口拔牙，消灭罪恶多端疯狂破坏抗日的暗探组长李亚狗事件。经过现场仔细调查，温亚月、胡须等6人，各配手枪一支、手榴弹两颗，防备冲散后生活费100元，扮成农民到大街上等候。亚狗4人乘坐敞蓬小汽车停于咖啡店前，狡猾的亚狗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拔出手枪，关伯眼明手快，抢先开枪击中亚狗握枪手臂，亚狗立即跳车狂跑，坤山紧追进其家中，开枪击中亚狗后脑，即刻倒毙地上。车上敌探也被海南坤击毙，另2暗探跳车逃脱。旁边警察局警笛大鸣，却紧闭大门没人敢出来。行动小组各乘自行车从容不迫从街口日本军车旁边走过，车上日军给行动小组的勇敢镇定弄糊涂了，以为是暗探执勤，睁大眼睛不开枪。离街口不远就是日本警备队的营房。

7月间出乎意外，游击队营房被一寻找白藤的可疑之人发现，为防万一，当晚就转移到两公里外丛林中。

年底，一个不能熬受艰苦生活的队员，偷走各地送来的2000元同情捐，空手摸黑逃跑。张云主持会议，决定队伍迁往华玲东面高鸟山区。队伍昼宿夜行，不意竟在重叠山峦间迷路，兜了7天还没有走出锡克(Sik)大山，吃完干粮，第4天就靠野生植物和打山猪、猴子填肚，第9天到达高鸟山区，立即派人到镇上了解情况。无意中碰到在牛仑打过照面

的暗探。次日，大队日军进山围捕，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在敌人刚进山嘴时就主动往西北山区撤退，在距离华人农村不远的日落湾（Jilowang）山中驻留下来，此地原有抗盟活动。

根据抗盟提供的情报，消灭了一个经常在日落湾调戏侮辱马来妇女的华人暗探和一个多次诬害勒索群众的马来暗探。后来又在万那村外消灭一个到处流窜侦察的日军线人，在华玲铲除两个民愤较大的敌人爪牙。1944年初，牛英村（Kampong Weng）已有不少华、马群众敢于观看抗盟演出的抗日歌咏与短剧。

1月26日，华玲日军警备队加上居林各地增援部队共500多人，拂晓以前就进犯日落湾地区。游击队得到华玲警长紧急通知，派出坤山和春奇下山侦察，刚到山腰就遭遇日军尖兵15人。坤山手执驳壳枪，春奇手执英制手提机关枪，居高临下，伏在灌木林间隐蔽的土堆后面，等待日军搜索前进到70米外空旷地方，首先开火，日军马上伏地还击。两人各扫两梭子弹，敌人死伤7人，朦胧中不明底细，不敢冲击，向上盲目扫射，等待主力部队。坤山脑后被子弹擦伤，两人俯伏后撤。游击队即往北部高山转移，日军胆虚，不敢向纵深搜索，只是用迫击炮乱轰两个小时，放火焚烧了十多间农民板屋，就抬着伤员、死尸返归华玲报功。

事后，坤山、林坤、春奇、关伯下山直插华玲郊区，捕捉带领日军搜山的暗探温六狗，押回山林审问后处决。别动队又到华玲东北泰马边境几个农村，抓获6个敌探，消灭其中罪恶累累的3个暗探，教育警告后即放另3个认罪悔过的线人。续后再消灭几个混入日落湾邻近地区的男女暗探。日军耳目失灵，几个月内没有进入山区骚扰。日落湾、牛英一

带农村，先后成立抗日自卫队、妇女服务队、粮食运输队，形成生气盎然的游击区。

游击队于是派出张田、温祥、老李远出锄奸。5月，在行人熙攘的美农大街上，枪毙一个横行霸道的双溪大年宪兵部暗探。8月，来自北吉的李坚等人，在警备队近在咫尺的茹嫩大街上，枪毙一个暗探，照例留下传单公布罪状。9月，张、温等人在居林戏院前枪击已经出卖几个抗日人员的叛徒、暗探黄巡，黄在临死前，向警备队告发一批“可疑分子”，使引导张等锄奸行动的陈春梅及地方干部3人因此被捕，受尽严刑酷打，40天后才释放。春梅即由张云调往吉北新路。同时，另一组别动队也在华玲以东消灭血债累累的暗探张奇光兄弟等5人。

华玲抗日游击队移进日落湾大山时，已经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有过联系，开始升挂三星红旗。在受华玲警备队进攻，队伍迁往靠近甘光牙笼（Kp. Galang）山林里，队伍已经发展到80多人，并继续扩大。

1945年2月新路战役之后，陈鲁、卫忠、国联调到华玲部队，马上进行整编。据张云、陈鲁、陈古、刘荣光、老杨所组成核心组的决定，吉东、吉北部队改称吉打人民抗日军。华玲部队由陈鲁任党代表，老杨任队长，刘荣光任副队长，参谋张田，政治指导员卫忠，军需温志月，教练国联。部队生活逐渐正规：黎明集队升旗布置任务、操练、上政治课，增设日夜流动哨，轮流到机房运粮上部队，增强锄奸与情报活动。吉东、吉北部队长期密切联系。当时德国法西斯受到东西夹击，败局已定；日本海空军都受歼灭性打击，马来日军已成瓮中之鳖。人民抗日军吉东吉北部队都在积极准备配合联军的大反攻。

1945年2月27日（农历己酉年正月十五元宵）大未明，牛英村抗盟发现有降落伞在飞机声中降落北部山区，抗日军在各处寻找仍不见踪迹。10几天后，东南亚联军所派联络人员林宏培、张朝国等6人方才和抗日军接上关系。陈斌带领一个小队给予护卫。那时恰逢多雨多雷季节，延至5月初，联军才开始向吉东人民抗日军空投武器和其他物资，先后两次。

以英军为主体的东南亚联军总部，空降武器给人民抗日军，既是为了共同抗日、反攻马来亚的需要，但又害怕日后对恢复马来亚殖民统治增添危险。因此空降给华玲抗日部队的卡宾枪、斯汀枪、航空曲尺、大部份是陈旧次品；子弹盒很少，每支卡宾枪只配两个；10支斯汀枪（手提冲锋枪）当中，8支未打完连发的一梭子弹就卡住；航空曲尺弹簧松弛，等等。人民抗日军在此严峻事实面前，不能不作必要的思想准备。联络组长喜士叻（Hislop）少校，半年期间，始终拒绝执行联军与马共的协议，不肯为抗日军进行军训。为了做好配合联军反攻的准备，华玲部队进一步加强实弹演习与实战训练。7月，由远行军的小队自己调查、布置，在当地民运工作者的配合下，夜袭茹嫩警察局，一组直攻正门，一组从边窗越进室内，迫使10个武装警察缴枪投降。抗日军只予宣传教育，不予惩罚，付还武器而后撤退。这是一场胜利的攻心战役，影响相当深远。

随着吉东人民抗日军的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不断扩展，人民已在屈指计算全面反攻，消灭日本侵略军的时间了。

（三） 吉打北部纯笃抗日部队

吉打北部边境武吉加由衣淡（Bukit kayu Hitam）和玻璃市北疆巴冬勿杀（Padang Besar），历来是泰马商旅交通要道。此

外，纯笃等村镇山路，也是几百年来民间小商贩交往的偏僻途径。南面10公里外的假子山和大港尾则是生产钨砂和锡砂的矿区。

1942年10月10日，原泰国昔罗锡矿公司经理陈介铁，会同陈忠、西风（陈练峰）、国联（曾焕）、陈任之、卢能（黄安）、卢继昌（江湖）等21人，在纯笃吗叻港白水河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抗日游击队。当时仅有三条向当地土匪小组收购来的来福枪。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和警告附敌人员家属等活动。11月受到一个中队警备队的进攻，哨兵黄秀向进犯的日军射击，被日军击中，当场牺牲。何东等3人被捕，其他游击队员走散。事后骨干人员虽又集中，但抗日活动基本停顿下来。

1943年初，先是刘荣光到纯笃和介铁讨论重建抗日游击队，续后，李坚、陈古、老杨等人先后到达，着手整编武装组织，严明纪律，加强组织建设。介铁等17人不愿接受严格的军事生活，宣布退出游击队。陈古、刘荣光等与吉北、玻璃市的马共党员戴翔、赖金锋等取得联系，动手加强抗日同盟会的组织活动。在抗日意志比较坚定的青年矿工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

老杨来往牛仑纯笃之间，协同李坚组织锄奸工作，以卫忠、奋光等人为主力，除掉3个破坏抗日活动欺压工人的包工头及矿山经理的爪牙。矿区的抗日活动日益活跃。

整编后的抗日游击队，被称为“3支半部队”，只有4支来福枪，其中一支锯短枪托，子弹也很缺乏。

假子山日本矿山株式会社的经理，剥削工人无孔不入，矿工无不切齿痛恨。游击队派出卫忠、奋光、毛强等5人，晚上直闯经理住宅，经理刚想开枪就被击毙。别动队缴获曲尺

及猎枪各一支。游击队为人民群众清除了障碍，日资矿山自此倒闭，工人得以自由开采。

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工农商贩的同情捐，同时保护工人将自采锡砂、钨砂，通过崎岖山路运往泰国南部昔罗县出售，游击队将所得捐款通过中间人向泰军下级军官购买少量手枪和子弹。

1943年10月18日，日本宣布将玻璃市、吉打州（改名西武里）、吉兰丹和丁加奴（TRENGANU）割给泰国。部分欺压群众成性的警察，继续鱼肉百姓，破坏抗日。吉北抗日游击队决定进攻几所警察局，既可夺取武器，又可杀一儆百。（注①）1944年初，由陈忠、戴翔带队，金锋殿后，带领20几名战士，在新路村边驻足，晚上直奔亚顺（Asun）警察局（南面日得拉，北面章仑都分别驻扎有日军警备队联队与中队），黑暗中摸近警察局，剪断电话线，制服值班警察，再将睡眼惺松的10几个警察集中到办事间，经教育后，点名警告几名行为恶劣者。不鸣一枪，便缴获长短枪10几支，才在黑暗中往东北撤退。

11月初，吉北抗日游击队与泰南抗日义勇队协作，摸清泰南昔罗县古务（Kubu）警察局的情况，由陈古率领游击队（唯一女战士陈春梅）及义勇队陈超、小周、小罗共18人，往北行走30多公里山路，次晚半夜抵达古务警察局附近胶林中，伏地静观动态，任由热带巨蚊叮螫不敢动弹。事先侦察虽细，却没有注意到警察局里有条守门狗。守门狗发现有人，烦躁不安地吠叫不停，引起值班警察怀疑，几次走出大门外探望，没有发现动静，以为是守门狗盲目乱吠，拾起小木棍挥去，吠声暂时停息。泰警进内为防意外，将12支三八式步枪的铁链锁头打开，以便紧急取用，然后回房睡觉。就

在这一瞬间，游击队踢开大门冲进警察局，往集体卧室开了一枪，睡梦中惊醒的13个泰国警察，听到“投降不杀”的喊声，不知虚实，跳窗逃跑。游击队顺利缴获12支步枪和一批子弹，由陈超用泰文写下“借条”，仍循原路撤回大港尾。

不久，刘强华和一个年轻战士，黄昏潜入亚娄（Arau）市区。当作恶多端的日本军服加工厂厂长乘坐小汽车转上大路时，强华开枪击毙日军司机，闪电般冲近汽车射击，车内两个日本军官来不及拔枪反抗，一个当时中弹殒命，一个送进亚罗斯打医院才绝气。刘等安全撤退，亚娄警备队为此忙乱了整个晚上。

年底以前，在纯笃、加基武吉、亚娄等地区，先后铲除了几个警备队暗探，夺得手枪。吉北部队的武器，绝大多数是东京兵工厂的产品。

12月下旬，经过亚娄民运人员周详侦察，掌握了镇内日军后勤小仓库的详细情况，日本警卫晚上锁门睡觉。经缜密研究后，由南吉打调来的陈鲁挑选一支精悍小队10多人，夜行晓宿，半夜进入日本重兵驻守的亚娄镇，从偏僻小道避开警备巡逻队，摸近街边小仓库后门，撬开后门进入屋内，留下警戒，其他人轻手蹑足直上二楼，静悄悄地用刺刀刺死几个睡眠中的日本管理人员，缴获一支日本曲尺，2支步枪，一挺轻机枪，搬走一些军服和药品。这次奇袭是利用日军麻痹心理，在警备队和泰军眼皮下，捋掉虎须，神出鬼没地悄然走进，不动声息地安然退出亚娄镇。

1945年2月，陈鲁率领戴翔、卫忠、奋光、直民、白杨、志业和泰南抗日义勇队的陈超、小周、小鲁、慕华等精悍战士，由大港尾出发，绕过章仑，日夜急行，从山路走向西部泰马边境铁路重镇巴冬勿杀。游击队员全部日军打扮，日

军武器，只是不穿反皮军靴，穿汽车废胶轮制成的夏凉鞋，适用于跋涉山泉、石溪和崎岖山路。此行目的是炸毁边境火车铁桥。到达目的地，潜伏在山丘上，居高临下观察守桥日军的动态，夜深时才避开灯光摸下桥墩放置炸药。不料走路时地下卵石响声惊动守桥日军，只好以火力掩护撤退。日军虽在黑暗中无法追赶，却被窥清撤退方向。

第二天晚上，游击队在新路村后一间无人小茅屋中抱枪连衣睡觉。下半夜，星光稀疏，章仑和亚娄的日军警备队两个中队分3路包围新路村，分头摸进村子。在面向亚娄沙土大路边放哨的战士，模糊看到弯腰轻步逐渐逼近的日军影子，立即丢出一颗英制手榴弹，没有爆炸，从走路声听出不止几十人，不敢开枪暴露目标，连忙从小路快跑回住宿的茅屋，逐个拍击睡眠战士的大腿，连续小声喊叫：“日本鬼来了！”惊醒的战士急忙从屋后小路分散撤退，跑到村外山边预定地点集合。

勇敢、沉着而年岁较大的白杨（台山人），两天两夜赶了百余公里山路，太倦了，战友们撤退时，翻一翻身又睡了，结果被日军捉回警备队，转押亚罗斯打宪兵部。白杨坚定顽强，越受刑越骂得凶，结果被日宪捆在木椿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卫忠醒得稍迟，提着轻机枪伏在茅屋旁观察究竟，刚好插在伏地待命的日军横排中，日军误认为是自己人，被军官踢了一脚，卫忠趁机往后蛇行退进树林里。

天未亮，日军即在新路村逐户搜查，逮捕了几十个青年店员、工人和农民，集中看管于街道尽头路旁空地，还强迫饭店、茶室和商店，在其监视下为200多日军官兵烧饭做菜。

游击队集合后，经过研究，认为日军将会残害无辜百姓，如果就此撤走，会在各族人民中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于是决定返身打个回马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当即由陈鲁布置作战计划，分成3个小组，快步跑回新路村，这时东方刚露鱼肚白。

到达新路半片小街对面的胶林里，大伙分散藏身树后，看见日军都分成小队围成圆圈坐在街道地上吃饭，有些吃饱了就埋头啃嚼从农民田里抢来的西瓜，三八式步枪都分组架在大路上。游击队以散兵队形借着树干隐蔽前进，到达100米以内距离，陈鲁一声令下，轻机枪、步枪一齐向日军开火，猛烈射击，20几个日军应声倒下。其余的日军慌了手脚，急忙从大路上抢过步枪和轻机枪，伏地向黑黝黝的胶林里漫无目标地胡乱回击。街头空地上几十个被捕群众，虽然被反绑双手，也趁机一哄而散，从另一方向跑掉。

约两分钟后，日军指挥官方才弄清楚黑暗胶林里游击队人数不多，就派两个小队士兵从左右两侧迂迴包抄过来。

游击队凭借胶树的掩护，迅速往后撤退，很快就脱离战场，从小路回归预定地点。此役有一战士小周英勇献身。日军死伤人数超过40人，运往亚罗斯打医院抢救的重伤员就有4大卡车。

新路战役的胜利在吉、玻两州，鼓舞更多抗日青年投向抗日游击队，大批民运工作人员调上武装部队，吉北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抗盟等民运组织都相应扩大了队伍。

3月，吉打抗日核心组决定将吉北、吉东的游击队，统一改称吉打人民抗日军。以陈鲁为首的几个武装骨干调往吉东（华玲）人民抗日军部队。吉北人民抗日军随即进行整顿，加强组织领导。主要领导成员：党代表陈古，队长戴翔，副

队长强华、梁志业，参谋西风，政治指导员胡克（陈春梅），教练陈忠，总务长：长宏（阿光），保管巫阿友。

泰南抗日义勇队于1943年成立，活动于泰南宋卡、也拉、北大年等地。在锄奸、进攻警察局、伏击日军汽车、炸桥、攻击日军等等活动，都和吉东、吉北人民抗日军配合作战，作出贡献。泰抗成员全属泰国土生土长的华裔男性知识青年，从1944年开始，就有数期泰抗战士到吉北和吉东抗日部队参加军训，前后近50人。联军空投武器以后，训练完毕回归泰南时，配给卡宾枪、斯汀枪、手枪、手榴弹、略优于马方战士，双方战士情谊深厚，感情融洽。

1945年6月间，为加强实战训练，由慕华带队，率领泰抗11名队员，人民抗日军老战士6人，跨过宽西冷山，沿着昔罗北上，趁着眉月星光进攻昔罗县一个日军小据点。可能是换防日军未撤离，受到日军还击火力，远远超过侦察所知一个小队的强度。相持约5分钟，无法接近据点；敌军也不敢冲出，呈现胶着状态。于是在老战士掩护下撤退，回归营地。

东南亚联军总部迟至1945年5月才开始向吉北人民抗日军空投联络人员，续后空投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空降地点在大港尾洗矿后的余泥沙滩上，三堆烟火中间和放一块4平方米的白布。空降武器部份飘落荒山深谷原始森林中，只好作遗失销账。

获得联军空投武器之后，吉北人民抗日军继续扩大武装部伍和民运组织，加强训练，积极准备迎接联军近在旦夕的大反攻。

注①：暹罗王国曾于1025年征服马来半岛北部，

1785年又进占吉打、吉兰丹、丁加奴等地。1842年玻璃市州从吉打分裂出去。英国于1905年和暹罗签订曼谷条约，暹罗将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州的宗主权移交给英国。1939年暹罗改名泰国。日本形式上将吉玻等4州割让给泰国，是将銮披汶独裁统治下的泰国进一步栓紧在日本的战车上，争取泰国增加供应米、锡、橡胶、柚木等战略物资给日本，并加深泰马民族的矛盾，便于分而治之。割让后日本在4州的统治地位与驻防情况不变，泰国接管行政、法院、治安警察等系统。4个州的马来民族在历史上对暹罗王国的入侵与不稳定统治多怀不满。而4个州的警察都是马来人，所以部份警察对抗日活动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吉打州抗日领导核心组，在抗战期间，除了以主要力量加强对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以外，同时紧抓抗日同盟会的组织、宣传、后勤和统战工作。

日治下的华侨资本家，多数怀有民族受难意识，不满日本法西斯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但又软弱怕事，逆来顺受。在各中小城镇中（吉、玻无10万以上的大城市），抗盟派人打入治安维持会和华侨协会工作，对其头面人物施加影响。亚罗斯打就曾利用协会名义向宪兵部及警备队担保释放一些并不公开显眼的被捕抗日人员；利用协会会所临时收藏等待转发的《活路报》；利用会长、副会长暗藏在米较中的收音机收听各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消息在会员中传播；几个华侨协

会头面人物都秘密地为抗日工作做了不少好事。

亚罗斯打警察局刑事部的暗探林巴味等10人，由于受到抗盟友人的劝告，在1942年至1943年间，只抓流氓盗窃案件，长期没有抓到抗日分子，被日本籍局长罚款半个月工资并禁闭半个月。华侨协会工作人员争取会长支持，用举办福利救济贫困的名义，向10家较大米较（碾米厂）摊派捐助10袋大米（1吨），几十斤咸鱼，分配给受处分暗探的家属，支持他们不与抗日分子为敌的行为。

1943年底，一个月落星稀的晚上，坤山、春奇等4个别动队员在古树苍莽的小路上，误将乘坐自行车迎面而来的马来警察当为暗探，开枪打中一个轻伤倒地，一个回头就跑。队员们看清是警察，马上将他扶起包扎伤口，说明抗日军只打日军和残害人民的暗探，不打无罪行的警察，把枪还给他，让他乘车回去。警察回华玲向警长汇报事情经过和抗日军的讲话，警长大受感动。从此就和抗盟人员秘密联系，两个月后，警长及时提供500名警备队将进攻日落湾抗日部队的情报。纯笃12名警察在抗盟的劝告下，长期保持和抗日军和平相处，街上贴抗日标语也伪装不知。

1945年初，刘荣光在华玲郊区找粮仓主任亚茶谈判，晓以大义，使亚茶打消顾虑，同意假借“被抢劫”的名义，将5大卡车由泰国勿洞（Betong）运来华玲的大米送给人民抗日军。结果分开三次三个地段，在抗日军掩护下组织群众将大米截留下来，分给邻近山区缺粮的华人和马来农民。

在盛产大米的牛英马来村，根据马来村长的建议，与别动队合谋，将经常敲诈勒索村民的马来暗探“歪”（Wai）诱捕处决后，村民欢天喜地，自此经常捐赠大米给人民抗日军，并有一些马来青年农民主动参加抗日民运工作。勤劳善良的马

来农民，已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和人民抗日军的英勇斗争中，初步引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

日本投降后第4天，抗盟领导人刘荣光担心日军临死前疯狂挣扎，藉故杀害亚罗斯打监狱中的抗日分子，于是派人说服马来狱长捷拉（Chelah），下令将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及被日军滥捕的群众200余人全部释放。捷拉则带领全家逃回乡下匿藏，以防日军追究。

统战工作，还做到马来绿林好汉的身上。赖金锋在玻璃市北部山区，说服以“皇碑”（Wongpi）为首的马来武装小组，协议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由他们作向导，驱逐泰马边境上一股华人强盗小集团。他们还在马来农村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日本投降后，经“皇碑”介绍，玻璃市苏丹满怀激情紧握金锋双手，表示非常感谢帮助他的侄儿走上正路，帮助王室人员参加抗日活动，为王室增添光彩。

对个别日本军官和日本商人，是利用其思想矛盾，因势利导，以减少对抗日工作的祸害。

一个名叫真锅武之的日本商人，在接受亚罗斯打华侨协会宴请时，以酒消愁，醉不停杯，从衣袋中取出照片边看边流泪。协会中的抗盟工作人员弄清真锅武之原来担心在上海的华人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生活和安全，所以愁眉苦脸。于是特意多接近他，多次利用他带引协会人员向各地警备队担保释放一些无辜群众和尚未暴露实情的抗日工作人员。

武古茹嫩常驻一个中队的日军警备队，属日本鲤部队所辖，对抗日活动有很大威胁，该地原是抗日别动队的重要据点。抗盟利用警备队长竹内德治郎的妻子是福州人的关系，通过维持会会长进行工作，使警备队将矛头指向各族的强盗和歹徒，两年期间只枪毙一个马来强盗，未有抗日人员被捕杀。

日本投降后，马来军区日军缴械之前，原驻吉打中南部的日军几批200多人，怀着对英帝国的仇恨心理，表示愿向人民抗日军投诚，共同抗英。由于缺乏信任基础，都加拒绝，不予收容，只接收一些武器。

紧接着，仁岭板厂日本经理（少佐，华名温和记），主动将所用日本曲尺及奥斯汀汽车送交人民抗日军，他的华人妻子和男女小孩各一人留居板厂。不久，抗日军分配给他一支航空曲尺，以示信任。日本经理串通另外12名日本官兵，投向抗日军，有大尉、军医、机械士、工兵、汽车司机及士兵。都改华人化名，化装成农民，与潮州菜农同劳动，含辛茹苦，为马来亚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吉打抗盟所办抗日小报《活路报》、《先锋报》、《爱国报》，檳城出版《公道报》、《真报》除激励人民抗日情绪外，对统战工作也发挥一定作用。

统一战线工作使吉、玻两州抗日工作增加了有利因素，减去不少阻力和损失，成为和武装斗争互相配合的抗日重要法宝。

三、日本投降后斗争在延伸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形势的突然转变，使人民抗日军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上升到首要地位。

（一） 成立人民自治会

吉北和吉东的人民抗日军，在日本投降后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就派遣先头部队下山，18日全部整队开出密林峻山营地，分别驻扎在纯笃和万那村。整编后调

派分队或小队进入各地城镇（包括威省大山脚、爪夷、高渊等地；初期没有进入亚罗斯打），加强发动群众和维持治安工作。

亚罗斯打、加央、双溪大年、居林、大山脚、檳城等大中城市，在8月20日以后就相继成立人民自治会。一般有抗日基层组织和抗盟活动的小市镇，如华玲、牛仑、亚娄、纯笃等10几个地区，也都同时成立同等组织。人民自治会接管日治华侨协会和治安维持会，在其旧址办公，行使人民基层政权的部分职能。

居林人民自治会的负责人是李群，其他地区大都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侨领，如钟文贤、陈荣树、郭六一、黄树邦、黄文佑、刘东玉等；也有其他民族知名人士和个别马来王族参加。人民自治会后来部分改称人民委员会。

自治会首先抓好协助维持治安工作。对没有破坏抗日残害人民的警察局，抗日军不予收缴武器，要他们在自治会指导下协助维持治安。对有破坏抗日罪行的威省几所警察局和“国防警察”即予缴械，不许为非作歹。人民抗日军没有进驻的县镇，当地则发挥人民自卫队的防护作用。由于人民抗日军威望很高；吉、玻两州，治安井然。个别小镇如吉中马目（Merbok）发生盗窃流氓小案，抗日军小队暂驻几天就安静了。

自治会组织群众团体接收敌资米较、板厂、矿场等企业及汽车汽油等恢复交通所需要的物资，发还各产业原主，协助各企业及客货汽车运输部门恢复生产。日得拉、华玲等地自治会经过谈判，将日军守卫的仓库内大量白米，搬运出来分发给当地各民族贫困群众。自治会还利用没收的日敌物资，救济抚恤牺牲烈士及受害群众的家属。

人民群众久被压抑的愤恨冤怨得到投诉控告的机会，纷

纷要求自治会和人民抗日军办事处帮助其伸冤雪恨，严惩凶手恶棍。吉、玻、檳、威各地，受到书面控告的叛徒、暗探超过120人。牵涉血债并经查证的重大案件，都转请人民抗日军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处理。在审问核实后，对事出有因的从犯，经过教育寻人保释。对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凶手，分别在拉务勿杀、牛场、高岭、新路等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审判，宣布罪状而后处决。

自治会派出代表，责令宪兵部和警备队释放在押政治犯50余人。组织工人纠察队检查与平抑物价；为宣扬民族团结和支持群众团体组织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为实行人民自治积累大量可贵经验。英军于9月3日在檳城登陆，几天后就进驻双溪大年、亚罗斯打等地。15日成立英国军事管制政府，下旬，吉、玻各地人民自治会就被军管当局无理强制撤销。

8月下旬，亚罗斯打、双溪大年、加央、居林、大山脚、华玲等地先后成立人民抗日军办事处，李坚、张牙、毛强、强华、李汉、陈斌等担任各办事处主任，在人民抗日军指挥部领导下工作。负责联系群众，办理和日军交涉事务，支持人民自治会工作。11月下旬，当全吉打人民抗日军集中亚罗斯打飞机场准备复员时，办事处才结束工作。

（二）针锋相对

东南亚联军总部于日本宣布投降时，立即命令日本马来军区司令部维持现状，保存武器，等待联军接受投降。同时又通过一三六部队，命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不要进驻市镇，梦想隔绝人民抗日军和各民族人民的密切联系。

吉东、吉北的人民抗日军，不顾联络官的阻挠，迅速分遣武装分队或小队，进驻和巡逻各市镇，每名战士随身携带枪械，带足120发或150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随时准

备应付意外事变。联络官对此深感不满，但是只能旁观摇头。

吉打中部和南部的个别日军警备队，由军官率领，运送三挺重机关枪、数挺轻机枪、500多支三八式步枪和一批子弹、手榴弹缴交给人民抗日军。华玲、居林、加央、双溪大年等各地日军，在抗日军和办事处代表说服下，也不同程度交出一些军用装备和粮食物资。陈鲁、小秋和警卫员钟子路等6人，于9月初乘车到瓜拉吉底（Kuala Ketil）日本警备队营房，向其中队长提出由人民抗日军收缴日军武器的意见，日军官推说没有上级命令，顽拒不交。经过严肃的说理斗争，日军才缴出长、短枪，子弹、手榴弹合计10箱。

8月底，蔡振华率领许明耀等两个小队武装战士，乘卡车经华玲到高乌，步行15公里到霹雳州仁丹，接管日资锡矿场部，并维持当地治安，参加群众庆祝胜利大会。接到第五独立队第三十五中队邀请，步行进入宜力，准备参加当地群众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宜力原为三数十名“华侨抗日游击队”所盘据，不许人民抗日军进入该镇。当近50名人民抗日军抵达镇外山坡上，镇上“华抗军”摆成散兵阵形，埋伏在各种掩体后面吆喝，不许人民抗日军下来，气氛非常紧张。坚持半小时，三十五中队代队长手握手榴弹，两名战士握枪护卫，不理睬对方大喊，健步走近“华抗军”。“华抗军”被此气势震慑住，经过谈判，撤出镇外。人民抗日军参加群众大会后，由五独战士表演刺刀操，军民尽欢而散。（注②）

9月初，应双溪大年各界人民邀请，驻在居林的人民抗日军派出一个分队分乘两辆卡车前往赴会，途中受到英国联络官阻拦，斥问“谁叫你们去?!”指挥员以更大声音怒答“人民！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几个战士跳下车怒目握枪而视，

联络官不得不灰溜溜开车走开。

英军先遣部队在槟城登陆后，各地的日本暗探、爪牙重新神气起来，以为可得到新主子撑腰庇护，继续横行作恶。槟城阿逸依淡的恶棍暗探大头成，闹市中侮辱妇女，欺压群众，狼突蟹行。经抗日组织决定，借调到槟城的坤山与春奇，在游艺场中将他击毙，护卫大头成的4个暗探四散逃命。沈少峰、彭汉强、陈毓光等30几个勇敢机警的别动队战士，不得不在槟城英军的鼻子下，和叛徒、暗探、匪徒进行短兵相接的艰苦斗争。

9月12日，日本马来军区司令板垣大将在新加坡代表重病的南方军总司令寺田寿一签署投降书。吉打州日军主要军官也在双溪大年飞机场举行投降缴械仪式。日军官按军阶等级，分将级、佐级、尉级，顺序分批小跑到联军代表的台前，先行军礼，后解下腰间的指挥刀放置草地上，才转身跑步走开。人民抗日军由第二中队长带领10个青年小队长在台右列队参加受降仪式。

早在8月21日，吉打抗日核心组就曾决定，将吉打人民抗日军改名为吉打人民解放军，吉北和吉东部队同时举起“吉打人民解放军”的红旗。两地联军联络官紧跟人民抗日军离开山林驻地，集中到双溪大年，并于9月上旬向进驻吉隆坡的英军三十四军军部报告吉打人民抗日军改名之事。军部认为“抗日”改名“解放”，显然将矛头转向企图恢复殖民统治的英帝国，立即向马共中央军委提出警告，不承认吉打人民解放军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组成部份，须予解散。莱特（张红）暗中已与英帝有了默契，当然不能容忍武力抵抗英国恢复殖民统治的行为。中央军委马上派人到吉打双溪大年向陈鲁、陈古传达命令，主持撤消吉打人民解放军称号，改编

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

第八独立队司令部的主要成员全部调换。调派原第五独立队政治部何小力（萧力、何添信）任第八独立队队长，另调原五独两个中队长张江海（江雁）和白丝木任副队长。陈鲁、陈古、刘荣光、杨国璋等原部队领导人，调离公开部队。

第八独立队司令部最初设在居林老火较，改编后移往双溪大年。白丝木留在居林，领导原吉东部队改编的第一、第二中队。

第一中队中队长陈忠，副中队长陈斌、阿添、肖坚。9月中旬，全中队调往双溪大年，和司令部同驻一起。曾经派出小队分驻牛仑、茹嫩、美农、仁岭各地，流动巡逻，维持治安。

第二中队中队长文训（林一叶），副中队长长宏，国联、蔡忠。中队部继续留驻居林老火较。由国联带领两个小队分驻靠近威省的孺乃（Lunas），并在居林和附近市镇巡逻。

张江海驻在加央，领导原吉北部队改编的第三、第四中队。

第三中队中队长戴翔，副中队长：杨剑秋、马龙、文山（后调换）。中队部驻在加央，派出4个小队分驻亚娄、加基武吉、新路各地。

第四中队中队长西风，副中队长巫阿友、直民。中队部驻在日得拉，曾由巫阿友带领3个小队分驻章仑。

第八独立队经过整编调整后，编制全部统一起来。每个中队（相当于连队）下辖3个分队10个小队，分队长由副中队长兼任。分队各辖3个小队，中队直辖1小队。全部在编人员513人。其中仅有8个卫生员是华人女青年，其他505人都是华人男性青壮年。公开队没有政治人员编制。

各中队都有英国联络官 1 名，翻译员 1 名。第一中队的联络官是粗暴傲慢的喜士叻少校，第二中队是门罗 (Monroe) 上尉，三、四中队也是上尉。司令部联络官由双溪大年英国驻军印度籍团长 (上校) 兼任。联络官及翻译员和抗日军同居一营地，另住一幢房。名曰联络，实是监视。

英军在八独各中队及其派出分队和小队的驻地附近，派驻人数多过抗日军几倍的英、印军队，制造威胁形势。人民抗日军为此每天加强操练，半夜紧急集合演习，加强城镇巡逻，行动严整，作为回敬英军挑衅的答复。

10 月中旬，驻防孺乃的英属印军连队有意挑起事端，途中缴去一个单身外出抗日战士的枪械。中队长亲向英籍军官提出“人民抗日军今后将把‘可疑’的印军缴械，以便审查其身份”的警告，英军连长才表示歉意，交还枪械，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印度士兵却在事件中受到教育，有个士兵偷偷告诉抗日军战士：“每个印度兵身上只带 3 颗子弹，英国人不相信我们，我们羡慕你们。”

英国军事管制政府成立以后，将深得民心的人民自治会无条件撤销，限制人民民主自由，挑拨唆使部份受蒙骗的马来民族进行排华骚乱，起用日本警探和民族败类欺压群众，宣布将在马来亚流通的日本通货，毫无补偿地全部作废，使各族人民蒙受相当于 5 亿新加坡元的损失 (多于日本强制搜刮奉纳金的 10 倍)。加以吮脂吸血搜刮大量物资运回英国，鸡旦白糖都不放过。而且管理无能，黑市猖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遭受严重困难。英国军事管制政府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因此被人民称为黑市协会 (Black Market Association)。在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吉坡人民抗日军在几个重要城市，积极支持以工人为主的群众抗议集会。

从日本投降之日开始，英帝国殖民政府就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当作潜在的主要敌人，步步监视，多方限制，处处作梗。严酷的现实，迫使吉坡的人民抗日军战士，为维护人民的抗日胜利果实，只能勇敢面对更长期、更艰巨的斗争。

(三) 部队复员前后

马来亚共产党在右倾路线指引下，于日本投降后3个月，就接受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关于解散全部人民抗日军的计划，命令各独立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复员的准备工作。第八独立队在组织全体战士讨论复员问题时，虽然对“群众希望和平”的提法有些迷惑，但将几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武装轻易放弃，普遍表示无法理解和接受。不少战士当场伤心流泪；很多战士借着实弹演习的机会，发泄怒火，尽量多耗子弹，不忿气将弹药白送给殖民统治者。大部分指挥员，却感受到很大的思想压力，既难说服自己，又难独立行动。

11月24日，第八独立队司令部及所属4个中队的指战员，全部集中到亚罗斯打北郊甲抛拉巴底(Kepala Batas)飞机场内兵营，周围都是廓尔喀雇佣军的营地。

准备复员的武装战士，只是抗日战士的一部份。在日本入侵吉坡两州的3年8个月艰辛岁月中，荷枪执刀经受战火锻炼考验的大批抗日武装骨干，包括张云、陈鲁、陈古、刘荣光、张田、老杨、志月、温祥、春梅、金锋等等几十人，都没有参加公开复员。

1945年12月1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的全体战士，在亚罗斯打市政广场举行最后一次检阅，参加简单的复员仪式后，乘汽车回归飞机场兵营，即交出全部随身武器500余件，手榴弹及子弹约4000多发。

半小时后，在兵营中召开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

吉打州会成立大会，选出会长白丝木，副会长张江海、戴翔，常务秘书文训，另其他常委陈忠、西风等7人。

复员的退伍战士每人领取复员费350元，每人捐献100元作为退伍同志会的开办基金，少数人捐献了绝大部份复员费。

复员后的八独战士，始终站在吉、玻两州反帝反殖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前列，从此迈步踏上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殖民统治斗争的新历程。

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注②：宜力的华侨抗日军复员后，部份原属流氓分子的成员，劣性不改，仍操武装强盗的旧业，流窜至霹雳州北部和泰国南部勿洞一带，继续残害百姓。

本文撰写及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文训	陈春梅（女）	林坤山	卢能
陈斌	王海志	赖金锋	梁良（女）
庄健英（女）		陈毓光	许明耀
陈德康	郑开兴	董苏泉	刘来芝
方克明	张石头	陈海汀	彭汉强
陈亚辉	伍仙护	林风	林牧
林钦	黄志成	蔡育生	陈有为
练亚发	黄仁	吴月娥（女）	

（由文训执笔整理）

编 后 话

在各方热心人士的支持下，这本反映当年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史册，终于出版了。

本书在编辑过程，我们力求遵循史论兼顾、以史为主的原则。在史的方面，比较注意了各种史料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在论的方面，则着重于讴歌各族人民及其子弟兵——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英雄事迹；无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公正批判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政策，给人民抗日事业所造成的恶果；同时，对抗日阵营内部的缺点和失误，也进行了适当的批评。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认识上难免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疏漏和不周之处，祈望读者加以指正。

在马来亚历史上，1941—1945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感人事迹不胜枚举，本书编辑期间所征集的原始史料也非常丰富，但因篇幅所限，只好“以概求全”，选用了其中比较典型的、主要的内容，尚有近百篇资料，有属于对抗日烈士事迹的介绍，有对某一战役、战斗经过的具体追述，有日军暴行的实录，等等。这些史料同样十分珍贵，编委会拟在今后继续整理出版单行本，作为本书的姊妹篇。

本书卷末附录的抗日烈士英名录，由于缺乏历史的记录，只好凭人们记忆所及加以整理，因而还是很不齐全的，还有许许多多烈士的英名，无法同时刊出，我们深感遗憾，希望知情人士继续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以便今后再作补充。

马来亚抗日战争迄今已经半个世纪了，现在再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往事历历在目。凡是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

人，由于对这段历史印象殊深，自然感受良多；而对于未曾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当代青年，相信亦可从中得到启迪，更加激发起热爱本土的感情，继承先烈的遗志，进一步增强新、马各族人民的精诚团结，为新、马两国的和平、民主、繁荣、昌盛继续作出贡献！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深得原抗日军指战员、民运工作者及侨友会会友的大力支持，出版费用亦由陈云彪先生、以及李振宗烈士亲属等热心人士给予赞助（赞助人芳名见附录），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抗日战争烈士（部分）英名录

一、抗日时期牺牲的马共中央委员：

黄 诚（黄 石） 小 忠（李振宗）
林江石（黄伯遂） 白 衣（李 良）
刘 文（钟步青） 小 路（陈培青）
蔡克明 阿 丘（邱联杰） 张锦章
朱 佬（朱日光）

二、柔南和新加坡：

陈亚福 苏森水 黎 深 翁 祥 陈玉珍
阿 福（余洪） 陈锡清 吕东木 陈家光
阿 川 梁 木 叶 顺 叶秀能 郑 谭
郑 瑶 苏 醒 郑 路 邹 荣 洛 夫
颜尚志 赖火石 黄国忠 亚 凤（女）
黄桂英（女） 吴玉君（女） 黄 叶 林 买
廖公福 符 佛 郑亚来 老 高 亚 九
亚 明 肖 金 李 九 刘 仔 赖秀兰（女）
华 珍 杨 关 亚 黑 亚 克

三、柔北和马六甲：（待补）

四、森美兰州：

刘冠文	邬育民	克 力	钟 萍	符 钦	
王 明	乌痣张	亚 唐	丘 盛	陆 竹	
肖云华	秋 白	丹 星	廖纪兴	肖若望	
曾锦文	钟 光	肖古顺	丁 兰	(女)	
罗亚木	李新福	夫妇	肖运仙	黄日生	
叶运生	朱 吉	肖 华	肖先财	吕 望	
黄 麟	骆 超	肖运来	肖 康	陈二贵	
曾吉麟	梁伟麟	林 清	肖璞顺	肖明钦	
肖可立	肖丁凤	颜锦英	(女)	林金发	
林覃英	(女)	老婢麻	(女)	黄少芳	(女)
李仁祥	李 二				

五、雪兰莪州：

许庆彪	刘 石	黄 光	彭 友	陈天庆
阿 燕	保 伦	刘 友	潘尧裕	陈大龙
张观凤	严 岛	李秀峰	冯瑞升	蓝 明
戴美娇	陈志伟	黄 奋	陈 金	吴亚克
乾 明	李贵祥	辉 炉	钱 锦	叶遂志
阿 明	马福登	李吉磷	龙世泽	陈大元
曾 议	张 炳	张 元	杨 恭	叶 关
钟 旺				

六、西彭亨：

郑清凉	陈秀清	黄锦洪	谢婉如
潘 松	(夫妇)	潘 林	张 才

梁譚胜 邓 近 傅 弟 肖清泉
 饶 托 巫 亚 老 肖 (知知港金龙人)
 李效群 张发 (加叻人) 张 良
 亚 让 (英国人, 英军溃退时流落在“二独”, 后转移到“六独”, 日本投降前病逝。)

七、东彭亨和丁加奴州:

肖新民	曾家补	李 达	莫有山	黄星龙
冯 芳	吴忠运	何 生	李 吉	尤 成
刑 丰	伍书典	符可海	陈载钦	符可禄
阿 全	黄 昆	陈 兴	吴 章	王孝宜
黄 胜	邱英华	陈 林	陈 真	黄幼文 (女)
陈 标	叶 成	符瑞书	颜 印	吴忠运

八、霹雳州:

刘 平 (沈元秀)	赖莱福 (杜龙山)	蔡 福
张伯伦	曾 维	路 河
张 宝	张兆士	陈 记
		朱天送

九、吉打州和檳城:

陈炳宏	陈文燕	白 杨	小 周	杨 克
傅亚宁	胡卫忠	肖亚河	阿 岳	黄 秀
何亚泉	何 鎬	阿 初	阿 冰	螺 珠
乌 马	方壮志	小 波	钟才妹 (女)	
林锦猷	郑翼秋	谢维汉	刘 刚	老 顾
陈凤娥 (女)		梁廷业	陈克俊	庄学祉

徐振忠	庄荣国	陈穷农	黄文章	李来晚
叶向荣	许欲似	沈星云	王淮东	梁栋材
蔡有松	柯连务	丘丕芬	陆 伍	鲁沙子
黄玉心 (女)		陈珍友 (女)		许福泰
庄锡祉	林 城	张桂光	张桂才	巴 舌
陈焕南	许福炎	亚 春		

十、吉兰丹州：(待补)

本书出版经费赞助人芳名录

(一) 港澳地区及国外赞助人名单:

陈云彪 30,000 元(港币,下同)

李振宗烈士亲属 10,000 元

岑远之 2,000 元

黄炳和 1,000 元

伍俊敏 1,000 元

彭国强 1,000 元

陈国顺 1,000 元

侨友社旅社 1,000 元

陈云辉 500 元

李侨生 500 元

陈东江 500 元

官志钧 500 元

一 春 1,368 元(原叻币折成港元计算,下同)

罗邦秀 1,368 元

李志光 1,368 元

张 岗 1,048.79 元

罗秋圃 1,003.19 元

陈 辉 1,003.18 元

王 泽 1,003.18 元

谢老子 1,003.18 元

罗清远 1,003.19 元

赖先生 1,000 元

陈彩芸 456 元

黄玉梅 228 元

林 杰 228 元

(二) 中国境内赞助人名单:

(以下除注明为港币外皆为人民币)

刘 鸿 2,000 元(港币) 廖兴理(林理) 500 元

林 钦 320 元

文 训 300 元

曾冠彪 300 元

曾月华 300 元

谢更生 300 元

陈 英 300 元

陈桂枝 300 元

叶偶欢 300 元

王耀光 300 元

杨诚忠(白冰)300 元

叶志辉 300 元

尹天雄 300 元

张 昌	300 元	叶仕生	300 元
陈先生	300 元	丘碧云	300 元
侯 斌	300 元	邓志光	300 元
李光明	300 元	蔡惠仁	300 元
刘 方	300 元	蓝少基	300 元
叶秋萍	300 元	梁 明	300 元
老 卢	300 元	冯尧新	300 元

(注：以上名单，是根据 1991 年 12 月 10 日发稿时统计的数字，发稿后收到的款项，因时间关系未能刊出。同时，受篇幅限制，国内赞助 300 元人民币以下的名单，未能一一列出，敬请原谅。)



CICIR 029434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新马侨友会编

香港见证出版公司发行

**THE WITNESS PUBLISH COMPANY
OF HONG KONG**

海院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1/32 12.8印张270千字

199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 HK \$ 50圆

